



國立中山大學大陸研究所博士班 博士論文

解放軍的政治影響力—解放軍參與外交政策之研究

(PLA Political Influence—PLA Participation in China Foreign Policy)

研究生：林麗香撰

指導教授：林文程博士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七月

提要(中文)

中共建立政權以來，解放軍的政治角色及影響力有著不同的轉變。在毛澤東時期，解放軍的政治角色受到毛澤東至高無上的魅力和權威之影響，軍隊服從並聽命於毛澤東，解放軍成為效忠毛澤東個人的軍隊，具有強烈的工具性角色；改革開放後，鄧小平極力想要轉變軍隊以往過度政治化的角色，使軍隊不再捲入黨內政治鬥爭，故推行軍隊現代化，將軍隊重心置於本務上；在鄧小平過世之後，由於新領導人江澤民在軍隊中無強人的軍事背景，為了拉攏軍隊的支持，江澤民只好靠著黨領導人的資源分配與人事權來掌握與控制軍隊。此外，因後冷戰時期外交事務日益繁雜，牽涉層面愈趨廣泛，使得外交政策的制定更須幕僚機構所提供的意見，而軍隊的研究、分析與情報機構就扮演極為重要之角色。在江澤民時期，解放軍參與外交決策的機會與管道增多，透過角色重疊、外事領導小組及其他非正式方式，解放軍在外交決策過程中的影響力也較毛澤東時期及鄧小平時期更強大。

本論文研究動機是希望瞭解解放軍政治影響力之變化情形，期望藉由分析解放軍在中共外交決策的實際參與情形，以探求解放軍的政治影響力。本論文研究目的有五點：1. 探究解放軍政治影響力轉變之因素；2. 藉由解放軍參與外交決策的制定，瞭解解放軍之政治影響力；3. 透過軍事外交之分析，明瞭解放軍配合及實踐中共國家外交戰略之狀況；4. 分析解放軍與外交部門的不同立場及衝突，以瞭解解放軍在外交政策中之強硬態度；5. 藉由領導者決策模式、黨軍關係的變化、政局穩定及國家安全議題等四個層面的分析，推論未來解放軍之政治影響力。

本論文將先分析影響解放軍政治影響力之因素；其次，探究在不同領導者時期，解放軍參與外交決策制定之方式，並說明解放軍在外交決策中的角色及影響力；再次，分析解放軍在重視軍隊現代化、政治局勢呈現穩定及非國家安全議題的情況下，其對外軍事交往的情形；第四，針對解放軍與外交系統的衝突作一說明；最後，推論解放軍未來的政治影響力情形。

Abstract

In Mao's era, Mao Zedong had a dominant leadership role, and PLA political role was affected by Mao's authority. PLA had to subordinate to Mao's order. PLA only played a role as a tool. After the 1978 reform, Deng Xiaoping promoted military modernization in the 1980s to reduce the political influence of the military. After Deng's death, Jiang Zemin lacked the personal authority and military background. As a result, Jiang had to grant concessions to PLA in order to ensure its support. One concession had obviously been the unprecedented participation of military chiefs in foreign affairs decisions that were of concern to PLA, including issues related to Taiwan and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Besides, in Jiang's era,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nnels which PLA participated in foreign policies increased. PLA influence in foreign policy was stronger than Mao's era and Deng's era.

The research motivation of this essay is to expect that can understand the change of PLA political influence. The research aims of the essay include the following: 1. exploring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PLA political influence; 2. probing into PLA participation in foreign policy, and realizing PLA political influence; 3. analyzing military diplomacy, and understanding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PLA and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4. probing into the conflict between PLA and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nd understanding PLA strong attitude; 5. analyzing the decision model, Party-Military relations, political situation, the issues related 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and deducing PLA political influence in the future.

致謝辭

猶記六年前，隻身前往中山大學大陸所考試，當時的我，懷著對知識追求的梦想踏進博士班，開始六年的求學生涯。在博一及博二的修課時間裡，大部份時間都沈浸在書堆中，常常以麵包及饅頭果腹，然而卻不以為苦，因為精神層面的豐富知識讓我忘卻物質生活的困苦。博三那年，我經歷人生最大的身心理變化——懷孕生子，兒子的？生讓我的人生更多采多姿，孩子讓我學會重新審閱人生的真諦及意義。爾後，生活就在工作、學業及家庭的忙碌中渡過。

如今能順利完成博士學位，實歸功於多人之支持與鼓勵。感謝指導教授林文程博士在百忙中撥冗詳閱學生之論文，並在研究過程中給予論文整體架構的指導，此外更感謝林中斌博士、丁樹範博士、陳勁甫博士及莫大華博士於口試期間的鼓勵與指導，使本篇論文架構及內容更加完整。

而公婆分擔育兒的責任、兄(耀鄰)姐(佳惠)妹(麗容)不時的鼓勵、同事(空軍航空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人文組)在工作上的協助，使我有勇氣面對人生的起伏；先生裕中之體諒與支持，更是我生活及心靈的最大支柱；當然寶貝兒子祐祐之可愛與貼心，是我生活喜樂的最大來源。幸虧有這些親友及同事的幫助與鼓勵，否則無法有今日我的成就。

最後，我將此份榮耀奉獻於含辛茹苦的父母：林老春先生及林方春梅女士，如無你們的養育之恩，則無今日的我，感謝你們。

目 錄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1
第二節 問題意識與研究假設.....	7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8
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途徑.....	9
第五節 文獻回顧.....	15
第六節 研究架構.....	29

第二章 解放軍政治影響力轉變之因素

第一節 決策模式.....	34
第二節 黨軍關係.....	41
第三節 政局穩定.....	57
第四節 國家安全議題.....	61
第五節 小結.....	63

第三章 解放軍參與外交決策制定

第一節 外交決策的制定.....	66
第二節 解放軍參與外交決策的機構.....	72
第三節 解放軍參與外交決策的方式.....	78
第四節 解放軍在外交決策中的影響力.....	82
第五節 小結.....	90

第四章 組織合作—軍事外交

第一節 軍事外交的目的.....	92
第二節 軍事外交的類型.....	103
第三節 軍事交流的主要國家.....	118
第四節 小結.....	134

第五章 組織衝突及案例分析

第一節 中美關係.....	135
第二節 軍機擦撞事件.....	144
第三節 台灣問題.....	151
第四節 1995-1996 年台海危機事件.....	161
第五節 小結.....	165

第六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發現.....	167
第二節 未來解放軍之政治影響力.....	173

參考書目

中文參考資料.....	184
英文參考資料.....	198

表目錄

表 1-1	中共政權結構.....	1
表 2-1	中共自改革開放以來的軍事費用狀況.....	38
表 2-2	中共已經購買及將要購買的國外武器裝備.....	51
表 2-3	不同領導者時期之解放軍政治影響力.....	65
表 3-1	外交事務各階段負責的黨政機構.....	73
表 3-2	中央軍委主席副主席在黨內職務關係表.....	75
表 3-3	解放軍在政治局及中央委員中的比例.....	79
表 3-4	解放軍在外交決策過程中的政治影響力.....	90
表 4-1	中共與各國建立夥伴、睦鄰關係的情形.....	95
表 4-2	近年來中共軍事高層人員出國訪問情形.....	104
表 4-3	中共海軍軍艦外訪的情形.....	107
表 4-4	後冷戰時期中共向俄羅斯購買武器系統一覽表.....	110
表 4-5	近年中共武器技術輸出遭美制裁案.....	115
表 4-6	中共軍隊與外國軍隊舉行聯合演習情況.....	117
表 4-7	中共與美國軍事合作及交流概況表.....	124
表 4-8	後冷戰時期中印軍事交流的情形.....	132
表 5-1	軍機擦撞事件經過大事紀.....	145
表 5-2	兩岸貿易金額之估算.....	155
表 5-3	台灣對大陸貿易占我外貿之比重.....	157
表 5-4	台海危機共軍七波演習.....	165
表 5-5	外交系統與解放軍的立場.....	166
表 6-1	解放軍之政治影響力.....	171
表 6-2	胡錦濤主要黨政軍經歷.....	175
表 6-3	十六屆軍委會成員.....	177

表 6-4	十五屆軍委會成員.....	178
-------	---------------	-----

圖目錄

圖 1-1	研究架構圖.....	32
圖 2-1	中共黨軍結構關係圖.....	45
圖 2-2	解放軍政治影響力與四項影響因素的關係.....	64
圖 3-1	中共組織系統圖.....	67
圖 3-2	中共外交政策的決策體系圖.....	72
圖 3-3	領袖主導決策模式.....	84
圖 3-4	集體領導決策模式.....	87
圖 3-5	官僚政治決策模式.....	89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中共自建立政權以來，黨的組織滲透到國家體制，形成一種「黨—政—軍—法—經濟—意識型態—文化」統一體的黨國體制。¹如西方學者所指出：共產中國是「由政黨、政府和軍隊三重權力所組成，每一部份都自成體系，但由共產黨的領導連結在一起。」²這原則也體現在中共政治體制的四套班子—黨委、人大、政府、政協，而「黨委」始終是領導核心（見表 1-1）。中共黨之權力結構，從縱面來看，依行政層級劃分（中央級、省級、地級、縣級、鄉級）為五級，配上共產黨系統的二套機構，即黨的委員會、紀律檢查委員會，成為基本的黨組織架構，加上完整及嚴密的軍、公安、法、政、宣傳、統戰、群眾、經濟、企業、文化、社會等各種形形色色的團體，組織起全面的共產黨統治的網路，全面地涉入及干預人民生活的每個層面。

表 1-1 中共政權結構表

層級	黨	人大 / 政協 / 自治組織	政府	軍隊
中央	中央委員會 中紀委	全國人大 / 全國政協	國務院 最高法院 最高檢察院	中央軍委
省級	省委 省紀委	省人大 / 省政協	省政府 高級法院 檢察院	省軍區
地(市)級	地(市)委 地(市)紀委	市人大 / 市政協	市政府 中級法院 檢察院	軍分區
縣級	縣委 縣紀委	縣人大 / 縣政協	縣政府 法院 檢察院	武裝部
鄉(鎮)	鄉黨委 紀檢組	鄉鎮人大 / 鄉鎮政協	鄉鎮政府 *法庭	武裝部

¹ 蘇紹智，*中國大陸政治經濟的再認識*(台北：風雲論壇出版社，1995年)，頁31。

² John K. Fairbank and Edwin O. Reishauer, *China: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 1989), 493.

資料來源：整理自朱光磊著，*當代中國政府過程*（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頁65；”
中國共產黨章程，”*人民日報*（北京），2002年9月19日，版1。

在中共黨國體制下，黨成為最重要的決策機構，國家的一切事務皆由黨來管理，黨政軍關係成為「黨政不分」、「以黨代政」及「以黨領軍」的狀況。雖然在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時，鄧小平提出「黨政分開」政策，³並於1981年8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講話時，提出應對現行制度存在的官僚主義、權力過分集中、家長制、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等各種弊端加以改革。⁴然而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黨政分開」成為被批判的論點，中共重新加強黨對政府和各方面的控制。⁵到了第三代領導者江澤民和第四代領導者胡錦濤仍舊強調黨的領導角色。2004年十六屆四中全會上，江澤民特別指出要「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始終把思想政治建設擺在首位，永保人民軍隊的性質、本色和作風。」⁶而胡錦濤在2004年9月中央軍委擴大會議更指出「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我軍建設和發展的首要問題。我們對這個問題要始終關注、抓住不放，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能有絲毫含糊和動搖。要抓住軍隊黨的建設這個關鍵環節，增強各級黨組織的創造力、凝聚力、戰鬥力，充分發揮黨委的核心領導作用、黨支部的戰鬥堡壘作用和黨員的先鋒模範作用。要堅持把思想政治建設擺在部隊各項建設的首位，加強思想政治工作，嚴格政治紀律和組織紀律，確保政令軍令暢通，確保全軍官兵堅決聽從黨中央和中央軍委指揮，堅決同黨中央和中央軍委保持一致。」⁷

在中共特殊的黨政結構中，黨與軍之關係成為「黨中有軍，軍中有黨」，軍隊成為「黨軍」。⁸軍隊中有「黨委」，加上黨內的中央委員會負責對軍隊的指揮，使得中共軍隊成為「黨軍」，而非國家的軍隊。不僅如此，共產黨國家的軍隊，多數領導者均具有黨員身份，使他們具有資格以黨的名義，參與包括軍中黨委與黨中央委員會的政治活動。正由於此種黨軍的一體性，使軍人即使從事於軍事專

³ 鄧小平在1978年12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中，特別提出「國有國法、黨有黨規黨法」的觀念，並將此概念納入隨後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公報第二部分。*十三大以來重要文件選編(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1-14。

⁴ 鄧小平文選，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322。

⁵ 1992年十四大的人事安排打破黨政分際的原則，為了強化黨的領導，中共又走向黨政一體的人事佈局。國家主席、人大委員長、政協主席此三項國家最高領導者，均由掌有實權的政治局常委兼任。

⁶ “中國共產黨十六屆四中全會，”*北方網*，2004年9月26日。

⁷ “江澤民胡錦濤出席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北方網*，2004年9月21日。

⁸ 以軍隊的性質來區分，當代世界上的軍隊分為三種類型：西方民主國家的職業型軍隊、第三世界國家的權力型軍隊和共產黨國家的革命軍隊。有關此三種軍隊的描述可參閱Amos Perlmutter, *The Military and Politics in Modern Tim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7), chapter 1.

業活動，也須瞭解黨的政治事務。這種對軍人角色的要求，不但不是軍人的壓力所造成，反而是黨的中央組織對軍人的強制性政策。因此，認識與熟悉政治事務，參與黨的政策，成為軍人黨員的權利與義務，⁹軍人參與政策制定的過程也就成為合法性之行為。

自中共建立政權以來，軍隊的政治角色有著不同的轉變。共軍的政治角色在改革開放前受到毛澤東建軍思想的影響，表現出一種「以政治為重、多功能的角色、軍民一致」的人民軍隊的特色，甚至成為效忠毛澤東個人的軍隊，而不可避免的高度政治化，具有強烈的工具性角色。改革開放後，鄧小平極力想要轉變共軍以往過度政治化的角色，使共軍不要再度捲入黨內政治鬥爭，而扮演以戰鬥隊為主，生產隊為輔的角色。但由於受到意識型態、組織結構和歷史傳統的影響，其工具性角色並沒有很大的改變，在面臨嚴重的派系衝突或權力鬥爭時，軍隊的支持成了重要關鍵，也成為各方爭相援引的勢力。¹⁰

在鄧小平過世之後，由於新的領導人江澤民在軍隊中無強人的軍事背景，為了拉攏軍隊的支持，江澤民只好靠著黨領導人的資源分配與人事權來掌握與控制軍隊。如同學者喬飛(Ellis Joffe)所指，軍方對江澤民的支持，並不是因為他有領導軍隊的能力，而是因為江澤民對軍隊特別大方，¹¹軍隊在江澤民的領導下，各項福利源源不絕，¹²所以在江澤民時期的黨軍關係出現「江澤民的弱勢與軍方的強勢」趨勢，使得軍方對政治事務的介入與影響倍於往昔。1995-1996年台海危機事件及2001年中美軍機擦撞事件正突顯出解放軍在相關國家安全議題的外交政策上，其影響力與日俱增。

根據1997年3月通過的《國防法》，將「國防」界定為「國家？防備和抵抗侵略，制止武裝顛覆，保衛國家的主權、統一、領土完整和安全所進行的軍事活動，以及與軍事有關的政治、經濟、外交、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活動。」¹³另外，在《2004年中國的國防》白皮書中也指出，解放軍的任務在於「維護國家安全的基本目標和任務是：制止分裂，促進統一，防備和抵抗侵略，捍衛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海洋權益；維護國家發展利益，促進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不斷增強綜合國力；堅持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協調發展的方針，建立符合中

⁹ 林長盛，「中共黨軍關係的模式與變遷」，林長盛編，*解放軍的現狀與未來*(台北：桂冠文化，1993年)，頁130。

¹⁰ 沈明室，「中國共產黨之轉型及共軍『軍隊國家化』之探討」，*和平論壇*，2003年10月20日。

¹¹ 英國廣播公司(BBC)2002年7月14日對Ellis Joffe的專訪，引自陸委會大陸動態簡報，2002年7月15日。

¹² 江澤民在1997年十五大接下軍委主席後，以提高軍事費用、提高軍人待遇、不斷走訪基層部隊、提拔高階將領軍階、尊重軍人的軍事事務主導權及強調黨對軍隊領導的方式，作為拉攏軍隊的方法。有關此部份的細節內容可參閱本論文第二章第一節。

¹³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法」，*人民網*，1997年3月14日。

國國情和適應世界軍事發展趨勢的現代化國防，提高資訊化條件下的防衛作戰能力；保障人民群眾的政治、經濟、文化權益，嚴厲打擊各種犯罪活動，保持正常社會秩序和社會穩定；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堅持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的新安全觀，爭取較長時期的良好國際環境和周邊環境。」¹⁴

解放軍視自己為中國領土主權及國家尊嚴之捍衛者，因此與國家安全利益和領土主權相關的決策，解放軍都希望領導者採取適當的強硬外交政策。¹⁵ 喬飛指出，解放軍對某些特定議題的影響力與日俱增，特別是有關於國家獨立與領土的統一的議題，包含台灣問題、中美關係、香港與南中國海、核武測試、非擴散政策、軍售和多邊安全等等。¹⁶

正因為解放軍負責國家安全，而國家安全又為外交政策的最高目標，因此在外交決策制定過程中，與軍事領域或國家安全議題有關的決策，解放軍都會表達其意見，並試圖影響國家政策的走向。尤其是近年來，解放軍積極發展與世界各國的軍事交往活動，目前中共已與 150 多個國家建立軍事關係，在 100 多個駐外使館設立武官處，有 85 個國家在中共設立武官處。解放軍高級軍事代表團已出訪過 60 多個國家，有 70 多個國家 130 餘批軍隊領導人來訪。中俄軍事關係繼續保持良好勢頭，2003 年 10 月中共國防部長在時隔七年後首次訪美；2003 年 5 月日本防衛廳長官五年後再次訪問中共；2003 年 4 月和 2004 年 3 月，印度、中共國防部長實現多年後的首次互訪；中共與歐洲國家的軍事交流向縱深發展；中共深化與周邊國家的軍事關係，加強與廣大發展中國家的軍事交流，繼續向一些國家的軍隊提供人員培訓、裝備器材、後勤物資、醫療衛生等方面的援助。¹⁷ 中共對外軍事交流在 2005 年更加務實及有效。全年共與 138 個國家的軍隊開展了軍事交往，接待 33 個國家的國防部長和 21 個國家的軍隊總參謀長來訪，參加雙邊和多邊磋商與合作等活動 41 項，向美國等 10 個國家提供緊急救援 3 次。2005 年 9 月解放軍邀請 24 國的 40 多名軍事觀察員 駐華武官觀摩了在北京軍區朱日和訓練基地舉行的「北劍—2005」演習。11 月海軍出訪艦艇編隊，還先後與巴基斯坦海軍 印度海軍和泰國海軍舉行以聯合搜救為主要內容的非傳統安全領域演習。¹⁸ 近年來，解放軍對外軍事交往之頻繁，直接促使解放軍在外交政策的制定中扮演一定的角色及影響力。

¹⁴ “2004 年中國的國防，” *新華網*，2004 年 12 月 27 日。

¹⁵ Arthur Ding, “The PLA and New Generation of Chinese Leadership,” *CAPS-RA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PLA Affairs*, U.S.A., August 15-16, 2003, p.7.

¹⁶ J.C. Mulvenon & R.H. Yang,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in the Information Age* (Santa Monica, California: Rand Corporation, 1999), 39.

¹⁷ “2004 年中國的國防”。

¹⁸ “軍事外交 營造和平發展安全環境，” *解放軍報* (北京)，2005 年 12 月 29 日。

軍事交流係指國家與國家之間，以國家安全為目的在軍事上建立的各種接觸、聯繫和關係，以及與此有關之各種活動的總稱；因為此種外交活動經常帶有顯著的軍事性質與戰略意義，故又稱之為軍事外交。¹⁹如同中共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副院長王在邦所表示：「頻繁的軍方高層互訪表達中國軍事外交正密切配合國家總體外交。中國與外國高層軍事交流是增強彼此戰略信任的最便捷途徑，加強與大國的軍事高層交往有助於維護大國關係的全面平衡發展，對於需要維護戰略機遇期的中國至關重要。」²⁰可見，中共對外的軍事交流已成為其全面性外交政策的重要一環，解放軍對外展開軍事交往，係配合其整體國家安全戰略，具有高度政治、外交之意涵。

基本上，解放軍對於國家戰略目標與政策是以服從與配合為主。江澤民在解放軍會議中明白指出，「國防建設必須服從國家經濟建設的大局。」²¹胡錦濤在第十五次政治局集體學習上也提出，「堅持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協調發展。」²²原則上，解放軍與外交部對於中央外交政策的主張，有下列的共識：1.維持一個穩定與和平的外部環境，以持續經濟發展，利於軍事現代化的進行。2.維護國家主權的完整和促進國家統一。3.追求成為強權的國際地位。²³

然而，由於外交決策過程涉及政府內部其他組織不同的利益、影響力，參與決策的個別成員又各自有其價值判斷、認知、目標、既得利益及權力，因此各個組織的立場都有「組織本位主義」。從社會學的「角色理論」觀之，「組織本位主義」會對組織領導者產生壓力，讓領導者在作決定時必須考量到所代表組織的利益。²⁴一個組織在執行政策時希望能保有自主性及決定權，不希望自己的專業職權被其他組織所侵犯，更希望在政策過程中爭取到最多的預算，繼續本身職務的進行。因此在決策過程中，意見或立場不同的相關組織單位，必須透過常規管道進行協商，而最後政策的採行與推動，也就成為政治角力的結果。²⁵

外交學權威尼柯勒生(Harold Nicolson)認為外交是根據談判來處理國際關係的事務，而國際關係是依照大使或使節來調整、處理的方法，屬於外交官的業務及技術。²⁶這個定義將外交視為外交官員運用交涉等處理國際關係之方法，其所

¹⁹ 賀俊起主編，《國防的多維結構》(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90年)，頁227。

²⁰ “2005年中國軍事外交『高與深』初露端倪，”《國際在線》，2005年2月2日。

²¹ “廿年來軍隊建設的歷史經驗，”《文匯報》，1999年7月8日，版4。

²² “政治局學習：堅持國防與經濟建設協調發展，”《新華網》，2004年7月26日。

²³ Michael D. Swaine, *China: Domestic Change and Foreign Policy* (S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 1995), 81-84.

²⁴ Robert L. Pfalzgraff, Jr. and James E. Dougherty, *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J.B. Lippincott Company, 1971), 455-458.

²⁵ Graham Allison & Philip Zelikow, *Essence of Decision* (New York: Addison-Wesley Longman, 1999), 295.

²⁶ Harold Nicolson, *Diplomacy*, 3rd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15.

注重的是技術層面。另外，普力斯凱(Elmer Plischke)則認為外交有六項意義：²⁷

- 1.外交是指主權國經由授權的代表，依據國際法處理國與國之間事務的科學。
- 2.外交是指藉由談判來管理國際關係。
- 3.外交是處理國際間交流的事務或藝術。
- 4.外交乃是國防的第一線。
- 5.外交是指除了應用武裝衝突外，任何國家嘗試達成其對外政策的藝術和科學。
- 6.外交可以說是在戰爭開始之時停止，而在戰爭結束之時開始。

由普力斯凱對外交的定義可以得知，外交是以和平手段來達成國家的對外政策，外交可以簡略的定義為「外交人員藉由和平的方式，以處理國際關係的方法和手段。」外交是代替軍事戰爭的方法，外交與軍事戰爭是相對的。

以中共外交部的立場來說，1978年改革開放後，外交政策路線一直相當審慎與務實，主要係著眼於長程需求，以建立與維持一個穩定的外界環境，利其持續保持經濟成長和進行現代化。²⁸為推行此一政策，外交部希望與世界各國保持和睦友善的關係，因此外交手段以和平軟性的方式為主；但對於軍隊來說，軍隊的職責在於維護國家安全及捍衛領土完整，解放軍基於軍方利益的戰略和目標，在外交決策涉及軍事領域或是與國家安全有關的議題上，傾向採取強硬的態度來捍衛國家主權和安全，²⁹而這種態度與外交部主張以友好睦鄰政策為主的軟性外交政策有著衝突之處。2001年中美軍機擦撞事件及1995-1996年台海危機事件即是外交部門與解放軍系統產生衝突之最佳案例，在本論文第五章將針對這兩個案例作一詳盡的分析。

本論文的研究動機主要是希望瞭解解放軍政治影響力之變化情形，期望藉由分析解放軍在中共外交決策的實際參與情形，以探求解放軍在中共政治體制中的角色及影響力。本論文的研究目的有以下五點：

1. 探究解放軍政治影響力轉變之因素。

²⁷ Elmer Plischke, *Modern Diplomacy: The Art and the Artisans*(Washington, D.C.: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1979), 54-72.

²⁸ Michael D. Swaine, *The Role of the Chinese Military i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making* (Santa Monica: RAND, 1999), 20.

²⁹ 「強硬(Strong)態度」是指解放軍在國家安全或主權領土相關的外交決策中，為了維護國家安全與主權完整，因此態度傾向強硬或採取軍事手段。而此種態度與外交部門堅持「軟性(Soft)」及和善的態度是相對的。以2001年中美軍機擦撞事件為例，解放軍系統堅持美方必須道歉、立即停止對中國沿海的軍事偵察活動和作出賠償；外交系統的立場則主張美國道歉即可。有關解放軍系統與外交系統在中美軍機擦撞事件中的態度及立場可參閱本論文第五章第二節。

2. 藉由解放軍參與外交決策的制定,正確地瞭解解放軍之政治影響力。
3. 透過軍事外交之分析,明瞭解放軍如何配合及實踐中共的國家外交戰略。
4. 分析解放軍與外交部門的不同立場及衝突,以瞭解解放軍在外交政策中之強硬態度。
5. 藉由領導者決策模式、黨軍關係的變化、政局穩定及國家安全議題等四個層面的分析,推論未來解放軍之政治影響力。

根據以上的研究目的,本論文將先分析自 1949 年以來,解放軍的政治影響力轉變,瞭解解放軍的政治影響力變化;其次,探究在不同領導者時期,解放軍參與外交決策制定之方式,並說明解放軍在外交決策中的角色及影響力;再次,分析解放軍在重視軍隊現代化、政治局勢呈現穩定及非國家安全議題的情況下,其對外軍事交往的情形;第四,針對解放軍在外交決策中的強硬態度作一說明;最後,推論解放軍未來的政治影響力情形。

第二節 問題意識與研究假設

本論文的研究主要源自於兩個重要的問題意識:

- 一、中共建立政權以來,軍隊政治影響力之變化問題。在不同領導者時期,解放軍的政治影響力是否有所不同?軍隊的政治影響力變化是受到那些因素的影響?
- 二、解放軍在外交決策過程中的角色及影響力問題。在外交決策過程中,解放軍與外交部的立場為何?兩個組織間的關係是屬於合作或衝突?

根據以上二個問題意識,本論文有以下六點假設:

假設一 不同的領導者決策模式造成解放軍之政策影響力相異。

假設二 軍隊現代化造成解放軍在政治上的影響力逐漸降低。

假設三 國內政局不安或權力繼承未穩固促使解放軍的政治影響力愈形強大。

假設四 當外交事務涉及國家安全或領土主權相關的議題時,解放軍將竭盡所能的發揮政治影響力。

假設五 當外交事務與國家安全或領土主權糾紛無關時,解放軍的立場以服從及

服務國家外交戰略為主。

假設六 若外交事務涉及國家安全或領土主權相關的議題時，外交部的政策以軟性與和善為主，而解放軍一般都堅持在外交政策層面應以強硬的態度為主。。

本論文將依據以上六點假設，逐次在各章節中驗證這些假設內容的真偽。第二章節及第三章節的內容主要是驗證假設一至假設四的論點。第二章將先探討毛澤東時期、鄧小平時期及江澤民時期的決策模式，並分析在不同的決策模式下，解放軍之政治影響力強弱情形。此外，並對影響解放軍政治影響力的其他因素(黨軍關係變化、政局情勢、國家安全議題)作一說明；第三章則分析解放軍參與外交決策制定的機構與方式，並依不同領導者決策模式，以探究解放軍在外交政策中之影響力；第四章至第五章分別探討解放軍系統與外交部門之合作與衝突情形，以驗證假設五及假設六的論點是否正確。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由於時間與能力的限制，本論文的研究範圍界定如下：

(一)本論文的研究時間範圍是由中共建政(1949年)開始，一直至現今胡錦濤主政時期，主要涵蓋四個領導者時期：毛澤東時期、鄧小平時期、江澤民時期及胡錦濤時期。然而，因胡錦濤主政時間尚短，許多外交政策的特色及執行未能展現，因此對於胡錦濤時期的探討，將於第六章結論部份來分析及預測。

(二)為了真正探析解放軍的政治影響力，本論文是以解放軍參與外交決策制定情形作為實際的分析，至於解放軍參與其他國家決策的探討，本論文將不列入研究範圍內。

(三)解放軍對於國家主權及國家安全的議題一向都是持著強硬態度，本論文將以解放軍最關切的議題作為探討重點，將以台灣問題及中美關係作為研究的議題。雖然中共聲稱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問題，但實則中共在處理台灣問題時，不能以內部決策的方式對台灣下令，³⁰其處理方式介於處理內政與外交問題之間，而且較偏向外交決策模式。中共將台灣問題視為中美關係下的台灣因素，中共對台政策可歸納為對外政策的一環，故本文將台灣問題視為中共外交政策的範圍。

³⁰ 楊開煌，「中共『對台政策』解釋與評估—決策人物取向之研究」，*東吳政治學報*，第7期(1997年3月)：頁73。

二、研究限制

本論文的研究限制主要在於資料的蒐集及資料的可信度。在大多數國家，外交決策的過程都是封閉和不透明的，中共的外交政策向來也有著難以探求真象的困境，中共外交界常有的「外事無小事」、「外交官是不穿軍裝的士兵」等說法，也說明了中共把「外交」視為政治上最敏感、控制最嚴的領域。³¹何況，本論文主要是探討解放軍與外交決策的關係，由於此類資料關係到中共重要的黨政機密，是以資料取得相當不易；再者，由於中共官方發表的文件通常為政策辯護文件，宣傳意義大於實質意義，使得中共的資料可信度受到質疑，間接造成研究中中共外交政策的困難度。最後，受限於本身任職於軍事院校的關係，無法親自在中共實地從事研究與訪談，實為本論文之最大缺憾。

由於資料蒐集困難，加上中共官方資料真實性檢驗困難，故為了降低論文資料蒐集及可信度的限制，本論文期望透過參考國內外學者的學術著作及文章，輔以中共官方及媒體所公佈的資訊進行多方比對，以降低資訊及數據的誤差，提高資料及數據之正確度。

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途徑

在社會科學的研究中，研究途徑(research approach)與研究方法(research method)同等重要，研究途徑是指選擇問題及資料的準則，而研究方法則是指蒐集、處理資料的技術。³²本論文將由「決策系統研究途徑」切入，藉由文獻分析法之研究方法，探究中共解放軍參與外交決策的過程，以瞭解解放軍之政治影響力。

一、文獻分析法：

文獻分析法是政治學者經常使用的研究方法，其目的在於辨別真偽、推敲其歷史淵源及對後世的影響、剖析其隱藏的涵義等。³³文獻資料分析的研究步驟包括：1.確定問題與擬訂假設：先決定合乎個人興趣與能力的研究範圍，並在此範圍內，廣泛探討有關文獻，包含專書、專刊及他人所作的研究報告或論文。確定有意義的研究題目。問題經確定之後，其次應建立明確而可以驗證的假設。再根據假設探求在史料文獻專書上的證據。2.蒐集文獻資料：文獻資料分為原始資料

³¹ 王緝思，「國際關係理論與中國外交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季刊》，第1期(1993年2月)：頁85。

³² 易君博，*政治理論與研究方法*(台北：三民書局，1984年)，頁98。

³³ 呂亞力，*政治學方法*(台北：三民書局，1994年)，頁133。

和次級資料。前者係指公私機關或私人紀錄、文稿、檔案、日記、自傳及其他文件。後者係指相關研究文件或出於他人的轉述資料。當然，原始資料雖是歷史研究的基本材料，但也最為珍貴，不過有時次級資料亦有其用途。3.分析資料：資料獲得之後，研究者尚須加以分析，藉以釐清並整理其內容。4.解釋與歸納資料：運用歸納方式對於所蒐集的資料加以整理及解釋，並藉以提出研究者的看法。³⁴

本論文主要透過相關史獻的收集與整理，探究出解放軍的政治影響力、解放軍參與外交政策制定、軍隊對外軍事交往情形及解放軍在外交決策中的強硬態度。本論文的文獻來源主要包括官方文獻及非官方文獻：

(一)官方文獻

官方文獻是指國內外各政府機構所公佈的資料，這些機構包含了中共國務院發行的國防白皮書、我國國防部發行的國防報告書、美國國防部向國會提報年度的《中共軍力報告》、日本防衛白皮書，以及中共國務院各外交與涉台政府單位、我國行政院各單位、我國陸委會、美國中央情報局、美國國防部及其相關機構等所公佈的中共軍事與外交訊息。

中共國務院自 1998 年開始發行國防白皮書，至今(2006 年 6 月)共發表過《1998 年中國的國防》、《2000 年中國的國防》、《2002 中國的國防》及《2004 中國的國防》等四本白皮書；我國國防部自李登輝執政時期，為了全民國防理念及爭取全體國民對全民國防的認識，於 1992 年發行第一本國防報告書，並於每兩年發布一次，截至目前為止，共有《81 年國防報告書》、《83 年國防報告書》、《85 年國防報告書》、《87 年國防報告書》、《89 年國防報告書》、《91 年國防報告書》及《93 年國防報告書》等七本報告書；美國國會在 2000 年國防授權法案中要求美國行政部門每年必須向國會提報年度的「中國軍力評估報告」，以供美國國會及人民瞭解中共軍力發展的狀況及亞太局勢的變化。迄今，美國國防部已向國會作過《2002 年中共軍力報告書》、《2003 年中共軍力報告書》、《2004 年中共軍力報告書》、《2005 年中共軍力報告書》及《2006 年中共軍力報告書》等五本報告書。

日本年度國防白皮書則從 1996 年開始首次表示要關注中共軍力發展，此後關注的力度逐年加大；2000 年，國防白皮書首次提及中共彈道導彈對日本構成威脅；2003 年又首次提出中共建立「遠洋海軍」的問題，並聲稱中共在不久的將來可能對台獲取實質性優勢；2004 年的白皮書更對中共軍事狀況作詳盡的描述；2005 白皮書除了稱中共在 2006 年後將慢慢取得對台軍事優勢外，還給予台

³⁴ 葉至誠，*社會科學概論*(台北：揚智文化公司，2000年)，頁 105。

灣軍隊支持，建議台灣要有效轉換戰力，才能確保對大陸質的軍事優勢。

本論文希望藉由以上官方資料的分析，研析影響解放軍的政治影響力變化之因素、解放軍參與外交政策的方式及影響力、解放軍對外軍事交往，以及解放軍與外交部的衝突情形。

(二)非官方文獻

非官方資料的來源則是以國內外的智庫、³⁵學術機構、學者專家的相關書籍、期刊論文、報紙、出版品、網路資料為主。本論文將儘量收集相關學者的論文著作、研究報告、報紙與期刊的相關報導、統計數據、訪問紀錄等等後，再依內容進行歸納與分類。

本論文將透過非官方資料，來對照官方資料的訊息，尤其在中共軍事預算與武器裝備相關資訊，更是經過官方與非官方文獻的交叉比對，以探求真正的數據及資訊。以中共國防預算為例，美國國防部《2005年中共軍力報告書(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The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05)》認為中共實際的軍事經費應是所公布數字的2-3倍；日本《2005年防衛白皮書》指出中共發布的國防預算僅為實際軍事支出的一部分，裝備採購和武器研發可能為涵括在內，預算透明度不夠；英國國際戰略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在《2005~2006年全球軍力平衡報告(The Military Balance 2005-2006)》中指出中共國防預算每年以兩位數增加，實際軍費為其公布的2倍；華府智庫哈德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在《中國的新大躍進？未來半世紀的高科技和軍事強權(China's New Great Leap Forward — High Technology and Military Power in the Next Half-Century)》研究報告中指出，以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共每年國防實際支出約1,800億-2,700億美元，實為所公佈數字的8倍之多。³⁶由以上四份全球四大報告書的內容可得知，不同國家的國防報告書或智庫的研究報告對於中共國防預算的預估皆不相同。

³⁵ 研究中共外交及軍事的相關智庫包含國內的中華歐亞基金會、中國國民黨大陸情勢週報、台灣智庫、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國立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未來中國研究-遠景基金會、國立中興大學全球和平與戰略研究中心、台灣民主基金會、台灣亞洲基金會、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中華經濟研究院、中央研究院亞太區域專題研究中心、國立台灣大學政治系台灣安全研究中心等等；國外智庫則有美國華府傳統智庫哈得遜學院(Hudson Institute)、傳統基金會亞洲研究中心(The Heritage Foundation)、華府智庫布魯金斯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ion)、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國際評估策略中心(International Assessment and Strategy Center)、詹姆斯通基金會(Jamestown Foundation)、英國國際戰略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瑞典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及日本防衛廳智庫「防衛研究所」等等。

³⁶ 有關美國國防部《2005年中共軍力報告書》全文可參閱網站

為了尋求真正的資訊，本論文在進行分析研究時，主要是優先引用官方的資料，再由非官方資料等第二手、第三手資料順序引用之。如此的研究順序目的是希望能避免兩岸的文獻觀點流於主觀及具有太濃厚的意識型態色彩，因此在作查證和評估時，將以國外官方、智庫和學術機構對中共軍事、外交相關之評估報告、文章和專書來對照兩岸的文獻，以達到資訊內容的真實性及公正性。

二、研究途徑

決策理論最早起源於政治學研究領域之外。根據專注於外交決策過程學者的研究，決策研究最早可追溯至希臘歷史學者修昔底斯（Thucydides）對西元前四世紀「伯羅奔尼撒戰爭」（Peloponnesian War）的研究。³⁷雖然學者很早便從決策的角度研究外交史及政治制度，不過，最早就決策做系統性研究的是心理學和管理學等學科。心理學者的研究興趣在於決策背後的動機，以及為什麼有人很容易就作成決策，而其他人則難以下定決心；管理學者則重視如何提高決策效率。³⁸

政治學研究領域中，國際關係學者是最後才將研究焦點置於決策的學術社群。專攻美國研究的學者早在 1950 年代起，即開始研究什麼原因促使某些選民投票，而某些選民卻選擇棄權。³⁹此外，多年來，許多專攻美國研究的學者也試圖解釋「立法者、行政官員、政客、利益團體領袖及其他在政治領域中活動的行為者」之行為。⁴⁰而多數研究決策的國際關係學者，則將研究焦點置於危機處理，這些學者包含艾里遜(Graham T. Allison)、史奈德(Glenn H. Snyder)和狄辛(Paul Diesing)等等。

基本上，在外交政策的分析上，學者主要有兩個廣泛的研究途徑領域，一派為國際體系結構，強調國際體系結構對外交政策的制約與形塑的重要性；另一派

www.loveunix.net/viewarticle.php?id=48375-109k；日本《2005 年防衛白皮書》全文可參閱網站 http://jda-clearing.jda.go.jp/hakusho_data/2005/2005/index.html；《2005~2006 年全球軍力平衡報告》可參閱網站 www.routledge.com；《中國的新大躍進？未來半世紀的高科技和軍事強權》研究報告的內容可參閱 http://www.hudson.org/files/publications/China_Great_Leap_Forward.pdf

³⁷ Dougherty and Pfaltzgraff. *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omprehensive Survey*, 3rd.ed. (New York: Harper & Row, 1990), 469.

³⁸ James E. Dougherty and Robert L. Pfaltzgraff Jr., *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omprehensive Survey*, 468.

³⁹最有名的著作是 Angus Campbell, Philip E. Converse, William E. Miller, and Daniel Stokes, *The American Voter* (New York: Wiley, 1960). 此書指出，政黨認同是一種如同團體認同般的指標，在個人幼年時即從社會化過程中習得。當一個人的政黨認同越強時，越會支持該黨的候選人，以表達對團體的忠誠。該書也指出，一般美國人對政治的態度是「冷漠」及「不關心」的，所以很少人會根據議題去投票，即使沒有政黨認同，選民會根據個人因素投票或根本不去投票。

⁴⁰ Paul Wasserman and Fred S. Silander, *Decision-Making: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Ithaca, NY: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Cornell University, 1958).

以決策分析為主，強調以國內的政治運作過程來瞭解政策資訊的過程，以及決策者如何做理性的選擇。⁴¹此種分類法與學者瓦茲(Kenneth N. Waltz)所提出國際體系結構理論相同，⁴²瓦茲認為一個國家政策研究的層次可分為三個：個人、國家、國際體系。

西方學者對外交決策結構與程序進行理論研究發現，外交政策如何制定確實會影響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事實上，從外交政策的研究來看，不瞭解一個國家的內部事務便無法理解一個國家的外交關係，⁴³瞭解外交決策的過程，將有助於對外交政策全貌的瞭解。因此，自內部環境因素解析中共外交政策實為一項具有實質意義的分析面向。

決策理論以「決策者」代替傳統學派將「民族國家」視為國際體系的基本成員地位，可以說是分析方法上的一大轉變。決策理論學者希望透過研究範圍的縮小，使得研究能更加具體與精確，也更具有系統性的分析。以決策理論作為分析途徑的研究方式，最大的優點在於資料的蒐集，此研究途徑提供一個制式且可供比較的分類法，除了可以描繪國家行為的比較分析外，更能對決策過程提供一個較嚴密的概念分析。⁴⁴

在中共的研究方面，1950年代與1960年代主要是針對基礎的黨政機構為研究方向，研究方法是描述法為主；1970年代以後則將研究重心轉移到菁英的衝突，研究方向有個別菁英的角色及非正式政治過程對正式機構的影響；毛澤東過逝後，學者們開始分析中共政策形塑的過程及菁英之間的互動。⁴⁵

決策機構研究將中共外交政策研究帶向更實證的方向，透過對中共涉外機構及決策過程的研究與分析，探求中共外交政策的根源。由於中共過去長期對西方國家封閉，中共外交決策體制向來不被國外學者及一般研究者知悉，隨著1978年改革開放政策實施後，中共的資訊較公開，學者的研究也隨之趨於實證研究路線，使得中共外交政策的研究途徑不再僅限於意識型態等較傳統的研究方式，學者開始嘗試透過中共外交決策的實際運作來認識中共外交政策。學者包大可(A. Boak Barnett)在1985年出版的《中共外交決策：結構與過程(The Making of Foreign Policy in China: Structure and Process)》實為第一本有系統且全面對中共外交決策

⁴¹ Ole R. Holsti, "Model of International and Foreign Policy," *Diplomatic History*, Vol.13, No.1(Winter 1989): 40.

⁴² Kenneth N. Waltz, *Man, the State, and W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⁴³ Kenneth Libenthal, "Domestic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in Harry Harding, ed.,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in the 1080s*(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43.

⁴⁴ Michael Brecher, et al., "A Framework For Research on Foreign Policy Behavior,"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utlion*, Vol.13, No.1 (March 1969):77.

⁴⁵ Nina P. Halpern, "Studies of Chinese Policies," in David Shambaugh, ed., *The American of Study of Contemporary China*(Armonk, N. Y.: M. E. Sharpe, 1993), 121-123.

結構及過程進行探討的著作。⁴⁶

1988年，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與奧森柏格（Michael Oksenberg）則綜合理性模式（Rationality Model）及派系（權力）模式（Factional/Power Model），提出一種「分裂官僚結構」（Fragmented Bureaucratic Structure）途徑，對中共決策進行研究，他們指出中共在改革開放後，在許多事務的決策上，有發言權的系統及單位都要參與，形成官僚組織之間的角力，並使得決策過程變得緩慢。⁴⁷另外，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中共黨政要職的人士流亡海外，這些人與西方學界及智庫共同合作，針對中共決策進行研究。例如韓林（Carol Lee Hamrin）及趙穗生（Sui Sheng Zhao）等人的著作即指出，研究中共決策過程，應將非正式的權力及正式的制度權威加以區分。⁴⁸

冷戰結束後，中共國力快速上升，使得國內外學界對中共對外政策的研究也日益擴大。國內學者如張登及採取綜合的方式探討中共的大國外交，許志嘉結合官僚政治、團體動力及個人決策三種決策模型來研究中共外交政策，于有慧對中共外交政策在九〇年代的發展進行全面性的探討；國外學者如趙全勝採取結合總體與個體分析的方式來探討中共外交政策，史文（Michael D. Swaine）探討解放軍參與外交決策制定的正式組織、非正式組織及相關的參與人員，藍普頓（David Lampton）綜整了西方學界九〇年代以來對中共外交與安全政策的最新發展，陸寧（Lu Ning）由中共外交政策的主要三大行為者（中央領導、中央外事領導小組及中央官僚機構）探討中共外交政策的制定，蘭德公司高級安全顧問蘇葆立（Robert Suettinger）則從中共角度分析六四天安門事件後到2000年柯林頓執政時期美中關係的決策過程。⁴⁹

⁴⁶ 此書主要是由中共外交決策的機構來分析中共外交決策的過程，參與外交決策的機構包含中共高層決策者、高層制定機構、黨政治局的角色、黨書記處、國務院相關單位、外交部、經濟軍事文化部會、媒體、研究單位及大學等等。A. Doak Barnett, *The Making of Foreign Policy in China: Structure and Process*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5), 1-4.

⁴⁷ Kenneth Lieberthal and Michel Oksenberg, *Policy Making in China: Leaders, Structure, and Processes*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⁴⁸ 在有關國家安全政策及意識型態問題方面，由上級領導決定，不受下級官僚及派系牽制；而經濟、科技政策領域，則是多方參與形成決策。Carlo Lee Hamrin and Sui Sheng Zhao, *Decision Making in Deng's China: Perspectives from Insiders* (N.Y.: M.E. Sharpe, Inc., 1995), 233-241.

⁴⁹ 有關張登及、許志嘉、于有慧、趙全勝、史文、藍普頓、陸寧及蘇葆立的研究可參閱張登及，*建構中國：不確世界中的大國定位與大國外交*（台北：揚智出版公司，2003年）；許志嘉，*中共外交決策模式：鄧小平時期的檢證分析*（台北：水牛出版社，2000年）；許志嘉，*當代中共外交政策與中美關係*（台北：生智文化公司，2004年）；于有慧，「中共外交政策走向與選擇」，*問題與研究*，第43卷第1期（2004年1、2月）：頁105-124；趙全勝，*解讀中國外交政策：微觀、宏觀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台北：月旦出版公司，1999年）；Michael D. Swaine, *The Role of the Chinese Military i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making*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1999)；David M. Lampton ed., *The Making of Chinese and Security Policy in the Era of Reform*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Lu Ning, "The Central Leadership, Supraministry Coordinating Bodies, State Council Ministries, and Party Departments," Edited by David M. Lampton, *The Making of Chinese*

隨著中共推行改革開放政策，國內外學者的中國研究進一步走向實證研究路線，使得中共外交政策的研究不再侷限於少數決策者、意識形態等較傳統的研究範疇，而能透過中共外交決策的實際運作過程，來理解中共外交政策的根源。1980年代後，學者開始以「決策系統途徑」來探究中共外交政策，這些學者將研究重心放在中共外交決策制定的過程，並分析參與的機構與人員。⁵⁰

決策理論研究途徑主要是強調外交決策過程的重要性，透過對中共外交決策的參與相關機構組織結構及參與決策成員，對於其他國家或相關外交政策事務的認知分析，據以論述中共外交政策的制定源由。本論文將以此研究途徑作為論證分析的主要方法，希望透過決策理論研究途徑，分析解放軍參與外交決策的機構及方式，以對中共外交決策與解放軍的關係做出正確的分析，進而釐清解放軍在中共政治體制中的角色與影響力。

第五節 相關文獻回顧

一、外交決策模式

進入 1950 年代後，政治學發生革命性的改變，倡導政治科學的行為學派崛起，現實主義的宏觀分析(Macro Analysis)法亦難逃被質疑與挑戰的命運。學者史耐德、艾里遜、郝斯梯(Ole R. Holsti)相繼提出外交決策理論，強調決策過程的重要性。史耐德提出決策制定理論，認為決策是由人制定的，所以研究外交政策的焦點應置於那些代表國家作權威性決策的領袖，而非現實主義所用的抽象名詞--國家，決策者的認知(Perception)才是影響一國外交政策行為的最重要變數。

1971 年，艾里遜在「決策本質(Essence of Decision)」一書中提出「理性模式」(Rational Model)、「組織程序模式」(Organizational Process Model)及「官僚政治模式」(Bureaucratic Politics Model)三種外交決策模式，分析 1962 年古巴飛彈危機時，美國外交政策的制定過程。⁵¹然而由於大量機密資料、錄音帶、檔案的解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in the Era of Reform(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40-55; Robert L. Suettinger, *Beyond Tiananmen: The Politics of U.S.-China Relations, 1989-2000*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2003).

⁵⁰ 由決策系統研究途徑研究中共外交政策的論著包含 A. Doak Barnett, *The Making of Foreign Policy in China: Structure and Process*(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5); Kenneth Liberthal, and Michel Oksenberg, *Policy Making in China: leaders, structures, and processes*(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David Shambaugh,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Research Bureaucracy," *China Quarterly*, No. 110 (June 1987); Michael D. Swaine, *The Role of the Chinese Military i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making*(Santa Monica, Calif: Rand, 1996). Lu Ning, "The Central Leadership, Supraministry Coordinating Bodies, State Council Ministries, and Party Departments," Edited by David M. Lampton, *The Making of Chinese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in the Era of Reform*(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40-55..

⁵¹ Graham Allison, *Essence of Decision: Ex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Boston: Little, Brown & Company, 1971), 164-173.

密，艾里遜與維吉尼亞大學教授哲利考(Philip Zelikow)重寫「決策本質」一書，將決策模式更改為「理性行為者模式」(Rational Actor Model)、「組織行為模式」(Organizational Behavior Model)及「政府政治模式」(Governmental Politics Model)三種。⁵²

而相對於艾里遜的研究，史奈德和狄辛也從 50 個危機管理案例中，提出三種決策理論：「理性模型」、「有限理性模型」及「官僚政治模型」，並指出當在運用其中之一模型時，應該以另一個模型作為輔助的分析架構，如此才能具有較佳的解釋力。此外，郝斯悌亦提出三種外交決策模式：「個人決策」(Individual Decision)、「團體動力」(Group Dynamics)、「官僚政治」(Bureaucratic Politics)；而國內學者許志嘉透過理論的推演與實例的論證，將中共外交決策模式分為「領袖主導」、「領導集體」、「官僚組織」三種。⁵³

綜合以上各學者的主張，外交決策模式大致可分為以下五種：

(一)理性決策模式

理性決策模式是歷史最悠久、最廣泛被用來分析一國外交政策產出的方法。在謀求最大利益的前提下，一國外交政策固然是經由理性的決策過程制定，並依照利益的大小排列政策選項的優先順序。然而由於決策者自有其他考量，最終作出的決策往往未必是最佳的選擇，但有一點可以確定，如果政策選項付出的代價太高、預期獲得的利益太低，決策者絕對不會考慮。⁵⁴根據理性決策模式，一國外交政策的基本概念有以下幾項：(1)目標：行為者的目標被轉化為一個收益、實用或偏好的功能，目標顯示出所選擇結果的價值或實用性，決策的問題可藉由它的價值及客觀性來排列其可能的結果。(2)選擇：行為者必須在一系列選擇中作決定，這些選擇是以一顆決策樹的方式來表現，行為的選擇途徑必須由與其它選擇不同之處來區分。(3)結果：每一個選擇項都是一系列的選擇結果或輸出。(4)決定：在理性模式中，功能排列最高者即為最後的決定選項。⁵⁵

⁵² Graham Allison and Philip Zelikow, *Essence of Decision: Ex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2. nd. ed. (New York: Longman, 1999), 6.

⁵³ 有關艾里遜、史奈德和狄辛、郝斯悌及許志嘉等人所提出的外交決策模式內容，可參閱 Graham T. Allison, *Essence of Decision: Ex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Boston: Little, Brown & Company, 1971), 164-173; Glenn. H. Snyder and Paul Diesing, *Conflict Among Nations : Bargaining, Decision Making and System Structure in International Crises*(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cha.1.; Ole R. Holsti, "Model of International and Foreign Policy," *Diplomatic History*, Vol.13, No.1(Winter 1989): 31; 許志嘉，"中共外交決策模式研究：鄧小平時期的檢證分析，"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論文，1998年，頁 203-210。

⁵⁴ Graham Allison and Philip Zelikow, *Essence of Decision: Ex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2. nd. ed, 25.

⁵⁵ *Ibid.*, 18.

(二)組織行為模式

組織行為模式與「領導集體」模式相同，皆強調政策決策權在一群領導者的手中。組織行為模式強調組成政府的組織過程，行為者不是國家或政府，而是一群位於政府領導地位的鬆散聯盟組織。此模式的一般命題有：一為行動是依據標準的運作過程及計劃而來，組織的行動主要是由組織的例行公式所決定，而非由政府領導的指示而來；二為組織行為是慢慢改變且缺乏極大的彈性；三為大範圍的計劃是被制度化的，其目的是為了提供一個較明確的方向。⁵⁶因此，一國政府所採取的外交政策是由一群領導者所決定，外交政策可由組織內部成員的共同目的與行為來解釋。

(三)政府政治模式

這種模式將重點放在一個政府的政治，根據這個模式，外交事務不是以作為一個選擇或輸出而被瞭解，外交事務發生的結果是被當作國家政府競賽者所討價還價而得到。⁵⁷政府的行動如同政治的結果，政府的決策及行動是來自於官員間不同利益和不平等影響的妥協、衝突和混淆，政治決策和行動的產生是藉由政府成員間的討價還價而來。此模式與「官僚政治」模式相同，皆強調政策的制定是透過官僚組織之間的妥協與溝通而來。

(四)領導人模式

此模型特別重視領導人對政策的影響力，假設領導人的人格及個人特質會對其決策及政策產生重要影響。例如在美國歷任總統的外交政策的研究，便發現不同的總統對外交政策的強調重點不同。⁵⁸西方學者金淳基(Samuel Kim)、奧森伯格、白魯洵(Lucian. Pye)等人及前中共外交部官員陸寧也曾以此研究途徑來解釋中共外交政策。⁵⁹領導人模式具有濃厚的人治色彩，此模式不經正式黨政決策組織體系的運作，由最高領導者依自己的判斷，並逕行作出基本決策。此模式對高度極權的中共政權而言，相當具有解釋力。尤其在毛澤東高度權威領導模式下，透過對毛澤東個人思想理念、性格及行事風格的研究，確可掌握中共外交政策的主要脈絡。

⁵⁶ Ibid., 164-185.

⁵⁷ Ibid., 255-256.

⁵⁸ Jaw-Lin Chang, *A Retrospective Evaluation of Decision-Making Models in US Foreign Policy* (Ann Arbor, Michigan: 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 1985), 231.

⁵⁹ 參閱 Samuel S. Kim, "The Maoist Image of World Order," World Order Studies Program Paper, Princeton University, 1977; Lucian W. Pye, "Mao's Tse-tung's Leadership Style,"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91, No.2(Summer 1976), 219-235; Lu Ning, *The Dynamics of 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ing in China*(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7), 8-16.

(五)有限理性模式

賽蒙(Herbert Simon)認為在理性決策模式中，決策者將自己的價值(喜好)提高到最大限度(Maximizing)或作最佳化(Optimizing)撰擇行為，此乃是不可能的。由於來自環境與人類計算能力的限制，造成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所以決策者不太可能得到完全理性模式下的最佳解，而只能求得滿意解。⁶⁰因此，賽蒙提出「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模式，主張決策者受限本身經驗、能力與取得資訊之不易，通常僅能就其所知的情境下，做最佳的決策。

在複雜的中共外交政策制定過程中，此五種決策模式可能只是其中的一個決策方式，任一單一模型均無法完全解析中共外交政策。在政治運作結構中，若以單一的決策模型來解釋所有決策，便會使決策模型產生盲點，在不同的領導人、面臨不同的政策議題、議題重要性出現差異時，便會產生不同的決策程序。因此建構全面性中共政治運作模式有相當的困難度，何況不同的時空背景，更使決策過程面臨不同的變數，同時許多決策模式可能在解釋特定政策時，極具說服力，但在探討不同議題，卻產生解釋上的盲點。

建構一個全面的政策運作模型相當困難，本文並無意對以上五種模型提出進一步的修正或新的解釋模型，本文將依領導者的不同決策模式，來探討解放軍之政治影響力變化。如同研究中共問題的學者高新言及「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三個時代之間最大的區別，就是毛澤東時代是一個人說了算，出現矛盾對立的時代，毛可以輕而易舉地將對手打翻在地；鄧小平時代是鄧小平及陳雲兩人說的算，整個鄧小平時代，陳雲始終以其政策角度的對立面存在，並隨時對鄧形成制約；而江澤民時代是一群人說了算，也就是鄧小平所說的『集體領導』。」⁶¹事實上，中共外交政策制定的模式變化，是決策權力從原來一個人、一小部分人手裏，擴展到一個相對擴大的群體和相對獨立的部門。⁶²由決策權力的歸屬來區分，毛澤東、鄧小平和江澤民的領導風格及決策模式確有不同，毛澤東是屬於「領袖主導模式」，政策的制定由毛澤東一人主導；鄧小平為「集體領導模式」，政策制定由一群同僚(colleagues)主控；江澤民則為「官僚政治模式」，政策制定由一群統治者主導。⁶³不同的決策模式使得解放軍對外交決策有不同的影響力。

⁶⁰ Herbert A. Simon, *Administrative Behavior-A Study of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in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1976), 45&80-83.

⁶¹ 高新等著，*江澤民面臨的挑戰*(香港：明鏡出版社，1996)，頁 227-228。

⁶² Sun Zhe, "China's Foreign Policy: System Transformation, Policy Formulation Proces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Decision-making," *CSIS*, Volume 1(January 30, 2004): 33.

⁶³ James C. Mulvenon and Richard H. Yang, eds.,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in the Information*

本論文的主要目的是探討解放軍的政治影響力，為了使研究分析能夠更嚴謹及有系統，本論文將依決策權力的歸屬，將中共不同領導者時期的決策模式區分為三種：「領袖主導」、「集體領導」及「官僚政治」，並以此三種決策模式作為本論文分析之基礎概念，分析並解構不同時期(毛澤東時期、鄧小平時期及江澤民時期)解放軍之政治影響力及角色。

二、 解放軍參與外交決策的研究

誠如前文(第四節)所論述，1980年代以後，西方學者開始以決策系統研究途徑來探討中共的外交決策。然而，在眾多的中共外交政策研究專書中，對於有關解放軍如何參與外交決策的部份，卻很少有學者碰觸。推測其中的理由，其一應為資料的取得相當不容易，其二應是中共傳統上認為外交事務與軍事事務不同，外交事務應為非軍事領域之國與國間的外交關係。⁶⁴因此導致國內外學者很少探討軍隊在外交政策之角色及影響力。

這種對軍事事務與外交事務關係的認知，隨著中共改革開放政策的實踐與經濟全球化的推展，開始受到質疑。改革開放的措施使得中共的資訊較公開，資料也較易取得；而另一方面，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更促使軍隊事務與外交事務緊密的結合在一起。因此自1990年代以後，西方學者開始從事解放軍與外交政策關係的研究，而史文及喬飛的著作與論述堪稱為最具代表性的文章。

史文在1996年撰寫《解放軍在國家安全制定中的角色(The Role of the Chinese Military i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making)》一書中，對解放軍參與中共國家戰略目標、外交政策、國防政策及戰略研究、分析與情報之領導階層、結構與過程加以說明，尤其重點在於探討在江澤民時期，解放軍參與國家安全決策過程的特定方式，包含個人與官僚組織的正式與非正式運作，以及解放軍對國家安全問題的立場與所追求的利益。⁶⁵

史文在解放軍參與外交政策一章中，探討解放軍參與外交決策制定的正式組織及非正式組織，並論述相關的參與人員。在正式組織中，解放軍主要是透過外事領導小組、中央委員會總辦公廳、人民代表大會外事委員會及國務院對外宣傳領導小組來表達軍隊對外交政策的看法與建議；在非正式組織方面，解放軍軍官會以非正式的方式與政治局常委會常委進行非常規與非正式的溝通，表達對外交政策問題的意見。最後，史文提出解放軍在外交政策中並未扮演舉足輕重的角

Age(Santa Monica,CA: RAND, 1998), 18.

⁶⁴ Michael D. Swaine, *The Role of the Chinese Military i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making*, 1-2.

⁶⁵ *Ibid.*, 9-36.

色，因為中共大部份的外交政策係由黨政機構負責進行。

在史文一書中，可以清楚瞭解到解放軍參與外交決策的方式，然而史文的研究卻忽略中共固有的黨軍關係結構，因此認為解放軍在外交決策制定過程中並無多大的影響力。事實上，在中共實際的政策制定過程中，雖然政策的決定權在少數領導者或政治局常委中，然而由於在重大決策拍版定案前必須具備一些政策細節的評估分析，因此一些類似具有「黨政協調」或「黨政運作」的機制就因應產生。它不僅具有決策機能，而且常常要先行在內部讓相關政黨部門的首長對問題求得共識，以便在呈報政治局常委之前可先有具體計劃提供參考，而在交付執行之時也因先前已有內部共識可順利推動。⁶⁶在外交決策的制定過程中，「中央外事領導小組」即扮演協調及溝通的機制。此外，由於中央軍委主席、副主席兼任政治局常委或政治局委員的角色，藉此角色的重疊，軍隊對於外交政策的制定仍具有一定的影響力，1995年李登輝訪美事件即為解放軍改變中央外交政策主張的重要例證。⁶⁷

相較於史文的研究，喬飛認為解放軍在外交政策中有重要的角色。在「解放軍如何影響外交政策(How much does the PLA make foreign policy?)」一文中，喬飛探討解放軍在外交政策中的角色及影響力，並說明解放軍參與外交決策的原因與限制。他認為解放軍在敏感的國家安全議題上有重要的角色扮演，這些議題包含台灣問題、中美關係及南海主權糾紛等等，並指出解放軍在1995年的台海危機中，其重要性達到最高點。⁶⁸此外，在政權轉移或政局不穩定之際，解放軍的角色愈形重要。

事實上，不論是史文或喬飛的分析，其對解放軍的研究都只限於某一層面的探討，史文以解放軍實際參與外交決策，來探究解放軍在外交政策中的角色；喬飛以敏感議題及政局情勢來分析解放軍的影響力。雖然二者的研究都有一定的貢獻，然而二者卻都只能解釋解放軍參與外交政策的部份現象，因此造成對解放軍的政治影響力看法有所不同。為了真正瞭解解放軍之政治影響力，在本論文中除了分析解放軍實際參與外交決策的過程與組織外，並以專章探討影響解放軍政治影響力轉變之因素。希望藉由領導者決策模式、黨軍關係的變化、政局穩定及國

⁶⁶ 張五岳主編，*兩岸關係研究*(台北：新文京出版社，2003年)，頁17。

⁶⁷ 1995年李登輝總統訪問美國，中共高層領導者在北戴河舉辦擴大會議，會中詳細討論對台政策，當時外交系統力主溫和，認為不值得為李登輝訪美一事大動干戈，然而由國防部長遲浩田所代表的軍方，則力主應採取強硬態度。最後，軍方的強硬態度被高層領導者所接受。1996年3月，解放軍在福建部署15萬的部隊，並在台海附近進行連續七波的軍事演習，其中包含在基隆和高雄外海進行飛彈試射演習、在福建境內進行實彈軍事演習和大規模的登陸演習。有關中共黨軍對李登輝訪美的反應情形，可參閱本論文第五章第四節。

⁶⁸ Ellis Joffe, "How Much does the PLA Make Foreign Policy," in David S. Goodman and Gerald Segal, ed., *China Rising: Nationalism and Interdependence* (London: Routledge, 1997), 54.

家安全議題四個層面的探討，以釐清解放軍之政治影響力。

三、 中共外交決策制定的影響因素

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主要是為了適應內外環境，不斷調整其目標、價值與利益，經由一連串累積的決策所產生的結果。有的學者強調中共外交政策制定受國際環境制約，例如陶威廉(William Tow)、肯明斯(Bruce Cumings)或藍普頓等人；⁶⁹有些學者則側重國內因素，例如巴克曼(David Bachman)、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奧森伯格及懷丁(Allen S. Whiting)等人。⁷⁰如從單一層面分析中共外交政策皆有所偏頗，中共外交政策實由國內因素與國外因素交錯影響而成。

事實上，中共 1990 年代以前的外交政策大多受到意識型態及決策者的影響，並且深受中共歷史文化背景的制約。⁷¹然而隨著蘇聯的瓦解，中共意識型態逐漸淡化，使得中共外交政策的制定趨於以國家利益為準則，其中經濟利益為最重要的考量。為了促使國內政經能夠穩定的成長，中共的對外政策目標轉以營造一個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為主。

(一)內部因素

綜合各學者的看法，影響中共外交政策制定的內部因素包括四項：意識型態、民族主義、國內政經環境及集權決策。

⁶⁹ 陶威廉認為經濟互動取代軍事，國際因素影響國家外交決策的主要因素；肯明斯及 Lampton 認為中共在 1978 年改革開放後，同西方國家經濟、政治互動頻繁，外交決策日益受到國際因素的影響。有關這些學者的看法，可參閱 William T. Tow, "China and the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System," Thomas W. Robinson and David Shambaugh eds., *Chinese Foreign Policy-Theory and Practice*(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115-117; David M. Lampton, "China's Foreign and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Making Process: Is It Changing, and Does It Matter?," David M. Lampton, *The Making of Chinese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in the Era of Reform, 1978-2000*(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34-35.

⁷⁰ 巴克曼和李侃如認為每一次的中國國內政治運動，如 1958 年的大躍進與 1966 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等，對於中共對待世界其餘部份的態度有明顯和直接的含義，而台灣在國內和國際舞台上不斷提出的挑戰，更使中共對諸如政權合法性、領土主權和國家生存這類問題非常敏感；奧森伯格等人在分析中共外交政策時，強調領袖個人主張和偏好的關鍵因素；奧森伯格提出中共在參與國際機制時，領導者的目標、建制本身的特質和國內政治等因素，將對中共的外交政策行為產生影響；懷丁教授認為，自然環境、歷史因素、心理認知及意識型態等國內因素是影響中共外交政策的基本因素。但他特別強調，這些屬於中國特質與共產黨特質的因素並無法解釋所有中共外交政策，中共外交政策還會受到其他特定組織部門角色的影響。同時，中共最高領導人對外交政策也有極大的影響力。因此，這些內部互動的總合形塑了中共外交政策。有關這些學者的論點可參閱 David Bachman, *Bureaucracy, Economy, and Leadership in China: The Institutional Origins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29-56; Kenneth Lieberthal, *Governing China: From Revolution through Reform* (New York and London: WW Norton & Company, 1995), 1-35; Elizabeth Economy and Michel Oksenberg (eds.), *China Joins the World*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1999), 1-41; Allen S. Whiting, "Foreign Policy of China?," Edited by Roy C. Macridis, *Foreign Policy In World Politics*(N.J.: Prentice Hall, 1992), 224-225.

⁷¹ Allen S. Whiting, "Foreign Policy of China?," Edited by Roy C. Macridis, *Foreign Policy In World Politics*(N.J.: Prentice Hall, 1992), 224-225.

1. 意識型態

意識型態的結構基本上可分為兩部分，其一是所謂核心(Core)的部分，其二是環繞著核心的外圍實踐性的(Practical)部分。核心部分的內容主要包含一套世界觀、歷史觀及用來支撐這套世界觀、歷史觀的方法論，或由這套世界觀、歷史觀延伸出來的一套價值觀；實踐性的部分主要是提供一套人們去認知判斷周遭世界的認知圖和評估圖，以及由此認知圖和評估圖所延伸出來引導人們實踐行動的戰略和策略設計。⁷²就這意義而言，馬列毛思想是中共意識型態的核心部分，由此塑造中共的世界觀，這就是中共正式的意識型態部分，這種意識型態是思想的明確性與系統性部分。

中共的馬列毛思想是固定的意識型態部分。⁷³雖然在後毛澤東時期，共產黨持續的轉變與重新解釋，共產黨捨棄原本意識型態當中較為激進的部分，用以適應當代的需求。然而在此同時，中共還是堅稱馬列毛思想的延續性，同屬為四項基本原則（堅持社會主義道路、馬列毛思想、人民民主專政及共產黨的領導等等）。所謂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只是對於原本思想的一種修正而已。

中共自稱是社會主義國家，信奉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故意識型態是中共外交政策的重要變數。中共外交政策的意識型態分為正式的(Formal)與非正式的(Informal)。⁷⁴所謂的正式的意識型態是導源於馬克斯—列寧主義(Marxism-Leninism)，從而判斷、觀察與認識這個世界。而理念(Ideas)、價值(Values)、假設(Assumptions)與先入為主(Prejudice)的意見，是作為中共外交政策當中的非正式意涵。非正式的意識型態包含複雜的文化價值、選擇、偏見、習慣及對於現實所共同分享的認知等等，或如白魯洵所言的實用主義(Pragmatism)路線。這樣的說法，拒絕了意識型態是思想的系統，而是受歷史與文化的傳承。

馬克思列寧主義均強調「階級鬥爭」，毛澤東也習慣以階級鬥爭作為判斷外交情勢發展的標準。例如毛澤東主張應該「聯合中間力量與進步力量，打擊反動力量」的統一戰線。另一方面，雖然鄧小平倡言「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但卻仍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意識型態目標。例如，胡耀邦在十二大政治報告中說：「中共的外交政策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科學為基礎的。」⁷⁵

⁷² 李英明、張亞中，*中國：向後鄧時代轉折*(台北：生智文化公司，1999年)，頁2。

⁷³ Steven I. Levine, "Perception and Ideology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Edited by Thomas W. Robinson and David Shambaugh, *Chinese Foreig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7), 30.

⁷⁴ Ibid., 32-35.

⁷⁵ 胡耀邦，"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 *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40。

十二大以來，中共的外交路線是以獨立自主外交為主，其理論基礎是馬列主義及毛澤東思想。其具體內容為：堅持和平共處五原則；堅持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及殖民主義；加強同世界各國人民的團結；支持被壓迫民族和發展中國家爭取及維護民族獨立等。由此可知，中共外交政策有其可變的成份，也有其不變的成份，而意識型態所決定的基本目標與原則是不會改變的。

2. 民族主義

毛澤東在 1938 年所寫的「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中，已明白宣示：「中國共產黨人必須將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結合起來」；⁷⁶到 1940 年的「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更明確指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方向，⁷⁷1949 年 10 月 1 日建立政權當天，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高喊「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時，其民族主義的暗示並不少於共產主義。

第二代領導人鄧小平於 1982 年中共十二大開幕式上講話時也指出：「中國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熱愛祖國、貢獻全部力量建設社會主義祖國為最大光榮，以損害社會主義祖國利益、尊嚴和榮譽為最大恥辱。」⁷⁸在民族主義的層面上，鄧小平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這個口號，修正毛澤東民族形式的馬克思主義，以階級鬥爭為中心的民族主義建構，而將之轉變為追求工業化和現代化的民族主義取向。

鄧小平修正毛澤東以民族主義界定現代化的方式，改以現代化來界定民族主義，將現代化本身的重點，即工業化與經濟發展，視為民族主義的目標，於是「農業、工業、國防與科技的現代化」成為中共民族主義的目標，中共民族主義轉型的結果，經濟建設成為其主要的內容。由於這個思想邏輯的轉變，使得 80 年代中共的經濟建設獲得極大的成功，中共人民的生活水準顯著的提昇。

到了江澤民時期，中共在 1994 年 8 月公佈的《愛國主義實施綱要》中指出：「中華民族是富有愛國主義光榮傳統的偉大民族……，中華民族在創造燦爛中華文明的過程中，形成了具有強大生命力的傳統文化，其內容博大精深，不僅包括了哲學、社會科學、文學藝術、科學技術等方面的成就，而且蘊含著崇高的民族精神、民族氣節和優良道德；不僅孕育了無數傑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藝家、科學家、教育家、軍事家，而且留下豐富的文物史跡、經典著作。」，而「開展愛國主義教育目的，是要振奮精神，增強民族凝聚力，樹立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

⁷⁶ 傅耀祖，「論鄧小平外交思想」，外交學院學報(1997 年 2 月)：頁 25。

⁷⁷ 鄧小平文選，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頁 360。

⁷⁸ 鄧小平文選，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頁 206。

鞏固和發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⁷⁹

江澤民時期的民族主義已轉換為愛國主義。事實上，中共以愛國主義代替民族主義，並不表示民族主義意識型態已從中共領導階層的認知中消失，從《愛國主義實施綱要》可看出，愛國主義包含著民族主義，而愛國主義的本質正是民族主義，兩者互為表裡。愛國主義式的現代化戰略，指的就是「黨的建設」加上「現代化的建設」，首先用來保證穩定的政治秩序，其次用來促進經濟發展，從而達成維護政權合法性的作用。最後，不能忽視中共的愛國主義主張，其中有濃厚的對台灣、香港、澳門與海外華僑的統戰意味，它是以訴諸民族感情來對全球華人進行統戰。

民族主義對中共外交政策的影響在於反和平演變與重拾民心的支持，愛國主義的表現則為獻身於建設和保衛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事業，獻身於促進國家統一的事業。儘管中共為了經濟發展而不再強調意識形態的作用，甚至極力拉攏西方國家至中共投資，然而這不意味民族主義在中共政治決策層的重要性下降。與 70 年代相比，中共領導人已能審慎地計算與美、日等國的共同利益。因此如果國內及國外環境因素沒有大變動，中共仍然可以在其固有的民族主義意識中，繼續維持與西方國家的交流與合作。然而，如果中共的國內或國外環境改變，危及中共政權的穩定，則中共也會以民族主義來凝聚人心，共同對抗外來的威脅。例如，1999 年 5 月以美國為首的北約組織誤炸中共駐南斯拉夫大使館時，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使得中共內部發生大規模的自發性示威，而中共當局的作法是默許此種示威行為存在，以民族主義的口號喚醒中國人民的愛國心，維護國家主權不受侵犯。

換言之，當主權或領土受到侵犯時，在中共的政治環境中便會祭出民族主義的大旗，因為對任何一個中共領導人而言，對主權或領土問題表現軟弱，將使其領導地位受到嚴重挑戰。由於領土主權問題涉及民族自尊心、領導人的政治權力和經濟利益等複雜因素相互糾葛，儘管目前中共對某些領土或領海的爭論力有未逮，暫採忍讓，但在未來的目標則是明確不退讓的。⁸⁰尤其是面對台灣問題時，民族主義更是對台動武的動機因素之一。以 1995 年台海危機為例，中共軍事演習的目的意謂著中共決策者決不容許台灣從中共分裂出去，在歷史使命與民族主義的驅使下，任何迫使台灣分離的舉動，都會迫使中共軍事決策者視採取武力手段解決是唯一的決策選擇。

⁷⁹ “愛國主義實施綱要，”新華網，1994 年 8 月 23 日。

⁸⁰ 劉正慶，”中共大國外交政策形成與實踐之研究，”文化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2000 年，頁 60-61。

3. 國內政經環境

在《威脅下的中國(China Under Threat)》一書中，哥托夫(Melvin Gurtov)和黃炳懋(Hwang Byong-moo)從中共的安全面臨威脅來看，比較韓戰、八二三炮戰、對印戰爭、越戰和珍寶島衝突等五次戰役，綜合出中共在面對內部政治不穩定時，外交政策也會隨之改變。⁸¹另外，學者張虎也指出，1962年中共會對印度展開戰爭，原因之一是當時「三面紅旗」失敗造成整個社會不安，中共因為內部情勢不穩，希望透過此一戰爭，可以轉移人民視線，緩和人民的反共情緒，從而加強中共內部的團結。⁸²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共將國家發展的目標轉以經濟發展為主，外交政策成為服務此目標的手段。中共為了經濟發展，不再強調意識型態的作用，極力拉攏西方國家。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即指出，「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就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鑑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鑑當今世界各國包含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和管理方法。」⁸³1992年十四大時，提出市場經濟的概念，將經濟體制與國際接軌，外交政策成為服務經濟發展的策略，開始展開「全方位」外交路線。

到了江澤民及胡錦濤時期，十六大報告中指出：「根據 15 大提出的到 2010 年、建黨 100 年和新中國成立 100 年的發展目標，我們要在本世紀頭 20 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設惠及 10 幾億人口的更高水準的小康社會，使經濟更加發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進步、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諧、人民生活更加殷實。經過這個階段的建設，再繼續奮鬥幾 10 年，到本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現代化，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⁸⁴後冷戰時期的中共國家戰略以經濟發展為中心，為持續經濟成長及改革，中共必須有一個穩定的國際環境，外交政策改以加強與大國的關係、實行「睦鄰友好」政策及參與國際組織為主。

由以上分析可得知，國內政經情勢對中共外交政策走向有著顯著的影響。在毛澤東時期，中共常以發動對外戰爭來鞏固政權及凝聚人民團結力量；在鄧小平、江澤民及胡錦濤時期，為了促進國家經濟發展，外交政策以提供穩定和平的國際環境為主要目標。

⁸¹ Melvin Gurtov and Byong-moo Hwang, *China under Threat*(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0), 17-20.

⁸² 張虎，*剖析中共對外戰爭*(台北：幼獅文化出版社，1996年)，頁 117。

⁸³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 3 卷，頁 279。

⁸⁴ “十六大報告全文，”新華網，2002 年 11 月 17 日。

4. 集體決策

在毛澤東未死亡前，中共對外政策路線完全由毛澤東一人決定。雖然中共在文化大革命之後進行政治和經濟改革，但是中共的政治制度和決策過程本質上仍然是權威主義，在外交政策制定過程中，呈現出高度集中、個人化和非制度化的特色。1967年毛澤東對中共外交部指示說：「對外路線是我制定的，周總理執行的」⁸⁵美國著名中國問題研究學者懷丁教授指出，毛澤東時期中共外交政策是由最高領導者毛澤東本人制定，而此種趨勢在毛死後並未結束，鄧小平在毛死後仍掌控重要的對外政策。⁸⁶

前中共外交部官員陸寧以其實際從事中共外交工作多年的經驗指出，中共政治體系的一個重要特徵是高度集權，在外交決策運作過程中，位階愈高，擁有的決策權威愈大，最高領導人及領導核心班子擁有最高權力。歷史上的最高領導人分別是毛澤東與鄧小平，最高領導人會組成領導核心班子共同掌控大權，這些人對外交政策擁有最後的決策權。⁸⁷由此可見，中共外交政策通常受到領導人個人意見的左右，並且高度反映領導人的意見。

(二) 外部因素

中共在制定對外政策時，會先考慮當時所處的時代，即分析當前國際體系變化，唯有先認清所處的時代，理解國家在國際體系中所占的地位，才能精確地制定合乎國家利益的對外政策。80年代初期，國際局勢呈現美蘇對峙，鄧小平在1985年6月的軍委擴大會議上提出國際局勢為「世界戰爭的危險還是存在的，但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長超過戰爭力量的增長。在較長時間內不發生大規模的世界戰爭是有可能的，維護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⁸⁸依據這個判斷，鄧小平制定「和平與發展」戰略，集中精力發展國內四化建設，強調中共的和平外交政策是獨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結盟。

隨著冷戰的結束，外部因素對中共外交政策的影響日趨變大。綜合中共近年來的國防白皮書內容，⁸⁹可以得知現今中共對國際安全局勢有以下的認識：

1. 多極化的趨勢

⁸⁵ 人民日報(北京)，1970年5月21日。

⁸⁶ Allen S. White, "Foreign Policy of China?," Edited by Roy C. Macridis, *Foreign Policy In World Politics*(N.J.: Prentice Hall, 1992), 225.

⁸⁷ Lu Ning, *The Dynamics of 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ing in China*(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7), 8-16.

⁸⁸ 王泰平主編，《鄧小平外交思想研究》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6年），頁94。

⁸⁹ 近年來，中共所發表的國防白皮書共有1998年的《中國的國防》、2000年的《2000年中國的國防》、2002年的《2002中國的國防》及2004年的《2004中國的國防》。

冷戰結束後，多極化趨勢在全球或地區範圍內，在政治、經濟等領域都有新的發展，世界上各種力量出現新的分化和組合。大國關係經歷著重大而深刻的調整，各種夥伴關係逐漸向機制化方向發展，各國獨立自主、聯合自強、協調發展的意識正在加強。發展中國家總體實力增強，正在成為國際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多極化趨勢和經濟全球化的持續發展，使國與國之間的相互依存和制約進一步加深，也有助於世界的和平、穩定與繁榮。

2. 經濟安全在國家安全中的地位日益重要

在國際關係中，地緣政治、軍事安全、意識形態因素仍然發揮著不可忽視的作用，但經濟因素的作用更趨突出，國家間經濟衝擊不斷加強。以經濟和科技為主的綜合國力競爭進一步加劇，經濟全球化的加快和區域集團化的加深使一國的經濟發展更容易受到外來因素的影響和衝擊。因此，越來越多的國家把經濟安全視為國家安全的一個重要部份。

3. 和平與發展仍是當今的主題

各國經濟相互依存加深，全球和區域經濟合作組織的作用增強，經濟安全更加受到重視。發展經濟和科技，增強綜合國力，是各國的主要戰略趨向。大國之間既相互借重、合作，又相互制約、競爭。2001年9月11日美國發生恐怖襲擊事件之後，大國關係協調與合作的一面上升。廣大發展中國家積極推動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序，為促進世界的和平與發展發揮著重要作用。新的世界大戰在可預見的時期內打不起來。維護和平，促進發展，是各國人民的共同願望。

4. 世界和區域範圍內仍存在一些不安定的因素

影響和平與發展的不確定因素也在增加，世界還很不安寧。不公正不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舊秩序沒有根本改變。世界經濟發展很不平衡，南北差距進一步擴大，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獲益較少，有的面臨被邊緣化的危險。國際關係民主化未實現，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有新的表現。一些地區因民族、宗教、領土、資源等問題引發的爭端時起時伏，武裝衝突和局部戰爭不斷發生。恐怖主義、跨國犯罪、環境惡化、毒品等非傳統安全問題日趨突出，尤其是恐怖主義已對國際和地區安全構成現實威脅。

綜言之，前蘇聯崩解，對國際體系造成重大的衝擊，中共認為現今國際局勢因處於多極化及經濟互賴的情況下，所以國際安全情勢是相對穩定及和平，世界大戰的發生是較不可能；但另一方面，由於國際間仍存在一些不安定因素，局部戰爭隨時有爆發的可能。

中共認為當前國際體系屬「一超多強」格局，所謂的「一超」，指的是美國；

「多強」則是指其他像俄羅斯、日本、歐盟等國家或區域，它們的實力雖然仍暫時難以與美國抗衡，但與美國的差距正逐漸縮小。另外，中共也體認到，當前國際體系是朝著「多極化」方向發展，各國權力分配正重新調整，一些重大的不確定因素仍未排除，各國便在變動格局中，積極尋求新的國際定位。對中共而言，「多極化」格局不僅是中共對當前國際情勢的客觀判斷，也是主觀上的期待與努力的方向。作為亞太最大國家，中共自認應在國際秩序的建構過程中扮演較以往重要的角色，因此近幾年來，中共積極推動大國外交政策，企圖同西方大國平起平坐。

另一方面，中共認為冷戰時期以軍事同盟為基礎，以加強軍備為手段的安全觀念和體制已證明不能營造和平，要爭取持久的和平，就必須培育新型的安全觀念，尋求維護和平的新方式。1997年12月16日中共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參加東協成立卅周年大會上，發表題為《發展合作才能獲得和平與繁榮》的講話，闡述中共新的安全觀念和維護和平的新途徑。其演講內容與1998年7月中共公佈的《國防白皮書》有相同之處，二者皆說明瞭新的安全觀包含三個方面：政治、經濟及軍事方面。⁹⁰

1.政治方面：

在相互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五原則基礎上，建立國與國之間的關係，這是全球和地區安全的政治基礎和前提。在這方面，大國之間建立健康、穩定的關係，對地區以至世界的和平與安全至關重要。近年來，所推動的大國外交對亞太地區安全具有積極的意義。

2.經濟方面：

各國應在經濟領域加強互利合作，相互開放市場，減少經濟及貿易上不平等及差別待遇政策，逐步縮小國家之間的發展差距，尋求共同的繁華，這是全球和地區安全的經濟基礎。東南亞金融風波表明，經濟安全是穩定和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維護正常和良好的經濟、金融秩序，不僅要有完善的宏觀經濟管理體制和健全的金融體系，而且要加強地區和世界的金融合作，共同防範國際游資的投資衝擊，創造穩定、安全的外部經濟環境。

3.軍事方面：

各國應透過對話及合作的方式，增進與各國之間的相互瞭解，承諾以和平方式尋求解決國家間的紛爭與歧見。安全是相互的，安全對話合作旨在促進信任，而非製造對抗，更不應針對第三國，不能損害別國的安全利益。

⁹⁰ 新安全觀的概念是整理自“發展合作才能獲得和平與繁榮”，文匯報，1997年12月16日，版4及中共國務院，1998年中國國防白皮書(北京：國務院新聞辦公室，1998年)。

1999年3月26日，江澤民在瑞士日內瓦裁軍談判會議上講話，首次在國際場合正式提出和闡述中共的「新安全觀」。他說：「以軍事聯盟為基礎，以加強軍備為手段的舊安全觀，無助於保障國際安全，更不能營造世界的持久和平，這就要求必須建立適應時代需要的『新安全觀』，並積極探索維護和平與安全的新途徑。我們認為『新安全觀』的核心，應該是互信、互利、平等、合作。各國相互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五原則，以及其他公認的國際關係準則，是維護和平的政治基礎。互利合作、共同繁榮，是維護和平的經濟保障。建立在平等基礎上的對話、協商和談判，是解決爭端、維護和平的正確途徑。只有建立新的安全觀和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序，才能從根本上促進裁軍進程的健康發展，使世界和平與國際安全獲得保障。」⁹¹如同中共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王逸舟所指出，「新安全觀」就是「在國際關係中，以平等、協商、合作的方式，促進各國安全和國際社會整體安全的實踐」，⁹²安全應當依靠相互之間信任和共同利益的聯繫，對話與合作是促進地區和平與發展的主要支柱。

由以上分析得知，任何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皆受到內部因素與外部因素的影響，任何只偏重某一層面的分析將會對政策的制定有所偏執的認識，而中共外交政策的制定當然也不例外。基本上，在中共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之前，外交政策大都只受到領導者、意識型態及國內政經等國內因素的影響。一直至改革開放政策實施後，尤其是冷戰結束，全球化及經濟互賴的產生，使得中共外交決策的制定開始受到外部因素的影響。而在後冷戰時期中共外交決策制定的過程中，外交部的立場一般是受到外部因素的影響，解放軍的立場則受到國內因素，特別是民族主義的影響。本論文在探討外交政策及軍事外交目的時，將由內外部因素的宏觀分析概念，來探究中共外交政策的制定及外交部、解放軍的合作與衝突之情形。

第六節 研究架構

中共的政治體制是共產黨一黨專政，軍人是黨的一部份，軍隊是黨的軍隊，黨軍關係呈現「黨中有軍，軍中有黨」的特殊現象。軍人以黨員身份參與黨的政治活動，使得軍人得以合法性的參與政治，表達對黨的政策、路線和方向的想法。為了瞭解解放軍在中共政治體制的角色及影響力，本論文架構將分為六部份：緒論、解放軍政治影響力轉變之因素、解放軍參與外交決策制定、解放軍對外軍事

⁹¹ 伊然，「江澤民的『新安全觀』透視」，*鏡報月刊*(1999年5月)：頁24。

⁹² 王逸舟，*全球政治和中國外交*(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頁7。

交往、解放軍的強硬態度與結論等等(論文架構如圖 1-1 所示)。

在第一章緒論中，將先說明本論文的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問題意識與研究假設、研究範圍與限制、研究方法與途徑、文獻回顧與研究架構。

在第二章解放軍政治影響力之轉變因素中，將分別探討解放軍在中共政治體制中角色及影響力轉變的情形。此章節將由決策模式、黨軍關係變化、政局情勢及國家安全議題等四個層面來分析解放軍的政治影響力變化。首先，在不同的決策模式下，解放軍的政治影響力各不同。毛鄧強勢的領導者時期，決策模式是以「領袖主導」及「集體領導」為主，軍人的政治角色只是工具性角色，軍人對政治的影響力較小；相對的，在江澤民弱勢的領導者時期，軍人的政治角色成為影響決策的角色，在缺乏具備毛鄧領導人的權威基礎，江澤民決策模式改以「官僚政治」為主，軍人的政治影響力較大。

其次，中共強調軍隊必須置於黨的絕對領導之下，黨軍關係向來即以「黨指揮槍」為特色。因此雖然自鄧小平時期開始主張軍隊現代化及專業化，軍隊將本務置於建軍，然而解放軍仍舊是一支「黨軍」，而非一支國家化的軍隊，其政治角色只能是政權的保護者，而非挑戰者。

第三，在政局不穩定時，解放軍的政治影響力愈形重要。尤其在國內政局不安或權力繼承未穩固時，軍隊的支持成為獲得政權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文化大革命及天安門事件發生時，解放軍勢力膨脹，政治角色地位重要；而在權力繼承時，中共軍隊也扮演關鍵的角色，尤其是由文人擔任軍隊領導人的江澤民在權力繼承的過程中，極需要軍隊的全力支持，所以掌權之後加重軍隊的決策權與發言權，使得軍隊的政治影響力大幅提升。

最後，解放軍對本身職責及任務更有與生俱來的使命感，因此與國家安全有關的議題，解放軍將竭盡所能的發揮影響力，以符合本身的利益。這些敏感議題包含台灣問題、中美關係、香港與南中國海、核武測試、非擴散政策、軍售和多邊安全等等。

第三章的內容主要是探析決策模式對解放軍政治影響力之影響。將先說明中共外交決策的制定過程，並藉由決策過程的分析，瞭解解放軍在外交決策的角色，進而探究解放軍參與外交決策的機構及解放軍參與外交決策的方式，最後再由領導者決策模式來分析解放軍在外交決策的政治影響力，以釐清解放軍的政治影響力情形。

為了進一步瞭解解放軍與黨軍關係、政局情勢及國家安全議題等三項因素之關係，在第四章將以軍事外交作為分析的面向，藉由軍事外交目的、類型及交流的情形，洞悉解放軍在軍隊現代化、政局穩定及非關國家安全議題的外交層面

上，解放軍服務及服從國家外交戰略目標的情形。

雖然解放軍與外交部皆是以國家目標為最大的政策考量，然而由於外交決策過程涉及政府內部其他組織不同的利益，參與決策的個別成員又各自有其主觀認知，使得各組織間可能在某一外交政策議題上產生意見相左的情形。在本論文的第五章將分析在相關國家安全的外交議題上，解放軍與外交部之衝突狀況，主要探討內容是以中美關係(2001年軍機擦撞事件)及台灣問題(1995-1996年台海危機)作為分析的案例。

在本論文的最後一章結論中，將對解放軍之政治影響力作一總結，並進一步依領導者決策模式、黨軍關係變化、政局穩定及國家安全議題等四項因素的分析，推論胡錦濤時期解放軍之政治影響力可能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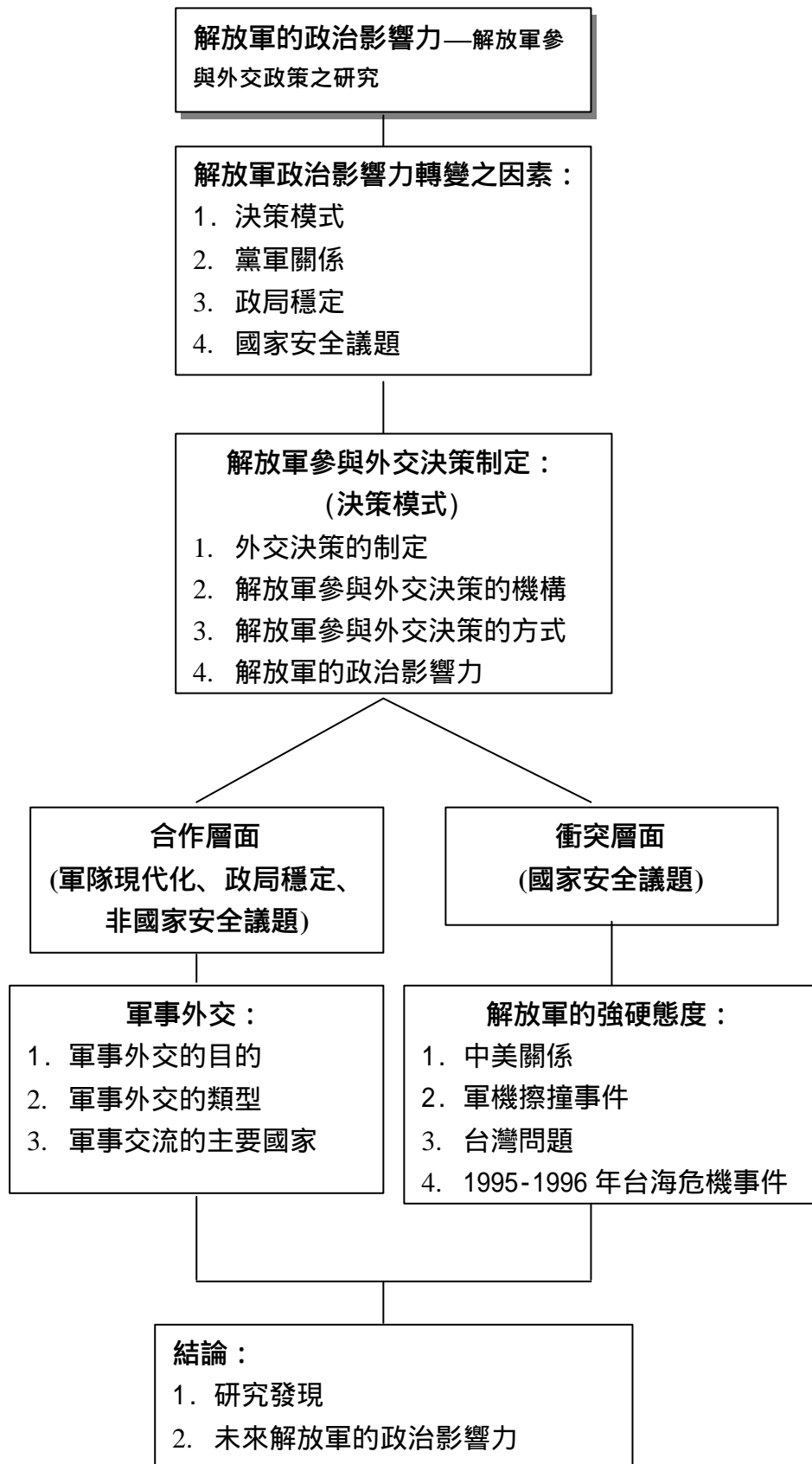


圖 1-1 研究架構圖

第二章 解放軍政治影響力轉變之因素

中共黨軍關係在組織結構上的表現具有黨軍一體的特質，因此軍人無法避免地進入政治舞台。一般而言，解放軍參與政治的原因可歸納為中國政治的特質、中共叛亂過程的發展、毛澤東的建軍路線、紅專衝突的結果等歷史因素。此外軍隊企圖參與政治也受到四項因素的影響，一為軍隊老一代幹部在長期革命鬥爭、黨軍不分的環境中成長，對於軍隊的積極政治角色，與毛澤東建軍模式，始終抱持著一定程度的肯定態度；二為在落後的國民經濟中，中共當權者始終未擺脫利用群眾動員，發展國民經濟的企圖，因此，中共軍隊仍扮演包括政治、經濟、軍事等功能的角色，使共軍很難由從政治角色中脫身；三為不論就中共的政治史，抑或其國家的政治發展來看，只要中共的政治局勢陷於不安的情況下，或大陸社會潛伏著動盪與衝突，中共軍隊涉及政治的可能性則會增加；四為中共軍隊在一個特殊的黨軍關係體制下，將不可避免或強或弱的捲入中共政治活動之中。¹

基本上，不同的學者對軍隊政治影響力的影響因素有著不同的看法。美國學者喬飛指出，軍隊的政治影響力主要受到三項因素的影響：最高權力領導人與解放軍的關係、解放軍在國家決策的涉入程度、黨軍關係；²學者史文觀察天安門事件後黨軍關係的發展，認為政權未穩固時，解放軍的政治角色相當重要；³學者李南(Li Nan)分析後毛時期的解放軍特色，認為解放軍雖走向專業化，但是礙於服從黨的指令，其政治角色與西方的軍隊是不同的；⁴國內學者俞雨霖認為只有在繼承階段或後強人時代，新領導人權威薄弱時，軍人政治角色問題才日益突顯；⁵學者沈明室認為軍人政治角色受到四項因素的影響：政治環境的變化、理論基礎的弱化、黨軍分立的傾向及強人統治的終結。⁶

¹ 林火順，「淺談共軍參與政治活動原因與途徑」，*臺灣新聞報*，2002年12月24日。

² Ellis Joffe, "The Military and China's New Politics: Trends and Counter-Trends," Edited by J.C. Mulvenon & R.H. Yang,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in the Information Age* (Santa Monica, California: Rand Corporation, 1999), 23.

³ Michael D. Swaine, *The Military and Political Succession in China: Leadership, Institutions, Beliefs* (Santa Monica: Rand, 1992), 122-139.

⁴ Nan Li, "From Revolutionary Internationalism to Conservative Nationalism: The Chinese Military's Discourse on National Security and Identity in the Post-Mao Era,"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May 2001.

⁵ 俞雨霖，「中共軍人的政治角色—比較與歷史的觀點」，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論文，1987年，頁47。

⁶ 沈明室認為在文化大革命及天安門事件中，解放軍的政治角色及影響力較大；年輕一代的軍人具有民主意識，其對黨的領導原則產生懷疑，希望軍隊的政治角色朝向軍隊國家化；鄧小平加強軍隊現代化與專業化工作，使得黨軍分立，解放軍的政治影響力下降；在毛鄧強人統治下，解放軍成為工具性的角色，解放軍的政治影響力微弱。在強人政治終結後，江澤民為了拉攏軍隊的支持，解放軍有了更多自主權。有關解放軍政治角色之影響因素可參閱沈明室，「中國共產黨之轉型及共軍『軍隊國家化』之探討」，*和平論壇*，2003年10月20日。

綜合各學者的看法，共軍的政治影響力受到四項因素的影響：決策模式、黨軍關係變化、政局穩定及國家安全議題，以下將分別探討這四項因素對解放軍政治影響力的影響。

第一節 決策模式

學者喬飛認為在不同時期，中共領導人與軍隊有著不同的三種關係。毛澤東在政治上和軍事上具有絕對的權威，軍隊作為獨立因素的政治影響就微乎其微；鄧小平的政治地位並不完全鞏固，但是他有軍隊的堅定支持；江澤民的政治資本並不雄厚，在軍中又絲毫沒有基礎，不能得到軍方的無條件支持，因此必須給軍方一些好處來換取支持，這就使軍方成為一股獨立之政治勢力，甚至成為決定最高領導人地位鞏固與否的重要因素。⁷

不同決策模式使共軍介入政治的深淺不同，並使得共軍的政治地位有所差異。毛澤東及鄧小平有著至高無上的權威，決策模式以「領袖主導」及「集體領導」為主，使得共軍聽命於領導者，共軍只是工具性的角色；江澤民缺乏毛鄧的威望，只能依賴制度上賦予的權力來領導軍隊，使得後強人的權力較弱勢，決策模式轉以「官僚政治」為主，為了穩固政權，江澤民積極拉攏共軍，使得共軍的政治地位提升。以下將分別論述在「領袖主導」模式、「集體領導」模式及「官僚政治」模式下，解放軍的政治影響力及政治角色。

一、領袖主導模式

軍隊的政治角色在某種程度上受到強人統治的影響。因為中共第一代領導者和第二代的領導者與軍隊一同打下江山，其與軍隊的淵源以及對軍隊的崇高權威，往往他人無可取代的。他們之所以成為強人，除了個人的強烈意志與精明權術之外，主要是在政治上提出突出一格並且具有成效的政策，以及以往在軍隊作戰立下的特殊功勳所致。⁸

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贏得權力鬥爭的勝利，形成他在軍權上的領導地位。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建立和鞏固獨裁地位，毛澤東消滅張國燾與國際派等反對勢力，掌握黨與軍隊的絕對領導權。然而，毛的文人與武人雙重角色，使他在處理軍人問題角色上，異於國際派對軍權的處理方式。國際派模仿前蘇聯紅軍的管理方式，重組織與制度上的領導；但是毛澤東採取的是中國傳統上的人事領導，使用恩威並重的方式收攬人心。他在處理軍人角色問題上，不僅要加強黨對軍的領

⁷ Ellis Joffe, "The Military and China's New Politics: Trends and Counter-Trends," Edited by J.C. Mulvenon & R.H. Yang,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in the Information Age*(Santa Monica, California: Rand Corporation, 1999), 24-34.

⁸ 沈明室，"中國共產黨之轉型及共軍『軍隊國家化』之探討"。

導制度，更重要的是加強他個人在軍中的權威地位，使軍人同時效忠於他個人。

9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發生，自1967年3月15日起，中共中央陸續決定對廣東、青海、安徽、內蒙古、四川、甘肅、湖南、江西、廣西等省實行軍事管制。1967年5月31日，決定將建立地級以下政權的審批大權，完全交給各大軍區或省軍區。解放軍代表在新建立的革命委員會中佔支配性地位，在全國二十九省、市、區革命委員會中，解放軍代表任主任的計二十名，佔69%。其餘省份的革命委員會主任也大都兼任軍職。解放軍代表任縣以上革命委員會主任、副主任的，計有5193人，所佔比例均為89%。解放軍代表帶進大批軍隊幹部擔任政權機關工作人員。¹⁰1969年中共第九屆人大會議有近1500名代表，軍人超過半數。選出的中央委員會中，軍隊代表佔50%。政治局委員中，軍隊代表佔52%，解放軍代表比例高，且黨、政主要領導仍兼軍職，必須接受軍隊領導，因此形成軍隊控制黨、政之現象。

毛澤東為了解決「槍指揮黨」之困境，於是著手清除政治軍事化。1972年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發出《關於三支兩軍若干問題的決定》，決定：1.由地方黨委對當地黨、政、軍、民實行一元化領導。2.省軍區、軍分區、縣武裝部同時是同級地方黨委的軍事工作部，受同級地方黨委領導，野戰軍在與地方有關的各項工作上，也必須接受駐地省、市、區黨委領導。3.實行軍管的地區或單位，黨委建立後，軍管撤銷，軍管人員返回部隊。4.各級黨委建立後，軍隊支左機構即行撤銷。¹¹至此，革命委員會的歷史使命實際上已告結束，「革命委員會」的名稱，只剩一個空名，傳統的黨一元化領導及政府體制，至此已全面恢復。

1950年代以後的毛澤東雖然重視軍隊的軍事專業能力，卻因過度強調軍隊的政治角色，使得解放軍軍事專業能力的發展遭到嚴重破壞。在此過程中，解放軍雖獲得極高的政治影響力，但其工具性甚強。亦即在毛澤東時期，共軍的政治角色只是一種工具性角色，共軍聽命於毛的指揮行動，充當毛的政治打手，只能在不違背毛的最高領導權威這個原則下，才能享有些許的自由，例如獲得各種政治、社會特權，和優厚的生活待遇等等。

二、集體領導模式

毛澤東死後，在葉劍英的支持下，鄧小平再度復出，恢復擔任中央委員、中

⁹ 林火順，「江澤民掌握軍權之研究」，政治作戰學校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年6月，頁22。

¹⁰ 周全華，「論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動因」，*二十一世紀*，第48期(2006年3月)。

¹¹ 「關於三支兩軍若干問題的決定」，*人民網*，1972年8月21日。

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共軍總參謀長的職務，但在實力不足的情況下，鄧小平並沒有採取全面整軍的措施。但是藉由處理中央軍委日常事務及總參謀長職務之便，一方面掃清軍中靠文革起家的幹部，一方面重用文革曾遭迫害，但已恢復職務的老幹部，並且安插自己的親信，擴展本身的勢力。當時十一大軍區中，就有七個支持鄧小平，三個支持華國鋒，一個保持中立。¹²鄧小平藉軍隊人事上的漸進整頓措施，逐漸擴展自己的實力，使得華國鋒雖為名義上的中央軍委主席，但在五位副主席均為「老紅軍」的情況下，¹³充其量只能當橡皮圖章，權力遭到架空。而在老軍頭年老日衰情況下，鄧小平自然穩穩的掌握軍權。¹⁴

在 1980 年中央書記處重新成立之前，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扮演集體決策模式的主要決策機構，1980 年代至 1987 年之間的中央書記處則是政策選定的主要機構，1987 年至 1992 年間的中央政治局扮演主要決策機構，1992 年十四大以後，最高領導人鄧小平及主要元老均已離開正式的黨政要職，中央政治局常委已身兼黨政軍重要領導職務，負責相關工作，此時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便已是集體領導決策模式政策制定的主導者。¹⁵

不論決策權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或是中央書記處、中央政治局，鄧小平時期決策模式主要是以「集體模式」為主。受到中共對外開放、外交政策議題多元化及革命元老凋零影響，在鄧小平時期的政治運作中，參與中共政策過程的成員比毛澤東時期多，技術官僚的決策權威也比以往有所提升。¹⁶何漢理(Harry Harding)認為後毛澤東(Post-Mao)時期的中共政權是一種「協商式威權(Consultative Authoritarian Regime)」政權，鄧小平的統治模式已與以往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明顯不同。¹⁷中共的決策結構發生變化，高層領導與低層官僚之間需要透過協商、談判、意見交換及建立共識等過程來進行權力運作。¹⁸「集體領導」模式使得長期從事外事工作的外交官及外貿職業官僚的角色愈形重要，外交工作官僚在黨內地位的日益重要，正可說明黨政軍高層不再獨佔外交決策的主導權，長期從

¹² 郭華倫，「中共當權派之權力與路線鬥爭現勢」，《匪情月報》，第 21 卷第 11 期(1979 年 5 月)：頁 1。

¹³ 五位中央軍委副主席分別為葉劍英、鄧小平、劉伯承、徐向前、聶榮臻（按排名序）。

¹⁴ 沈明室，「中共十六大權力繼承與軍隊角色」，《展望與探索》，第 1 卷第 2 期(2003 年 2 月)：頁 37。

¹⁵ 許志嘉，「中共外交決策模式研究：鄧小平時期的檢證分析」，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論文，1998 年，頁 186。

¹⁶ Alan P. Liu, *How china is Ruled*(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 1986), 255-256.

¹⁷ Harry Harding, *China's Second Revolution: Reform After Mao*(Washington, D. 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87), 200.

¹⁸ Kenneth G. Lieberthal and Michel Oksenberg, *Policy Making in China: Leaders, Structures and Process*(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22-23.

事外交工作的職業官僚已深入外交決策核心。

三、官僚政治模式

江澤民接班模式是在 1989 年趙紫陽下台時，先接下黨總書記的職務，然後在中共的十三屆五中全會，接下鄧小平所辭去的黨中央軍委職務，隨後在 1990 年 3 月的七屆人大三次會議中，接下國家軍委會主席的職務，最後在八屆人大一次會議中接下國家主席的職務，其接棒的程序是依照黨、軍、政的程序進行。中共第三代領導人江澤民自 1989 年 11 月從鄧小平手中接任黨的中央軍委會主席後，在鄧小平刻意的支持及安排下，¹⁹逐漸建立個人威望，1997 年 9 月十五大後，真正鞏固在軍隊的領導地位。在強人鄧小平統治終結後，江澤民只有黨和政府工作的經歷，與軍隊沒有歷史淵源，為了取得軍隊的支援，除配合軍人將楊家兄弟排除外，就是盡力討好拉攏軍隊。自從接任中央軍委主席後，江澤民重視軍事現代化及現代高科技戰爭需要的問題，並處處表現出對國防現代化的關心。在具體行動上，江澤民以下列幾種方式拉攏軍隊：

1. 滿足軍隊財政需求：

1990 年代以後，中共軍費開支增長率幾乎每年都超過 10% 以上，有時甚至超過 20%，此與 1980 年代軍費遭到削減成了鮮明的對比。尤其是自江澤民掌權以來，軍事費用幾乎每年呈兩位數的成長(軍事費用情形如表 2-1)。

¹⁹ 鄧小平為了能讓江澤民順利接班，除了將中央軍委會主席的位子讓予江澤民外，更在 1992 年十四大時，捨棄楊白冰，任用劉華清和張震，由劉張二將輔佐沒有軍事經歷的江澤民掌軍。

表 2-1 中共自改革開放以來的軍事費用狀況

單位：億元人民幣

年代	國家總支出	國防支出	年增率
1978	1,122.09	167.84	0
1980	1,228.83	193.84	0.134131
1985	2,004.25	191.53	-0.01206
1989	2,823.78	251.47	0.238358
1990	3,083.59	290.31	0.133788
1991	3,386.62	330.31	0.121098
1992	3,742.2	377.86	0.12584
1993	4,642.3	425.8	0.112588
1994	5,792.62	550.71	0.226816
1995	6,823.72	636.72	0.135083
1996	7,937.55	720.66	0.116477
1997	9,233.56	812.57	0.11311
1998	10,798.18	934.7	0.130662
1999	13,187.67	1,076.4	0.131643
2000	15,886.5	1,207.54	0.108601
2001	18,902.58	1,442.04	0.162617
2002	22,053.15	1,707.78	0.155606
2003	24,607	1,907.87	0.104876
2004	26,768	2,117.01	0.098790
2005	32,255.03	2,446.56	0.134699

資料來源：整理自中國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鑑：2003*（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3年），頁285；第十屆人大會議財政部長報告，2005年3月4日；2004年中國的國防白皮書（中共國務院，2004年12月27日）。

1993年後，江澤民積極推動軍隊工資改革，大幅度地提高軍人的待遇，用實際的物質利益獲取軍人的支持。經過這次工資改革後，軍官工資大幅地拉開與地方工資的差距，使以往僅比地方同級幹部高30到50元的軍官工資，提高到超過一至兩倍。如軍校畢業生每月工資達700元，而一般大學畢業生的工資僅200到300元。1994年江澤民又下令將部隊伙食標準每天提高1元，僅此一項每年就增加軍費11億元。²⁰江澤民逐年調高國防預算，除了滿足共軍將領迫切需要的高科技軍備外，最主要的目的是為改善軍人薪資待遇，藉此籠絡軍心。

2. 走訪基層部隊：

²⁰ 林長盛，“槍桿子到底支援誰？”，*北京之春*，第48期（1997年5月）：頁32。

江澤民積極拉攏軍隊的另一個手法，是不斷走訪基層部隊單位，以建立與廣大軍人的親密關係。江澤民在 1990 年代中期前的幾年中，先後探視 100 多個部隊基層連隊，幾乎平均每月巡視一個軍事駐地。江澤民到訪之處包括西藏海拔四千多公尺的軍營，以及駐防南海的艦艇。在走訪過程中，江澤民極力表現出對軍人生活的關心，處處詢問軍人的伙食、住宿等情況。在巡視各營房時，江澤民親自視察廚房、營舍和崗哨等地方，儘量樹立愛兵形象，²¹爭取軍隊的支持。

3. 建立軍中人脈：

江澤民尋求軍隊支持的重要方法之一是建立自己人脈，而提拔高級將領軍階成為最方便的方式。1993 年 5 月江澤民授予張萬年、傅全有、于永波等六人上將軍銜；1994 年 6 月又授予徐惠滋、李景、周克玉等 19 人上將軍銜。僅在一年多的時間裏，江澤民就授予 25 個上將軍銜，而鄧小平擔任軍委主席十多年，也只授 17 個上將軍銜。總計任內 13 年，江澤民總共提升 81 位上將。²²

4. 尊重軍隊專業自主性：

江澤民拉攏軍隊的最重要行動，是對職業軍人主導軍隊事務的尊重。以往，中共強人毛澤東和鄧小平，通過軍隊的政委系統，不論對軍內的政治事務、人事升遷，以至純粹的軍事業務，均積極主導，大力干預。但觀察江澤民與軍隊的關係即可發現，解放軍的人事問題和軍事事務，已由職業軍人所主導，主要？兩位老軍委副主席劉華清和張震主管。其中，武器裝備多由劉華清主管，軍內人事主要由張震主持。軍隊要研製和購買什？武器裝備，劉華清作出決定後，江澤民簽名認可；軍隊人事的變動和調整，張震拿出名單後，江澤民亦簽名認可。²³江澤民尊重職業軍人在軍事事務的自主權，使得軍隊對江澤民擔任軍隊最高政治領導權給予認可和尊重。

5. 加強意識型態的灌輸：

由於江澤民沒有如毛鄧在軍中的地位，在如此的情況下，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基礎就相形薄弱。為了確保軍隊對黨的服從，江澤民以「三個代表」意識型態作為軍隊的政治教育內涵，藉以鞏固黨對軍隊的領導。江澤民在 2000 年 2 月 25 日於廣東考察時，首次提出「三個代表」，認為中國共產黨「總是代表著中國先

²¹ 林長盛，「槍桿子到底支援誰？」，頁 32。

²² 董立文，「中共十六大人事的初步分析—令人困惑的後江時代與第四代」，*展望 2003 年兩岸政經發展研討會*，高雄，2002 年 12 月 1 日，頁 54。

²³ 林長盛，「槍桿子到底支援誰？」，頁 32。

進社會生產力發展的要求，代表著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著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²⁴之後，江澤民陸續對三個代表提出論述，並指出三個代表是中國共產黨的「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源」。²⁵在中共建黨八十週年的講話中，江澤民更對「三個代表」的內涵作出更完整詮釋。²⁶黨政軍亦發動各種輿論造勢，呼應與闡釋「三個代表」，聲勢可比擬鄧小平「南巡講話」後的風潮。

張萬年在出席第十六屆黨代表大會時指出，「堅持和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全黨的一項長期戰略任務，也是全軍第一位的政治任務。在學習貫徹十六大精神的過程中，要緊緊抓住『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這個靈魂和主線，廣泛宣傳，系統學習，自覺行動，全面實踐，在全軍迅速掀起深入學習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新高潮，確保我軍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我軍是黨絕對領導下的人民軍隊，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永遠不變的軍魂。我軍必須以黨的旗幟為旗幟，以黨的意志為意志，自覺在思想上政治上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²⁷

在鄧小平過世之後，由於新的領導人江澤民在軍隊中無強人的軍事背景，為了拉攏軍隊的支持，江澤民只好靠著黨領導人的資源分配與人事權來掌握與控制軍隊，軍隊在江澤民的領導下，各項福利及自主權都較毛鄧時期來得多，所以在江澤民時期的黨軍關係出現「江澤民的弱勢與軍方的強勢」趨勢，決策模式轉以「官僚政治」為主，決策的制定較以往更具制度化及多元化。

此外，在後冷戰時期國際事務日趨繁雜的影響下，中共決策體系愈來愈依賴外事領導小組的專業功能，促使外事領導小組的重要性愈形提高。如果外交事務涉及之議題與外交系統、軍隊相關，通常政治局常委會會邀請外事領導小組及中央軍委進行研議。²⁸可見，在「官僚政治」的決策模式下，軍隊對政治事務的介入與影響倍於往昔。

²⁴ 江澤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黨如何做到『三個代表』」，刊於江澤民，*論「三個代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8月），頁2。

²⁵ 「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源」，*人民日報*（北京），2000年5月23日，版2。

²⁶ 江澤民提及「在新的世紀，繼續推進現代化建設，完成祖國統一大業，維護世界和平與促進共同發展，是我們黨肩負的重大歷史任務。面對國內外形勢的深刻變化，我們黨要緊跟世界進步的潮流，團結和帶領全國各族人民抓住機遇、迎接挑戰，勝利完成這三大歷史任務，必須堅定不移地貫徹落實『三個代表』要求。『三個代表』要求，是我們黨的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源，也是我們在新世紀全面推進黨的建設，不斷推進理論創新、制度創新和科技創新，不斷奪取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勝利的根本要求。」更詳細的「三個代表」內涵可參見江澤民，「在慶祝建黨八十週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北京），2001年7月2日，版1。

²⁷ 「張萬年遲浩田代表表示全面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 加速推進軍隊建設和改革」，*人民網*，2002年11月9日。

²⁸ 在2001年4月，美國總統布希決定出售台灣紀德級驅逐艦及柴電動力潛艦後，政治局常委會、外事領導小組及中央軍委三個單位立即召開特別會議研究對策。田道遠，「江澤民提出對美三大策略」，*多維周刊*，第49期（2001年5月）。

四、不同決策模式的軍人政治角色變化

根據韋伯(Max Weber)的研究，權威的類型可分成三種：第一為傳統的權威(Traditional Authority)，第二為魅力的權威(Charismatic Authority)；第三為合法、理性的權威(Legal-rational Authority)。²⁹在傳統的權威中，權威來源是對於傳統文化的信仰與遵循，亦即權威的來源是世襲。領導者的權威至高無上，不受任何的限制。人員在組織內從事工作，一切聽命於領導者的意志，沒有一定的法規可循，領導者意志與好惡決定一切；在魅力的權威中，權力來源是領導者個人的特質與魅力，這種情形大多發生於動盪不安的社會裏，一旦社會安定，領導者的個人特質與神秘色彩即逐漸消失；在第三種法定權威中，權力乃基於法律的授與。下屬之服從權威領導，並非服從領導者本人，而是服從法律所賦與該職位的權力。法律至高無上，治者與被治者都受到法律拘束，即在組織裏，無論是最高主管或臨時雇員，都需遵照法規的規定，領導者權威的行使有一定範圍，且須遵循一定的法定程序。

若以韋伯的權威類型來區分，毛鄧的權力是來自於個人魅力，江澤民的權力則是來自法定權威。毛澤東藉由個人至高無上的魅力和權威，促使軍隊服從並聽命於他；鄧小平個人威望也使得軍隊不得不介入天安門的震壓行動；江澤民因缺乏如毛鄧般的魅力型權威，只好藉由攏絡軍隊及制度上職權的方式，建立在軍中的地位及影響力。亦即毛澤東和鄧小平固然是黨的最高領導人，但是他們的權力實際上並非靠黨政職務，而是源自長期在軍隊中掌權的魅力型領導人身份，黨政職位只是增加他們運用權力的正當性而已。因此在毛鄧強勢的領導者時期，決策模式是以「領袖主導」及「集體領導」為主，軍隊政治角色只是工具性角色，軍隊對政治的影響力較小；相對的，在江澤民弱勢的領導者時期，江澤民的政權是一種「官僚政治」方式，而非以江澤民個人權威之下的強人領導，³⁰缺乏具備第一代及第二代領導人的權威基礎，故其決策模式以「官僚政治」為主，軍隊參與決策制定的機會與管道變多，軍隊的政治影響力較大。

第二節 黨軍關係

共產黨國家革命軍隊的基本職能除了保衛國家安全外，更主要的是維護共產黨的一黨專制體制。在政治上，這種革命軍隊不具有西方職業軍隊的中立性，

²⁹ Lewis A. Coser 著；黃瑞祺、張維安譯，*古典社會學理論*（台北：桂冠圖書公司，1986年），頁184。

³⁰ 奕父，「從『集體領導』論江核心的問題，」*中共研究*，第31卷第3期（1997年3月）：頁9-11。

也不具有第三世界國家權力軍隊的獨立性，相反地，中共軍隊完全為共產黨牢牢地控制，為共產黨的利益服務。在軍事上，專業自主權被共產黨所控制，軍人在軍事上的發言權必須與黨之政策保持一致。亦即這種革命型的軍隊在本質上並不是國家或人民的軍隊，而是共產黨一黨的軍隊，即所謂的「黨軍」。³¹

黨軍關係在毛澤東與鄧小平時期最為密切，對於黨軍關係，鄧小平則延續毛澤東時期「黨指揮槍」原則。雖然鄧小平主張現代化、正規化、革命化的建軍路線，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幹部政策，有限度地提高共軍政治素質與專業水準。然而在鄧小平強人領導下，人民解放軍的現代化並未改變黨軍關係「一體化」現實，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形成強人對軍隊絕對領導，軍隊對黨的忠誠，也成為對強人個人的忠誠，使得軍隊無形中成為強人的政治工具。此種「一體化」黨軍關係一直到後冷戰時期黨軍關係才出現新的變化，主要原因是波灣戰爭、科索沃戰爭發生，使中共意識到軍隊現代化和專業化的重要性，因此中共開始重視武器裝備、資訊戰及人員素質。軍隊現代化和專業化使得軍隊將重心放在建軍層面，使得解放軍的政治角色影響力漸趨微弱。以下將先分析中共黨軍關係的維繫方法，繼而探討軍隊現代化和專業化對軍隊政治角色的影響。

一、黨軍關係的維繫

中共建軍政策中，希望將解放軍建設成為一支臣服於黨領導的現代化正規化軍隊，儘量減低軍隊捲入共黨政治領域或者是派系鬥爭之中，使解放軍成為名符其實的「戰鬥隊」。因此在政策作為上，針對強化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上，一方面強化解放軍的思想政治工作，鞏固解放軍思想路線，另一方面更是強化「軍中有黨」特性，對解放軍進行結構性的控制，使解放軍定位成為維繫共黨鞏固政權的工具。³²基本上，中共黨軍關係的維繫主要是由思想與組織二方面來鞏固，黨軍關係的全貌可由意識型態的控制、中央軍事委員會組織及黨委領導制度、政治委員制度和政治機關制度來加以瞭解。

(一)意識型態的控制

中共建軍思想基本上承襲馬列主義的理論，在這個基礎上，毛澤東根據中共的實踐狀況進行補充與強化，最後形成指導中共黨軍關係的主要原則。概括而論，這些原則包含以下幾點，即無產階級的解放需要通過暴力革命來實現，無產階級暴力革命的領導核心是共產黨，軍隊必須置於共產黨的絕對領導之下。³³

³¹ 林長盛，「中共黨軍關係的模式與變遷」，林長盛編，*解放軍的現狀與未來*(台北：桂冠文化，1993年)，頁97。

³² 莫大華，「政權轉移VS解放軍地位」座談會，遠景基金會會議紀錄摘要，2002年3月20日。

³³ 林長盛，「中共黨軍關係的模式與變遷」，林長盛編，*解放軍的現狀與未來*(台北：桂冠文化，

列寧曾指出：「革命的軍隊是需要的，因為偉大的歷史問題，只有使用暴力才能解決，而暴力組織在現代鬥爭中就是軍事組織。」³⁴列寧堅定主張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和無產階級專政的領導力量。毛澤東完全承襲馬克思列寧的思想，一方面認為每個共產黨員都應該懂得「槍桿子出政權」道理外，更應堅持「黨指揮槍，而絕不容許槍指揮黨」的原則。³⁵

鄧小平雖然以改革者自居，但在黨軍關係上繼承毛澤東的思想原則，堅持黨對軍隊領導。鄧小平指出：「我們這個軍隊的性質是黨的軍隊，人民的軍隊，社會主義國家的軍隊。我們的軍隊要始終忠於黨，忠於人民，忠於國家，忠於社會主義。我們這個軍隊是黨指揮槍，不是槍指揮黨。我軍不管如何更新換代，這一條絕對不能改變。」³⁶

江澤民與胡錦濤對於黨軍關係的主張也與毛鄧思想相同。江澤民在 2004 年十四屆四中全會上指出，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始終把思想政治建設擺在首位。而胡錦濤也在 2004 年 9 月中央軍委擴大會議言明，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是解放軍建設和發展的首要問題。³⁷由此可見，自建政以來，中共領導者始終堅持「以黨領軍」原則。在中共黨軍關係中，解放軍服從於共產黨權威，³⁸黨對軍隊領導權並沒有因為時間與環境的改變而有任何變化。

為了將「黨領導軍」的意識型態灌輸至軍隊中，軍隊政治教育成為重要的工作。毛澤東於 1954 年審定《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條例》草案時，親筆恢復原稿中被刪除「中國共產黨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的政治工作是我軍的生命線」提法，使得解放軍將政治工作視為重要任務。³⁹中共視政治教育為，「提高官兵政治思想覺悟和認識能力所進行的政治理論和思想啟動活動，是保持人民軍隊軍隊性質，調動官兵積極因素，提高部隊戰鬥力，完成各項任務的中心環節。」⁴⁰為了使軍人接受中共建軍思想與黨對軍隊的領導，長期以來，中共堅持對軍人進行政治宣傳和教育，使軍人自然養成服從共產黨領導的心態，並成為黨的政治性工具。

1993 年)，頁 99。

³⁴ 列寧，「論革命軍隊和革命政府，」*列寧全集*（第 8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年），頁 313。

³⁵ 毛澤東，*戰爭和戰略問題*（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年），頁 535。

³⁶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頁 27。

³⁷ 有關江澤民及胡錦濤演講內容，可參閱本論文第一章第一節的內容。

³⁸ 高德溫(Paul H.B. Godwin)認為，解放軍服從於共產黨權威乃是軍隊的「靈魂」(soul)。Paul H.B. Godwin, "Preserving the PLA's Soul: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and the New Generation of Chinese Leadership," *CAPS-RA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PLA Affairs*, U.S.A., August 15-16, 2003: 8.

³⁹ 楊永斌主編，*毛澤東軍隊政治思想工作思想研究*（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3 年），頁 128。

⁴⁰ *中國軍事百科全書*（*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與軍事後勤*）（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7 年），頁 148。

(二)中央軍事委員會組織

中央軍事委員會為領導全國武裝力量的組織，其主席是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其中央軍事委員會其他組成人員則是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提名，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或常務委員會決定。事實上，國家的中央軍事委員會和黨的中央軍事委員會是「一套人馬，兩塊招牌」，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的中央軍事委員會之組成人員，也是黨中央委員會的成員，二者之人員是重疊的。因此中共憲法所創設的國家中央軍事委員會，非但沒有削弱中共共產黨對國家武裝力量的領導，卻成為強化黨對軍隊領導的主要緣由所在。⁴¹有關中共黨軍結構的關係可以圖 2-1 來表示。

⁴¹ 劉清波，「論中共『八二憲法』的『中央軍事委員會』」，《共黨問題研究》，第 26 卷第 1 期(2000 年 1 月)：頁 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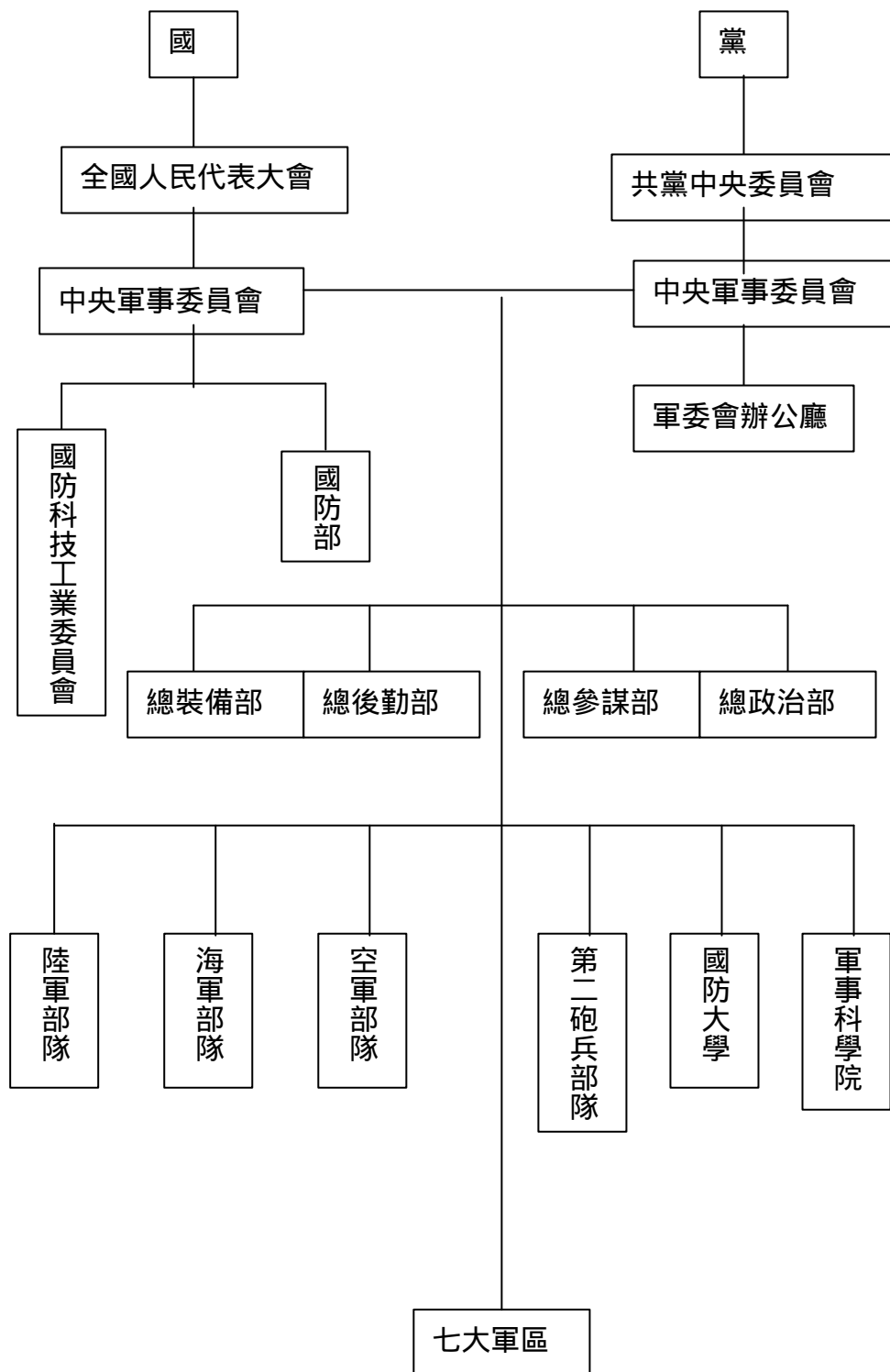


圖 2-1 中共黨軍結構關係圖

資料來源：修改自林麗香，”中共黨軍關係，”空軍學術月刊，第 586 期(2005 年 9 月)：頁 21。

(三)黨委會領導制度

中共建軍之初，就在軍隊內建立黨的組織。1927年「秋收起義」失敗後，毛澤東為了加強黨對軍隊的控制，立即在三灣對軍隊進行整編，以軍事單位為基礎把在軍隊內的中共黨員組織起來，在每個連隊設立中共黨的支部，在軍隊內正式地建立中共的黨組織。到井岡山之後，軍隊內黨組織進一步的制度化，在班排設黨小組，連隊設黨支部，營團設黨委，軍隊設軍委。往後幾十年裡，中共在軍隊的黨組織不斷鞏固，形成中共對軍隊絕對領導，以及把軍隊變成黨工具的組織基礎。⁴²

黨對軍隊的領導主要是透過黨委員會。在十六屆四中全會明確指出「發揮黨委對同級人大、政府、政協等各種組織的領導核心作用，發揮這些組織中黨組的領導核心作用。黨委既要支援人大、政府、政協和審判機關、檢察機關依照法律和章程獨立負責、協調一致地開展工作，及時研究並統籌解決他們工作中的重大問題，又要通過這些組織中的黨組織和黨員幹部貫徹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貫徹黨委的重大決策和工作部署。」⁴³中共黨軍具體規定，在團以上部隊和相當於團以上的單位，設立黨的委員會；基本上，解放軍內部仍然實行黨委統一的集體領導下首長分工負責制，軍隊中一切重大問題，都要由黨委集體討論決定，然後由軍政首長負責分工執行。屬於軍事工作方面事項，由軍事指揮員負責；在緊急情況下，軍政首長有權作臨機處置，但事後應迅速向黨委報告。⁴⁴

黨委會是一個平行並獨立於各個階層的軍事組織之外單位，各個階層黨委會只向它的上級黨機關負責，而此一指揮鏈的最高層級即是中共中央軍委會。一個軍事單位的黨委會，其組織成員有該單位的軍事指揮員、政治委員及少數參謀人員。黨委會採取共識決和集體領導制，雖然軍事指揮員為部隊之首長，但是在黨員會中沒有獨斷獨行的權力，凡事需取決於黨委的集體決定。此外，如果黨委會就某一個問題無法達成決議，黨委書記有最後的決定權。而黨委書記通常是由政委擔任，所以在黨委會集體領導制之下，政委的權力基本上是大於軍事指揮員，⁴⁵這就是「以黨領軍」的最佳表現。

另外，解放軍的黨委領導制還具體表現在由軍事系統組織和地方黨組織對軍隊的雙重領導上。一方面，解放軍內部要保持軍事系統黨組織的垂直領導與隸屬關係；另一方面，在與地方有關工作上又得接受同級地方黨委會的領導。各省軍

⁴² 林長盛，「中共黨軍關係的模式與變遷」，頁 102。

⁴³ 「中國共產黨十六屆四中全會」，*北方網*，2004年9月26日。

⁴⁴ 浦興祖主編，*當代中國政治制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頁 326。

⁴⁵ 陳志洪，「江澤民時期中共黨軍關係之研究」，*中山大學大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年，頁 13。

區、軍分區及同級地方黨委的軍事工作部門，皆由地方黨委書記兼政治委員；而省級以下(含省級)軍區，必須要有一位主要領導人參加該地區黨委會的領導工作。通過這種雙重領導制度，確保省級以下黨對軍的領導及延續高層的軍文關係。除此，解放軍的黨委領導制，還表現在：1.在團以上或相當於團以上的單位，以及根據需要在獨立執行任務的營或相當於營的單位，設立政治委員會。2.在一般的營級單位設立政治教導員，在連級單位設立政治指導員。3.營及相當於營的單位，設立黨的基層委員會。4.基層連隊設立黨支部，班排設立黨小組。⁴⁶

實際上，中共黨委制度之設立目的是在保證軍隊能夠保持對黨的效忠與服從，並傳達與落實黨的方針、政策、原則、命令和指標；解放軍各級政委與軍事指揮員和首長同為部隊首長，但兩者都直接受黨委員會領導幹部的指導，政治委員長和軍事指揮員有不同意見時，必須提交黨委員會討論決定，⁴⁷亦即各級政委及軍事指揮員其實是在黨委領導下傳達與落實黨的方針、政策、原則、命令和指標之執行人員而已。

(四)政治委員制度

為了領導部隊的黨工作和政治工作，在軍隊團以上或相當於團以上單位，以及根據需要在獨立執行任務的營或相當於營的單位，設立政治委員，並且在營級單位設立政治教導員，在連級單位設立政治指導員。政治委員和同級軍事指揮員共同負責制定部隊作戰、訓練、後勤工作和部隊建設、民兵建設的計劃，並在頒布的命令上簽字。政治委員還負責部隊的幹部工作，並在任免幹部及調動人員的命令上簽字。在所屬部隊中，若發現個別人(包括同級軍事指揮員在內)或組織違反政策、法令時，政治委員有權立即制止和糾正，並提交黨的委員會處理⁴⁸。營政治教導員和連政治指導員，在上級首長、政治機關和黨委會(黨支部)領導下，進行黨的基層組織工作和政治工作，與營(連)人員的首長，共同負責全營(連)工作。⁴⁹

政治委員、政治教導員及政治指導員形成軍隊的政治委員制度，政治委員制度對部隊建設和政治工作，產生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中共也藉此制度確保中央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及控制。

(五)政治機關制度

⁴⁶ 浦興祖主編，*當代中國政治制度*，頁 327-329。

⁴⁷ 李英明，*中國大陸研究*(台北：五南書局，1995年)，頁 147。

⁴⁸ 浦興祖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制度*(香港：三聯出版社，1996年)，頁 330-331。

⁴⁹ 浦興祖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制度*，頁 331。

政治機關是中共在部隊中管理黨的工作和政治工作的機關⁵⁰。人民解放軍下設總政治部，負責管理全軍黨的工作和政治工作。在總政治部以下，在各大軍區、省軍區、軍分區和全軍師以上單位(包括軍隊院校和醫院等)均設立政治部，團級單位設立政治處。⁵¹部隊黨委會的日常工作主要是由政治機關來組織實施；提請黨委會討論的工作計劃、幹部任免事項等，一般都先經政治機關討論，提出意見。換言之，為了發揮政治機關作用，黨委會和政治委員會要充分尊重政治機關的職責。⁵²政治機關是黨在軍隊的代表機關和領導機關，也是黨的工作機關，更是同級黨委的辦事機關。

由以上的分析內容可得知，中共長期以來透過意識型態的控制功能，以及軍事委員會、黨委制度、政治委員制度、政治機關制度在領導與指揮的組織控制，將軍隊牢牢地置於黨的領導之下，黨軍關係一體化確保中共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使得黨對軍隊的領導成為合法化行為，並促使軍隊在共產黨政治體系中扮演關鍵性的角色。

二、1990 年後黨軍關係的變化

毛澤東時期的解放軍逐步變成為「腫、散、驕、奢、懶」之組織，使得鄧小平決定抑制軍隊的政治影響力，深感展開軍隊專業改革之必要。與此同時，解放軍在中共中央領導層佔的比率也逐漸下降，⁵³解放軍開始朝向所謂「專業軍隊」的方向發展。1990 年代末期，中共的黨軍關係發展出新的互動模式，雖然軍隊仍堅守「黨指揮槍」原則，然而基於軍隊現代化和專業化的需要，軍隊逐漸將重心置於建軍本身，使得中共軍隊在政治上的影響力逐漸降低，而現代化和專業化成為注目的焦點。

(一)軍隊現代化

1. 軍隊現代化的原因

中共軍隊現代化與世界局勢變化是息息相關的。前蘇聯崩解對國際體系造成重大的衝擊，中共認為多極化趨勢及經濟互賴持續發展，國際安全情勢是相對穩定與和平，世界大戰發生較不可能；但另一方面，因國際間仍存在一些不安定的

⁵⁰ 浦興祖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制度*，頁 331。

⁵¹ 浦興祖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制度*，頁 332。

⁵² 浦興祖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制度*，頁 332。

⁵³ 在 1977 年十一大時，解放軍在政治局委員的比例為 52.2%，1982 年十二大下降為 39.3%，到了 1987 年十三大時更下降到 11.8%。有關八大至十六大解放軍在政治局委員中的比例情形，可參閱本論文的表 3-3。

因素，局部戰爭有隨時爆發的可能性。尤其在波斯灣戰爭與科索沃戰爭後，更讓中共警覺到軍事現代化的重要性。1991年3月中共總書記、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江澤民視察國防科技大學時強調，「科學技術是非常重要的生產力，國家與軍隊要實施現代化，必須依靠科學技術的進步。……特別是近期發生的局部戰爭(波斯灣戰爭)的現實告訴我們，現代戰爭已成為高技術戰爭……落後意味著被挨打。」⁵⁴中共軍委副主席劉華清對科技建軍也有所解釋，「軍事技術，尤其是高新技術在未來戰爭中將發揮越重要的作用，提高我軍的科技水平成為一項重要的戰略任務。……我們不是『惟武器論』者，但具有高度覺悟和勇敢犧牲精神的人掌握了先進武器，加強我軍的革命化、正規化建設。」⁵⁵波斯灣戰爭促使中共當局體認到高科技武器的重要性，依靠科技強軍已蔚為時代潮流。

1999年科索沃戰爭的爆發，更讓中共再一次領悟到空中力量的威力，尤其是掌控訊息之重要性。北約組織在此次戰役中，大力施行電子戰，以奪取制空權，並實行信息封鎖。1999年3月北約組織對南斯拉夫進行空襲，動用50多顆衛星及F117、F16等戰機，以支持空襲行動的協調統一及空中打擊任務的實施。中共尖端武器研究專家舉行多次研討會，會中除了認知到科索沃戰爭體現高科技武器之威力外，並認為未來戰爭將是高科技戰爭，是立體戰、電子戰、導彈戰，未來中共是否能贏得戰爭乃決定於是否能掌握信息權。

由波斯灣戰爭及科索沃戰爭可以發現，在現代戰爭中，軍隊所運用的是高技術武器、自動化指揮系統及各種保障設施和器材，此皆對國防工業的科技有了更高的要求。對中共而言，在經濟成長已達到一定水準後，⁵⁶其對國防安全的需求更是殷切，如無強大國防力量，則經濟發展必受到掣肘。尤其是在波斯灣戰爭和科索沃戰爭發生後，中共領導者更深刻的認知到現代戰爭是一場「高技術的局部戰爭」，軍隊現代化成為重要的議題，中共開始重整軍隊組織及武器裝備。

2. 軍隊現代化的具體作為：

自波斯灣戰爭及科索沃戰爭等高技術戰局發生後，中共當局深刻瞭解到高科技武器的重要性。江澤民在十四大報告中指出：「今後軍隊要努力適應現代戰爭

⁵⁴ 解放軍報(北京)，1991年3月20日，版1。

⁵⁵ 解放軍報(北京)，1991年6月13日，版1。

⁵⁶ 開放20多年來，中共經濟獲得前所未有的快速發展，經濟年平均增長超過8%；經濟規模迅速擴大，經濟實力與綜合國力大大增強。2000年，按現行匯率計算的中共GDP為10800億美元，居世界第6位，佔世界GDP的3.4%，此雖只有美國的10%、日本的23.1%與德國的57.8%，但卻標誌著中共正式進入世界「萬億美元俱樂部」。2003年，中共的GDP已達1.4萬億美元（11.7萬億元人民幣），已超過法國，上升為世界第5位。如果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共GDP的規模就更大，已進入世界前3位。

的需要，注重質量建設，全面增強戰鬥力，更好地擔負保衛國家領土、領空、領海主權和海洋權益，維護國家統一和安全的神聖使命。」⁵⁷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在未來將成為主要的戰爭模式，而現代戰爭的特點是重視和依靠科學技術，因此中共軍隊現代化特別重視武器裝備、信息戰及人員素質的培養。

(1) 購買武器裝備

1997年9月江澤民於中共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宣佈，在80年代裁軍百萬的基礎上，三年內再裁減軍隊員額50萬，以建設高效率體制及堅持「走有中國特色的精兵之路」。中共將此次裁軍與體制改革，定性為質量建設和走精兵之路，強調除裁減軍隊員額、減縮軍隊規模外，最重要的是伴隨編制體制改革之全面質量建設，於是加強海軍、空軍及二砲步隊的軍力，並成立集團軍、陸軍航空兵和電子對抗等新兵種。中共軍隊在歷經建國五十年的努力整建後，其武裝力量已由數量規模型和人力密集型轉向質量效能型和技術密集型發展；其武器裝備已由尖端武器與常規武器相結合轉向尖端武器、高技術武器和常規武器相配套發展；其國防動員已由注重地面常規戰爭的人力、物力動員轉向注重高技術戰爭的科技和快速動員發展。⁵⁸

近年來，中共積極採購軍備武器，軍事力量大幅提升。在所有採購國中，俄羅斯列為中共最大進口國，目前中共採購的現代級(Sovremenny)驅逐艦已交艦，所配備的超音速「日炙型」反艦飛彈，專門對付美國航空母艦與「神盾級」驅逐艦，目的在威嚇美國太平洋艦隊介入台海衝突；此外尚購買先進的基洛級(Kilo)攻擊潛艦、蘇愷27及蘇愷30攻擊機、米格31戰機、空中預警機、T-80戰車、S-300地對空導彈、AA-12遠程空對空導彈及大型運輸機、火箭引擎等等。關於中共已經購買及將要購買的國外武器裝備情形如表2-2所示。

⁵⁷ 王維章主編，鄧小平軍隊現代化建設思想研究（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97年），頁40。

⁵⁸ 鄒旺，「高新科技武器服役 國防整體實力增強」，鏡報(1999年9月)：頁47。

表 2-2 中共已經購買及將要購買的國外武器裝備

取得否	武器名稱	武器類型	來源國
已經購買 或使用中	MAZ IRBM (1)	直立發射器運輸車	俄羅斯
	Russian EW/SIGNIT equipment	信號情報	
	S-300 PMU-1(160+)	地對空飛彈	
	SU-27SK(126)	戰機	
	SU-30MKK(80)	戰機	
	Kh-31(5)	攻船飛彈	
	IL-76	運輸機	
	R-73	空對空飛彈	
	R-27	空對空飛彈	
	Kilo(4)	傳統動力攻擊潛艦	
	Sovremenny destroyer(2)	現代級驅逐艦	
	Mi- 8/17(50+)	運輸直昇機	
	SA-15	地對空飛彈	以色列
	Lavi technology	殲十戰機	
	Python 3	空對空飛彈	法國
	Dauphin(50)	直九直昇機	
	Crotale	地對空飛彈	
Gazelle(8)	瞪羚直昇機	美法	
Ecureuil(10)	攻擊直昇機		
Blackhawk(24)	黑鷹直昇機	美國	
將要購買	SU-27SK(200)	戰機	俄羅斯
	SU-30MKK(38)	戰機	
	Searchwater(6-8)	空中預警管制系統	
	R-77	空對空飛彈	
	Kh-31	地對空飛彈	
	IL-76(30)	運輸機	
	IL-76(8)	空中加油機	
	Sovremenny destroyer(2)	現代級潛艦	
	Kilo(8)	傳統動力攻擊潛艦	
	Moskit	地對空飛彈	
	SA-N-7/12	地對空飛彈	
	KA-27(4-6)	反潛戰	
	APR 3-E ASW torpedo	反潛戰	
Shmel FAE co-prod	油氣彈	以 / 俄	
Phalcon (6-8)	空中預警管制系統		

資料來源：Richard D. Fisher, Jr., “中共外購武器裝備與解放軍的現代化,” James R. Lilley and David Shambaugh 編, *共軍的未來(China's Military Faces the Future)*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 2000年8月), 頁114; 沈有忠, “中共解放軍戰略與軍事裝備的現代化,” *展望與探索*, 第2卷第8期(2004年8月): 頁49; 陳漢華, “短期內中共科技在國防安全面向的趨勢評估,” *中華民國外交部網站*, 2004年8月13日; “中俄聯盟權益之計 夥伴關係難持久,” *大紀元*, 2005年8月28日;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The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Jul. 19, 2005.

(2)重視信息戰⁵⁹

美國陸軍對資訊戰的定義為：「藉由採取影響敵人資訊、資訊相關程式、資訊系統，和電腦網路等行動，以奪取資訊優勢；同時，亦須對己方資訊系統採取防護措施」。⁶⁰中共將其視之為：「在現代高技術戰場環境中，敵對雙方使用信息技術手段、裝備、系統實施的作戰行動，通過信息武器與其它武器系統的綜合運用，爭奪信息優勢並形成戰術、戰略的優勢，以達到戰爭目的的一種新的獨特戰爭型態。」⁶¹亦即以影響敵人之資訊、資訊化處理及資訊系統，而防禦本身之資訊、資訊化處理及資訊系統，以取得資訊之優勢所採取各項行動，稱為信息戰。

信息戰爭已經成為未來戰爭的重要標誌，交戰雙方保存己方資訊，截斷敵方資訊的能力，對於戰爭的最後勝負將有決定性影響。而此種截斷或保存資訊的能力將依賴軍事技術進行，在技術上處於相對優勢的一方，將有很大的機會截斷敵方資訊，從而成為「資訊壟斷者」，而被壟斷的一方，其作戰計劃及節奏將被完全破壞，有組織的軍事行動也將可能被瓦解，其下場也就可想而知。⁶²

近年來中共對於信息戰表現出相當大的興趣，除了設立獨立研發中心（如鄭州的人民解放軍信息工程大學）加速技術獨立之外，信號情報、通信設施、照相偵察、太空監視、超地平線感測器（OTH）、相位陣列雷達、無人飛行載具（UAV）、高能電腦（High Performance Computers）、高能微波武器（High Powered Microwave weapons）以及技術人員的招募上，也都積極地進行資訊戰的發展。⁶³

1995 年期間，中共各軍兵種、國防科工委、解放軍報、軍事論壇、軍事院校及科研機構，及一些民間學術團體，多次召開「軍事革命問題研討會」，對信息戰進行廣泛而深入的探討。此外，更展開發展信息戰能力的研究計劃，並在軍方出版物上發表大量論文及在訓練與演習時運用與信息戰相關的方案；另一方面，更從最基層的軍事院校著手，加開「信息作戰技術學」、「信息作戰指揮控制學」學分課程，中共科學院並成立信息安全技術工程技術中心，建立國家級的重點實驗室，在各大學等單位也成立初級信息戰鬥實驗室、信息戰研究所。⁶⁴

⁵⁹ 「信息戰」英文為 Information Warfare，我國通譯為資訊戰，中共通譯為信息戰。

⁶⁰ Field Manual No.100-6(FM100-6), Information Operations 2-2, Washington D. C.: Headquarters Department of the Army, Aug. 1996.

⁶¹ 中央研究雜誌社，1998 中共年報(台北：中共研究雜誌社，1998 年)，頁 8-11。

⁶² 張建邦，2010 中共軍力評估(台北：麥田出版公司，1998 年)，頁 152。

⁶³ 有關近年來解放軍資訊戰的發展，可參閱王普豐，*信息戰爭與軍事革命*（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5 年）；Susan M. Puska 編，李憲榮、陳國雄譯，*未來的中國人民解放軍(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fter Next)* (台北：玉山社出版，2001 年)，頁 99-103；Mark A. Stokes 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中共戰略現代化(China's Strategic Modernization Implications Unites States)* (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2000 年)，頁 29-70。

⁶⁴ 沈佛光，「再論信息戰」，*中國國防報*，1998 年 10 月 18 日，版 3。

(3)提升人員素質

隨著高新技術在軍事領域的廣泛應用，戰爭形態和作戰樣式都發生根本性變化，知識在戰鬥力中所佔的比重越來越大，軍隊越來越成為知識密集、技術密集的武裝組織。⁶⁵而提高解放軍官兵素質，並推動軍隊的機械化和信息化建設乃為軍隊現代化建設主要的重點之一。

近年來，人民解放軍發揮軍隊院校培養人才的主渠道作用，2000年4月頒布《軍隊院校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確立「軍隊現代化以科技為關鍵，以人才為根本，以教育為基礎」思想，使院校教育成為軍隊建設之基礎，並予優先發展，以造就足夠之高素質人才。此綱要確立院校2000年至2010年發展目標，推動「軍隊院校重點建設工程」，至2010年使十所重點軍事院校專業學科達到國內外先進水準，軍級以上高學歷指揮官比例超過師、旅、團級。目前已有90餘所普通高等學校承擔為軍隊培養幹部的任務。實施「高層次人才強軍計畫」，近30所重點普通高校為軍隊培養大批專業碩士。在軍事院校開辦中青年幹部培訓班、大軍區職和軍職領導幹部高科技知識培訓班、軍兵種知識交叉培訓班等班次，選送數百名軍隊幹部入中央和省級黨校學習。有計劃地組織作戰部隊師旅主官出國考察，增加軍事指揮軍官出國留學數量。⁶⁶

2003年8月中央軍委制定實施軍隊人才戰略工程規劃，提出力爭經過一二十年的努力，擁有一支懂得資訊化戰爭指揮和資訊化軍隊建設的指揮軍官隊伍，一支善於對軍隊建設和作戰問題出謀劃策的參謀隊伍，一支能夠組織謀劃武器裝備創新發展和關鍵技術相關的科學家隊伍，一支精通高新武器裝備性能的技術專家隊伍，一支能夠熟練掌握手中武器裝備計程車官隊伍。人才戰略工程分兩個階段實施：2010年前使全軍人才狀況明顯改觀，作戰部隊人才建設大幅躍升；2011年到2020年，實現人才建設大的跨越。⁶⁷

「十五」期間，中共軍方將提高官兵素質列為軍隊建設的重點，經過多年來的努力，中共領導幹部的素質獲得相當程度地提升。例如，1988年58%的軍級以上高階軍官，受過軍事學校或學院教育。到1994年高階軍官中的79%受過各種深造教育，55%以上的軍官受過專業教育。⁶⁸藉由這些數據可以發現，新一代軍官教育接受專業訓練及深造教育的比例較以往軍官更高，中共軍方在提升幹部素質上已投入相當的努力。

⁶⁵ “解放軍報坦承中共軍隊官兵科學文化素質偏低，”中央社（台北），2003年4月15日。

⁶⁶ 2004年中國的國防。

⁶⁷ 2004年中國的國防。

⁶⁸ 中共軍力基本報告（台北：民進黨中國事務部，2003年），頁139。

(二)軍隊專業化

鄧小平認為軍隊必須在加強革命化和正規化建設的同時，加強現代化建設，並以現代化建設為中心。不搞現代化，就難以適應現代條件特別是高技術條件下戰爭的要求。鄧小平特別指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全體指戰員，務必時刻保持警惕，不斷提高自己的軍事素質，努力掌握應付現代戰爭的知識和能力。」⁶⁹故鄧小平提出軍隊「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四化要求，企圖以改革帶動精簡，以精簡促進改革。基本上，中共軍隊專業化可分為二部份：軍隊組織架構的精簡及軍官教育體制的變革。

1.軍隊組織架構的精簡

張萬年在擔任中央軍委會副主席時指出，根據國家安全和發展的需要，確定適度規模及提高質量，是保證軍隊建設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由數量規模型向質量效能型轉變的重要戰略措施。⁷⁰因此自 1950 年以來，解放軍已進行十次的裁軍，總兵員由近 424 萬減至 230 萬，最大規模的裁軍共有三次，分別為 1985 年裁減軍隊員額 100 萬；1997 年決定在 3 年內再次裁減軍隊員額 50 萬；2003 年，時任中央軍委主席的江澤民鄭重宣告：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決定，將在「九五」期間裁減軍隊員額 50 萬的基礎上，2005 年前再裁減員額 20 萬。中共大幅度裁軍的目的有二，一為提升軍隊現代化，著眼於「精兵利器」；二為消除周邊國家的憂慮，讓國際社會相信中國崛起是和平的象徵。

1954 年 9 月中共憲法公佈，其軍事組織隨之改組，於是撤銷六大軍區，重新調整大軍區組織，並將大軍區冠以駐地地名，改稱「一級軍區」，調整為「瀋陽」、「北京」、「南京」、「武漢」、「廣州」、「成都」、「蘭州」等 7 個一級軍區及「內蒙」、「新疆」、「西藏」等 3 個直轄軍區，這是共軍軍區制之首次變革；1957 年 4 月共軍一級軍區實施局部調整，將南京、武漢、成都 3 個一級軍區之管轄權範圍縮小，並在福州、濟南、昆明成立 3 個一級軍區，將原來 7 個一級軍區擴增為 10 個一級軍區，這是軍區制的第二次變革；1973 年將新疆直轄軍區調整為一級軍區，使一級軍區擴增為 11 個，這是第三次變革；1979 年又將新疆軍區更名為「烏魯木齊軍區」，將內蒙、西藏兩個直轄軍區分別劃歸北京及成都軍區，此時共軍仍轄 11 個一級軍區，但取消直轄軍區，這是第四次變革；1985 年 6 月中共又將原有之 11 個一級軍區合併為 7 大軍區，除瀋陽、北京兩個軍區保持不動外，撤銷福州、武漢、昆明、烏魯木齊 4 個軍區，分別併入南京、濟南、廣州、成都及蘭州軍區，整編後之 7 大軍區，大體上又回復至 1949

⁶⁹ 鄧小平文選，第 3 卷，頁 70。

⁷⁰ 張萬年，*當代世界軍事與中國國防*（北京：軍事科學院，1999 年），頁 348。

年建政初期之六大軍區，這是第五次變革。⁷¹中共自 1985 年將 11 大軍區併為 7 大軍區後，人民解放軍總員額一直保持在 250 萬人以內。

2.軍官教育體制的變革

軍事教育的主要變革始於 1980 年代初期，1981 年中共實行「學位制」，1982 年共軍成立「全軍學位領導小組」，同時頒授共軍第一批授予碩士學位的研究生，中共軍方確立自行培訓「碩士」與「博士」學位研究生的教育體系。⁷²

1986 年 6 月中共中央軍委根據「第十三次全軍院校會議」決議，公布「關於軍隊院校教育的決定」，計畫在既有之指揮及專業技術學院校體制基礎上，從事軍事院校體制改革，將指揮院校確立為初、中、高三級，專業技術院校分為中、高二級。至此，中共指揮學院與專業學院能夠專業分流，有助培養適應現代高科技戰爭的專業與高素質人才。此外為了提升軍官素質，中共於 1985 年成立國防大學，做為中、高階軍官深造教育之用。為了改善資源浪費、成效低落、幹部素質不足及配合未來戰爭需要，中共人民解放軍於 1999 年以合、組併的方式，建成 26 所新的軍事院校。1998 年中共總參謀部以軍事院校校長為對象，舉辦學習班，並提出「三高」口號，指出從現在以至廿一世紀，要養成擁有「三高」的熟練技術人員。所謂的「三高」，意味能使用「高」技術裝備以因應「高」技術戰爭之「高」個人素質。⁷³

另一方面，中共軍方也和著名的地方大學合作，培養軍隊的碩士人才，以利軍校的教學研究需要。在著名大學成立後備軍官訓練團，吸引名校大學生參加軍隊，設立「定向生」制度，允許大學入學考試成績稍低者，可進入名校就讀，畢業後則至軍隊服務。⁷⁴透過以上所述相關作為，中共軍方得能擴大軍官來源，加速軍官素質提升，達成人民解放軍現代化目標。

(三)黨軍關係變化對軍隊政治影響力的影響

由中共憲法及共產黨章程的內容可以得知，中共仍舊堅持「黨」領導的最高原則。⁷⁵軍隊認為在新的歷史條件之下，始終不渝的堅持黨對軍隊

⁷¹ 甘棠，「共軍體制改革精簡整編的研析」，《中國大陸研究》(1986年1月)：頁10。

⁷² 《中共軍力基本報告》，頁138。

⁷³ 《中共軍力基本報告》，頁139。

⁷⁴ 《中共軍力基本報告》，頁139。

⁷⁵ 憲法序言明定，「中國各族人民將繼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改革開放，不斷完善社會主義的各項制度，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自力更生，艱苦奮鬥，逐步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另外，

的絕對領導，對軍隊的建設與發展，對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和實現國家長治久安，都有極為重大之意義。因為「黨的先進性決定著軍隊的先進性，黨『三個代表』的先進性和與時俱進的品格，是黨擁有對軍隊絕對領導權的根本依據，也是軍隊建設不斷發展前進的根本動力源泉所在。」⁷⁶因此中共把黨對軍隊絕對領導提高到軍隊軍魂的高度，強調軍隊要聽從黨的指揮，也就是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這個永遠不變的軍魂，在思想上、政治上與黨中央保持一致，堅決聽從黨中央、中央軍委和江澤民的指揮，並以「三個代表」的精神，推動軍隊之中黨的建設。⁷⁷只要共產黨繼續執政，共產黨的制度結構仍滲透各部隊，解放軍就仍是黨的軍隊。⁷⁸在「黨指揮槍」的原則下，解放軍仍舊是一支「黨軍」，而非一支國家化的軍隊，其政治角色只能是政權的保護者，而非挑戰者。

毛文杰（James C. Mulvenon）認為後鄧時期的文武關係基本上是文武領導之間，就政策和資源分配議題激烈的討價還價所形成之權力平衡，他認為中共的文武關係已從共生走向專業主義。⁷⁹此種觀點與喬飛及沈大偉（David Shambaugh）的看法相同，喬飛明白的指出，十五大後軍隊的政治角色可定位為「具有高度專業色彩的政黨軍隊」；⁸⁰而沈大偉從 1997 年 3 月制定的《國防法》中推論出中共黨軍關係已由共棲關係走向專業主義因素的直線演化。⁸¹

隨著解放軍現代化及專業化的進程，解放軍本身將會成為一個更加複雜、專業分工與更加注重其專業使命的組織，其結果是軍隊與黨之間，在利益上、功能

在十六大修改後的《共產黨章程》前言中，明白規定「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

⁷⁶ 解放軍報(北京)，2001年9月6日，版2。

⁷⁷ 解放軍報(北京)，2002年12月4日，版1。

⁷⁸ Stephen J. Flanagan and Michael E. Marti,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nd China in Transition*(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Washington, D.C., 2003),62.

⁷⁹ James C. Mulvenon, *Professionalization of the Senior Chinese Officer Corps: Trends and Implications*(Santa Monica: RAND, 1997); James C. Mulvenon and Richard. Yang eds., *Truth From Facts: A Retrospective on Chinese Military in the Post-Mao Era* (Santa Monica, CA: Rand, 2001), 41.

⁸⁰ “淡出北京政爭共軍角色蛻變，”*中央日報*(台北)，1998年2月20日。

⁸¹ 沈大偉計算《國防法》中「國家」和「黨」出現的次數的差別。沈大偉發現，該法中至少有三十九次提到「國家」，而只有一次提到「黨」。而且，該法第十九條內容：「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武裝力量受中國共產黨領導。武裝力量中的中國共產黨組織依照中國共產黨章程進行活動。」提到「黨」的領導時，並沒有使用語氣比較強烈的「黨的絕對領導」。在這個這麼重要法律中，不特別強調「黨的絕對領導」是非常罕見的。因此，他傾向認為，中共的文武關係有重大轉變，黨軍已走向專業主義。David Shambaugh, “Commentary on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in China: The Search for New Paradigms,” in James C. Mulvenon and Andrew N. D. Yang (eds),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A Retrospective on Chinese Military Studies in the Post-Mao Era* (Santa Monica: Rand, 2001), p. 44.

上與外觀上的差異將會越來越大。從這個角度來看，解放軍將會極力地避免涉入到政治的鬥爭之中，這種傾向將會因最高層領導人之間功能性的區分而日趨於明顯，同時也會使得黨高層領導人使軍隊介入政治領域的企圖越來越困難，而各個層級之間的分化狀況，更使得解放軍介入政治事務問題的可能性越趨於微弱，這樣的趨勢將會因解放軍日益的現代化與專業發展而更趨於明顯與強化。⁸²

事實上，軍隊現代化和專業化使得中共黨軍關係存在著矛盾的特徵。軍隊受到黨的控制，但其軍官團已經具備有基本的專業主義特徵，導致軍與黨之間持續的衝突。政、軍領導階層在高層權力結構中，一直存在共生關係的網絡中，在其底層結構中，由於武裝力量的現代化和專業化，已產生一種功能性的分離。軍隊專業主義促使他們對於與他們利益相左的黨政策，產生質疑，甚至有抗拒的情形發生。⁸³也就是說，軍隊現代化和專業化對「黨指揮槍」原則產生挑戰。

然而，雖然現代化和專業化使得軍隊將重心置於本務發展，但是軍隊對國家政策仍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力。如同普瑞斯特普(James Przystup)所言：「解放軍的政治作用在減少，而作為專業化軍隊的作用在增加。軍隊在毛澤東時代是一支政治力量，現在這種色彩在下降，軍隊的國家武裝力量之色彩在增加。而作為國家武裝力量，軍隊對於國家安全政策有一定的影響力。」⁸⁴亦即軍隊對攸關國家安全的政策仍相當關切，並具有一定的政治影響力。

第三節 政局穩定

在政局不穩定時，解放軍的政治角色愈形重要。學者史文觀察天安門事件後黨軍關係的發展，認為因為缺乏決定領導階層繼承的制度化結構，和充斥著對社會與經濟不滿的國內環境，以及老幹部與專業年輕世代互信的不足，所以黨的領導者只能依靠軍中之支持網絡來鞏固其地位，反過來說，軍人則只能依靠與文人的關係來影響決策，尤其在危機時期，雙方都依賴彼此親信關係時，這些因素顯得更為重要。⁸⁵

在國內政局不安或權力繼承未穩固時，軍隊的支持成為獲得政權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文化大革命及天安門事件發生時，解放軍勢力膨脹，政治角色地位重要；而在權力繼承時，中共軍隊也扮演關鍵的角色，尤其是由文人擔任軍隊領導人江澤民在權力繼承的過程中，極需要軍隊的全力支持，所以掌權之後加重軍隊的決

⁸² 莫大華，「政權轉移 VS 解放軍地位」座談會，台北，2002年3月20日。

⁸³ Ellis Joffe, "Party-Army Relations in China: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David Shambaugh and Richard H. Yang eds., *China's Military in Transi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7), 36.

⁸⁴ 江天，「解放軍對政治的影響力更大了，」大紀元，2001年8月1日。

⁸⁵ Michael D. Swaine, *The Military and Political Succession in China: Leadership, Institutions, Beliefs* (Santa Monica: Rand, 1992), 122-139.

策權與發言權，使得軍隊的政治角色大幅提升。

一、文化大革命

大躍進政策的失敗使得許多中共高層領導開始懷疑毛澤東的領導能力和革命化中國的做法，加上在幾項中共基本發展戰略上意見的分歧(例如：放棄群眾路線，改採務實政策、重新重視專業技術等)，使最高領導間的分裂更加劇烈。正因遭到黨組織的同僚反對和阻礙，毛澤東被迫在黨組織之外尋找一個新的權力基礎以確保他的意志，並重新攫取中國革命的控制權，因此毛澤東向在其眼中已成為最革命化組織的解放軍尋求支持。⁸⁶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發生後，毛澤東在1967年1月23日要求解放軍全面介入文革，執行「三支兩軍」的任務。⁸⁷1968年9月各地區的革命委員會全數成立，解放軍成為主控地方政治和行政權力的組織，並且在中央決策中獲得重要發言權的政治力量。軍隊在中央勢力的提升，可由中共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的代表人數看出，1969年4月召開的第九屆黨大會，170位中央委員會委員中，85人是軍方人員，比例高達50%，其中60位為指揮員，25位為政治委員；在政治局委員中，21位委員就有10位是軍方人員，4位候補委員有2位可歸類為軍方人員。⁸⁸第九屆黨代表大會是毛澤東時期軍隊在黨內政治地位最高的階段，因為當時毛澤東為了利用林彪軍人系統的力量，大肆清除黨內以劉少奇為首的革命份子，乃授予與軍隊較大的自主性，從而導致軍人在各級黨委會勢力的大幅膨脹；尤其在地方上，軍人的勢力更是迅速擴張。這也可以說是毛澤東的酬庸策略和現實妥協下的結果。⁸⁹

由此可知，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澤東為了穩定全面惡化的政治局勢，要求軍隊實施全面性的軍管，在「三支兩軍」的基礎下，軍方勢力大量滲入非軍事部門，軍隊勢力急速膨脹，政治地位提升至最高的狀態。

二、天安門事件

⁸⁶ Ellis Joffe, "The Chinese Army after the Culture Revolution: The Effects of Interven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No.55(July/September 1973):452; Harvey W. Nelsen, "Military Bureaucracy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sian Survey*, Vol. XIV, No.4(April 1974): 372.

⁸⁷ 「三支兩軍」是指支左、支工、支農、軍管、軍訓。

⁸⁸ Harlan W. Jencks, *From Muskets to Missiles: Politics and Professionalism in the Chinese Army, 1945-1981*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82),106.

⁸⁹ 林火順，「由中共歷屆全國黨代表大會，談解放軍在中國大陸的政治角色，」*台灣新聞報*，2002年12月24日。

1978年改革開放後，鄧小平對於文革期間高漲的軍隊政治角色，採取壓制之措施，藉由消滅軍隊政治權力，使軍人在中央政治舞台及社會的影響力降低。1969年第九屆黨代表大會選出的中央委員會，軍方代表超過50%；1977年第十一屆黨代表大會，軍方代表人數降至30%；1982年第十二屆黨代表大會，軍方代表獲得席次大約為23.8%；至1987年第十三屆黨代表大會，軍方代表的席次下降至18.3%。在政治局方面，1969年第九屆政治局委員中，軍方佔52%；1982年第十二屆黨代表大會中，軍方代表佔所有政治委員的比例下降至39.3%；1985年，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政治局成員中，軍方代表比例僅佔大約15%；⁹⁰1987年第十三屆黨代表大會，17名政治局委員中，軍人只佔2名，軍方代表比例僅佔11.8%。軍人在政治局委員比例下降主要是反映鄧小平企圖使軍隊逐次脫離中共中央之權力核心，以削弱軍隊對中共政治的影響力，使軍隊不再是居於舉足輕重的地位。⁹¹

鄧小平藉由降低軍隊在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的代表比例，來削減軍隊在政治層面的影響力，重新建構軍隊的政治角色。基本上，鄧小平希望解放軍是一支專注於軍事現代化，並回歸軍事專業的軍隊，因此大力進行組織精簡及軍官專業化，除了仍維持黨對軍隊的領導外，鄧小平更重申軍隊應專注在軍事事務上。

1989年4月15日前總書記胡耀邦病逝。學生自發悼念胡耀邦，要求正確評價胡耀邦，否定「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官倒、反貪污，提倡民主、自由、人權、法治。5月20日國務院宣佈在北京部分地區實施戒嚴，大約15萬至20萬的部隊，從超過12個集團軍中被派遣前往北京近郊執行戒嚴任務。5月24日中央軍委召開擴大會議，劉華清、秦基偉、遲浩田、楊白冰、趙南起出席會議，解放軍三總部負責人，各大軍區、各兵種、國防大學的政委、司令員、政治部主任都參加此會議。會議由洪學智主持，楊尚昆發表重要講話。這個會議完全是根據鄧小平的授意召開，開會的目的就是通報趙紫陽的問題，統一部隊高級將領的認識，以防軍隊高層產生思想分歧。⁹²6月2日中共黨內大老鄧小平、李先念、彭真、楊尚昆、薄一波、王震、李鵬、喬石和姚依林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開會，並作出武裝清場的決定。6月4日解放軍進行鎮壓行動。

六四天安門事件迫使軍隊介入政治，雖然鎮壓行動並非軍方主動出擊，而是由於保守派憂心權力之喪失，所採取的一種激烈手段，卻使軍

⁹⁰ Ellis Joffe, *The Chinese Army after Mao*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160-162.

⁹¹ 林火順，「由中共歷屆全國黨代表大會，談解放軍在中國大陸的政治角色」。

⁹² 張良編著，*中國六四真相*，頁661。

隊又再度扮演捍衛共黨政權的工具性角色。⁹³為了酬庸軍隊在六四天安門事件的功勞，嚇阻大陸民主運動的再起，1992年第十四屆黨代表大會時，新的中央委員189名成員中，具軍人身分者共44人，後補中常委共23人，總計67人，較上屆增加12人。⁹⁴此外海軍出身的劉華清成為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而且天安門事件後軍隊的國防預算每年幾乎以兩位數上升(如表2-1所示)。這些現象都顯示出軍隊的地位在天安門事件中獲得提升。

三、江澤民鞏固政權

1989年天安門事件之後，江澤民於第十三屆四中全會進入政治局常委會並出任總書記。由於江澤民的領導地位與基礎非常薄弱，尤其是在軍隊方面，所以鄧小平除了以其聲望替江澤民的權力接班背書之外，江澤民也積極拉攏軍隊，積極建立自己軍中的勢力。

1992年鄧小平在第十四屆黨代表大會上作了三項人事的安排，第一為取消十二大成立的「中央顧問委員會」，迫使黨內元老退出權力核心；第二為解除楊尚昆和楊白冰的職務，削弱「楊家將」派系對江澤民所造成的威脅；第三為提拔劉華清和張震兩位專業的軍事將領，進入政治局常委會和軍事委員會，輔助江澤民順利接班。⁹⁵從此次的人事安排可以得知，軍隊在中共政治繼承及政治鬥爭中的重要性，軍隊成為政權穩固前的過渡時期穩定力量。

江澤民在接班之初，以兩階段的方式鞏固自己的領導地位；第一階段先拉攏軍隊的勢力，整肅天安門事件後的軍隊亂象及防範東歐、蘇聯解體的影響。第二階段的重點則在於積極建立軍中勢力，增加國防預算，提高部隊待遇，拉攏部隊情感，鼓吹「黨指揮槍」的傳統等。⁹⁶如同學者林長盛所言：「在決定最高領導人地位方面，軍隊的影響力比以前增強。以前毛澤東和鄧小平能夠直接把軍隊控制住，現在江澤民不具備這種能力。在毛澤東和鄧小平時代，軍隊將領是他們的下級，而現在對江澤民來說，他們倒像是夥伴。所以，江澤民對軍隊的政策是收買政策，不斷提高軍隊的待遇。」⁹⁷由此可見，江澤民為中共第一個非軍人出身的黨政領導人，為取得軍隊的支持，江澤民在掌權初期，儘力調和與軍方的關係，

⁹³ 鄭竹園，*大陸政經巨變與中國前途*(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2年)，頁159。

⁹⁴ 林火順，「由中共歷屆全國黨代表大會，談解放軍在中國大陸的政治角色」。

⁹⁵ 有關鄧小平如何幫助江澤民順利接班，可參閱王玲玲，「中共十四大人事之分析」，*中國大陸研究*，第36卷第1期(1993年1月)：頁23-24；吳安家，「中共十四大後的政治動向」，*中國大陸研究*，第35卷第12期(1992年12月)：頁13。

⁹⁶ 沈明室，「中共權力繼承與軍隊角色」，*東亞季刊*，第27卷第3期(1995年冬季號)：頁46。

⁹⁷ 江天，「解放軍對政治的影響力更大了」，*大紀元*，2001年8月1日。

極力拉攏軍方，如增加軍隊預算、晉升高階將領等。江澤民這些措施在無形中也促使軍隊的政治角色愈形重要。

過去解放軍在中共內部鬥爭中一直扮演重要的角色。解放軍的動向在逮捕四人幫和八九民運兩個事件中都是決定派系鬥爭勝負的關鍵。然而，這種政治性角色未來應該會逐漸萎縮，除非文人菁英無法自行解決權力繼承問題，必須利用軍方「保駕護航」，否則軍隊將不易扮演決定未來中共首腦的關鍵性角色。⁹⁸

在政局穩定的情況下，解放軍的政治角色地位會趨於微弱，而此種情形可由江澤民穩定政權後的黨軍關係發展狀況得到印證。在江澤民軍權掌握穩定之後，中共黨軍關係有了以下的變化：第一、中共進行的國防現代化，預算雖然逐年增加，但國防預算占財政總支出之比率卻逐年下降，如 1994 年國防預算占財政總支出之比為 9.46%、1998 年為 8.66%，至 2003 年已降至 7.86%，這使軍人的實質待遇和地位下降。⁹⁹第二、中共第十四屆黨代表大會選出的 189 位中央委員，軍人代表有 44 位，比率為 23.2%；政治局常委除江澤民外，尚有一位軍人--劉華清。至第十五屆黨代表大會時，中央委員中軍人代表有 41 人，比率為 21.2%，但從此政治局常委中就沒有軍人，這使軍人徹底遠離政治，也清除軍人干政的疑慮。¹⁰⁰第三、江澤民基於軍隊涉入經濟活動和隨之而產生黨對軍事單位掌握趨於鬆散，¹⁰¹於 1998 年 7 月下達軍隊和武警禁止經商之命令。以上種種舉措，雖引起軍隊的抱怨和反彈，但也顯示出江澤民在政權穩定後，希望軍隊不要涉入政治的意圖。

第四節 國家安全議題

作為一個組織，解放軍有其本身的利益，不管是在政策路線的鬥爭中或者是當權者要求解放軍的支持，利益互換的關係一直存在，在「保駕護航」的關係中，不論是黨或是當權者，都不能忽略解放軍利益的維護，因此儘管要求解放軍要專注於國防本務，並不意味解放軍對於國防事務以外的政策沒有發言權。¹⁰²尤其是解放軍對於本身職責及任務更有與生俱來的使命感，因此與國家安全有關的議題，解放軍將竭盡所能的發揮影響力，以符合本身的利益。

由於本身職責與利益的緣故，解放軍一向以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國家統一

⁹⁸ 寇健文，「政權轉移 VS 解放軍地位」座談會，台北，2002 年 3 月 20 日。

⁹⁹ 丁樹範，「1990 年代以來的中國黨軍關係」，《中國大陸研究》，第 46 卷第 2 期(2003 年 4 月)：頁 63。

¹⁰⁰ 王官德，「從『裁軍 50 萬』看共軍體制改革及其影響」，《共黨問題研究》，第 25 卷第 1 期(1999 年 1 月)：頁 47。

¹⁰¹ 洪陸訓，《軍事政治學》(台北：五南圖書，2002 年)，頁 328。

¹⁰² 莫大華，「政權轉移 VS 解放軍地位」座談會，台北，2002 年 3 月 20 日。

的捍衛者自居，因此對於所關切的國家安全議題會表達其觀點。解放軍曾表達意見的外交事務包含台灣問題、中美關係、美日防衛條約的修訂、印度核子試爆及美國可能發展與部署戰區飛彈防禦系統等問題。

在台灣問題上，解放軍強調以「軍事威脅」策略對付台灣。中共駐聯合國軍事參謀團團長劉沛少將在紐約中共常駐聯合國代表團舉行招待會時強調，制止「台獨」勢力分裂祖國，是中共人民解放軍的神聖職責。中共政府將繼續以最大的誠意，盡最大的努力，爭取實現兩岸和平統一，但絕不容忍「台獨」，絕不允許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把台灣從中共分割出去。如果「台獨」勢力一意孤行，中共人民解放軍有決心、有能力，堅決粉碎任何「台獨」分裂圖謀。¹⁰³另外，解放軍國防大學一著名軍事專家、教授建軍節在深圳為媒體記者、精英階層人事和武警官兵發表「中國的國防安全及軍事變革」的演講時也稱，中國奉行和平統一與和平崛起政策不會改變。但如果有人突然宣布獨立，解放軍會依據《反分裂法》，¹⁰⁴武力統一台灣，並以「炸、封、登」三招解決台海問題。¹⁰⁵

1995年6月9日李登輝總統以私人身份訪問美國康乃爾大學，中共解放軍採取飛彈試射及軍事演習來回應。1995年7月21日中共舉行二砲部隊的飛彈試射演習，並於8月15至25日在東海進行一系列新的飛彈試射，距離北台灣90哩。在此同時，中共又將殲7或殲8戰機部署於距離台灣250哩的機場。¹⁰⁶

1996年爆發台海危機後，解放軍加強在東南沿海的飛彈部署，增強軍隊的軍事裝備，並持續對台軍事威懾。中共中央軍委於2000年3月20日召開擴大會議，作出兩項歷史性的決定，其中包括：1.為適應國際局勢、周邊環境變化和對「台灣統一」工作，對海軍、空軍、二砲部隊、各大軍區作出新的戰略部署；2.對南京戰區¹⁰⁷、廣州戰區的陸軍、空軍，東海艦隊、南海艦隊，駐南京、廣州戰

¹⁰³ “軍方提『炸、封、登』解決台灣”，大公報(香港)，2005年8月2日。

¹⁰⁴ 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於2005年3月14日制訂《反分裂國家法》，有關此法的全文內容，可參閱人民網，2005年3月14日。

¹⁰⁵ “軍方提『炸、封、登』解決台灣”，大公報(香港)。

¹⁰⁶ 費學理，”中國飛彈飛越台灣海峽的政治與軍事評估”，李節明、唐思合編，張同瑩、馬勵、張定綺合譯，台灣有沒有明天？-台海危機美中關係揭祕(台北：先覺出版社，1999年2月)，頁205-208。

¹⁰⁷ 依解放軍軍語辭典的記載，「軍區」是在本國領土按戰略區域設立的軍隊一級組織，一般以領導機關所在地、轄區、地理方位或序數命名。目前中共共有七大軍區，分別是北京、瀋陽、濟南、南京、廣州、成都、蘭州等7個軍區。軍區主要負責轄區內諸軍兵種部隊合同作戰的指揮和所屬部隊的軍事訓練、政治工作、行政管理、後勤技術保障，領導轄區內的民兵、兵役、動員工作和戰場建設；至於「戰區」，則是？實現戰略計劃、執行戰略任務而劃分的作戰區域。有時也泛指進行戰爭的區域。一般根據國家的戰略意圖和軍事、政治、經濟、地理等條件在戰前或戰爭爆發後確定，並在戰爭中根據情況變化適時調整或建立新的戰區。戰區的範圍是發展變化的，隨著軍事技術和軍隊建設的需要，作戰空間不斷擴大，戰區已由陸地擴大到海、空域。有關「軍區」與「戰區」的區別，可參閱陳東龍，”如何界定『軍區』與『戰區』”，東森新聞報，2001年5月1日。

區的二炮部隊優先更新，部署先進的高科技軍事裝備和具威嚇力的新式武器。¹⁰⁸中共此舉除了計畫從北京軍區和瀋陽軍區 11 個集團軍中抽調 12 至 15 個師的精銳部隊到南京戰區和廣州戰區外，另將從蘭州軍區和瀋陽軍區空軍部隊抽調 4 個師空軍進駐南京戰區，以及從成都軍區空軍部隊抽調 1 個師空軍進駐廣州戰區，以加強上述戰區的戰鬥力。¹⁰⁹這二項決定的用意即是希望藉由加強南京軍區與廣州軍區之軍備及軍力，強化對台的軍事作戰能力。

另外，在美國的亞太軍事聯盟中，美日防衛合作關係為解放軍關切的問題之一。1996 年 4 月美日發表《美日安保共同宣言》，並依規定修改 1978 年的舊指針，隨後於 1997 年 9 月公佈新的《美日防衛合作指針》，將防衛合作範圍擴及非地理區的「周邊有事」；1999 年 5 月更完成《美日防衛合作指針》相關法案的立法，包括《周邊事態法》與《修訂自衛隊法》；2006 年 1 月日本政府開始對《周邊事態法》進行修改，擬將「台灣有事」視為「日本有事」。隨即，解放軍報刊登文章指出，「日本將『台灣有事』屬於日本『周邊事態』及『有事體制』的適用範圍，露出了日本政府的真實企圖。日本政府試圖對處於經濟快速發展階段的中國進行牽制甚至遏制，把『台灣有事』與『日本有事』等同起來，便有了插手台灣事務、干涉中國內政的理由。」¹¹⁰此外文章還表示，「為了推行牽制、遏制中國的戰略，日本不斷強化自身的軍事實力。日本自衛隊共有官兵約 24 萬人，雖比中國軍隊員額少，但其軍人占總人口的比例與中國基本持平，而中日國國土面積卻相差懸殊。相差懸殊的還有年度軍費開支，日本是中國的 1.6 倍；日本自衛隊人均軍費是 20 萬美元，比中國軍隊高出 15 倍還多。」¹¹¹

由以上所述解放軍對台之軍事威脅手段及對美日防衛條約之關切可瞭解，解放軍對於與職責或任務有關的國家安全議題，皆會表達其看法與意見，也會試圖影響政策之制定。其中最明顯的案例即為 1995-1996 年台海危機事件與 2001 年中美軍機擦撞事件，而有關解放軍在這兩個案例中，如何影響外交政策制定及其影響力為何，將於本論文第五章中加以詳述。

第五節 小結

由以上各節的分析可以得知，解放軍的政治角色主要是受到決策模式、黨軍關係、政局情勢及國家安全議題等四項因素的影響。解放軍政治影響力的強弱與四項因素之關係如圖 2-2 所示。

¹⁰⁸ “中共計畫更動戰區戰略部署強化戰力，” *中央社*，2000 年 4 月 4 日。

¹⁰⁹ “中共計畫更動戰區戰略部署強化戰力，” *中央社*。

¹¹⁰ “日修事態法欲遏中國，” *解放軍報*(北京)，2006 年 1 月 16 日。

¹¹¹ “日修事態法欲遏中國，” *解放軍報*(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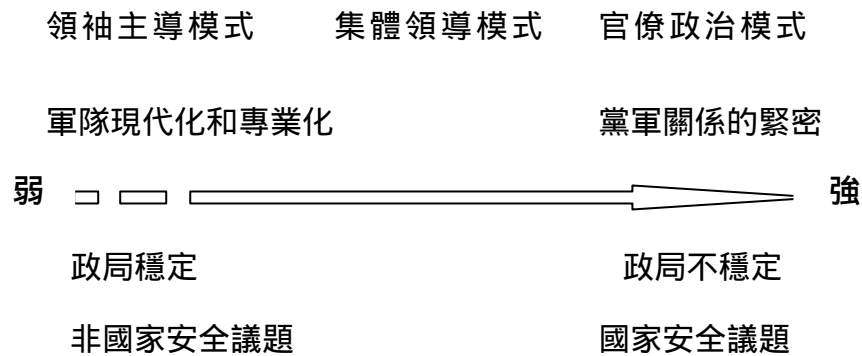


圖 2-1 解放軍政治影響力與四項影響因素的關係

資料來源：作者綜整繪製

在「官僚政治」決策模式、黨軍關係緊密、政治情勢不穩定及相關國家安全議題下，解放軍的政治角色最為重要，其影響力也最大。反之，在「領袖主導」決策模式、軍隊重視現代化和專業化、政治情勢穩定及非相關國家安全議題下，解放軍的政治角色最為微弱。在毛鄧時期，領導人有著強大的權威，解放軍的政治影響力較為薄弱；在鄧小平執政後期，軍隊強調現代化和專業化，使得軍隊的政治影響更日趨下滑；而在江澤民掌權初期，領導者權力較弱，決策模式改以「官僚政治」為主，加上政權不穩定，使得軍隊在國家安全議題有著重要的發言權及決定權。

若依不同領導者時期來分析解放軍政治影響力與四項影響因素之關係，解放軍影響力的強弱情形可以表 2-3 來表示。在毛澤東時期，以決策模式面向來看，領導人有著強大的權威，決策模式為領導主導方式，解放軍影響力較弱；以黨軍關係來分析，黨軍關係呈現「黨指揮槍」或「槍指揮黨」的狀態，黨軍關係相當緊密，解放軍政治影響力較強；依政局情勢因素來分析，文化大革命發生後，政局情勢不穩定，解放軍政治影響力變強；依國家安全議題面向來看，冷戰時期解放軍與外交系統之議題劃分相當清楚，外交事務由外交部門負責，軍隊事宜由軍方負責，解放軍對外交議題的影響力較弱。

在鄧小平時期，依決策模式因素來分析，決策模式改以集體領導為主，解放軍政治影響力的強弱介於領袖主導模式與官僚政治模式之間；以黨軍關係面向來看，鄧小平時期重視軍隊現代化及專業化，然因 1989 年發生天安門事件，使得軍隊現代化進程受到阻礙，解放軍成為捍衛政權的角色，軍隊對政治決策仍保有

一定的影響力；依政局情勢因素來分析，鄧小平時期除了天安門事件造成國家政局不穩定外，其它時間政局尚處於穩定狀態，此時解放軍政治影響力介於毛澤東政局不穩定時期與江澤民政局穩定時期之間；以國家安全議題面向來看，鄧小平執政末期適逢冷戰時期結束，外交議題愈趨多元化，外交與軍事議題的界線模糊，軍隊對外交事務的影響力漸漸增強。

在江澤民時期，由決策模式面向來看，決策模式以官僚政治模式為主，解放軍參與政治決策的機會與管道增多，解放軍政治影響力轉強；依黨軍關係因素來分析，在波斯灣戰爭及科索沃戰爭發生後，軍隊現代化成為解放軍最重要之課題，解放軍將重心置於建軍本務上，其對政治決策的影響力日趨轉弱；以政局情勢因素來看，後冷戰時期，中共以經濟發展為國家戰略目標，為持續國家經濟發展，維持國內外和平穩定為外交部門與解放軍之重要使命。在和平穩定的政局情勢下，解放軍的角色成為服務國家戰略的工具性角色，其政治影響力日漸轉弱；依國家安全議題來分析，後冷戰時期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使得軍隊事務與外交事務緊密結合，許多國家安全議題涉及多個組織或單位。解放軍為了本身組織的存在與利益，對於與國家主權相關之外交決策議題，表現出積極干預與強力影響的態勢。由 1995 年台海危機事件與 2001 年中美軍機擦撞事件可看出，在與國家主權相關的外交決策議題上，解放軍的政治影響力與日俱增。

表 2-3 不同領導者時期之解放軍政治影響力

	毛澤東時期	鄧小平時期	江澤民時期
決策模式	弱 (領袖主導)	中 (集體領導)	強 (官僚政治)
黨軍關係	強 (黨軍緊密)	中	弱 (軍隊現代化)
政局情勢	強 (政局不穩定)	中	弱 (政局穩定)
國家安全議題	弱 (軍事、外交議題分離)	中	強 (軍事、外交議題結合)

資料來源：作者綜整繪製

第三章 解放軍參與外交決策制定

在中共特殊的政治結構中，黨與軍之關係成為「黨中有軍，軍中有黨」，認識與熟悉政治事務，參與黨的政策，成為軍人黨員的權利與義務。正因為解放軍負責國家安全，而國家安全又為外交政策的最高目標，因此在外交決策制定過程中，與軍事領域或國家安全議題有關的決策，解放軍都會表達其意見，並試圖影響外交政策的走向。本章主要是探討領導者決策模式對解放軍政治影響力之影響，章節安排分為四個部份，第一節將先探討中共外交決策的制定過程，瞭解解放軍在外交決策過程中的地位與角色；第二節說明解放軍參與外交決策的機構，探析解放軍各組織在外交決策中的角色；第三章分析解放軍參與外交決策的方式及管道；最後，再依領導者不同決策模式探究解放軍在外交決策過程中的政治影響力。

第一節 外交決策的制定

中共政府體制包含三個垂直的部份，也稱為系統。第一個就是共產黨，第二個是政府，第三個是軍隊。¹在這三個系統的最頂端就是政治局，而政治局為中共共產黨的政治局，它通常是作為領導的核心(中共組織系統如圖 3-1 所示)。為有效控制及運作這個系統，這個系統分成六個主要的功能系統或稱為六個口。每一個部份都由政治局常委會的成員所掌控，這個六個部份是軍事事務、法律事務（這部份包含立法、司法及法律的執行）、行政事務（工業及農業生產，還有財政、商業、外交事務、健康、教育科學、運動等等）、宣傳部份（包含文化事務及傳播媒體）、統一陣線（非共黨的政治、政黨團體、宗教、少數民族、台灣、香港、澳門事務）及群眾組織事務（青年、婦女團體的組織與其他的組織）。

¹ Lu Ning, "The Central Leadership, Supraministry Coordinating Bodies, State Council Ministries, and Party Departments," Edited by David M. Lampton, *The Making of Chinese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in the Era of Reform*(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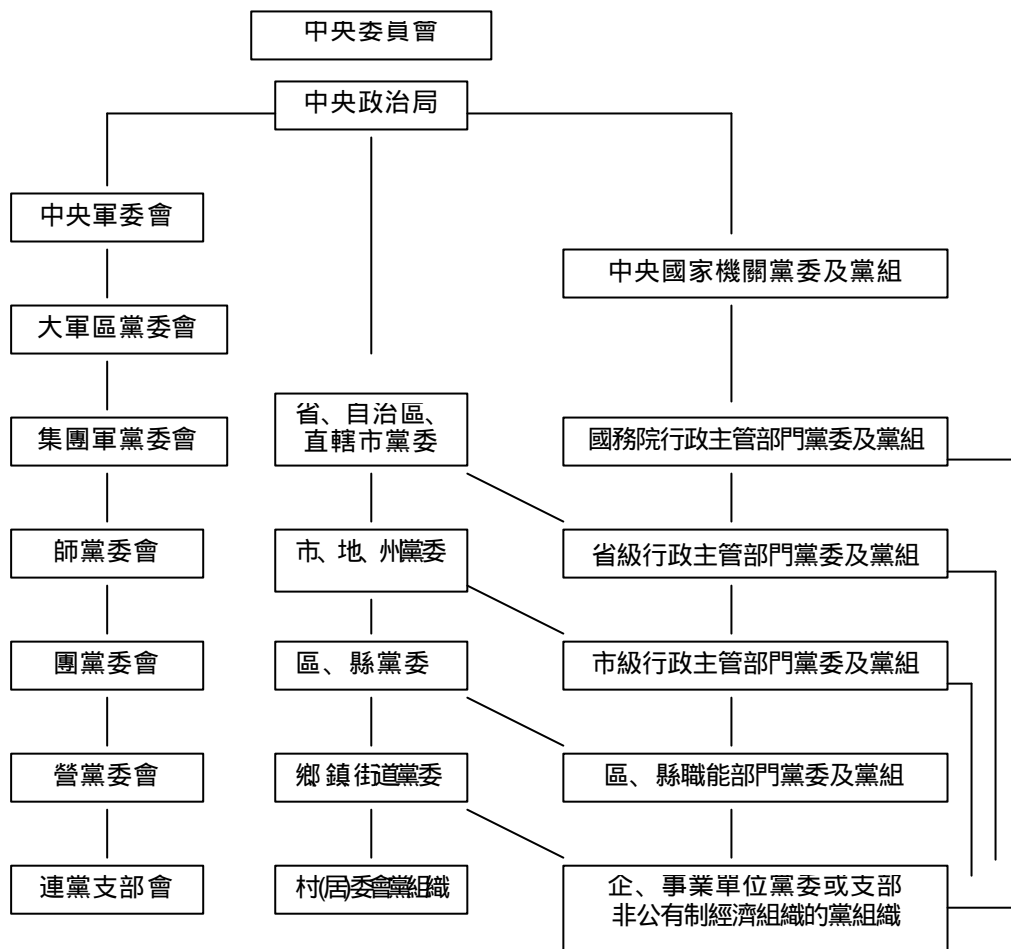


圖 3-1 中共組織系統圖

資料來源：整理自胡偉，*政府過程*（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頁86；中國共產黨章程，*人民日報*（北京），2002年9月19日，版1。

中共外交政策有三個主要的行為者，第一個是中央領導，第二個是中央外事領導小組，第三是中央官僚機構(圖 3-2 為中共外交政策的決策體系圖)。²以下分別從這三個層面來探討中共外交政策的決策體系。

一、中央領導：中央領導有四個主要的部份，第一個是領導核心或是最高的

²這種分類法是由陸寧(Lu Ning)提出，詳細內容可參閱 Lu Ning, "The Central Leadership, Supraministry Coordinating Bodies, State Council Ministries, and Party Departments," Edited by David M. Lampton, *The Making of Chinese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in the Era of Reform*(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40-55.

領導者，第二個是核心的周圍，第三個是政治局常委的委員，第四個是政治局其他的成員。³一般來說，領導核心周圍的成員都是政治局常委委員，他們構成上層的領導。中共政治系統的主要特色就是政治權力高度集中在共產黨，黨的權力集中在少數領導人身上。外交事務、軍事事務及黨的組織工作，通常被視為最敏感的區域，因此需要權力的高度集中。

(一)最高領導者與領導核心

外交事務最後決策的核心在於最高領導者或領導核心。⁴最高領導者產生一個非正式的領導核心，而且這些核心會圍繞著這些最高領導者，此領導核心通常包含一至二個人，這些人由最高領導者所授權。在毛澤東時代，從1949年到1966年，領導核心包含劉少奇跟周恩來；1966年到1971年是林彪，1971年到1974年是周恩來。在鄧子平的時代，在1986年以前，領導核心是陳雲、胡耀邦，1986年到1989年是趙紫陽，1989年以後則是江澤民。從1999年後，大部份重要的外交與國防事務之決定權，大部份歸屬於江澤民、朱鎔基、黨的最高層助理及軍隊系統。⁵

(二)政治局及其常任委員會

外交政策係屬全國性的重大政策問題，依中共黨章的規定，應交由黨中央決定，也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常任委員會會議，才有權作出決定。根據中共黨章第二十二條的規定，黨的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任委員會和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由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選舉，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必須從中央政治局常任委員會委員中產生。中央政治局和其常任委員會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閉會期間，行使中央委員會的職權。⁶

中央政治局不僅可以對中共外交政策的內容進行討論，並作出具體決議，同時還可以對外交執行機構，如何進行及開展對外工作提出指示。這樣的職權充份顯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中共政權中的最高決策領導地位。

(三)書記處

中共在1934年黨第六屆五中全會設立書記處，但在1969年黨第九屆全國代表大會取消此機構，一直至1980年召開黨十一屆五中全會時，才又決議重設書記處。當時任中共黨中央委員副主席葉劍英即明白表示，中央書記處是準備接中央的班，「書記處處於第一線，中央常委、政治局處於第二線」。⁷亦即書記處成

³ Lu Ning, *The Making of Chinese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in the Era of Reform*, 40-41.

⁴ Ibid., 41.

⁵ Ibid.

⁶ “中國共產黨章程，” *新華網*，2002年11月18日。

⁷ 葉劍英，“在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第一次會議上的講話，”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360-362。

為重要的辦事單位，而中央常委及政治局成為扮演第二線的指導角色。

中央書記處是中央政治局和其常任委員會辦事機構，成員由中央政治局常任委員會提名，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通過。中共黨中央高層的決策，近年來已有逐漸從中央政治局和常任委員會轉移至中央書記處的趨勢，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央政治局及常任委員會並非每日開會，因此負責處理政治局與常任委員會日常事務的書記處就在總書記之領導下，擔負著日益重要的決策責任。

二、外事領導小組及其辦公室

中共中央政治局雖為中共黨內的最高決策機構，但即使是政治局的中央書記處，其職權範圍仍極為廣泛，因此近年來中央外事領導小組及其辦公室在中共外交決策過程中，扮演著極為重要之角色。

(一)外事領導小組

領導小組以前稱為小組，係於 1958 年 6 月成立，並分為財經、政法、外事、科學及文教等小組。十三大之後，領導小組的地位與中央書記處相等，均由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會直接領導。它的成員包括中共黨政系統中的高層領導人及與對外事務有關的機構負責人，如國家主席、國務院總理、副總理、外交部長、對外經貿部長，黨內的對外聯絡部長也可能奉召參加，此一小組每週定期集會一次，主要是對外交事務進行廣泛的意見交換及相互溝通，並不對特定事項作出具體決議，除了將政策決議轉告給對外的各個組織，同時將主要資訊和觀點報告給黨的高階領導者。在李鵬擔任此小組主持人時，透過其本身在黨的權力與威望，使得此小組對重要的外交政策制定與執行有極大之影響力。⁸正因為外事領導小組的成員包含中共最高領導階層，因此領導小組所提出的政策建議與意見，被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會採納成為外交政策的機率相當高。

(二)外事領導小組辦公室

中央外事領導小組辦公室是領導小組的辦事機構，其主要職掌為：1.針對國際形勢和執行外交政策的重大問題，特別是攸關國家安全的國際問題，進行綜合調查研究，提出看法和建議；2.承辦中央外事領導小組全體會議和辦公會議的會務工作，列管議決事項的辦理；3.承擔有關外事協調工作；4.聯繫主要涉外部門召開形勢政策協調會，就重大國際問題及政策進行研究討論，提出看法和對策建議；5.定期聯繫國際問題諮詢小組成員，研究國際形勢及重大國際問題；6.加強與國內重要國際研究機構聯繫，原則上每年召開一次國際形勢研討會；7.承辦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機關、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中央機關各部門、解

⁸ Mickael D. Swaine, *The Role of the Chinese Military i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making*, 25-26.

放軍各總部、全國總工會、共軍團中央、全國婦聯和其他人民團體，以及省級地方黨委報送中央外事領導小組審批有關重要外事問題的請示、報告。⁹由職權內容可以得知，外事辦公室為外事領導小組的最佳助手，在外交決策過程中扮演著較為靜態的政策研究分析和協調之角色，而非執行政策之角色。

三、中央官僚機構

在黨、政府及軍隊系統中，有五個中央官僚機構對外交政策的制定有影響力：在政府體系包含外交部、外經貿部與新華社；在黨部份包含共產黨的對外聯絡部；在軍隊部份，主要是解放軍的總參謀部。¹⁰

(一)外交部

中共國家機構中主要對外工作是由國務院下的外交部負責。外交部的主要職權有：1.對國際形勢和各國情況進行調查研究，為中央制定外交戰略、方針、政策、策略提供情況和提出建議；2.代表國家和政府辦理外交事務；3.代表國務院或根據授權歸口管理有關的涉外事宜；4.瞭解國際重大經濟信息和外國經濟體制、法規等；5.從外交政策和國別關係的角度，就對外貿易、經濟合作、經援、軍援、軍貿、僑務、文教、科技、宣傳中的一些重大問題，與有關單位協調，向中央反映情況，提出建議；6.貫徹執行中央關於外交的方針政策，就聯合國事務以及人權、軍控、世界和地區經濟合作等重大問題向中央提出建議，辦理多邊外交政策；7.在外交方面貫徹執行中央關於香港、澳門和解決台灣問題的方針政策，促進祖國和平統一；8.領導駐外使館和有關代表機構的工作；9.領導直屬單位及民間單位的外事工作，進行業務領導；10.負責外交幹部思想政治工作；11.承辦黨中央和國務院交辦的其他事項。¹¹

在外交決策的過程中，外交部主要任務是協助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統一掌管外交事務和制定中共對外政策並負責執行，以及代表國務院就涉外方針、政策的實施進行協調。

(二)外經貿部

外經貿部是計畫、研究及實行對外貿易與經濟援助政策的一個官僚機構，其主要職權包括：1.研究擬訂發展對外經濟貿易的戰略方針和國別政策及其他有關政策，經黨中央和國務院批准後，負責組織實施；2.負責編制有關發展對外經濟貿易的中長期計劃；3.負責制訂有關對外經濟貿易管理的法規；4.研究制訂對外

⁹ 楊勝春著，*中國最高領導班子的左右手——中共中央直屬機構檔案(1949-1998)*(台北：永業出版社，2000年)，頁70-72。

¹⁰ Lu Ning, *The Making of Chinese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in the Era of Reform*, 49-50.

¹¹ 中央編委辦公室綜合司編，*中央政府組織機構*(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1995年)，頁41-42。

貿易體制改革方案；5.組織並管理進出口貿易相關事宜；6.負責管理對外援助，組織和協調管理外資項目貸款及技術引進、經濟合作事宜；7.負責對外經濟貿易的教育培訓計劃及市場調查研究。¹²

在中共採取改革開放以後，外經貿部的角色變得相當重要。在外交決策過程中，外經貿部對於對外貿易與經濟合作的議題有相當之影響力。從具體實踐來看，對外經濟援助、派遣醫療隊與支援技術專家等是中共對第三世界國家推動的重要外交政策，而此項政策的具體實踐與推動則是由外經貿部負責，外交部則只是外經貿部的諮詢對象。也就是說，在外交政策的經濟議題上，外經貿部扮演政策的建議者，甚至是具體政策制訂者的角色，同時也是中共外交政策經濟議題的主要執行者。¹³

(三)對外聯絡部

對外聯絡部成立於1951年，對外聯絡部經常與國務院的外交部相互配合，其主要的工作項目是建立和發展與其他國家政府及政黨的關係，尤其是和其他共黨國家之間的關係，對外聯絡部可能和外交部扮演著同等重要的角色。中央對外聯絡部的主要工作任務包括：1.依照黨的外事工作方針，通過與各種政黨聯繫，團結一切願與中共友好的力量，增進中共在國際上的地位和作用，爭取有利於中共發展的和平國際環境；2.透過黨的關係和群眾團體的管道，促進經濟和科技合作。工作重點是與各國共產黨進行友好交往，並與社會黨、社會民主黨等其他政黨和組織建立必要的聯繫；3.對外聯絡部受中央委託，代管有關群眾團體的外事活動，協調黨的對外交往工作。¹⁴

近幾年來，對外聯絡部更致力於拓展與其他國家的共黨關係，特別是開發中國家的社會主義、社會民主及工黨之間的關係，因此中共與其他共黨國家(如北韓)及第三世界之間的往來，對外聯絡部的角色日趨重要，而對外聯絡部在中共對外關係中，地位的提升也相對地提高共黨書記在外交決策之影響力。

(四)新華社

新華社是中共中央政府主管新聞工作的部門，其主要的任務是宣傳馬列主義、毛澤東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及時反映國際上的重大取向，宣傳中共對外政策。¹⁵另一方面，新華社也是一個重要的資訊及處理資訊之提供者，其提供資訊給中央領導者及許多的外國事務單位。新華社每天發行的參考日報平均量是

¹² 徐爭游等編，*中央政府的職能和組織結構*（下冊）（北京：華夏出版社，1994年），頁349-350。

¹³ 許志嘉，「鄧小平主政下參與中共外交決策的黨政組織探討」，*中國大陸研究*，第41卷第5期（1998年5月）：頁41。

¹⁴ 景杉編，*中國共產黨大辭典*（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91年），頁216。

¹⁵ 徐爭游等編，*中央政府的職能和組織結構*（下冊），頁380。

五十頁，其內容來源非常多，不只有報導，還有一些文章是有關於國際及國內雜誌、報紙、期刊之評論。¹⁶這個參考刊物主要是給中央領導人及對外事務的專家作參考資訊。可見，新華社在外交決策過程中扮演著資訊分析者與提供者之角色。

(五)人民解放軍

解放軍對外交政策之影響大多侷限在一些特定的活動，這些活動主要是與國家安全、國家主權或軍售有關之議題。在外交政策制定過程中，有關人的情報資訊分析是由總參謀部負責，有關軍售部份是由總裝備部負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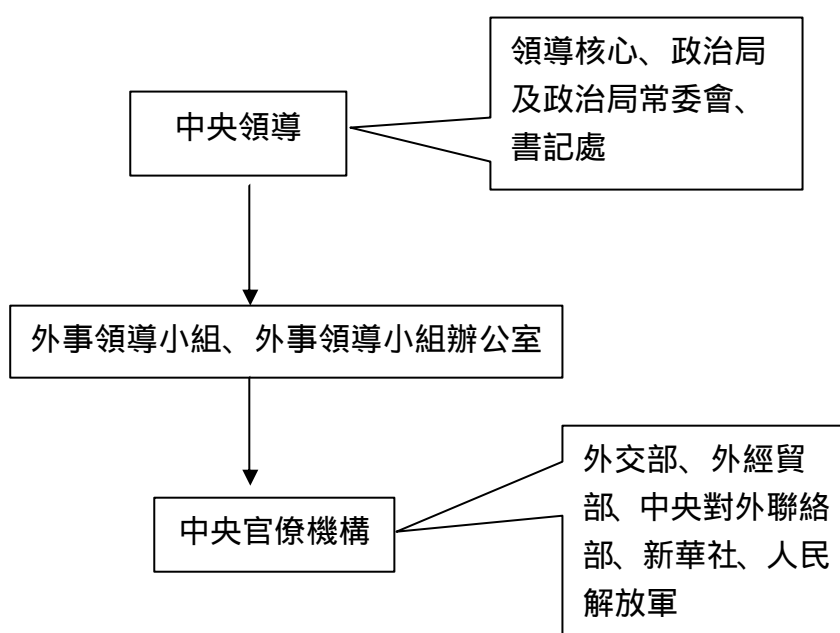


圖 3-2 中共外交政策的決策體系圖

資料來源：作者綜整繪製

第二節 解放軍參與外交決策的機構

在後毛澤東時期，中共實際的政策制定過程中，雖然政策的決定權仍舊在少數領導者或政治局常委中，然而由於在重大決策決定前必須具備政策細節的評估與分析，因此黨政協調的機制仍然發揮不少功能。亦即中共的重大外交政策是由中央領導來作決定，而中央領導依賴涉及外事工作的各種機構蒐集資訊、分析情勢、建議，以制定外交政策。在外交政策決定過程中，解放軍的角色主要在於資

¹⁶ Lu Ning, *The Making of Chinese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in the Era of Reform*, 53.

訊蒐集、政策諮詢及政策執行(有關外交事務各階段負責的黨政機構情形如表 3-1)。

表 3-1 外交事務各階段負責的黨政機構

政策階段	資訊蒐集與分析	政策選項形成	政治諮詢	政策制定	政策執行
參與的黨政組織	中央對外聯絡部、外交部、國防部、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新華社、相關研究機構、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宣傳部、中央統戰部、人民日報社、國家安全部、人大外事委員會、政協外事委員會、中央外事辦公室	中央外事領導小組 中央書記處、國務院	人大常委會、中央軍事委員會、外事領導小組	最高領導者與領導核心、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中央政治局	外交部、外經貿部、新華社、對外聯絡部、駐外使館、中央宣傳部、中央統戰部、人民日報、人民解放軍

資料來源：修改自許志嘉，「鄧小平主政下參與中共外交決策的黨政組織探討」，《中國大陸研究》，第 41 卷第 5 期(1998 年 5 月)：頁 33。

在軍事層面，涉及外事工作的機構主要是由四部份組成，在最中間的核心部份，中央軍委會扮演著決策過程的核心位置；第一個內圈是解放軍的總參謀部，參謀部是中央軍委會的執行單位，其任務在於提供第一手資料及資訊；第二個內圈是其他中央層次的軍事組織，其提供經常性資料。這些軍事組織包含總政治部 總裝備部 國防科技工業委員會及研究機構；外環是指實行決策的軍事組織。

¹⁷以下就對這些組織的性質與功能加以詳述。

一、中央軍委會

中央軍委會領導中共全國武裝力量，負責共產黨和國家的最高決策和軍事指

¹⁷ 這些涉及外交事務的軍隊組織資訊是歸納 Kenneth W. Allen and Eric A. Mcvaddon, *China's Foreign Military Relations*(Washington, D.C. : Henry L. Stimson Center, 1999), 11; Mickael D. Swaine, *The Role of the Chinese Military i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making*, chapter 4.

揮，依據黨的路線和方針，確定軍事戰略，領導軍事建設，為人民解放軍的最高統率機構。由於中共最高領導者同時又是中央軍委會主席，因此可以說，中央軍委會是介於政治力跟槍桿子之間的機構。由於在中共實際政策運作中的特殊地位，中央軍委會在中共外交決策過程中仍具有提供政策建議的能力，特別是在有關國防與外交議題方面。

軍委會主席、副主席多係中共實權機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或中央政治局成員(如表 3-2)。因此就組織結構來看，中央軍委會雖非制定外交政策過程的一個重要機關，但由於軍隊高層領導人身兼黨政要職，使得軍方對外交決策過程的涉入程度頗深。中央軍事委員全體委員會議每月至少召開一次，如有特別的需求，每年也會以專案方式召開數次的會議。軍委會每年舉行兩次擴大會議，討論和批准五年與十年的國防計劃、國防預算和其他重要的國防政策事宜。¹⁸由此可知，中央軍委會是國家最高層的軍事組織，中央軍委會直接涉入軍隊操作及運作之決策制定，其對外交政策的影響大多侷限在制定及協調外交政策中有關的國防政策部份。

¹⁸ Mickael D. Swaine, *The Role of the Chinese Military i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making*, 52.

表 3-2 中央軍委會主席副主席在黨內職務關係表

時間		中央軍委會主席：黨內職務	中央軍委會副主席：黨內職務
十一屆一中	1977-1981	華國鋒：中央委員會主席	葉劍英：中央委員會副主席 鄧小平：中央委員會副主席 劉伯承：中央政治局委員 徐向前：中央政治局委員 聶榮臻：中央政治局委員
十一屆六中	1981-1982	鄧小平：中央委員會副主席	葉劍英：中央委員會副主席 劉伯承：中央政治局委員 徐向前：中央政治局委員 聶榮臻：中央政治局委員
十二屆一中	1982-1987	鄧小平：中央政治局常委	葉劍英：中央政治局常委 徐向前：中央政治局委員 聶榮臻：中央政治局委員 楊尚昆：中央政治局委員
十三屆一中	1987-1989	鄧小平：中央委員會主席	趙紫揚：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楊尚昆：中央政治局委員
十三屆五中	1989-1992	江澤民：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楊尚昆：中央政治局委員 劉華清：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十四屆一中	1992-1995	江澤民：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劉華清：中央政治局常委 張震：中央委員會委員
十四屆五中	1995-1997	江澤民：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劉華清：中央政治局常委 張震：中央委員會委員 張萬年：中央委員會委員 遲浩田：中央委員會委員
十五屆一中	1997-1999	江澤民：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張萬年：中央政治局委員 遲浩田：中央政治局委員
十五屆四中	1999-2002	江澤民：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張萬年：中央政治局委員 遲浩田：中央政治局委員 胡錦濤：中央政治局常委
十六屆一中	2002-2004	* 江澤民：國家主席	胡錦濤：中央政治局常委

			曹剛川：中央政治局委員 郭伯雄：中央政治局委員
十六屆四中	2004-	胡錦濤：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曹剛川：中央政治局委員 郭伯雄：中央政治局委員 ? 才厚：中央書記處書記

* 江澤民在 2003 年 3 月卸下國家主席的職位，並由胡錦濤接任。

資料來源：許志嘉，”鄧小平主政下參與中共外交決策的黨政組織探討，” *中國大陸研究*，第 41 卷第 5 期(1998 年 5 月)：頁 33；展望與探索雜誌社編，*中國大陸綜覽*台北：展望與探索雜誌社，2003 年)，頁 26；*中華人民共和國黨政軍組織架構*(香港：文? 出版社，2003 年)，頁 1-4。

二、總參謀部

總參謀部是中央軍事委員會的軍事工作機關，是全國武裝力量軍事工作之領導機關，是人民解放軍的總司令部，在中央軍委領導下負責組織領導全國武裝力量軍事建設和組織指揮全國武裝力量的軍事行動。¹⁹亦即總參謀部是軍事指揮的中樞，在軍隊建設和作戰指揮中佔有極其重要的作用，同時在形成高層次決策中占有影響力之地位。

總參謀部參與外交決策的主要部門為總參謀部第二部門及第三部門。

(一)第二部：又稱「情報部」，該部主要工作包括國外軍事、戰略情報等資訊的蒐集與分析。該部會定期為總參謀部與中央軍委會、國防部、主要軍事工業部門提供長期與短期的情報報告資料。另外，第二部也提供一份發生在 24 小時之內的重要軍事事務日報，並將此日報呈報中央軍委會、政治局及各軍種負責人。²⁰由此可得知，總參謀部第二部是中共研判國外軍事資訊的主要單位，在中共外交決策過程中，軍事情報的提供與研判，受到該部重要之影響。

(二)第三部：又稱「通信部」或「技術偵察部」，主要工作是負責對無線電通訊的監聽，各種密碼的破譯，並提出專題報告。²¹在外交決策過程中，第三部主要扮演國外軍事情報的蒐集與分析工作。

三、總政治部

總政治部在中共中央軍委會的領導下，負責管理全軍黨的工作和組織進行政治工作。設有辦公廳、組織部、宣傳部、保衛部、紀律檢查部、文化部、群眾工

¹⁹ 中國軍事百科全書編審委員會，*中國軍事百科全書*(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7 年)，頁 850。

²⁰ Nicholas Eftimiades, *Chinese Intelligence Operations*(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4), 75.

²¹ 郭瑞華，*中共對台工作組織體系概論*(台北：法務部調查局共黨問題研究中心，1996 年)，頁 119。

作部、聯絡部、軍事法院、軍事檢察院和直屬工作部等部門。其主要任務是：遵照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的決議、命令、指示，根據黨的基本路線和軍隊的任務，制定全軍政治工作方針、政策、規章制度；領導全軍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領導全軍搞好政治思想建設，保證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和人民軍隊的性質；鞏固軍隊內部的團結和軍政、軍民團結，保證軍隊戰鬥力的提高和各項任務的完成。²²

由於中共的政治體制是以黨為中心，總政治部因為主管政治與意識型態方面事宜，故對軍事政策有一定之影響力。加上，總政治部負責管制解放軍各階層的人事選拔，亦可藉由黨領導階層的支援下，改變解放軍內部國防政策討論和行為。²³總政治部下轄的「聯絡部」是解放軍另一個重要之情報系統，主要工作對象包括台灣、美國、日本、俄羅斯、泰國、法國等地，蒐集前述地區的政治情報，並提出相關報告。該部的政情蒐集與分析，是中共高層領導對外交事務看法的重要來源。²⁴因此在外交決策過程中，該部負責蒐集國外政情及反映中共軍事系統的觀點。

四、總裝備部

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召開，中共為了加強全軍武器裝備建設的集中統一領導，故決定合併原「國防科工委」及總參謀部、總後勤部等三大單位負責武器裝備研發與維修相關機構，成立「總裝備部」，直屬中央軍委，並在各大軍區、軍兵種也相對成立對口之「裝備部」。總裝備部主要職責是負責軍事科技論證，以及軍事裝備的計劃、研發、試驗、購買、分配、運用、保管、維護及汰除等工作。²⁵此外，總裝備部也負責監視和控管武器的購買及出口武器，尤其是自1998年以來，中共與俄羅斯、巴基斯坦與伊朗的軍事交流合作部份，都受到總裝備部之影響。

五、國防科技工業委員會

國防科技工業委員會雖正式置於國務院與中央軍委會的聯合管制之下，但由於大部份的成員都具有官階，因此實際上隸屬於軍事領導階層。就廣泛的層面而言，委員會是中共科技工業政策的主要管理機構，負責制定與督導軍民兩用的科

²²中國軍事百科全書編審委員會，《中國軍事百科全書》，頁853。

²³ Mickael D. Swaine, *The Role of the Chinese Military i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making*, 51.

²⁴許志嘉，《中共外交決策模式研究》（台北：水牛出版社，2000年），頁146-147。

²⁵ 陳梓龍，「現階段中共裁軍與體制改革之研析」，《戰略與國際研究》，第1卷第2期（1999年4月）：頁39。

技目標和相關計劃。另外，委員會也負責與外國洽談所有有關軍事技術轉移及其他國防工業交流事宜。²⁶至於在軍備控制與裁軍方面，國防科技工業委員會則在中共國防科技資訊中心內指導一個軍備控制與裁軍計劃，並主辦各種武器管制研討會，將技術資料傳至外交部與國防政策的各個制訂機構。²⁷換言之，在外交政策制定過程中，國防科技工業委員會的角色主要是提供資訊及執行決策的單位。

六、研究機構

軍事科學院、中國國際戰略研究會及和平與發展研究中心皆屬於解放軍系統之研究機構。研究機構所製作的大部份正式報告均先送至軍事委員會，然後再送達最高層次之國防政策、外交政策與國家安全政策機構。²⁸作為軍事系統涉及有關國際問題的研究單位，這些研究機構對中共外交決策過程仍能發揮一定影響力，可透過對中共軍事領導人提供有關國際重要戰略議題的分析與建議，循中共軍事系統，在外交決策過程中發揮影響力。

由以上內容得知，解放軍在外交決策過程所扮演的角色是諮詢、資料蒐集與分析、政策執行，政策諮詢的任務由中央軍委會擔任；資料蒐集與分析的工作由總參謀部第二部和第三部、總政治部、總裝備部、國防科技工業委員會及研究機構負責；執行政策則包含三軍各單位。一般而言，解放軍透過以上各組織形成對外交決策的建議，以正式方式（透過軍委主席、政治局中軍方的委員、外事領導小組中軍方的代表及可親自參與外交決策的軍方人物等等）或非正式方式（參加由外交政策中所屬機構所召開的內部討論會、研討會）表達軍方觀點和立場，參與外交決策制定過程。

第三節 解放軍參與外交決策的方式

中共外交政策是由中央黨政領導層級所決定，解放軍若要發揮軍隊在外交決策過程中的重要角色或參與外交政策的制定，只有透過影響中央黨政領導層級對外交政策的看法。基本上，解放軍參與外交決策的方式有三種：角色重疊、外事領導小組及非正式管道。

一、角色重疊

中央軍事委員會為領導全國武裝力量的組織，其主席是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²⁶ Mickael D. Swaine, *The Role of the Chinese Military i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making*, 49.

²⁷ *Ibid.*, 70.

²⁸ *Ibid.*, 69.

選舉產生，中央軍事委員會其他組成人員則是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提名，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或常務委員會決定。事實上，國家的中央軍事委員會和黨的中央軍事委員會是「一套人馬，兩塊招牌」，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的中央軍事委員會的組成人員，也是黨中央委員會的成員，二者人員是重疊的。因此中共憲法所創設的國家中央軍事委員會，非但沒有削弱中共共產黨對國家武裝力量的領導，卻成為強化黨對軍隊領導的主要緣由所在。²⁹

理論上，解放軍對外交決策影響的正常途徑，是通過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中央軍委會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等等。換言之，這些機構都有解放軍的代表，他們可以通過參加黨政會議，來爭取軍方的權益。其中，中央軍委會是軍隊系統的最高領導機關，中共建政以來（中共建政初期，中央軍委會一度被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所取代），中央軍委主席一直由當時最有實權領導人或最高領導人擔任（毛澤東、華國鋒、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從十四大開始，軍人擔任政治局委員的比例大多維持在 10%，而擔任中央委員的比例一直在 21% 上下之間，顯示軍人在黨內仍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參見表 3-3），這也表示軍人對外交政策有一定的影響力。

表 3-3 解放軍在政治局及中央委員中的比例

區分	八大	九大	十大	十一大	十二大	十三大	十四大	十五大	十六大
年份	1956	1969	1973	1977	1982	1987	1992	1997	2002
政治局委員	7/17 41.7%	12/25 52%	6/21 28.6%	12/23 52.2%	11/28 39.3%	2/17 11.8%	2/20 10%	2/22 9%	2/24 8%
中央委員	30/97 31%	85/170 50%	52/195 26.7%	61/201 30%	50/210 23.8%	23/175 18.3%	44/189 23.2%	41/193 21.2%	44/193 22.2%

* 中央委員不含候補委員

資料來源：沈明室，「中共十六大權力繼承與軍隊角色」，《展望與探索》，第 1 卷第 2 期（2003 年 2 月）：頁 45。

另外，透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也是軍隊參與外交決策的方式之一。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中共「最高國家權力機關」，主要行使國家的立法權、國家主要機構的人事任免權、全國性重大問題的決定及監督憲法及其他法

²⁹ 劉清波，「論中共『八二憲法』的『中央軍事委員會』」，《共黨問題研究》，第 26 卷第 1 期（2000 年 1 月）：頁 31。

律的實施等職權。³⁰其代表組成是由省、自治區、直轄市和軍隊選出的代表組成，各少數民族則應有適當的名額，軍隊的代表依照《中國人民解放軍選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辦法》的規定，由共軍各總部、各軍區、各軍兵種、國防科學技術委員會、國防工業辦公室、軍事科學院、軍事學院、政治學院、後勤學院的軍人代表大會，按「解放軍選舉委員會」分配的名額選舉產生。解放軍在歷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比例，以第四、五屆的人數最多，分佔代表總數的 16.8% 和 14.38%，2006 年 3 月第十屆人大總人數共 2985 人，軍隊人數有 268 人，所佔比例為 8.97%。³¹一般來說，雖然軍隊代表佔總代表人數的比例並不高，但卻是與地方和少數民族並列派出代表的職業團體。

二、透過外事領導小組

外事領導小組組長一職通常由總書記、國家主席或國務院總理擔任。然而自 1995 年後，江澤民取代李鵬成為外事小組組長，李鵬與錢其琛成為副組長。自此，該小組組長就由國家最高領導者擔任，2003 年胡錦濤接任江澤民國家主席的位子，並成為該小組組長。正因為外事領導小組的成員包含中共最高領導階層，因此領導小組所提出的政策建議與意見，被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會採納成為外交政策的機率相當高。

外事領導小組是解放軍與外交政策之間的正式接觸機構。解放軍在該小組中最少設有一位代表，代表國防部或是總參謀部。在外事領導小組中列入一位解放軍代表係於 1980 年代中期開始，當時該小組係由趙紫陽領導，其目的在使文人政府能就外事有關的議題，加強對解放軍的監督。³²當時國防部長秦基偉即為外事領導小組成員，1980 年代末期至 1990 年代初期，徐信與徐惠滋二位上將亦以主管情報與外事的副總參謀長的身分，出任解放軍在外事領導小組中的代表。在江澤民時期，遲浩田任職國防部長，並同時身兼領導小組的委員，使得解放軍的

³⁰ 中共憲法第 62 條指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行使下列職權：

1. 修改憲法；2. 監督憲法的實施；3. 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國家機構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4. 選舉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副主席；5.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提名，決定國務院總理的人選；根據國務院總理的提名，決定國務院副總理、國務委員、各部部長、各委員會主任、審計長、秘書長的人選；6. 選舉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根據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提名，決定中央軍事委員會其他組成人員的人選；7. 選舉最高人民法院院長；8. 選舉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9. 審查和批准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和計劃執行情況的報告；10. 審查和批准國家的預算和預算執行情況的報告；11. 改變或者撤銷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不適當的決定；12. 批准省、自治區和直轄市的建置；13. 決定特別行政區的設立及其制度；14. 決定戰爭和和平的問題；15. 應當由最高國家權力機關行使的其他職權。

³¹ “新陣容新面貌新階段，” *新華網*，2006 年 4 月 27 日。

³² Carol Lee Harmin, “Elite Politic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Thomas W. Robinson and David Shambaugh(eds), *Chinese Foreig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5), 90.

意見在外交政策的制定中能受到一定的重視。

由於外事領導小組的主要角色乃是外交決策中一個溝通與協調機制，故解放軍指派代表參加該小組的目的是為保證對外政策與軍隊之間正常程度的資訊交流，以及保證對外政策與國防政策兩者之間能就一些相當例行性的政策問題，以及可能重疊或引起衝突的部分進行協調。³³例如 2001 年發生軍機擦撞事件後，中共政治局常委立即在中南海召開緊急會議，江澤民以外事領導小組組長和中央軍委主席的身份主持會議，胡錦濤（國家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錢其琛（副總理、外事領導小組副組長）、張萬年（中央軍委副主席）、熊光楷（副總參謀長）、國防部長遲浩田及總參謀長傅全有等軍委成員都參加此次的會議。³⁴在會議中，解放軍高層要求江澤民和胡錦濤採取強硬路線，因此會中敲定「道歉外交」的解決模式。³⁵可見，在處理撞機事件過程中，解放軍發揮了實質的影響力。

三、非正式方式

解放軍軍官會以非正式方式與政治局常委會常委進行非常規與非正式的溝通，或是參加由外交政策中所屬機構所召開的內部討論會、研討會，表達其對外交政策問題之看法與意見。例如在 2000 年台灣總統大選後，中共解放軍青壯派軍官曾在多次的研討會或公開場合中，對「台獨」發展的形勢做出研判，認為 2004 年至 2008 年將進入「台獨危險期」，並建議解放軍務必在這段期間做出萬全準備以防萬一。³⁶

另外，軍方的研究機構也會透過對中央軍委會、總參謀部、各軍種及各階層軍事單位的研究報告及政策分析，提供軍方高層領導者對外交政策的看法。這些看法將在軍方領導者參與外交決策制定時，適時提出，並表達軍隊的立場。例如國際戰略研究學會學者辛旗，在陳水扁上台後，經常發表針對台灣講話，提出對台強硬的態度，主張以武力威脅對付陳水扁政府，³⁷而其意見深受解放軍高層將領的青睞。

³³ Mickael D. Swaine, *The Role of the Chinese Military i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making*, 32.

³⁴ “江澤民遙控作主 朱熔基插不上手，” *大紀元*，2001 年 4 月 12 日。

³⁵ 有關「道歉外交」政策的制定過程與涵義可參閱本論文第五章第二節。

³⁶ 有關解放軍對台海情勢的分析可參閱“中國青壯派解放軍不主張 4 年內和台灣決裂，” *中國時報*，2000 年 5 月 16 日，版 14。

³⁷ 辛旗在 2000 年陳水扁上台後，曾發表「辛十條」。「辛十條」代表北方強硬派，主張繼續以武力威脅對付陳水扁新政府，諸如：「要有 3 至 5 年軍事措施，以戰逼和」；「擺出不惜一戰，戰決心越大，和越可能」；「邊和邊戰，配合軍事，加大島內軍方的分化」；「對陳水扁搞他片刻不得安寧」等等。有關辛旗的主張及論點可參閱阮銘，「新政府的兩岸政策-觀察與展望，” *遠景季刊*，第 1 卷第 3 期(2000 年 7 月)：頁 182。

第四節 解放軍在外交政策之影響力

隨著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中共外交政策涉及的層面愈來愈廣，而且外交議題也更趨複雜，使得江澤民時期決策模式呈現多元化的狀態，除了透過角色重疊的傳統途徑參與外交決策外，解放軍更透過外事領導小組及非正式方式影響外交決策的制定。事實上，毛澤東、鄧小平和江澤民的領導風格及決策模式確有不同，毛澤東屬於「領袖主導模式」，鄧小平為「集體領導模式」，江澤民則為「官僚政治模式」。不同決策模式使得解放軍參與外交決策制定的方式與管道相異，進而造成解放軍在外交決策過程中有不同之影響力。

一、領袖主導模式

由中共歷史發展過程來看，擁有中共最高決策權之所謂「黨中央」是經過更迭的。中共共產黨於 1921 年成立之時，中央書記處是最高決策核心，書記處成員包含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與任弼時；1956 年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後，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取代原書記處的地位，成為黨中央；文化大革命時，「中央文革小組」發揮重要作用，具有黨中央的地位。然而不論黨中央是指書記處成員或是中央文革小組，毛澤東時期外交政策的制定過程主要是毛澤東在周恩來的協助下，制定重大的外交決策。

毛澤東堅持「黨指揮槍」的原則，它的實質也就是在這個基礎上建立起來。³⁸在毛澤東時期，軍隊聽命於毛的指揮行動，軍隊的政治角色是一種工具性角色。以抗美援朝事件為例。1950 年 6 月 25 日韓戰爆發；6 月 27 日美國決定派出海軍和空軍入侵朝鮮領海、領空。此時毛澤東迅速作出反應，表明中國政府的立場，毛澤東在 6 月 28 日中共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八次會議上莊嚴宣告：「全國和全世界的人民團結起來，進行充分的準備，打敗美帝國主義的任何挑釁。」³⁹8 月 4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毛澤東在會上又指出，「如美帝得勝，就會得意，就會威脅我們。對朝鮮不能不幫，必須幫助，用志願軍的形式，時機當然還要適當選擇，我們不能不有所準備。」⁴⁰

10 月 2 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朝鮮半島局勢和中共出兵問題。毛澤東認為出兵朝鮮已是萬分火急，原擬派林彪率兵入朝，因林彪託病推辭，毛澤東遂決定派彭德懷掛帥出戰。⁴¹10 月 4 日和 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

³⁸ 俞雨霖，「中共軍人的政治角色——比較與歷史的觀點」，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論文，1987 年，頁 141。

³⁹ 逢先知，李捷，「毛澤東與抗美援朝」，《解放軍報》(北京)，2000 年 10 月 25 日。

⁴⁰ 同前註。

⁴¹ 同前註。

北京中南海召開會議，討論出兵問題，政治局成員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陳雲、康生、高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張聞天、彭德懷、李富春等出席會議，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和中央負責新聞工作的胡喬木也都列席會議。

在此次討論中，許多政治局成員對出兵抗美援朝有顧慮，因為當時國內困難重重：長期戰爭的創傷尚未治癒；土地革命尚未完成；土匪特務尚未肅清；軍隊的武器裝備落後，訓練不充分；部分軍民存在厭戰情緒。以解放軍的裝備水準，是否能打贏世界上最現代化裝備的美軍？中共的經濟力量能否支援持久戰爭？這些都是不容樂觀的難題。一旦失利，中共的處境將更加困難。但另一方面，大多數與會者也認為：如果不出兵，整個朝鮮將被美國侵佔，中共有直接面臨著美國侵略的威脅，東北地區的電力將被其控制，工業基地將遭到破壞，中共將失去安心進行經濟建設的保證；如果朝鮮失敗，朝鮮的革命遭到鎮壓，這也會降低共產主義的士氣，促長帝國主義的威風，美國將會更加猖獗，國際國內反動氣焰將會增高，這對中共局勢極為不利。⁴²

政治局在經過充分討論、權衡利弊之後，一致認為中共應當參戰，必須參戰，參戰利益極大，不參戰的損害極大，毅然作出「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重大戰略決策，決定組成中國人民志願軍赴朝參戰。⁴³10月6日周恩來在中南海居仁堂主持召開包括各地區負責人在內之黨政軍高級幹部參加的中央軍委會會議，根據5日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決定，討論入朝作戰方案和佈置有關方面的工作。8日彭德懷根據毛澤東的命令，立即與高崗率領臨時指揮人員飛往瀋陽；9日彭德懷、高崗召集志願軍軍以上幹部會議，傳達中央出兵援朝的決定，要求各部在10天內作好一切出國作戰的準備。⁴⁴

由以上抗美援朝的決策過程來看，雖然自10月2日至5日，中共中央共召開3天的會議。會中充分發揚民主的精神，參與人員認真地提出各自的見解，而毛澤東也聽取各種不同的意見，讓出席人員把出兵之不利方面和困難方面充分地說出來。但是由毛澤東在1950年6月至10月2日前的言論內容可以發現，毛澤東對於抗美援朝政策早已有定案，10月2日的會議也明確地決定由彭德懷擔任主帥，亦即至少在10月2日前，中共已決定出兵援朝。10月4日及5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可以說只是形式上讓政治局委員發表言論，然後再由毛澤東說服參與會議的成員同意援朝政策。

⁴² 參考自“抗美援朝大事記—中共中央決策出兵”，*新華網*，2005年10月19日。

⁴³ “抗美援朝大事記—中共中央決策出兵”，*新華網*，2005年10月19日。

⁴⁴ 逢先知，李捷，“毛澤東與抗美援朝”，*解放軍報*(北京)，2000年10月25日。

由抗美援朝的案例得知，毛澤東始終握有外交政策之最後決定權，軍人在外交政策中的角色只是執行者，而非決策者，其對外交決策的影響力相當小。(圖 3-3 為領袖主導決策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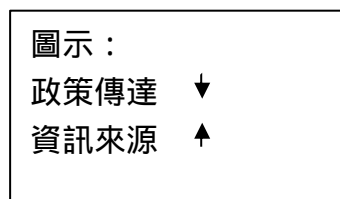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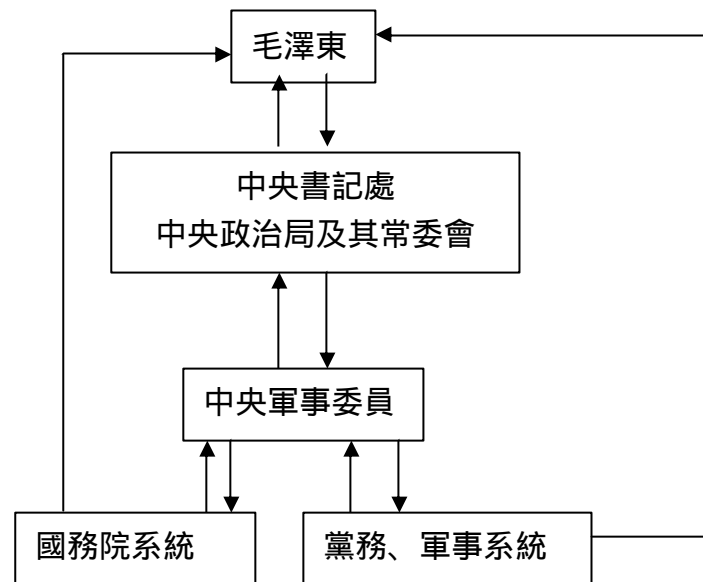


圖 3-3 領袖主導決策模式

資料來源：修改自許志嘉，*中共外交決策模式研究—鄧小平時期的檢驗分析*台北：水牛出版社，2000)，頁 217。

二、集體領導模式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尤其是 1978 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再次取得黨中央的位子，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成為決策的核心。自 1978 年至 1980 年，黨中央所指的政治局常務委員包含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及陳雲等人。另外，由於在中共實際權力運作中，仍舊有著濃厚的「人治色彩」，許多非

正式黨中央組織成員，卻擁有決策權，最明顯就是呈現半退休狀態的「元老」。⁴⁵

「元老政治」主要是出現在鄧小平時期，鄧小平要求年事已高的高層幹部退出黨政要職，然而這些元老仍對重要政策具有一定之影響力。此影響力主要視其個人在黨內歷史地位、貢獻及鄧小平對其意見的重視與否等因素而定。基本上，陳雲、李先念及楊尚昆等人都曾扮演重要角色。在外交政策方面，雖然多名元老對政策的參與及關心並不是很高，⁴⁶但當他們對一些重要政策表達意見時，往往會受到高度的重視。例如：1985年12月發生蘇聯國內航線民航機劫機事件，該機副駕駛將飛機劫持至黑龍江省。事後，蘇聯要求遣返劫機者，中共外交部為了重修與蘇聯的關係，傾向將劫機者遣返。但該案送至陳雲辦公室時，陳雲卻反對遣返，最後劫機者在中國大陸接受審判。由此可以看出，元老對於外交決策仍有一定的影響力。⁴⁷

另外，在1987年十三大之後，中共黨章規定，中央書記處成為辦理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之事務性工作的辦事機構，外交政策的決策權落到政治局與其常委會身上。這樣的規定使得鄧小平時期決策模式呈現「集體領導」，外交決策主要是由鄧小平、陳雲及元老作為主要的決策者(圖3-4即為鄧小平時期的集體領導決策模式)。以1989年天安門事件的決策為例，5月18日中共黨內八元老(鄧小平、陳雲、李先念、彭真、鄧穎超、楊尚昆、薄一波、王震)與政治局常委會委員(李鵬、喬石、胡啟立、姚依林)以及軍委會成員(洪學智、劉華清、秦基偉)舉行會議，正式決議宣佈北京市進入戒嚴狀態。⁴⁸5月27日鄧小平、陳雲、李先念、彭真、鄧穎超、楊尚昆、王震、薄一波在鄧小平住宅決定由江澤民接替趙紫陽的位置，擔任總書記。⁴⁹

在「集體領導」決策模式下，中央外事領導小組的地位在外交決策過程中益形重要。具體外交政策經由黨政軍相關部會組織在最高總體政策方針指導下，各自提出見解，形成初步政策方案後，送交中央外事領導小組討論，討論過程若無

⁴⁵ 所謂「元老」主要是指已無黨中央組織正式職務的高層領導，或是中央顧問委員會的成員，他們大多為開國元勳，其對中央政策均有提出意見的權力，並對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作決策時，有相當的影響力。Kenneth Liberthal and Michel Oksenberg, *Policy Making in China: leaders, structures, and process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36.

⁴⁶ 中共元老較關心的議題為經濟政策或意識型態的問題，對於外交政策較少發表不同的意見。根據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先念文選》，收錄李先念1935年至1988年的文章共九十七篇，多數是屬於關於經濟問題的看法，其中1979年以後的文章有二十一篇，只有一篇提及外交工作，其重點是對中共地方組織執行外事工作的問題，並非政策性談話。參閱李先念，*李先念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

⁴⁷ Lu Ning, *The Dynamics of Foreign-Policy Decisionmaking in China*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7), 93-94.

⁴⁸ 張良編著，*中國六四真相*(香港：明鏡出版社，2001年)，頁479。

⁴⁹ 張良編著，*中國六四真相*，頁753-754。

重大意見衝突，則將協商後的議案送交上級組織，即中央書記處或中央政治局；若外事小組討論中有重大意見衝突，無法達成協商，則將具體衝突的主要政策意見同時送呈上級組織；外事小組送交的議案在中央書記處或中央政治局中再進行討論，與會成員對送交之議案若無重大意見衝突，一般經修正更可作成決策，或是對並呈的議案經討論後作出決議形成政策。如果在中央書記處或中央政治局會議中重要政策衝突仍無法達成妥協時，則送交政治局常委會或由鄧小平親自批示。⁵⁰中央外事領導小組重要性的提高表示隨著改革開放的推行，外交政策愈形複雜，外交部門與其他相關部門的專業化程度及影響力也相對增加。

在鄧小平時期，中共當局會定期探詢軍方領導人對國家戰略目標及政策的意見與論點，並給予相當程度的尊重。⁵¹因此在鄧小平時期，解放軍除了透過外事領導小組表達軍方意見外，也常藉由資深的軍方領導人(葉劍英、楊尚昆、徐向前、聶榮臻、張愛萍、楊得志、余秋里及張學智等人)向鄧小平獻策，以發揮解放軍之政治影響力。

⁵⁰ 許志嘉，「中共外交決策模式研究：鄧小平時期的檢證分析」，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論文，1998年，頁189-190。

⁵¹ Michael D. Swaine, *The Role of the Chinese Military i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making*,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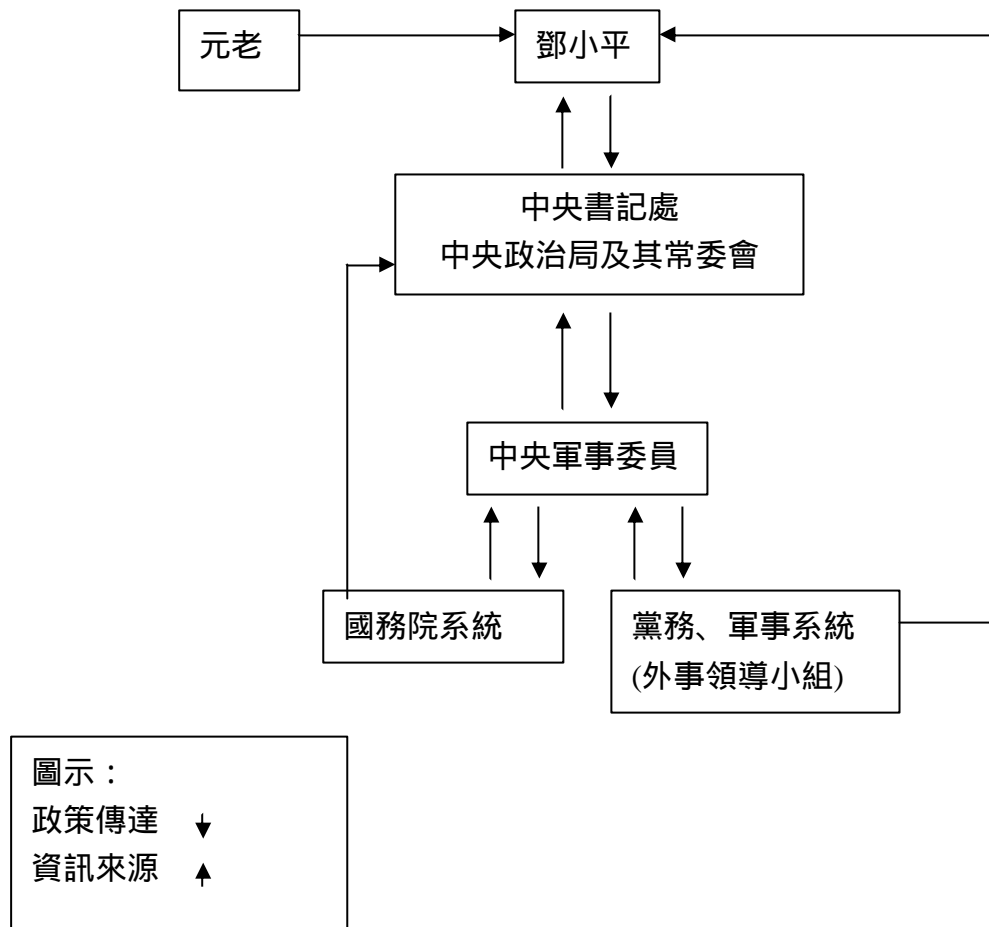


圖 3-4 集體領導決策模式

資料來源：修改自許志嘉，*中共外交決策模式研究—鄧小平時期的檢驗分析*台北：水牛出版社，2000)，頁 224。

三、官僚政治模式

第十三屆黨代表大會之後，外交決策的權力落在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手中，使得政治局及其常委的角色顯得重要。此外，在國際事務日益繁雜的情況下，中共外交決策體系愈來愈依賴外事領導小組的專業功能，這使得外事領導小組的重要性日益提高。整體而言，在江澤民主政時期，政治局常委、外事領導小組及中央軍委常常就外交事務進行研議。

從決策系統來看，不論中央書記處或是政治局掌握決策權，其成員均有軍方的代表，⁵²因此在最高決策體系中，軍方的意見可透過軍方代表充分反應。中央

⁵²劉華清在江澤民時期即為政治局常委會中，主要負責國防政策的常委兼軍委會副主席。

軍委若不是正式參與政治局常委會議和政治局會議，就以非正式方式參與政治局重要會議，或與政治局常委舉行不定期的接觸和溝通，表達解放軍對一些重要決策議題的觀點。⁵³

以中共對台決策體制為例，「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會領導下，負責中共對台政策及推動對台工作的任務編組。⁵⁴在此一小組中，長期以來一直有軍方代表參與，在江澤民主政時期，江澤民（組長）、張萬年、熊光楷皆是此小組的成員。在此一小組內，軍方代表可以參與討論、提出建議，但是該小組對台重大決策建議，按制度仍必須由黨的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會審批。

在江澤民時期，外交政策的主要領導權通常都由一位政治局常委會委員負責，此人即為李鵬。李鵬是當時的國務院總理，負責外交政策的發展，督導外交部的行動，以及解決此等機構間所浮現的差異與歧見。李鵬主要係以外事領導小組主持人身分行使職權，⁵⁵故能在最高領導階層內擔任對外政策的「橋樑領導者」，⁵⁶進而掌控外交政策的決定，指導重要政策的執行，並限制其他政治局常委對外交政策的影響力。可見，在江澤民時期，外事領導小組在外交決策過程中的角色相當重要。

另外，因外交事務日益繁雜，牽涉層面愈趨廣泛，使得外交政策的制定更須幕僚機構所提供的意見，而軍方的研究、分析與情報機構就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由共軍各個研究單位所製作的報告，通常先送交中央軍委會總辦公室，再送達最高層次之國防政策、外交政策與國家安全政策機構。⁵⁷再者，共軍各研究機構還會定期製作一些正式的情報資料送呈資深的軍方與黨內領導階層。此外，軍方戰略家也會以非正式方式參加一些由外交部門所屬各單位所召開的內部討論會與研究會議。

由以上分析得知，在江澤民時期「官僚政治」決策模式下，解放軍參與外交決策的機會增多，透過角色重疊、外事領導小組及其他非正式方式，解放軍在外交決策過程中的影響力也較毛鄧時期更強(圖 3-5 為江澤民時期的官僚政治決策模式)。

⁵³ Mickael D. Swaine, "The PLA and Chinese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Leadership, Structures, Processes,"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46(June 1996): 375.

⁵⁴ 郭瑞華，*中共對台組織體系概論*台北：法務部調查局共黨問題研究中心，1997年），頁103。

⁵⁵ Michael D. Swaine, *The Role of the Chinese Military i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making*, 54.

⁵⁶ Kenneth Lieberthal, *Governing China: from revolution through reform*(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1995), 188.

⁵⁷ Michael D. Swaine, *The Role of the Chinese Military i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making*, 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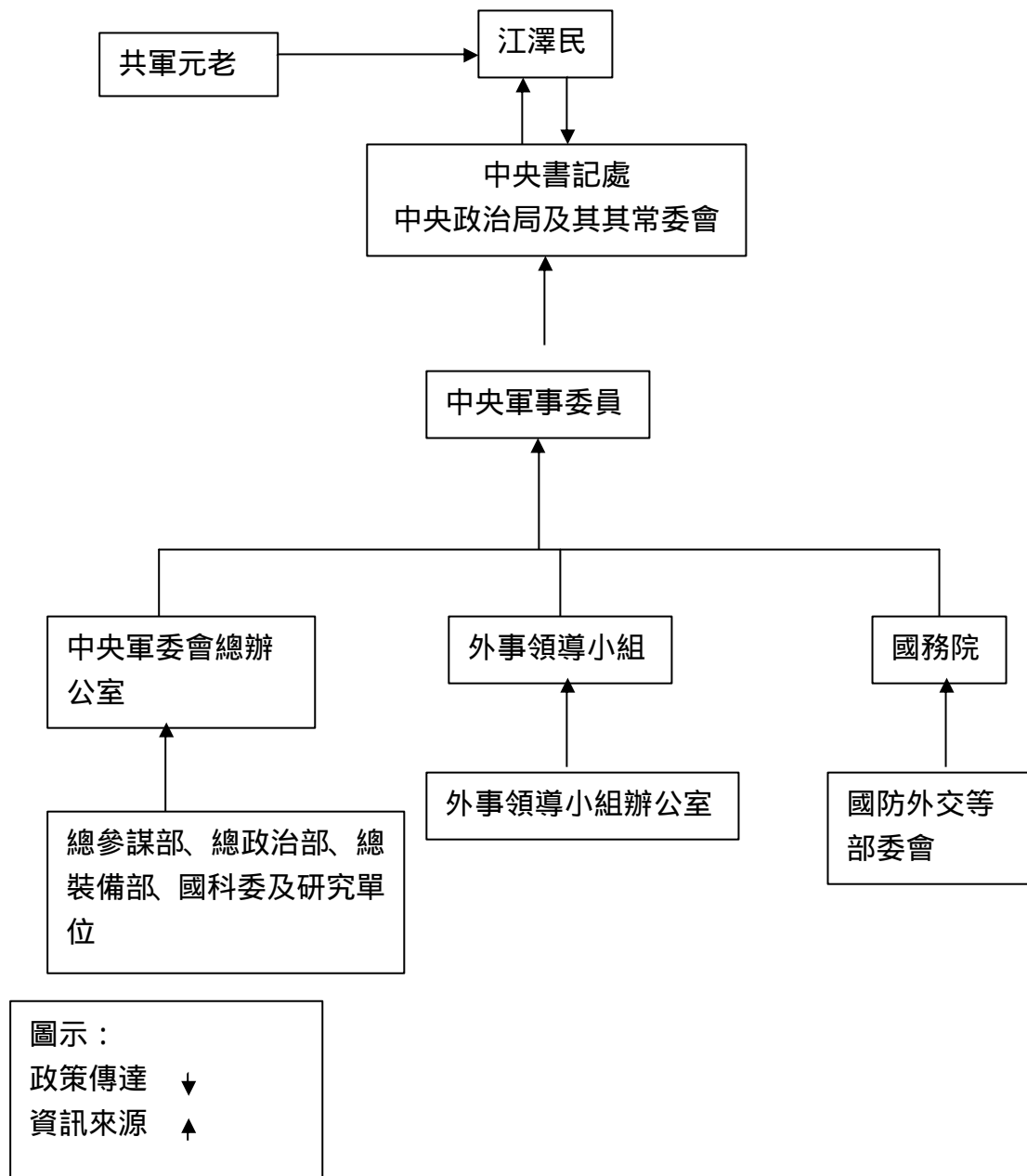


圖 3-5 官僚政治決策模式

資料來源：修改自許志嘉，*中共外交決策模式研究—鄧小平時期的檢驗分析*台北：水牛出版社，2000)，頁 227。

由圖 3-3、圖 3-4 及圖 3-5 可以得知，毛澤東、鄧小平及江澤民時期的決策模式不同，造成解放軍的影響力相異。在毛澤東時期「領袖主導模式」，毛澤東

握有最後決定權，解放軍所提供的資訊影響力最小；在鄧小平時期「集體領導模式」，外交政策的決策權在中央書記處或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會的手中，解放軍藉由角色重疊及非正式方式影響外交政策的制定，解放軍對於外交政策的制定有較大的影響力；在江澤民時期「官僚政治模式」，外交政策的制定形成一套體系，解放軍藉由角色重疊、外事領導小組及其他非正式方式，提供意見給予上層領導者，擴大軍隊在外交政策制定過程中的影響力。

第五節 小結

中共外交政策是由黨政重要機關或人員決定，解放軍在外交決策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是諮詢、資料蒐集與分析，中央軍委會負責政策諮詢的工作；總參謀部第二部和第三部、總政治部、總裝備部、國防科技工業委員會及軍方研究機構負責資料蒐集與分析的工作。

不同領導人的決策模式造成解放軍在外交政策中的角色及影響力各有不同，表 3-4 即為不同領導者時期，解放軍在外交決策過程中之政治影響力情形。

表 3-4 解放軍在外交決策過程中的政治影響力

	毛澤東時期	鄧小平時期	江澤民時期
領導者決策模式	領袖主導模式	集體領導模式	官僚政治模式
外交決策制定者或組織	毛澤東	鄧小平、陳雲、元老	政治局常委、外事領導小組、軍委會
解放軍參與方式	非正式方式	角色重疊、非正式方式	角色重疊、外事領導小組、非正式方式
解放軍的政治影響力	弱	中	強

資料來源：作者綜整繪製

江澤民時期「官僚政治模式」領導風格促使解放軍在外交決策過程中有著較多的參與機會，加上中央軍委主席、副主席兼任政治局常委或政治局委員的角色，藉此角色的重疊，軍隊能影響外交政策的制定。此外，由於黨依賴涉及外事工作的各種機構蒐集資訊、分析情勢與建議，以制定外交政策。因此除了透過角色重疊來表達軍方立場外，解放軍也可以透過外事領導小組及其他非正式的方式來闡述軍方對外交政策的建議與意見。藉由多種管道參與外交決策的制定，解放軍在江澤民時期的政治影響力顯然大於毛鄧時期。

事實上，由圖 3-1(中共組織系統圖)可以看出，不論是毛澤東時期、鄧小平時期或是江澤民時期，中共外交決策體系主要是屬於「中央集權」式的決策模式。軍方系統在外交決策地位並未特別突顯，但由於國家安全為中共的核心利益，且解放軍是負責國防之最核心組織，軍方代表在外交決策過程仍有一定的發言權。從決策系統來看，不論中央書記處或是政治局掌握決策權，其成員均有軍方的代表，因此在最高決策體系中，軍方的意見可透過軍方代表充分反應。

另外，由於解放軍的最高領導機構是中央軍事委員會，此機構雖非外交政策制定的重要單位，但是中央軍委實際負責中共國防安全，而且從鄧小平時期至今，中央軍委會的主席均是黨的最高領導者，副主席則多在黨內佔有重要職位(如表 3-2)。中央軍委常以正式方式參與政治局常委會議和政治局會議，或以非正式方式參與政治局重要會議，表達解放軍對重要決策議題的看法。因此在中共外交決策過程中，解放軍能夠反映其觀點和立場，尤其是涉及國家安全的外交政策議題，解放軍實具有重要之影響力。

第四章 組織合作--軍事外交

中共自 1978 年鄧小平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國家目標就鎖定在經濟的發展。鄧小平將國家戰略的重心放在經濟發展，因此特別指出：「我們在國際事務中起的作用的大小，要看我們自己經濟建設成就的大小。如果我們國家發展了，更加興旺發達了，我們在國際事務中的作用就會大。-----所以，在國際事務中反對霸權主義，台灣歸回祖國、實現祖國統一，歸根到底，都要求我們的經濟建設搞好。當然，其他許多事情都要搞好，但是主要是必須把經濟建設搞好。」¹ 此種國家戰略目標一直持續到江澤民時期及胡錦濤時期，在十六大報告中指出，建設小康社會「最根本的是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²

在經濟發展的國家戰略指導下，解放軍為營造國內外穩定環境及追求軍事現代化，在與國家安全或領土主權無關的外交議題上，解放軍積極配合及實踐「新安全觀」之外交政策，開展對外軍事交流與合作，形成全方位、寬領域、多層次的軍事外交局面。軍事外交是中共執行外交政策與國防政策的一項重要工作，³2002 年至 2005 年中共軍事外交活動尤其活躍，除派遣部隊參加聯合國的「維和任務」外；且與俄羅斯、中亞各國以及越南、泰國、印度、外蒙等周邊國家，建立「軍事互信機制」。此外，更創造多項「第一次」的記錄，例如 2003 年 6 月第一次參加「上海合作組織」六國聯合軍事演習，2003 年 10 月、11 月中共海軍第一次分別與巴基斯坦、印度等外國舉行海軍聯合演習；2005 年 8 月第一次與俄羅斯舉行聯合軍事演習。軍事外交的蓬勃發展，促使中共在《2002 年中國的國防》白皮書中，首次將「軍事外交」列為專章來說明。此外，《2004 年中國的國防》白皮書並在「國防政策」一章的闡述中提出「開展軍事合作與交流」，此為中共國防白皮書第一次把軍事交流放在戰略層次，把開展軍事交流與合作作為堅持新時期軍事戰略方針、推進中國特色軍事變革之重要內容。

第一節 軍事外交的目的

在《2004 年中國的國防》白皮書中，對於軍事外交之目的特別指出：「人民解放軍貫徹國家對外政策，發展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方的軍事合作關係。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和國際反恐合作，開展多種形式的軍事交流，建立軍事安全

¹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 2 卷，頁 239-240。

² “十六大報告全文，”新華網，2002 年 11 月 17 日。

³ Christopher B. Pultz, “The PLA and China's Changing Security Environment,” *Strategic Insights*, Volume II, Issue 1 (January 2003).

對話機制，營造互信互利的軍事安全環境。參加非傳統安全領域的雙邊或多邊聯合軍事演習，提高共同應對非傳統安全威脅的能力。學習和借鑒外軍有益經驗，有選擇地引進先進的技術裝備和管理方法，促進軍隊現代化建設。」⁴

學者艾倫（Kenneth W. Allen）與麥利凱（Eric A. McVadon）兩人在《中國對外軍事交往（China's Foreign Military Relations）》一書中，曾就中共推動軍事合作的目的進行探究，認為中共重視軍事合作之目的有：1. 塑造國際安全環境，並且支援中共重要的國家安全目標；2. 追求中共開放及改革政策；3. 強化中共軍事及國防工業現代化；4. 改善與外國的政治與軍事關係；5. 促使中共軍事領導者及年輕的官員獲得現代化軍事知識；6. 提供開發中國家軍事的援助；7. 訓練軍隊幹部成為技術人員及專家；8. 透過外國援助，以獲得軍事技術及增進主要的解放軍軍事研究與發展計畫。⁵

中共前駐印度大使程瑞聲也指出，中共推動對外軍事交流，大致上有五項作用：1. 透過軍事交流，維護周邊和平與安定；2. 藉由軍事交流促進國際的軍事政治形勢、軍事經濟情勢、軍事戰略形勢朝向有利中共的方向發展，改善其所處國際環境；3. 擴大對外軍事交流，吸收國外的戰爭經驗和軍隊建設的經驗，引進國外先進的軍事技術和現代科技知識，藉以縮短與先進國家武器裝備之差距，並同友好國家建立穩定關係；4. 可以開拓國際市場，發展軍事貿易，促進中共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發展；5. 可以宣傳和闡明中共在重大軍事問題上的立場、觀點和主張，維護其所謂的國家尊嚴與利益，以提高在國際上的地位。⁶

另外，我國學者楊志恆歸納中共對外軍事交流的內容，指出中共軍事外交之目的有以下六項：1. 藉由軍事交流以獲取高科技；2. 封鎖台灣的軍事採購管道；3. 藉由軍事交流保障其能源獲得；4. 消弭周邊國家對於中共軍備發展的疑慮；5. 擴大中共在武器市場的佔有率；6. 提升中共的國際地位及影響力。⁷

綜合以上各學者及國防白皮書的說法，中共軍事外交的目的共有四項：配合國家經濟建設、促進軍隊現代化、消弭「中國威脅論」的疑慮及孤立台灣國際生存空間。

一、營造和平之國際環境，以利經濟建設

⁴ “2004年中國的國防”，新華網。

⁵ Kenneth W. Allen and Eric A. McVadon, *China's Foreign Military Relations* (Washington D.C.: The Henry L. Stimson Center, 1999), 8.

⁶ 程瑞聲，“論中國對亞太安全的新方針”，《國際問題研究》，第3期（1999年）：頁2。

⁷ 楊志恆，“中共近年對外軍事交流及其對我國國防安全之影響”，《國家安全學術研討會》，台北，1996年7月，頁13-14。

自從 1978 年十一屆三中全會鄧小平掌權以來，中共外交政策強調國家利益，外交任務以營造有利於經濟建設的和平國際環境為主，對外關係重視資金、技術的導入及經貿的推動。亦即後鄧小平時期的外交政策是以「實用主義」為主，不搞意識形態爭論，拋棄毛澤東時期「教條主義」。現今中共的國家戰略正趨向務實型或慎重型(Calculative)戰略發展，⁸中共的國家戰略具有高度的務實性，它是以市場領導的經濟成長和維持友善的國際政治關係為主之戰略觀。可見，後冷戰時期的中共國家戰略以經濟發展為中心，為持續經濟成長及改革，中共必須有一個穩定的周邊環境。⁹為了服務經濟發展的國家戰略目標，中共領導人開始提倡「新安全觀」，¹⁰並積極推動「大國外交戰略」及「睦鄰友好」外交政策，與世界各國保持友好的外交關係。

從 1996 年起中共先後與美國、俄羅斯、歐盟及周邊國家進行雙邊領袖會談，並建立起各種形式的「夥伴關係」(中共與各國建立夥伴、睦鄰關係的情形如表 4-1 所示)。

⁸ 西方學者將中共的國家戰略稱為「慎重型」的國家戰略。有關慎重型戰略的探討，可參閱 Michael D. Swaine and Ashley J. Tellis, *Interpreting China's Grand Strateg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Rand, 2000), 97-150.

⁹ Balbina Y. Hwang, "Resolving the North Korean Nuclear Issue," *Heritage Foundation*, May 8, 2003.

¹⁰ 「新安全觀」的意涵可參閱本論文第一章第五節。

表4-1 中共與各國建立夥伴、睦鄰關係的情形

國名	夥伴關係	建立日期
俄羅斯	面向 21 世紀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	1996.04
菲律賓	面向 21 世紀的睦鄰互信合作關係	1996.11
印度	面向未來的建設性合作夥伴關係	1996.11
法國	面向 21 世紀的全面夥伴關係	1997.05
美國	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	1997.10
加拿大	跨世紀的全面合作夥伴關係	1997.11
東協	睦鄰互信夥伴關係	1997.12
墨西哥	全面合作夥伴關係	1997.12
歐盟	面向 21 世紀長期穩定的建設性夥伴關係	1998.04
英國	面向 21 世紀的長期穩定的建設性夥伴關係	1998.10
南韓	面向 21 世紀的中韓合作夥伴關係	1998.11
日本	面向 21 世紀和平與發展的友好合作夥伴關係	1998.11
越南	面向 21 世紀之睦鄰友好合作關係	1999.02
蒙古	睦鄰互信夥伴關係	2003.06
南韓	全面合作夥伴關係	2003.07
東協	面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夥伴關係	2003.10
墨西哥	戰略夥伴關係	2003.12
波蘭	友好合作夥伴關係	2004.06
匈牙利	友好合作夥伴關係	2004.06
羅馬尼亞	全面友好合作夥伴關係	2004.06
烏茲別克	友好合作夥伴合作關係	2004.06
智利	全面合作夥伴關係	2004.11
阿根廷	全面合作夥伴關係	2004.11
祕魯	全面合作夥伴關係	2005.01
印度	面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合作夥伴關係	2005.04
孟加拉	全面合作夥伴關係	2005.04
斯里蘭卡	全面合作夥伴關係	2005.04
菲律賓	和平與發展的戰略性合作關係	2005.04
克羅地亞	全面合作夥伴關係	2005.05
哈薩克	戰略夥伴關係	2005.07

印尼	戰略夥伴關係	2005.04
加拿大	戰略夥伴關係	2005.09
西班牙	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2005.11
希臘	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2006.01

資料來源：林麗香，”中國，”張亞中主編，*國際關係與現勢*(台北：晶典文化出版社，2004年)，頁34；”2005年：中國睦鄰外交譜新篇，”*新華網*，2005年12月7日；”中國和希臘發表建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新華網*，2006年1月19日。

近年來中共在多邊及雙邊的國際場合不斷呼籲要樹立新安全觀，¹¹新安全觀已成為中共對外政策的組成部分。為了實踐「新安全觀」的思維，中共外交部門開始積極與周邊各國發展睦鄰友好合作關係，並與大國建立「夥伴關係」。由於軍事外交是中共總體外交重要組成部分，解放軍的角色是國家經濟發展之捍衛者和保護者。因此解放軍希望藉由對外軍事交流與合作的機會，實踐「新安全觀」理念，發展與世界各國之間友好關係，並且營造和平的周邊國際環境，以利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發展。

二、引進尖端科技武器，以強化國防現代化

中共軍隊建設自1978年12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確定開始軍隊現代化以來，經歷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期的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的國際情勢變化，加上1990年代期間「波斯灣戰爭」和「科索沃戰爭」的啟發，促使解放軍體驗到「科技強軍」之重要性。在1991年波斯灣戰爭中，美軍利用高科技武器和先進的戰略、戰術，在短時間內迫使伊拉克投降，並光復伊拉克占領的科威特，這使共軍更深刻瞭解其軍隊戰力與以美國為首之先進國家之間的差距。由於受到波斯灣戰爭高科技武器裝備之衝擊，軍事現代化再度被重視，以劉華清為首強調海空軍武器裝備現代化派勢力？頭。此後的幾年之中，中共即不斷地向俄羅斯採購蘇愷27戰機、蘇愷30戰機、現代級驅逐艦與基洛級潛艦等高新常規武器裝備，並爭取技術轉移，以提升本身的研發生產水平。

1999年科索沃戰事對中共形成另一個更大的衝擊，在純軍事層面的科索沃戰事中，北約聯軍僅以空中武力對南斯拉夫進行密集攻擊，而沒有派出地面部隊就使南斯拉夫做出重大政治讓步，這種以高科技武器裝備為基礎之不直接接觸作戰

¹¹ 中共在 2002 年 7 月的東協區域論壇外長會議中提交關於「新安全觀」之立場文件，全面有系統地闡述了中共在新世紀下的安全觀念和政策主張。有關此文件的全文可參閱”中國向東盟論壇提交新安全觀立場文件，”*人民日報*（北京），2002 年 8 月 2 日，版 3。

方式，令共軍深感震撼，尤其以美國為首的北約組織迴避聯合國，直接對南斯拉夫發動軍事攻擊，更使中共意識到未來有可能發生在中共的先發制人干預政策。

12

波斯灣戰爭及科索沃戰爭發生後，中共軍方體認到現代戰爭已趨向高科技條件下的局部戰爭，於是開始對現代戰爭特性進行研究。解放軍曾就「高科技條件下局部戰爭」的特性，描述如下：¹³

(一)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是一種動態的概念，因為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必須依賴軍事高技術，而軍事技術的發展是不斷變化的，新的軍事技術不斷被更新的技術所取代，使得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產生多樣化的情形，此即動態的概念所意指。

(二)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是以資訊(或稱資訊)技術為主要核心，包括資訊技術群、新材料技術群、新能源技術群、生物技術群、海洋技術群及航太技術群。

(三)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增大不確定和利用不確定性的手段。由於資訊時代戰爭的多樣化程度增高，寬廣資訊的範疇、加大對資訊的倚賴，也增加資訊戰的易毀性。

(四)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是不同類型戰爭的轉化與控制。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在空間範圍上可區分為：全球性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區域性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與地點性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這些劃分是絕對的，但在實踐的層次裡，每種類型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的區分是相對的、沒有明顯界線。亦即一場地點性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可以轉化為國際集團性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而典型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可以轉化為混合型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

(五)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是多面相戰爭，戰場朝向多元化發展，戰役與戰鬥是多元一體化的合同作戰。

(六)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之戰場空間擴大、打擊火力集中且精準、作戰持續時間短且戰鬥節奏快速。

(七)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改變了人民戰爭的形式。人民戰爭的核心思想是以民兵作為勝利之基礎，但由於客觀條件的變化，人民群眾參與和支援戰爭的形式，轉變為間接參戰，以經過訓練的後備力量作為正規軍的後續梯隊，由

¹²丁樹範，「1990年代以來的中國黨軍關係」，《中國大陸研究》，第46卷第2期(2003年4月)：頁70。

¹³整理自譚傳毅，「高技術條件下解放軍之作戰指導」，《跨世紀兩岸軍力發展與區域安全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高雄，1999年，頁6-9。

突出物質支援轉化為重視技術支援；在動員方面則突出快速反應、重視後備軍與常備軍的銜接、重視和平時期國防建設的威懾性及重視戰爭潛力的多點化建設。

(八)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之戰略指導是「戰威並重」。威懾是靜態的，它無法取代實戰，但是在實戰過程中所伴隨的威懾力效最高，因此威懾戰略的實現是建立在提高實戰能力的基礎之上，真正有效的威懾是靠實戰打出來。

(九)由於高技術兵器系統種類與技術愈來愈複雜，對於官兵之文化素質與專業化知識的要求，也相對提高。

為了應付未來戰爭，解放軍認知到國防政策和軍隊建設必需置於「打贏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的基點上，因而訂定「科技強軍」和走「精兵之路」之軍隊建設方針，並積極進行提高軍費、引進國防科技、加速共軍武器裝備現代化，以提升在高科技下現代戰爭中的作戰能力。在最近十年中，中共從俄羅斯、烏克蘭、以色列及歐洲國家引進大量武器裝備和技術，其中俄羅斯為中共武器裝備的最大進口國。中共先後引進俄羅斯蘇愷27戰機、蘇愷30戰機、基洛級潛艦，裝備「日炙」反艦飛彈的現代級驅逐艦、S-300地對空飛彈、AA-12視距外中程空對空飛彈、空中預警飛機，以及IL-76大型空中運輸機等，這些武器的提供對中共國防軍事實力之提升有相當大助益。

三、消除「中國威脅論」之疑慮，以扮演亞太軍事霸權角色

自1978年中共推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綜合國力明顯大增，不但保持軍事、政治強國地位，並由於經濟改革取得明顯成就，亦擠身經濟強國之林。軍事、政治與經濟實力的成長使得「中國威脅論(China Threat)」興起。¹⁴

改革開放20多年來，中共經濟獲得前所未有的快速發展，經濟年平均增長超過9.6%，2005年時中共GDP總量已躍居世界第四，人均GDP達到1700美元，財政收入超過3萬億元，¹⁵經濟實力與綜合國力大大增強。中共豐富的勞動力、廉價的土地成本、巨大的潛在市場以及迅速增加的高科技人才，吸引世界各國不斷增加在中共的直接投資，跨國公司與海外企業將生產基地轉向中共，使中共成為全球發展中國家資本輸入最多之地區。截至2005年5月底，至中共投資的國家和地

¹⁴ 「中國威脅論」的論調大致是於1992年美國撤出菲律賓軍事基地開始形成。當時美國「外交政策研究院」亞洲部主任穆諾(Ross H. Munro)指出，中共近年來積極由俄羅斯獲得武器，此舉動將大幅提升中共干預領土外的軍事能力，並言及蘇聯的解體與美軍撤出蘇比克灣及克拉克空軍基地所造成的真空狀態，實提供中共加強在亞太地位的好時機。Ross H. Munro, "Awakening Dragon: The Real Danger in Asia is From China," *Policy Review*, No.62(Fall 1992):10-16.

¹⁵ 鄧謹，「中國發展戰略正式轉型，」《南方周末》2006年3月9日。

區超過190個，全球最大500家跨國公司中已有超過400家在中共投資，其中30多家設立地區總部，外商投資設立的研發機構超過600家。¹⁶

外商在中共的製造基地與研發中心不斷增加，也帶動中共航運、物流等服務業之發展，中共作為世界航運中心、物流中心與採購中心正在形成。尤其是中共港口集裝箱的吞吐量迅速增長，2002年中共港口集裝箱總量為3700萬標準箱，2003年達到4800萬標準箱，超過美國，躍居世界第一。而上海港在2005年完成貨物吞吐量有望達到4.6億噸，超過新加坡港，躍居世界第一。¹⁷

另外，中共科技發展也日新月異，不斷有重大科技成果的出現。特別是中共神舟五號的成功升空與回收，成為全球第三個有此能力的國家，標誌著中共科技進入一個新的程度。同時，中共在資訊產業技術領域的迅速發展與重大突破，也正在改變著中共在世界高科技產業領域中的地位。

在軍事方面，國防預算逐年增加。中共自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以來，國防建設始終是國家整體建設中重要的一環，隨著中共經濟每年持續的高成長(90年代以後，中共GNP平均每年大約成長9.8%)，國防預算也跟著水漲船高，從1991年中共國防支出330.31億人民幣，到2000年為1207.54億人民幣，十年來中共國防支出已增加將近四倍(詳細資料可參閱表2-1)。2001、2002、2003、2004、2005年國防預算繼續逐年上升，分別為1442.04、1707.78、1907.87、2117.01、2446.56億人民幣。

但是中共所對外公佈之國防預算，僅為其「國防支出類」預算之一部分，另有許多支出諸如「國防科研事業費」、「民兵建設費」等均隱藏於非軍事部門項目下。依據國際間評估，中共所公佈的國防預算數字，與實際情況實有差別，實際支出的國防費用，為其對外公佈之二到八倍。¹⁸

另在軍購方面，中共大舉向俄羅斯採購先進精密武器亦不容忽視。中共採購現代級驅逐艦已交艦，所配備的超音速「日炙型」反艦飛彈，專門對付美國航空母艦與神盾級驅逐艦，目的在威嚇美國太平洋艦隊介入台海衝突；此外尚購買先進的基洛級攻擊潛艦、蘇愷30攻擊機、米格31戰機、空中預警機、T-80戰車及先進防空飛彈、火箭引擎等等，中共積極擴充軍備不僅造成鄰國緊張，亦已引

¹⁶ “商務部投資促進事務局副局長顧傑在第九屆中國國際投資貿易洽談會香港推介會上的講話，”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經濟部貿易處網站，2005年6月29日。

¹⁷ “我國港口集裝箱吞吐量有望穩居世界第一，”新華網，2005年12月6日。

¹⁸ 由美國國防部《2005年中共軍力報告書》、日本《2005年防衛白皮書》、英國國際戰略研究所《2005~2006年全球軍力平衡報告》及華府智庫哈德遜研究所《中國的新大躍進？未來半世紀的高科技和軍事強權》研究報告可得知，中共實際的軍事經費應是所公布數字的2-8倍。有關相關中共國防預算的資訊可參閱網站 www.loveunix.net/viewarticle.php?id=48375-109k；http://jda-clearing.jda.go.jp/hakusho_data/2005/2005/index.html；www.routledge.com；http://www.hudson.org/files/publications/China_Great_Leap_Forward.pdf

起國際社會廣大的關注。

隨著中共經濟的快速發展，以及隨之而來的整體綜合國力的提昇，中共已成為新的強權。加上中共被視為是最有可能填補亞太地區權力空間的國家，將成為「新興的強權」，並對亞太地區造成威脅，因此有「中國威脅論」的說法。1996年8月，中共解放軍總參謀長傅全有訪問菲律賓時指出，現在西方某些國家大肆鼓吹「中國威脅論」是毫無根據和別有用心的，其目的是挑撥中共與周邊國家的關係，遏制中共的發展。¹⁹因此解放軍為了消除各國對「中國威脅論」的疑慮，軍事高層將領積極出訪周邊國家，並共同舉行軍事演習，期望與周邊國家建立睦鄰友好的關係，進而提升在亞太地區的地位及重要性。

四、切斷對台軍售管道，以孤立台灣國際活動空間

中共對台政策從1949年「武力解放台灣」及1955年「和平解放台灣」，一直到1983年「一國兩制」，²⁰台灣除了面臨中共之和平統戰攻勢外，最直接的壓力是來自於中共在國際社會的外交孤立及軍事威脅。

(一) 孤立台灣外交空間

以軍售方式孤立台灣的作法主要是阻止世界各國出售武器給台灣，切斷台灣對外軍購的管道。在中共國務院所發表的《一個中國的原則與台灣問題》中提到，「與中國建交的國家不能向台灣出售武器，或與台灣進行任何形式的軍事結盟。凡是與中國建交的國家，都應本著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干涉內政的原則，不以任何形式或藉口向台灣出售武器，或幫助台灣生產武器。」²¹另外，在2004年公佈的《2004年中國的國防》白皮書也指出，「中國人民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台獨』分裂活動，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外來干涉，堅決反對任何國家向台灣出售武器或與台灣進行任何形式的軍事結盟，決不允許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把台

¹⁹ 文匯報(北京)，1996年8月3日，版2。

²⁰ 1983年6月26日，鄧小平在接見美國紐澤西州西東大學楊力宇教授時，提出中國大陸與台灣和平統一的六點設想，一般稱為「鄧六條」。內容如下：(一)台灣問題的核心是祖國統一。和平統一已成為國共兩黨的共同語言。(二)制度可以不同，但在國際上代表中國的，只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三)不贊成台灣「完全自治」的提法，「完全自治」就是「兩個中國」，而不是一個中國。自治不能沒有限度，不能損害統一的國家的利益。(四)祖國統一後，台灣特別行政區可以實行同大陸不同的制度，可以有其他省、市、自治區所沒有，而為自己獨有的某些權力。司法獨立，終審權不須到北京。台灣還可以有自己的軍隊，只是不能構成對大陸的威脅。大陸不派人駐臺，不僅軍隊不去，行政人員也不去。台灣的黨、政、軍等系統都由台灣自己來管。中央政府還要給台灣留出名額。(五)和平統一不是大陸把台灣吃掉，當然也不能是台灣把大陸吃掉，所謂「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不現實。(六)要實現統一，就要有個適當方式。建議舉行兩黨平等會談，實行國共第三次合作，而不提中央與地方談判。雙方達成協定後可以正式宣佈，但萬萬不可讓外國插手，那樣只能意味著中國還未獨立，後患無窮。郭立民編，中共對台選輯1949-1991(台北：永業出版社，1992年)，頁535-537。

²¹ “一個中國的原則與台灣問題”，陸委會網站，2000年2月。

灣從中國分割出去。」²²由這二份檔案的內容可以得知，中共堅決反對國際間任何國家與台灣形成軍事結盟或對台軍售。

美法兩國是台灣整建二代兵力的主要合作國家，美國在傳統上就是台灣軍購的主要提供國，而法國是在 1989 年天安門事件後，密特朗(Francois Mitterrand) 總統批准軍售台灣 16 艘拉法葉級戰艦和 60 架幻象 2000 戰機，而成為台灣引進高科技軍備的重要國家。在法國軍售台灣船艦與戰機後，中共採取強烈的報復行動，除了宣佈關閉法國駐廣州總領事館，並嚴格控制兩國副部長以上人員的往來外，在經貿方面，中共更宣佈撤銷部分擬議中與法國的大型合作項目，如廣州地鐵、大亞灣核電站二期工程、購買法國小麥等，同時表示不再與法國商談新的重大經貿合作項目。²³

中法關係自此惡化，一直至 1994 年初法國與中共簽訂《一一二聯合公報》，聲明不再賣武器給台灣，中法關係才恢復正常。雖然後來法國有意出售台灣西北風飛彈，但由於中共總參謀長傅全有曾為此軍購案赴法國抗議，因此此項軍售後來就無疾而終。²⁴

在美國軍售台灣武器方面，由於美國是長期以來出售武器給台灣的國家，美國成為台灣軍購的主要來源國，因此阻止美國對台軍售成為中共重要之策略。在中共外交的施壓下，美國和中共共同簽署《八一七公報》，美國政府承諾「不謀求執行對台售武器之長期政策，對台灣武器銷售在質或量上均不會超過美『中』兩國建立外交關係後近年來（美對台灣）所提供之水準，美國意圖逐漸減少對台灣之武器銷售，經由一段時間而趨於最終解決。」²⁵此外，中共認為美國對台軍售會提昇台灣的軍力，使台灣更不願與中共統一，且對台軍售是對中國內政的干涉。²⁶為了 1992 年美國軍售 150 架 F16 戰鬥機給台灣，中共對美國採取「懲罰性的經濟報復」政策，取消原有購買美國飛機的訂單而轉向空中巴士。1996 年 4 月，中共就向法國購買 30 架 A320 以及 3 架 A340 空中巴士飛機，金額約 12 億美金左右。這個舉動無疑展現出中共對美國企圖「干涉內政」的一項報復措施。

²⁷

1998 年 7 月 28 日美國國防部宣佈四筆對台軍售計劃，包括 200 枚 F16 戰機使用的先進中程空對空飛彈（AMRAAM）71 枚魚叉飛彈、146 門 155 自走砲、

²² 《2004 年中國的國防》。

²³ 錢其琛，外交十記（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 年），頁 291-299。

²⁴ “中法軍售充漢變數，”《中國時報》，1997 年 1 月 6 日，版 4。

²⁵ “八一七公報，”陸委會網站。

²⁶ 郝雨凡，”台灣問題：潛在的定時炸，”郝雨凡、張燕冬主編，*限制性接觸：布希政府對華政策走向*（北京：新華出版社，2001 年），頁 187。

²⁷ 葉斯偉、吳佳玲，”由空中巴士看歐洲整合，”*認識歐洲*，第 5 期（2000 年 8 月）。

高性能保密通信系統等。隨後於 8 月 2 日，中共外交部副部長楊潔篪召見美國駐華大使館代表時就強調，「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這是國際社會，包括美國政府在內公認的事實。美國政府在《八一七公報》中明確承諾：不尋求執行一項長期向台灣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灣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數量上將不超過中美建交後近幾年供應的水平，它準備逐步減少對台灣的武器出售，並經過一段時間導致最後的解決。然而，美方現在卻決定向台灣出售上述大量先進武器和裝備，這與美方的上述承諾和國際關係的基本準則完全背道而馳。這種背信棄義的做法不僅遭到中國人民的強烈反對，也將遭到全世界主持正義國家和人民的譴責。」²⁸

解放軍在對外軍事交流與合作時，也嚴守「反對軍售台灣」的立場。中共軍委副主席、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曹剛川 2003 年 10 月 28 日在美國五角大廈，和美國國防部長倫斯斐(Donald H. Rumsfeld)舉行會談時指出，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問題，希望美方恪守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和反對台獨的承諾，妥善處理台灣問題，包括美對台軍售問題，特別是不要向台灣出售先進武器，不與台灣開展軍事交流與合作。²⁹事實上，對於任何與台灣發展軍售關係的事項，中共都會採取強烈的抗議與報復手段，現今解放軍藉著對外軍事交流與合作的機會，更將台灣的軍售管道切斷，利用軍事外交手段孤立台灣，儼然已成為解放軍重要的對外政策目標之一。

(二)造成兩岸軍事失衡

近年來，中共國防武器採購的比重已從過去陸軍轉變為海、空軍，在對外軍購種類方面，中共海軍軍購明顯將重點置在擴增大型艦艇、補給艦與兩棲登陸艦；而空軍採購則置重點於全天候戰鬥機、預警機、空中加油機及新式空對空、導彈等武器。這些新式武器促使解放軍的作戰範圍擴大，並對台海安全構成威脅。

以海軍的現代級驅逐艦為例，該艦標準排水量 7070 噸，最高航速 32 節，以 12 節速度航行續航力達 7000 海浬，所配備之 SS-N-22 日炙超音速反艦飛彈，速度達 2.5 馬赫，可進行超低空掠海飛行，兩分鐘內射程達 90 公里，可在神盾級等防禦系統尚未完成探測、跟蹤、鎖定、判斷、發射等程式以前，即以高速突破目標艦防禦區，幾乎無法予以有效攔截，對大型水面艦艇將形成嚴重威脅，西方國家評估該級艦艇之戰力可媲美一艘配有神盾系統之史普魯恩斯級 (Spruance-Class)

²⁸ “就美國政府宣佈將向台出售大量先進武器裝備，我政府向美方提出強烈抗議，”新華網，1998 年 8 月 2 日。

²⁹ “曹剛川希望美勿軍售台灣先進武器 未獲美國回應，”東森新聞報，2003 年 10 月 30。

與日本的金剛級（Kongou-Class）驅逐艦，實力不容忽視。³⁰

又以空軍蘇愷 30 戰機為例，中共向俄羅斯購買的蘇愷 30 戰機為一多功能、全天候戰鬥轟炸機。1 架蘇愷 30 型戰機可以同時指揮 4 架同型飛機或蘇愷 27 系列戰機作戰，藉由資料連接(Datalink)可將相關資料傳給其他僚機。高級頭盔式瞄準系統及引擎間配有後視雷達，使飛行員可由目視方式對機載導彈發出攻擊指令，包括來自機後之飛彈攻擊。機艙的前方安裝功率更大的紅外線搜尋與追蹤系統以及大功率脈衝都卜勒雷達和光電雷達。當敵方的空對空導彈來襲時，機背上安裝的紅外線導彈警告掃瞄儀可向飛行員發出警告，並同時能以導彈攔擊敵方的導彈及飛機。在攻擊空中目標時，蘇愷 30 可以動用 R27 和 R73 空對空導彈，前者為超視距攻擊時使用，其具有高機動性，可有效地攔截大規模的空中來襲目標。後者則為近距離目標攻擊時使用，機上還可配備俄羅斯最先進的 R77 主動雷達導彈。整體而言，蘇愷 30 型戰機優越性主要表現在三方面：超低空持續自動飛行能力、鈦合金裝甲防護能力及隱形性能上。³¹若與美軍戰機相比擬，這種戰機與美國 F-22 戰機性能差不多，亦即蘇愷 30 戰機的性能將超越我國現有的 F16 戰機，將對台海軍事平衡產生重大的衝擊。

第二節 軍事外交的類型

軍事外交係服從和服務於國家總體外交，與其發展軌跡一致，隨著其綜合國力的不斷增強及國際地位的提高，中共的軍事交往開始向縱深方向發展，交往的領域更加寬廣，內容更加豐富；另一方面，軍事高層往來、外國軍事首長來訪以及參加多邊軍事外交活動與日俱增。為了實現服從外交戰略佈局與服務國防現代化建設，從 1990 年代起解放軍的軍事交流共採取五種類型：增進友誼與宣揚國威之交流、軍事科技交流、銷售與軍事協助計劃、軍事演習的參加及聯合國維和任務的參與。

一、增進友誼與宣揚國威之交流

基本上，這類軍事外交活動是中共以禮儀性的方式，突顯出軍事的特色，並以軍威展現國威。活動方式主要有軍事人員的訪問、軍艦訪問、參加國際軍事學術會議與參訪、軍隊文藝團體的訪問表演等等，其中以軍事高層人員的訪問及軍艦訪問最具代表性。

³⁰ 民進黨，“中共軍力報告”，《東森新聞報》，2003 年 12 月 20 日。

³¹ 有關蘇愷 30 戰機的介紹是整理自鄭大誠，“論中共新購之蘇愷 30 型戰機”，《空軍學術月刊》，第 533 期(2001 年 4 月)。

(一)軍事人員的訪問

軍事人員的交流可分為二類，一為軍事高層人員的交流，另一為軍事專業人員的交流。根據歷年來中共國防部外事辦公室所發佈的訊息，在軍事高層交流方面，計有國防部高階長官及中央軍委委員等 50 餘位軍事首長，先後率 40 餘團赴美、俄、英、法、德、日、韓等 90 餘國，進行軍事訪問。有關近年來的軍事高層人員出國訪問情形可以表 4-2 來表示。

表 4-2 近年來中共軍事高層人員出國訪問情形

時間	軍事交流情形
2000 年 1 月	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遲浩田上將率團訪俄。
2000 年 4 月	應日本參聯會主席邀請，中央軍委委員、總參謀長傅全有上將對日本進行正式友好訪問。
2000 年 4 月	中央軍委委員、常務副總參謀長郭伯雄上將訪問阿根廷、巴西、智利等國。
2000 年 6 月	中央軍委委員、總裝備部部長曹剛川上將訪問以色列。
2000 年 10 月	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遲浩田上將率領的高級軍事代表團訪問北韓，參加北韓舉行的紀念中共人民志願軍入朝參戰 50 週年紀念活動。
2000 年 10 月	中央軍委委員、總政治部主任於永波上將應邀對美國進行友好訪問。
2000 年 11 月	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遲浩田上將訪問阿爾及利亞、突尼斯、摩洛哥 3 國。
2001 年 1 月	中央軍委委員、總參謀長傅全有上將對希臘進行正式友好訪問，這是中共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第一次訪問希臘。
2001 年 2 月	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遲浩田上將訪問老撾、越南、柬埔寨和尼泊爾 4 國，與 4 國國家和軍隊領導人就雙邊關係、國際和地區形勢、兩軍交往與合作等問題深入交換意見，達成廣泛共識。
2001 年 2 月	中央軍委副主席張萬年上將對俄羅斯進行訪問。訪問期間，俄羅斯總統普丁(Vladimir Putin)、總理及國防部長分別會見張萬年副主席，就進一步發展兩國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和雙方感興趣的問題交換意見，並達成廣泛共識。

2001年3月	中央軍委副主席張萬年上將對澳大利亞和新西蘭進行正式友好訪問，此次訪問推動和發展中共與南太平洋地區兩個重要國家的關係。
2001年4月	中央軍委委員、總參謀長傅全有上將訪問巴基斯坦，拜會巴基斯坦總統穆夏拉夫(Pervez Musharraf)，就雙方關心的問題深入交換意見，加深兩國傳統友好關係。
2001年5月	中央軍委委員、總後勤部部長王克上將對德國、英國進行友好訪問。
2001年8月	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遲浩田上將應邀對哥倫比亞、委內瑞拉以及特立尼達和多巴哥3國進行友好訪問，這是中共國防部長第一次對上述3國進行訪問。
2001年9月	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遲浩田上將訪問象牙海岸、尼日利亞。
2001年10月	俄羅斯參謀長應邀訪中，中央軍委副主席張萬年上將會見他。中俄雙方高度評價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與俄羅斯總統普丁簽署之《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稱其為兩國關係長期穩定發展奠定牢固的法律基礎，是兩國關係發展史上的又一重要里程碑。
2001年12月	中央軍委委員、常務副總參謀長郭伯雄上將率團訪問西班牙和葡萄牙。
2002年6月	中央軍委委員、總裝備部部長曹剛川上將訪問義大利、法國等國。
2003年10月	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曹剛川率團訪美。這是七年來中共國防部長首次訪美，標誌著自中美撞機事件以來，中美軍隊高層交往得到恢復和發展，兩軍建設性合作關係得到進一步加強。
2003年12月	曹剛川率團訪俄，促進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深入發展，中俄兩軍高層交往和戰略合作得到新的加強。
2004年3月	中央軍委副主席、國防部長曹剛川訪問巴基斯坦、印度、泰國、法國、比利時、瑞士、巴西等國。
2004年4月	中央軍委副主席徐才厚訪問古巴、墨西哥。
2004年5月	中央軍委委員、總參謀長梁光烈訪問俄羅斯、法國、英國、美國、澳大利亞等國。
2004年7月	中央軍委副主席郭伯雄訪問俄羅斯、埃及、南非，與俄羅斯簽署

	《關於中俄兩國舉行聯合軍事演習的備忘錄》。
2005 年 1 月	俄羅斯陸軍總參謀部將官代表團飛抵達北京，協調 2005 年 8 月在中共境內舉行的中俄「和平使命 2005」聯合軍事演習計劃。
2005 年 4 月	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熊光楷上將與美國國防部副部長費斯 (Douglas Feith)，在華盛頓舉行中美第七次防務磋商。
2005 年 10 月	擔任美國國防部長 5 年的倫斯斐首次到中共進行友好訪問。

資料來源：“中國軍事外交步入新階段，”*解放軍報*，2002 年 9 月 23 日；“2003 中國軍事外交：聯合軍演受注目 參與維和加力，”*解放軍報*，2003 年 12 月 29 日；“2004 年中國軍事外交更加活躍務實，”*解放軍報*，2004 年 12 月 20 日；“2005 年中國軍事外交新思維，”*青年參考報*，2005 年 5 月 25 日。

在軍事專業人員交流部分，軍事科學院等科研機構與國外軍事科研機構進行廣泛的學術交流活動。人民解放軍擴大派出和接受軍事留學生的規模，近年來向 20 多個國家派出軍事留學生 1000 餘名，19 所軍事院校分別與美國、俄羅斯等 25 個國家的相應院校建立校際對口交流關係。兩年來，91 個國家的 1245 名軍事人員到中共軍事院校學習，其中有 44 國軍官參加國防大學第五、第六期國際問題研討班。³²尤其在 2004 年，中共軍隊向俄羅斯、英國、法國、德國等國家派出數百名軍事留學生，派遣國家增加到 25 個。國防大學戰略班、院校長班，南京和西安政治學院、空軍指揮學院軍政指導班等近 600 人，陸續到澳大利亞、埃及、法國、日本、巴基斯坦、韓國、土耳其、英國、美國等國參觀考察。引人注目的是，近百名師旅主官分 4 批先後對 8 個國家進行考察訪問，這是中共軍隊第一次大規模組織中級軍官走出國門、開闊眼界。³³

(二)軍艦的出訪

軍艦外交是國際軍事交流重要模式，美英等西方強國藉軍艦出訪展示國力已有悠久歷史，中共近年也積極透過軍艦互訪強化軍事外交，並展現共軍現代化成果，同時達到控制海洋、嚇阻他國和維護海洋權益的目的。中共解放軍近年來積極鼓吹「走出國門，重視國家領域外的利益」觀念，解放軍將領形容，「軍艦是流動的國土，水兵是特殊的外交官」，而海軍軍艦出訪，是一種具有軍事外交性質的國家行為，是和平時期執行國家外交政策的一種特殊形式，也是提高國際

³² “2004 年中國的國防，”*中國聯通網*，2004 年 12 月 27 日。

³³ “樹大國形象 2004 年中國軍事外交更趨務實，”*新華網*，2004 年 12 月 19 日。

地位、顯示國威軍威、促進海軍現代化的重要途徑。³⁴此外軍艦外訪亦具熟悉外軍事務與統戰功能，對發展海洋戰略助益甚大。

改革開放 20 年來，中共共有 21 支海軍艦艇編隊，分別訪問巴基斯坦、斯里蘭卡、孟加拉、美國、泰國、印度、俄羅斯、印尼、朝鮮、馬來西亞、墨西哥、秘魯、智利、菲律賓、新西蘭、澳大利亞、坦桑尼亞、南非、德國、英國、法國、義大利、越南和加拿大等 20 多個國家。總計自 1985 年首次組織艦船外訪後，共訪問近 40 個國家（地區）。有關中共海軍軍艦外訪的情形可以表 4-3 來表示。

表 4-3 中共海軍軍艦外訪的情形

時間	軍事交流情形
1985 年 11 月	東海艦隊司令員聶奎聚中將，率領海軍 132 號導彈驅逐艦和 X615 綜合遠洋補給船，組成特混編隊，從上海吳淞碼頭啟航，出訪南亞三國，揭開中共海軍艦艇編隊出國訪問的序幕。
1989 年 3 月	鄭和艦在北海艦隊司令員馬辛春中將的率領下，單艦橫渡太平洋，首次對美國進行友好訪問。
1997 年 2 月	由 112、116 導彈驅逐艦、南運 953 補給船及 800 名官兵組成的中共海軍艦艇編隊，在南海艦隊司令員王永國中將的率領下，於 1997 年 2 月 20 日啟航，跨越太平洋，掠過夏威夷，首次抵達美國本土聖疊哥港，隨後，中共軍艦沿太平洋東岸南下，繼續對美國、墨西哥、秘魯、智利的訪問。
1998 年 4 月	由 113 號導彈驅逐艦、世昌號綜合訓練艦和南倉號綜合補給艦組成的中共海軍艦艇編隊，穿越太平洋 11 個海區、6 個海峽後，對新西蘭、澳大利亞兩國第一次訪問。
2000 年 7 月	由深圳號導彈驅逐艦、南倉號綜合補給艦組成的艦艇編隊，在南海艦隊參謀長黃江少將率領下，首次橫渡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成功地實現對馬來西亞、坦桑尼亞、南非的友好訪問。這是中共海軍艦艇編隊首次訪問非洲大陸。
2000 年 8 月	由青島號導彈驅逐艦、太倉號綜合補給艦組成的艦艇編隊，在海軍北海艦隊參謀長呂秋芳少將的率領下，對美、加兩國三港進行友好訪問。這是中共艦艇編隊對美國的第 3 次訪問，對加拿大的首次訪問。

³⁴ 吳明傑，「軍艦外交 國力展示」，《中國時報》，2005 年 2 月 21 日。

2001 年 8 月	由東海艦隊參謀長吳福春少將率領的深圳號導彈驅逐艦、豐倉號遠洋綜合補給艦組成的艦艇編隊，圓滿完成了首次出訪德國、英國、法國和義大利的任務，創造一次出訪航經的大洋、海峽和沿岸國家最多的紀錄。
2001 年 9 月	由宜昌號新型導彈護衛艦和太倉號綜合補給艦組成的艦艇編隊，再次訪問澳大利亞和新西蘭。
2002 年 5 月	由青島號導彈驅逐艦和太倉號遠洋綜合補給艦組成的中共海軍艦艇編隊從青島啟航，開始中共海軍歷史上首次環球遠航。編隊橫跨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訪問新加坡、埃及、土耳其、烏克蘭、希臘、葡萄牙、巴西、厄瓜多爾、秘魯等國家，歷時 4 個多月，總航程 30000 多海裏。這是中共海軍史上出訪國家最多、時間最長、航程最遠、影響最大的一次軍事外交活動。
2003 年 10 月	應美國海軍的邀請，由深圳號導彈驅逐艦和青海湖號綜合補給艦組成的中共人民解放軍海軍艦艇編隊，對美國在太平洋的軍事基地關島進行為期 4 天的訪問。
2005 年 11 月	11 月 8 日由深圳號導彈驅逐艦、微山湖號遠洋綜合補給艦組成的海軍艦艇編隊，出訪巴基斯坦、印度和泰國。

資料來源：整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1998 年中國國防白皮書北京：國務院新聞辦，1998 年 7 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2000 年中國國防白皮書（北京：國務院新聞辦，2000 年 10 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2002 年中國國防白皮書（北京：國務院新聞辦，2002 年 12 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2004 年中國國防白皮書（北京：國務院新聞辦，2004 年 12 月）及國防部外事辦公室發佈的資料。

二、軍事科技交流

軍事科技交流是中共從先進國家獲得高科技，推進國防現代化建設的主要管道。由於西方國家在 1989 年六四事件後，開始對大陸實施武器禁運，中共解放軍從 1990 年代起就大規模向俄羅斯引進武器，尤其在 1996 年台海局勢趨於緊張後，中共對外軍購金額迅速增加，2000 年到 2004 年五年間，中共對外軍購提升到 200 億美元、約合台幣 6600 億。³⁵一般而言，中共主要的武器進口國為俄羅斯、以色列、烏克蘭、歐盟等國家。

³⁵ “大陸近五年軍購約 6600 億台幣，”中廣新聞網，2004 年 6 月 3 日。

(一)俄羅斯

1989 年天安門事件後，美國宣佈暫停對中共軍售，中共旋即轉向俄羅斯尋求援助。而俄羅斯為解決國內的經濟問題，也極力推銷其國防武器，欲藉由外銷國防武器，來賺取外匯及創造就業機會。中共軍委會副主席劉華清於 1990 年訪問俄羅斯，討論購買米格 29 及蘇愷 27，雙方於 1991 年 3 月達成交易，中共花費 10 億美元以上購買 26 架蘇愷 27 及相關武器、飛彈、後勤與飛行員的訓練。此後，中共與俄羅斯的軍事關係即日趨緊密，中共分別於 1992 年及 1994 年向俄羅斯購買蘇愷 27 戰機及基洛級潛艇。這兩筆交易大部份是以貨易貨方式進行，中共以成衣、運動鞋及涼鞋等輕工業民生用品抵付。這種交易模式的特點是：中共以輕工業產品交換俄羅斯武器與國防科技，此一方式反應出兩國的實力，中共需要國防現代化，與俄羅斯國防軍工體系的出口唯一導向，為兩國軍事合作基礎。³⁶

自 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俄羅斯向中共提供各種類型的軍用飛機、潛艇以及驅逐艦、直升機等。此外，俄羅斯還向中共提供生產軍用飛機、步兵武器和其他軍用產品的許可證。自 1993 年 11 月 11 日中俄簽訂兩國國防部軍事合作協定以來，中俄軍事夥伴關係穩定發展，而軍事技術合作為主要合作形式之一。近年來，雙方軍事交流規模最大的是 1995 年 12 月由劉華清率領中共國防、經濟及外交官員，到莫斯科進行兩國冷戰結束以來最大規模的軍事採購及技術合作交流。1996 年 4 月，葉爾欽(Boris Yeltsin)與江澤民在北京簽署中俄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紀的「戰略性協作夥伴關係」聲明，等於將冷戰結束以來雙方軍事交流成果作總結。

中共已經成為俄羅斯的第一大武器購買國，僅 2004 年中共從俄羅斯購買的武器總額就高達 20 億美元，而且自 2000 年至 2003 年，俄羅斯向中共出售價值 50 億美元的武器。整體來看，中共向俄羅斯軍購主要集中於空軍與海軍武器(參閱表 4-4)，例如 2004 年，中共就向俄羅斯洽購 8 艘基洛級潛艇、2 艘現代級導彈驅逐艦、一批 S300 型防空導彈，以及數十架蘇愷 30 戰機，總造價超過 40 億美元。³⁷以引進的技術而言，最引人注意的是引進蘇愷 27 的製造技術。在俄羅斯政府授權下，中共將製造二百架的蘇愷 27 戰機，並以其做為中共空軍未來的主力作戰機種，經授權製造的戰機已經從瀋陽飛彈公司陸續出廠。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已經從俄羅斯購得蘇愷 30 戰機，其將比照蘇愷 27 戰機交易的先例，由俄羅斯提供許可，中共可自行製造蘇愷 30 戰機及其他先進的武器。³⁸

³⁶ 歐錫富，「中(共)俄軍工改革與軍事合作」，跨世紀兩岸軍力發展與區域安全學術研討會，高雄，1999 年 4 月，頁 16。

³⁷ 「大陸近五年軍購約 6600 億台幣」，*中廣新聞網*，2004 年 6 月 3 日。

³⁸ 丁樹範，「中共未來的軍備政策」，*遠景季刊*，第 2 卷第 2 期(2001 年 2 月)：頁 5。

表 4-4 後冷戰時期中共向俄羅斯購買武器系統一覽表(1991-2005)

採購日期	裝備
1991	購買 26 架蘇愷 27 戰機。
1992	購買 5 架伊爾-76 運輸機。
1993	購買米格 29 型戰機用的 RD-33 型引擎，並獲生產。
1994	購買 4 艘柴油動力的基洛級潛艇。
1994	簽定購買 6 套 S-300 防空飛彈系統(至少 100 枚飛彈)。
1994	簽署由俄羅斯「米高揚設計局」協助中共進行殲 7 和殲 8 型戰機為期 3 年的改良計劃。
1995	購買改良殲 8 型戰機的俄製米格 29 使用的多功能射控雷達。
1996	購買 72 架蘇愷 27 戰機。
1997	購買 4 架可攜帶核子彈頭的逆火式(TU22/24)戰略轟炸機，並與之簽訂「超 7」新型攻擊機聯合開發計劃。
1997	購買 2 艘現代級驅逐艦，裝備日炙二倍半音速飛彈。
1999	俄羅斯將在 2 年內向中共提供 96 架蘇愷 30 戰機，並負責培訓飛行員。
1999	俄羅斯同意出售先進攻擊飛彈，這些飛彈包含中程空對空飛彈 R-27ER、R-27ET、RVV-AE，以及中程和長程空對地飛彈 KH-29L/T、KH-31 和 KH-59M。
2000	中共國防部長曹剛川訪俄期間，中俄雙方達成協議，中共將在 2004 年購買價值高達 20 億美元的俄國軍事裝備和技術。
2001	俄方將向中共出售 S-300PMU 防空飛彈系統，中共亦向俄羅斯採購大批 Shmeli 火燄噴射器 120 公釐 Nona-SVX 多管火箭發射系統 BMP-3 裝甲運兵車，300 公釐龍捲風多管火箭發射器、152 公釐自動裝填迫擊炮，MSTA-S 情報偵蒐車、電子干擾體系、Ka-27 艦載直升機等。
2002	中共向俄羅斯購買高達 50 億美元的武器，這些武器包括 1 月簽署 2 艘現代級飛彈驅逐艦，售價約 14 億美元；4 月簽署 2 套 S-300F 地空導彈系統，金額 2 億美元；5 月簽署 8 艘基洛級潛艇，價值 16 億美元；8 月簽署 38 架蘇愷 30MK 戰機，金額約 15 億美元。
2003	中共向俄羅斯簽訂 24 架蘇愷 30MKK 型多用途戰鬥機的合同，價值 10 億美元。
2004	俄羅斯向中共交付 24 架蘇愷 30 型戰鬥機、1 艘基洛級柴油動力潛水

	艇、一批 S-300 型防空飛彈系統。
2005	中共向俄羅斯採購 30 架伊爾-76 型軍事運輸機以及一批伊爾-78 型空中加油機。

資料來源：整理自陳國志，「後冷戰時期中共軍事戰略之研究」，台灣師範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 年 6 月，頁 119-120；蘇武，「俄羅斯與中共現階段的軍事合作關係」，軍事焦點評論，2003 年 8 月 1 日；「俄羅斯對外武器出口創紀錄」，大紀元，2005 年 2 月 6 日；「中俄聯盟權益之計 夥伴關係難持久」，大紀元，2005 年 8 月 28 日。

(二)以色列

1970 至 1980 年代，美國為聯合共產中共對抗前蘇聯，鼓勵以色列軍售中共。主要項目包括：戰車武器、反裝甲飛彈、巡弋飛彈、電戰裝備及飛機設計等等。根據瑞典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院(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統計，1993 年至 2002 年，以色列軍售解放軍的額度達 1 億 6200 萬美元，僅次於俄羅斯位居中共外國軍火來源第二名。³⁹以色列幫助解放軍研發多種飛彈系統，如 YJ-12A 中程反艦飛彈、YJ-91 空射反輻射飛彈及 YJ-62 長程反艦飛彈，這些飛彈都是由以色列的 STAR-1 巡弋飛彈的技術沿改而來。以色列同時也將其巡弋飛彈及無人飛機的技術賣到中共，供其發展攻陸巡弋飛彈之用。另外，以色列也提供由美製的 AIM-9L 響尾蛇飛彈改良而來的蟒蛇三、四式短程空對空飛彈。

以色列是長期供應高科技軍事科技給中共的國家之一，以色列目前已成為軍售中共之第二大國，僅次於俄羅斯。以色列已協助中共自製 F10 型戰鬥機，該機主要依據以色列 Lavi 戰鬥機為原型，而 Lavi 計畫則是以美國 F16 為原型機。⁴⁰該型戰機可對抗西方現役戰機，並於 2004 年生產。由於以色列輸出至中共的軍事科技中有許多源自美國，已引起美國高度關切，2002 年以色列在美國壓力下取消軍售中共空中預警機案即為一例。根據 2003 年 12 月 15 日防衛新聞週刊(Defense News)報導，以色列國防部 2003 年底核准十幾家公司出售無人航空載具(UAV)，先進偵蒐系統、飛行員訓練系統及技術等給中共。2004 年 3 月，以色列和中共並洽商恢復國防合作事宜。⁴¹

(三)烏克蘭

³⁹ 陳漢華，「短期內中共科技在國防安全面向的趨勢評估」，外交部網站，2004 年 8 月 13 日。

⁴⁰ David Isenberg, "How Russia keeps China armed?," *Asia Time*, Nov 19, 2004.

⁴¹ 整理自陳漢華，「短期內中共科技在國防安全面向的趨勢評估」。

烏克蘭與中共的軍事技術合作非常穩定，同中共的軍火交易額最近幾年每年都在 7000 萬美元到 1 億美元之間。現今烏克蘭與中共正在積極加強軍事技術合作，中共已經成為烏克蘭軍火的第二大買主。⁴²

烏克蘭出售給中共的主要品項包括；先進液態燃料火箭、蘇愷系列戰機的空對空飛彈、除役航母及航母相關科技、協助研發中共 170 新型驅逐艦(中共版神盾艦)之艦載防空相位陣列雷達，以及引進船用蒸氣渦輪引擎，裝配在自製的旅海號驅逐艦上。此外，在 1999 至 2001 年期間，烏克蘭共向第三國出售約 20 枚 Kh-55 核能空中導彈和 Kh-55M 核能巡洋導彈，其中有 6 枚經由俄羅斯銷往伊朗，6 枚經由俄羅斯銷往中共。⁴³現今烏克蘭和俄羅斯是解放軍軍火銷售的競爭對手，解放軍近年來在太空及飛彈方面的技術也多由烏克蘭取得，烏克蘭並替中共訓練太空人。

(四)歐洲

歐洲個別國家對中共軍售包括：英國的微衛星技術(有助解放軍發展反制衛星能力)、航空發動機技術、用於搜尋水上目標的雷達；法國向中共出售了 AS - 365N 海豚 2 型直升機；義大利的攻擊直昇機技術；德國和法國的潛艦和水面艦引擎。另外，歐盟所屬歐洲太空總署(European Space Agency)最近邀請中共加入伽利略(Galileo)導航衛星計畫及未來之五年綜合性太空合作計畫，顯示出雙邊合作將日趨密切。⁴⁴

歐洲自 1989 年天安門事件後即對中共實施軍火禁運，2003 年底，德國總理施諾德及法國總統席哈克提出解除對中軍火禁運。2004 年 1 月歐盟外長高峰會以 14 對 1 票，否決終止對中共軍火禁運的提案。然而，歐洲國防及航太公司仍然積極遊說，希望近年內解除對中禁運。

四、銷售與軍事協助計劃

基本上，軍事交流與合作的目的是在於配合國家經濟建設、促進軍隊現代化、消弭「中國威脅論」疑慮及孤立台灣國際生存空間。然而，在所有軍事外交類型中，軍售議題卻常導致解放軍與外交系統間產生爭議的狀況。理論上，解放軍參謀部、總裝備部及國防科學技術工業委員會擁有軍售決策權，⁴⁵外交部對於軍售

⁴² “中國成為烏克蘭軍火第二大買主，”美國之音中文網，2005 年 1 月 1 日。

⁴³ “中國成為烏克蘭軍火大買主，”看中國網，2004 年 4 月 4 日。

⁴⁴ 陳漢華，”短期內中共科技在國防安全面向的趨勢評估”。

⁴⁵ 路易斯(John W. Lewis)等人在 1991 年的文章中指出，解放軍參謀部及國防科學技術工業委員會擁有軍售決策權，然而因 1997 年中共為了加強軍隊武器裝備建設的集中統一領導，合併原「國

政策並無決策權，但卻必須負責處理來自美國及其他國家對中共出售軍事武器的抗議，一旦外交部與軍方對軍售問題出現爭議時，依法國務院總理負責協調爭議，或交由外事領導小組討論，但因中共國務院總理在軍隊的地位不高，使得中央軍委會副主席成為仲裁者。例如，楊尚昆出任中共中央軍委會副主席時，只要他介入的軍售議題糾紛，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總是批准其決定。⁴⁶以 1990 年中共軍售沙烏地阿拉伯為例，中共外交部曾反對負責中共武器出口的保加利科技公司出售飛彈給沙烏地阿拉伯，甚至外交部一直不知道軍方欲出售的武器是可攜核子彈頭的飛彈。⁴⁷可見，在軍售議題層面，解放軍不惜冒著與外交系統衝突的可能，試圖掌控軍售政策的決定權，其主要的目的就是為了突顯組織的自主性及重要性。

解放軍為了鞏固與巴基斯坦、伊朗及緬甸等國的關係，近年來持續向巴基斯坦、伊朗及緬甸銷售武器裝備，項目包括：殲 8 型機、運 8 型機、直 9 型直升機、步兵戰鬥車、反坦克導彈、定位雷達、防彈衣、各型機零組件與各型槍枝、彈藥等等。

(一)軍售巴基斯坦並協助其發展國防工業

冷戰時期，印度與蘇聯交好，為了圍堵蘇聯勢力，美國是巴基斯坦軍事力量的主要後援之一。當時的中共，面對南方印度勢力的崛起，為了制衡，中共也成為巴基斯坦的重要後援。中共不只是提供飛彈技術給巴基斯坦，甚至出售飛彈，並協助巴基斯坦建造一座製造中程導彈的工廠。中共賣給巴基斯坦 30 枚可移動發射的 M11 型飛彈，而該座中程導彈製造工廠，則坐落於巴基斯坦拉瓦爾品第(Rawalpindi)附近。⁴⁸後來，在中共的協助下，巴基斯坦宣佈核試成功。

目前巴國已擁有中共製 M11 導彈，且中共也協助巴國研製、改良、生產飛機及導彈、核燃料生產技術。中共願意幫助巴國發展軍事力量，尤其是核武方面的發展。從軍事角度來看，中共很明顯是要平衡印巴兩國的

防科工委」及總參謀部、總後勤部等三大單位負責武器裝備研發與維修相關機構，成立「總裝備部」。總裝備部除了負責軍事科技論證，及軍事裝備的計劃、研發、試驗、購買、分配、運用、保管、維護及汰除等工作外，也負責監視和控管武器的購買及出口武器。故實質上，自 1997 年後，軍售權是由解放軍參謀部、總裝備部及國防科學技術工業委員共同擁有。John W. Lewis, Hua Di and Xue Litai. "Beijing's Defense Establishment: Solving the Arms -Export Enigm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5, No.4(Spring 1991):95-96.

⁴⁶ John W. Lewis, Hua Di and Xue Litai. "Beijing's Defense Establishment: Solving the Arms -Export Enigm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96.

⁴⁷ Samuel S. Kim, ed., *China and the World: Chinese Foreign relations in the Post Cold War Era*(Boulder. San Francisco. Oxford : Westview Press,1994), 51.

⁴⁸ “巴國發展核武 中共是藏鏡人，”*中國時報*，1998 年 5 月 30 日，版 7。

軍事力量，增加巴國與印度在邊界衝突的籌碼，以牽制印度對北部藏印邊境的騷擾。⁴⁹

(二)軍售伊朗

中共從 1980 年代即提供 M7、M9、M18 導彈給伊朗，而伊朗為了回報中共的友誼，也提供蘇聯的設備及技術，包括蘇愷 22、蘇愷 24、蘇愷 25 及米格 29 供中共「肢解」，以用來提升中共自製殲 7 戰機性能，中共因此項交換條件而同意將導彈技術給伊朗，並為伊朗建立一座核能發電站。1999 年上半年，中共繼續提供伊朗大量各種與飛彈有關器材和科技，伊朗利用這些援助繼續生產，並且達成其導彈自給自足目標。伊朗已能生產飛毛腿短彈道飛彈，並已展示夏辛三型飛彈的原型。⁵⁰

中共在 1980 年到 1988 年兩伊戰爭期間，開始提供伊朗彈道飛彈技術，但隨著伊朗發展核武計劃的曝光，美國開始高度關注伊朗的飛彈研發狀況。自 2001 年以來，美國已多次對中共武器輸出伊朗，而作出制裁。關於美國的制裁案相關情形可參閱表 4-5。

⁴⁹ 楊志恆，「中共軍事擴張戰略之探討」，《國策期刊》，1997 年 1 月 7 日。

⁵⁰ 整理自「中共自信 50 年內成為『中型』強權」，《聯合報》，2000 年 7 月 4 日，版 5。

表 4-5 近年中共武器技術輸出遭美制裁案

時間	制裁對象	原因
2001 年 6 月	永利化學技術進出口公司	向伊朗出售化武原料
2002 年 1 月	中國機械暨電子設備進出口公司、江蘇溧陽市化工廠	向伊朗出售生化武器技術及設備
2002 年 5 月	北方工業公司	向伊朗輸出飛彈元件
2002 年 7 月	中國機械設備進出口等八家公司	向伊朗及伊拉克輸出化學武器技術
2003 年 5 月	北方工業公司	向伊朗輸出飛彈技術
2004 年 9 月	新時代公司	向伊朗輸出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技術
2005 年 12 月	中國國家航空技術進出口總公司、中國北方工業公司、山東淄博化工設備有限公司、洪都航空工業集團 Ounion 國際經濟技術合作公司」，以及 Limmt 冶金礦產公司。	向伊朗出售飛彈及化學武器材料

資料來源：整理自李棠生，「中售伊朗飛彈技術美跳腳」，《蘋果日報》，2003 年 5 月 24 日；「六家中國公司涉嫌出售飛彈材料遭美國制裁」，《中央社》，2005 年 12 月 28 日。

(三)軍售及軍援緬甸

中共與緬甸的軍事合作以軍援方式居多。中共的考量是藉由軍、經援，換取緬甸同意中共在緬境使用軍事設施，作為中共從太平洋進入印度洋的戰略。1992 年至 1993 年，中共提供緬甸信號情報設施及海軍情報監控設施；1995 年中共提供緬甸海軍與空軍電戰裝備及陸軍的戰術雷達截取系統。另外，在人員代訓方面，1996 年 10 月緬甸「恢復法律與秩序全國委員會(State Law and Order Restoration Council)」主席貌艾(Maung Aye)將軍訪問中共，雙方簽署雙邊軍事合作協議，中共代訓緬甸軍人，雙方並進行情報交換，而中共將提供緬甸經援及改善緬甸的電訊情報設備。⁵¹迄今，緬甸軍政府三軍均已接受中共之代訓。⁵²

在軍售方面，1990 年 8 月 10 日中共所出售的第一批軍備抵達緬甸。1991

⁵¹ 陳鴻瑜，「後冷戰時期東南亞之區域安全」，《戰略與國際研究》，第 1 卷第 1 期(1999 年 1 月)：頁 52。

⁵² William Ashton, "Burma's armed forces: preparing for the 21st century," *James Intelligence Review*, Vo.110 No.11(November 1998):29.

年 5 月中共出售 7 架殲 7 抵達緬甸，還包含 10 億元的軍事裝備。總計自 1989 年以來，緬甸自中共購入的軍品包括戰機、運輸機、巡邏艇、坦克、裝甲運兵車、多管火箭發射器、防空野砲等等，金額高達 20 億美元。⁵³

(四)軍援寮國、柬埔寨及泰國

近年來中共不斷派出軍事代表團訪問寮、柬及泰國，並提供軍事贈款給寮、柬及協助訓練，1992 年 4 月更藉著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之機會，派遣 400 名工程兵赴柬埔寨協助建設，與柬國奠定良好的友誼。此外，近年來對泰國也以超「友誼價格」出售 6 艘艦艇，且兩國高層軍事將領每年均固定互訪。⁵⁴中共軍援寮、柬並拉攏泰國，從軍事角度來看，很明顯地是要平衡他們與越南的軍事力量對比，以牽制越南對中共北部中越邊境及南沙群島之侵犯。⁵⁵

四、軍事演習的參加

軍事演習是每一個主權國家常見的活動，是國防建軍備戰一項重要的檢測驗收過程，由於演習是軍隊以具像化的演出，對該國的國防實力具有相當的總結性和可見之前瞻性，對外亦有戰略宣示性的意味。⁵⁶近年來，中共軍隊與外軍的聯合軍演次數逐年上升，演習領域也在不斷擴大，從反恐到海上搜救、聯合登山，從陸地到海上和高海拔地區等（表 4-6 為 2002-2005 年中共軍隊與外國軍隊舉行聯合演習的情形）。

2002 年中共軍隊開始有選擇地逐步參與雙邊和多邊聯合軍事演習，以拓寬中共與有關國家安全合作的領域。2003 年起，從西北邊陲到東海之濱，解放軍與多個國家軍隊聯合舉行軍事演習，創造中共軍隊的多個「第一」，這是 2003 年中共軍事外交的一個突出亮點。解放軍和多個國家軍隊聯合舉行不同內容的軍事演習並邀請外軍觀摩，除了可以加強彼此間的友誼和信任外，更進一步推動軍隊間的交流與合作。

⁵³ Corazon S. Foley, "Contending Perspectives: Southeast Asia and American Views on a Rising China," *US Army War College*, August 2005, 4.

⁵⁴ Corazon S. Foley, "Contending Perspectives: Southeast Asia and American Views on a Rising China", 3.

⁵⁵ 林正義，「中共與東南亞國家的軍事交流：解放軍外交」，《國家政策雙週刊》，第 155 期（1997 年 1 月 7 日）：頁 10。

⁵⁶ 帥化民，「東山演習戰略意涵」，《國政評論》，第 178 期（2001 年 8 月 24 日）。

表 4-6 2002-2005 年中共軍隊與外國軍隊舉行聯合演習情況

時 間	地 點	名 稱
2002 年 10 月 10-11 日	中共與吉爾吉斯邊境	中吉兩國聯合反恐軍事演習
2003 年 8 月 6-12 日	中共與哈薩克	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武裝力量聯合反恐軍事演習
2003 年 10 月 21 日	上海	中巴海軍海上聯合搜救演習
2003 年 11 月 14 日	上海	中印海軍海上聯合搜救演習
2004 年 3 月 16 日	青島	中法海軍海上聯合搜救演習
2004 年 6 月 20 日	青島	中英海軍海上聯合搜救演習
2004 年 8 月 6 日	新疆	中巴海軍聯合反恐軍事演習
2004 年 8 月 28 日	西藏	中印聯合登山訓練
2004 年 9 月 2 日	廣東	中共海軍陸戰旅兩棲登陸作戰演習
2004 年 10 月 14 日	青島	中澳海軍海上聯合搜救演習
2005 年 11 月 28 日	印度洋	中印「友誼 2005」軍事演習
2005 年 8 月 18 日	山東半島	中俄「和平使命 2005」聯合軍事演習

資料來源：2004 年中國的國防（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04 年 12 月 27 日），附錄五；“中共近兩年來的重大軍事演習一覽”，*新華網*，2004 年 9 月 25 日；“中國軍隊近年來涉外演習盤點”，*新華網*，2005 年 9 月 27 日。

五、聯合國維和任務的參與

中共因外交政策的改變，逐步增加對聯合國事務參與程度，自 1992 年起正式派遣建制部隊參與聯合國維和任務。中共自 1990 年首次向聯合國維和行動派遣軍事觀察員以來，已先後向 13 項聯合國維和行動派出維和軍事人員 3362 人次。包括軍事觀察員 785 人次，向柬埔寨維和行動派出工兵部隊兩批共 800 人，向剛果（金）維和行動派出工兵和醫療分隊三批共 654 人，向賴比瑞亞維和行動派出運輸、工兵和醫療分隊兩批共 1116 人，向聯合國維和部派出 7 名參謀軍官。自 2000 年 1 月起，中共已向東帝汶等 6 個任務區派遣維和員警 404 人次。⁵⁷

⁵⁷ 整理自“2004 年中國的國防”，*新華網*。

2001年由中共國防部正式成立「維和事務辦公室」，統一協調和管理解放軍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工作；2002年加入聯合國維和行動待命機制，並組建1個聯合國標準工程營（約500餘人）、1個聯合國標準醫療分隊（約30餘人）及2個聯合國標準運輸連（約60人），可隨時應聯合國要求支援維和行動。現階段尚有50餘名軍事觀察員、80餘名民事員警、100餘名工兵及40餘名醫療隊參與近10項維和行動，另派駐2名於聯合國總部「維和部」工作。2003年分別派遣維和建制工兵部隊（工兵連100餘人），參與聯合國剛果及柬埔寨維和任務；2004年10月亦派遣維和建制工兵部隊及維和員警防爆隊（120餘人），分赴賴比瑞亞及海地參與維和任務。2004年中共共向東帝汶、賴比瑞亞、阿富汗、塞黑科索沃地區和海地派遣59名維和員警，並應聯合國請求，向聯合國海地穩定特派團派遣首支125人的維和員警分隊。自1990年以來，中共先後有6名維和軍事人員在執行任務中犧牲，數十人負傷。目前，中共有845名維和軍事人員在聯合國8個任務區執行維和任務。其中，軍事觀察員66人，赴剛果（金）工兵分隊175人、醫療分隊43人，赴賴比瑞亞工兵分隊275人、運輸分隊240人、醫療分隊43人，聯合國維和部參謀軍官3名。⁵⁸

第三節 軍事交流的主要國家

中共軍事外交係配合其國家整體安全及利益考量，具有高度的政治意涵，尤其著重與大國、周邊國家發展友好關係，在互訪性質上要求具有功能性的特點，例如：加強與俄羅斯建立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以改善邊界安全環境，並提升軍事技術能力；發展與美國雙邊關係，以提升其國際地位；鞏固與周邊國家的軍事交流，以創造穩定的周邊環境，利於國家經濟發展。

一、加強與俄羅斯的軍事技術合作

蘇聯在中共國防工業發展史上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由於中共與蘇聯的政治意識形態及反美的立場相同，中共與蘇聯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中共成立國防工業之際，初期中共國防武器、技術及人力皆由蘇聯提供及援助。然而中蘇蜜月期只維持約十年光景，1958年中蘇間因長波電台與聯合艦隊事件，雙方發生齟齬。⁵⁹1959年中蘇關係決裂，1960年蘇聯撤回在中共科技人員並中斷所有

⁵⁸ 整理自「2004年中國的國防」，*新華網*。

⁵⁹ 在1958年4月和7月，蘇聯提出要在中國領土和領海上建設長波電台和聯合艦隊。這使得毛澤東覺得相當的反感，迫使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不得不親自前往中國大陸，當面向毛澤東解釋。毛澤東直接對來訪的赫魯雪夫說：「英國人、日本人、還有別的許多外國人已經在我們國土上待了很久，被我們趕走了。赫魯雪夫同志，最後再說一遍：我們再也不想讓任何人利用我

的援助，中蘇關係自此陷入低潮期。進入 1970 年代以後，雙方衝突有了新的變化，由於蘇聯對中共逐步地實施孤立及圍堵政策，致使中共傾向與美國交往，以擺脫蘇聯的控制。

中蘇關係惡化的情形一直持續至 1989 年為止。1989 年天安門事件後，中共開始向俄羅斯購買軍事武器裝備，包括蘇愷 27、基洛級潛艇。除了軍售合作外，中共更把握此良機，利用俄國經濟的窘困，以較優厚的經濟待遇，延聘大批前蘇聯的軍事科技人才進入中共國防工廠、科研基地或軍事訓練場所服務。

自 1992 年起，中共軍方派出大量俄語人才，赴俄招募國防科技人才。⁶⁰1992 年 8 月中共國防部長秦基偉訪問莫斯科，正式建立兩軍之間的聯繫，雙方探討兩國軍事技術交流及在更廣泛的領域加強合作與交流之問題。1993 年 6 月和 8 月，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和總參謀長分別訪問莫斯科，進一步探討雙方在軍事技術和軍轉民領域的合作。1993 年 11 月俄羅斯國防部長訪問北京，簽署中俄兩國國防部合作協定，確立國防部長定期會晤機制。1994 年 7 月中共國防部長遲浩田訪問俄羅斯，雙方簽署《中俄兩國政府預防危險軍事活動協定》。

1996 年 4 月葉爾欽與江澤民在北京簽署中俄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紀的「戰略性協作夥伴關係」聲明，此舉使得中俄兩國關係更加緊密。1999 年 5 月發生中共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誤炸案，使中美關係轉趨緊張，中共立即宣佈停止與美國之間的軍事高層交流計劃；另一方面，中共與俄羅斯的關係，卻因此誤炸案而趨於緊密。1996 年 6 月中旬，中共軍委會副主席張萬年訪問俄羅斯，並與俄羅斯達成多項軍事共識及合作計劃：⁶¹

1. 雙方軍隊同意向對方開放最先進的武器軍事基地、裝備及軍事科學研究單位。
2. 互派學員到對方軍事學院、軍事科研單位學習進修。
3. 互派代表團、觀察組觀摩對方的軍事演習。
4. 俄方將協助中共改良正在投入生產的蘇愷 27 戰機的性能，提高戰機實力。
5. 俄方將在三年內向中共提供 96 架蘇愷 30 戰機，並負責培訓飛行員。
6. 中共將引進俄國先進的常規潛水艇技術，並改造現有的一百多艘潛艇。

們的國土來達到他們自己的目的！」8 月 1 日至 3 日，經過赫魯雪夫與毛澤東舉行三次會談，這件事才平息下來。但事實上，長波電台和聯合艦隊事件已傷害中蘇間的友好關係。韓漳主編，*中南海外交珍聞錄*（太原：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1994 年），頁 98。

⁶⁰ 陸民聲，「中共擴軍--僱傭前蘇聯國防專家，」*中國大陸研究*，第 26 卷第 6 期（1993 年 6 月）：頁 55-57。

⁶¹ 「中俄在科索沃找到交集，」*中國時報*，1999 年 7 月 19 日，版 14。

7. 雙方將斥資八億美元成立共同軍事裝備科研合作組，研製的武器包括新型隱形戰鬥轟炸機、常規戰略導彈、辛基鐳射武器、地面防空系統、資訊系統及反干擾資訊系統等高技術軍事裝備。

2000年7月17日俄羅斯總統普丁對中共進行擔任總統以來的第一次正式訪問，中俄雙方簽署兩個重要文件：其一是《中俄北京宣言》，其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和俄羅斯聯邦總統關於反導問題的聯合聲明》。⁶²這兩項文件的簽署使得中俄雙方的經貿、科技和軍控領域合作有更進一步的發展。2002年5月俄羅斯國防部長伊萬諾夫(Sergei Ivanov)訪問中共，與中共前國防部長遲浩田進行會談，雙方高度評價在「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框架下，兩軍友好合作關係的發展。而根據俄羅斯戰略與科技分析中心(Russian Center for Analysis of Strategies and Technologies)表示，中共已添購前蘇聯時期的大量軍事器材，其價值佔俄羅斯全年預算的30%至50%。⁶³

2005年12月18日中共與俄羅斯展開為期八天「友誼-2005」軍事演習，因此次演習中俄兩軍跨越陸海空領域立體作戰，參演軍兵種齊全，又為中俄首次聯合軍演，其意涵與影響，乃備受國際關注。此次中俄聯合軍演的意涵與影響包括：1. 雙方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大幅提升：除已將邊界的歷史遺留問題解決，高層互訪頻繁，政治互信不斷深化，兩軍交往不斷加強，經貿交流與合作日益提升，如今讓對方軍隊進駐與演習，互信更是無以倫比；2. 挑戰美國主導東亞安全秩序，從而制衡美國作為超級強權的影響力：中俄聯手除可影響東亞局勢及削弱美國在中亞及亞太地區的影響力，反制布希的單邊主義，並將催化世界多極化的型塑；3. 軍演將給予中共向俄羅斯部隊學習的機會：俄國對於複雜的協同作戰經驗豐富，中共向俄取經，最後或可用於威脅台灣。⁶⁴由於此次軍演被視為中俄軍事交流的進一步合作，故國際間也投以相當關切的眼光。

二、恢復與美國的軍事交往關係

過去20餘年來，中美軍事交流的推展一直隨著雙方政治關係的起伏而波動，兩國的軍事交流活動多次因政治因素宣告中斷，其中包括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1995-1996年「台海危機」、1999年「美軍誤炸中共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事件」與2001年「中美軍機擦撞事件」。

⁶² 有關《中俄北京宣言》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和俄羅斯聯邦總統關於反導問題的聯合聲明》的內容可以參閱“中俄北京宣言”，《人民日報》(北京)，2000年7月19日，版1。

⁶³ David Isenberg, “How Russia keeps China armed,” *Asia Times*, Nov 19, 2005.

⁶⁴ “正視中俄軍演的意涵與影響”，《中華日報》，2005年8月22日。

1949 年中共建立政權，毛澤東隨即宣佈「一面倒」政策，並視美國為頭號的帝國主義敵人，此後不久又爆發韓戰。這兩件事情使得情勢逆轉，打破美國對中共的幻想，美國乃對中共實行圍堵政策，進行政治孤立、軍事遏阻和經濟封鎖政策。這種政策一直持續到 70 年代初期，1971 年兩國關係開始緩和，尼克森 (Richard Nixon) 政府結束對中共技術產品的禁運，向中共出口 10 架波音 707 飛機。1972 年美國與中共和解開始，雙方即基於共同反對蘇聯擴張的戰略需要，而尋找安全合作，共同簽定《上海公報》。1973 年 3 月美國與中共決定在華盛頓與北平分別設立「聯絡辦事處」，雙方關係至此邁進一大步。

在尼克森政府時期，美國經由公開及私下的表示，反對蘇聯對中共的威脅，而中共亦在越戰的解決上協助美國。1979 年雙方建交後，雙方加強軍事合作關係，美國轉移軍民兩用的科技給中共，允許法國向中共出售核子反應爐，雙方亦在支援阿富汗及柬埔寨反抗軍方面進行合作。⁶⁵1980 年代初期，美、蘇對立開始升高，對美國而言，「聯中制蘇」更顯得迫切，而此時中共卻改變親美的政策，對美姿態逐漸升高，對蘇聯卻釋放出準備和解的訊息。為防止中共與蘇聯接近，及期望與中共建立一種穩定而持久的關係以對抗蘇聯，美國不得不百般拉攏中共，於是不僅放寬對中共的科技轉移，並且加強與中共的軍事合作。

1986 年戈巴契夫倡導「新思維」，⁶⁶促使美蘇關係改善，中共的戰略利用價值隨之降低；後又因發生天安門事件，引起美國民意對中共政權的強烈反感，最後導致美國與中共合作關係倒退，二者間的軍事交流導致重挫。布希政府於同年 6 月 5 日宣佈對中共鎮壓民運事件實施軍事制裁，包括切斷對中共的軍售與軍事科技轉移，並停止雙方軍事領袖的互訪。⁶⁷

直到 1993 年 8 月，美國對中共解除制裁，中美才又恢復軍事交流。1993 年 10 月美國國防部主管東亞安全事務的助理國防部長傅立民(Charles Freedman)訪問北京，為天安門事件發生以來美國國防部訪問中共官階最高的官員。次年 10 月國防部長裴利(William Perry)訪問中共，奠定雙方國防部長互訪之基礎。1995 年 6 月李登輝總統的私人訪美引發中共中斷與美國軍事人員之交流，推遲國防部

⁶⁵ 周煦，「冷戰後美國與中共的軍事關係」，《政大國際關係學報》，第 13 期(1998 年 12 月)：頁 13。

⁶⁶ 戈巴契夫在 1986 年 1 月首次提出「新思維」此一概念。「新思維」此一概念，連同「重建」、「開放」的概念，則在 1986 年 2 月蘇共第 27 次全國黨代表大會上被共同提出。蘇共 27 大通過《蘇共綱領新版本》，主張全球普遍安全與裁軍，以及與資本主義國家的和平共存，由此而衍生了相互安全的觀念，並且將蘇聯的軍事戰略由進攻性改為防禦性，戲劇性地大幅調整蘇共的傳統國際關係政策思維。曾建元，「動員戡亂時期台灣憲法變遷的歷史回顧」，《淡江人文社會學刊》，第 10 期(2002 年 3 月)：頁 133。

⁶⁷ 美國停止和中共的軍事交易最重要的有二件：一為 1980 年代與美國格魯曼公司合作提升殲 8 戰機的計劃；另一為由「中國航空技術進口公司」與格魯曼公司擬訂共同開發「超 7」戰機計劃。

長遲浩田的訪美計劃。惟 1996 年 12 月以後，中美雙方逐漸恢復全面交往，1996 年 12 月 3 日遲浩田率團抵美，進行 10 天的訪問，象徵中美軍方關係復趨正常化。1997 年 1 月中共派出 12 位上校級軍官至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接受短期的講習課程，中共參謀總長傅全有與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謝爾頓(Henry H. Shelton)簽署建立加強海上軍事安全磋商機制協定。

美國與中共軍事交流最熱絡的階段發生在 1990 年代中期，時值柯林頓政府宣佈與中共建立「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之際。1997 年 10 月江澤民訪問美國，中美關係可謂達到頂峰，中美雙方決定共同致力於建立「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Construct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確定中美關係未來發展的方向。近年來，中美兩軍高層互訪和軍事交往相當積極，以 1999 年為例，1 月美國國防部長柯恩(William Cohen)應邀訪問中共，與中共簽署建立加強海上軍事安全磋商機制協定；4 月中共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部長王克上將訪問美國；5 月美國空軍參謀長裏安上將訪問中共；9 月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張萬年赴美訪問，與美國總統柯林頓、國防部長柯恩、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謝爾頓，就全球和亞太地區安全及中美關係等問題進行會談，並參觀美國陸、海、空軍部隊和軍事院校。中美雙方並達成以下協議：⁶⁸

1. 雙方同意 1999 年舉行人道主義救援和減災沙盤研討作業，介紹各自實施搶險救災的作法，交流經驗。
2. 雙方同意就軍事環境的保護問題開展合作，將互派代表團商討有關技術細節。
3. 雙方同意於 1999 年互派人員觀摩對方聯合訓練演習。
4. 雙方同意 1999 年實現互派學員到對方軍事院校學習。
5. 雙方同意 1999 年中共軍艦訪美並與美方舉行海上搜救室內研討會。
6. 中方接受美方邀請，將派代表團參觀美國桑地亞國家實驗室「合作監測中心」。

中美軍事合作如膠似漆的關係一直維繫至 1999 年。1999 年 5 月中共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案引發中共人民激烈反美怒潮，中共因此事件的發生，宣佈中止與美方高層的軍事交流，同時暫停與美方有關人權、軍備管制的談判。直至 2000 年 1 月底，中美軍事合作關係才解凍，1 月 24 日中共副參謀長熊光楷抵達美國，恢復中共與美國間的軍事交流。

⁶⁸ “中美決增強軍事交流，”文匯報(北京)，1998 年 9 月 17 日，版 1。

美國總統布希(George W. Bush)於 2001 年上台後，以倫斯斐為首的美國國防部鷹派勢力得勢，採取強硬的對華政策，進行全面的「軍事戰略評估」，將軍事戰略重心從歐洲移到亞洲，不斷強化與台灣和日本的軍事關係，以遏制中共。2001 年 4 月中美軍機碰撞事件導致兩國緊張關係升高，布希政府隨後又宣佈對台灣出售大批先進武器，中美軍事交流再次停頓，中共一度拒絕美國軍艦停泊香港。911 事件後，國際局勢發生巨大變化，美國的外交和軍事戰略部署也隨之進行調整，中美雙方以攜手反恐為契機，迅速改善雙邊關係。2001 年 10 月和 2002 年 2 月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與美國總統布希先後舉行兩次首腦會晤；5 月中共國家副主席胡錦濤又訪問美國，雙方領導人就國際局勢和雙邊關係等重要問題交換意見，為恢復軍事交流奠定基礎。

自 911 事件發生後，中共與美國的軍事交流活動逐漸熱絡起來，從軍事交流的內容而言，領域大為增加，雙方亦達成一些協議和意向。11 月 22 日中共允許美國星座號 (USS Constellation) 小鷹號(USS America)航母戰鬥群停靠香港；11 月 24 日美國太平洋艦隊福斯特號 (USS Paul F. Foster) 驅逐艦抵達青島。⁶⁹2003 年 9 月美軍艦首度進入湛江港，此為中共建政以來湛江港第一次對外國軍艦開放，而中共海軍編隊也應邀訪問關島，為中共軍艦首度進入美國在西太平洋之軍事重鎮。10 月 28 日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曹剛川訪美，受到美國高規格的接待。小布希總統、國防部長倫斯斐、國務卿鮑爾、總統國家安全顧問賴斯分別會見曹剛川，並討論美中兩國、兩軍關係之發展。

2004 年 1 月美國副國務卿阿米塔吉 (Richard Lee Armitage) 在北京訪問時表示，美國與中共的軍事交流在 2001 年受到挫折後，形勢已幾乎回到 1990 年代末期原本的情況。⁷⁰綜觀後冷戰時期中共與美國軍事合作及交流情形，可以表 4-7 作一總結。

⁶⁹ “美國小鷹號航母訪港 將停留四天，”*人民日報*(北京)，2002 年 11 月 28 日，版 1。

⁷⁰ “阿米塔吉指美中軍事交流幾乎回到原本情況，”*中央社*，2004 年 1 月 31 日。

表 4-7 中共與美國軍事合作及交流概況表

時間	軍事合作及交流情形
1993.10	美國助理國防部長傅立民訪問中共三天，傅立民為天安門事件後，美國國防部訪問中共官員中官階最高的官員。
1994.03	中共國防大學校長訪美。
1994.03	美國國防部次長魏斯納(Frank Wisner)隨同克里斯多福訪問中共。
1994.07	美國太平洋艦隊司令拉森(Charles Larsen)訪問中共。
1994.08	中共副參謀總長徐惠滋訪美。
1994.10	美國國防部長裴利訪問中共四天，奠定雙方國防部長互訪之基礎。
1994.11	美國軍備管制暨裁軍總署署長侯倫(John Houlun)訪問中共，恢復自六四事件後中斷的裁軍及軍管磋商會談。
1995.03	中共參謀總長助理熊光楷訪美。
1995.06	中共國防部長遲浩田因抗議李登輝總統訪美，而延遲原定之訪美之行。
1996.12	中共國防部長遲浩田訪美十天，完成兩度延期的訪問。
1997.01	中共十二名上校軍官赴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接受短期的講習課程。
1997.05	美國參謀總長聯席會議主席謝爾頓上將訪問中共，為六四事件後訪問中共的最高層將領，亦是 1983 年魏塞上將之後訪問中共的聯參會主席。
1997.08	中共參謀長傅全有訪美，與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夏利卡席維利簽署建立加強海上軍事安全磋商機制協定。
1997.12	美國太平洋總司令普赫訪問中共，主張雙方舉行聯合演習。
1997.12	中共解放軍副參謀長熊光楷訪美，根據柯江會談協議，與美方進行首度防衛諮商會談。
1999.01	美國國防部長柯恩訪問中共，與中共簽署建立加強海上軍事安全磋商機制協定。
1999.09	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張萬年赴美訪問，與美國總統柯林頓、國防部長柯恩、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謝爾頓，就全球和亞太地區安全以及中美關係等問題進行會談，並參觀美國陸、海、空軍部隊和軍事院校。雙方並達成六項協議。

2000.01	中共副參謀長熊光楷訪問美國，此為發生中共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誤炸案後，第一位赴美訪問的中共官員。
2000.10	中共中央軍委委員、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于永波赴美訪問，會見美國政府和軍隊其他領導人，並參觀美國陸、海、空軍部隊和院校。
2000.11	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謝爾頓至北京訪問，並赴南京參觀解放軍演習。
2002.06	美國助理國防部長羅德曼（Peter W. Rodman）訪問中共。
2002.11	中共允許美國星座號、小鷹號航母戰鬥群停靠香港。
2002.11	美國太平洋艦隊福斯特號驅逐艦抵達青島。
2002.11	中共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高級軍事代表團前往美國進行訪問。。
2002.12	熊光楷率領二十三名解放軍將領到美國國防大學參與交流活動，熊光楷並與沃佛維茲(Paul Wolfowitz)進行第五次美中國防部副部長級諮商會談。
2002.12	美軍太平洋司令部總司令法戈（Thomas B. Fargo）上將至中共訪問。
2003.09	美軍艦首度進入湛江港，此為中共建政以來湛江港第一次對外國軍艦開放。
2003.10	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曹剛川訪美，受到美國高規格的接待。
2004.01	美國副國務卿阿米塔吉訪問北京。
2004.12	美軍太平洋總部司令法戈訪問北京。
2005.01	中美首次國防部政策會議在北京舉行。
2005.04	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熊光楷上將與美國國防部副部長沃佛維茲，在華盛頓舉行中美第七次防務磋商。
2005.10	擔任美國國防部長 5 年的倫斯斐首次到中共進行友好訪問。
2006.05	美軍太平洋司令部總司令法戈至中共訪問。

資料來源：整理自周煦，「冷戰後美國與中共的軍事關係」，*政大國際關係學報*，第 13 期(1998 年 12 月)：頁 16-17；中央研究雜誌社，1999 *中共年報*台北：中共研究雜誌社，1999 年 7 月)，頁 9-64、9-65、9-69、9-70、9-75、9-76；「中美軍事交流大事紀」，*新華網*，2003 年 10 月 29 日；「軍事外交營造和平發展安全環境」，*解放軍報*(北京)，2005 年 12 月 29 日；「美軍太平洋總部司令：美中兩軍增加了解非常重要」，*新華網*，2006 年 5 月 15 日。

三、鞏固與周邊國家的軍事交流

後冷戰時期的中共國家戰略以經濟發展為中心，為維持經濟成長及改革，中共必須有一個穩定的周邊環境，而「睦鄰友好」外交政策就成為創造這個和平環境的主要手段之一。1997年9月召開十五大時，江澤民表明將繼續以「加強和鞏固同周邊國家的睦鄰友好關係」作為中共對外政策的基本出發點之一。江澤民在紀念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二十週年大會上，也提到「進行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需要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我們對外工作的首要任務，就是爭取和平，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要實事求是地判斷國際形勢，恰當處理對外關係，以利抓住機遇，集中力量加快國內經濟和其他事業的發展。要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把國家的主權和安全始終放在第一位。堅持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建立和發展同所有國家的友好合作關係。堅持睦鄰友好政策，積極發展同鄰國之間的關係，爭取一個良好的周邊環境。」⁷¹

爾後，江澤民也多次在國際場合中闡述中共「親仁善鄰」的傳統思想，而外交部長唐家璇也指出，「親仁善鄰，國之寶也」，睦鄰友好、互利合作已成為中共與周邊國家關係的主要特徵。⁷²自1990年代以來，解放軍為提供國家現代化發展之穩定周邊和平情勢，軍隊高層領導者頻頻出訪周邊國家，並積極發展與周邊國家的軍事合作關係。

(一) 東北亞

1. 韓國

與北韓的軍事合作方面，1949年10月6日中共與北韓建交，北韓成為新中國最早建交的國家之一。1950年6月韓戰爆發，美軍越過三八線北進，戰火延燒至鴨綠江邊境。中共面臨戰爭威脅後，應北韓之要求，中共派出志願軍加入韓戰。停戰後，中共積極援助北韓戰後經濟恢復建設。1953年11月雙方簽訂經濟文化合作協定，1961年7月11日兩國簽署《中韓友好合作互助條約》。⁷³

中共與北韓兩國一直保持著傳統的友好合作關係，兩國黨和國家領導人經常往來。北韓領導人金日成生前曾數十次訪問中共，中共領導人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等也先後多次訪問北韓。1990年以來，江澤民、總理李鵬、書記胡錦濤、國防部長遲浩田、國務院秘書長羅幹、外交部長唐家璇相繼訪問北韓。金日成主

⁷¹ “江澤民在紀念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二十週年大會上的講話，”*新華網*，2000年12月18日。

⁷² “唐家璇外長談2000年的中國外交，”*新華網*，2000年12月28日。

⁷³ “中朝雙邊關係，”*人民網*，2004年9月9日。

席、延亨默總理、北韓國家副主席李鍾玉、北韓勞動黨中央政治局委員、總參謀長崔光及副總理洪成南、金潤赫、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會委員長金永南、白南舜外相等人也都相繼訪問中共。

2000年10月遲浩田率領高級軍事代表團訪問北韓，並參加北韓舉行的「紀念中共人民志願軍入朝參戰50週年紀念活動」。2001年9月3日應金正日邀請，江澤民前往北韓進行正式友好訪問，此為1990年以後，11年來中共最高領導人再次踏上北韓的土地。江澤民的訪問也標誌著中共與北韓兩國高層互訪已恢復，並開創兩國友好合作關係的新局面。

在與北韓軍隊繼續保持合作關係之同時，與南韓軍隊的交流也同步發展。中共與南韓自1992年建交以來，即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領域進行交流與合作。近年來，中共領導人江澤民、李鵬、李瑞環、胡錦濤等相繼訪韓，南韓的幾任總統盧泰愚、金泳三及金大中也都分別曾訪問中共。總統金大中於1998年訪問時，與江澤民就兩國關係建立「面向廿一世紀的合作夥伴關係」達成共識，雙方商定以聯合國憲章和中韓建交聯合公報的精神，著眼未來，後會並發表聯合公報，簽署若干協定、備忘錄，這些檔案即為兩國關係的發展制定新的框架。2000年1月遲浩田再率團訪問南韓，這是中共與南韓建交後，國防部長首次訪問南韓；2001年10月南韓海軍艦艇亦編隊訪問中共；2002年5月中共海軍軍艦回訪南韓。2005年5月南韓國防部長尹光雄特別指出，現階段南韓應要加強與中共之軍事合作，尹光雄說：「南韓希望和中共軍事交流之層次提高到和日本相當的層級。」並表示：「即使是為提高韓美關係實效，韓中關係也需要維持在適當水準，同時考慮到北韓的改革開放、核問題、北韓離民、韓戰俘虜等，加強與中國的軍事交流也符合南韓國家利益。」⁷⁴

由中共與南北韓的軍事交往可以看出，在「睦鄰友好」外交政策的指導下，解放軍與南北韓軍事合作交流關係將繼續呈現穩定的平衡局面。

2. 日本

1978年以來，中共為追求經濟成長，大幅度地修正其對外經濟政策，加強和先進國家間的經濟交流。日本為亞洲地區唯一已開發國家，佔著地利之便，和中共的經濟關係自1972年雙方建立邦交後，即有長足之進展。尤其是1978年8月，日本和中共簽訂友好條約之後，政治關係的緊密化更進一步促進經濟關係之發展。1980年代雙方開始進行國防部長及防衛廳長官間之互訪，但雙方的交流

⁷⁴ “南韓議題紛紛踏訪中國 為國家安全選擇尋找答案，”*瞭望東方周刊網*，2005年5月27日。

因 1989 年天安門事件而告中止。

1997 年 9 月日本首相橋本龍訪問中共時，江澤民向其表示雙方繼續嚴格遵守《中日聯合聲明》及《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原則，本著相互尊重、求同存異的精神，妥善處理好兩國間存在之問題，是實現中日兩國世代友好的重要保障。⁷⁵李鵬於同年 11 月間訪問日本時亦表示，期望中日睦鄰友好關係按照《中日聯合聲明》與《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所確定的原則，不斷得到新的發展。

停頓 14 年之久的中日軍事交流，繼 1997 年秋天江澤民訪美、李鵬訪日後，1998 年中共再次推動高層對日軍事外交。在日方的邀請下，2 月 3 日至 8 日中國防部長遲浩田率軍事將領團赴日訪問 6 天，之後並續訪澳洲、紐西蘭和斐濟等國。這是中共為擺脫 1989 年六四天安門事件以來外交困境後的再出發，爭取主動出擊。

1998 年 11 月江澤民訪問日本，與日本首相小淵惠三進行會談，雙方發表《關於建立致力於和平與發展的友好合作關係》聲明，確認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和平共處以及聯合國憲章的準則是處理國與國之間關係的基本準則；申明雙方不在本地區謀求霸權，不行使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主張以和平手段解決一切糾紛；一致認為應進一步加強雙方之安全對話機制。⁷⁶

1999 年 10 月中共總理朱鎔基出訪日本，積極爭取日本對中共經濟改革的支援，中日雙方並在高峰會時確認「元首熱線」的開通。2000 年 4 月應日本參聯會主席邀請，共軍前總參謀長傅全有赴日本進行正式友好訪問；6 月日本參聯會主席回訪共軍，中日兩國國防部門並進行「第三次防務磋商」，就有關防務問題深入交換意見。自此以後，兩國軍事代表團互訪幾乎每年定期實施，對兩國軍事關係發展與瞭解有一定程度之意涵。

911 事件發生後，日本國會為了因應美國懲罰阿富汗的「持久自由(Enduring Freedom)」行動，於 2001 年 10 月 29 日通過《恐怖活動對策特別措施法案》《海上保安廳修正案》與《自衛隊法修正案》三項時效兩年的特別立法。⁷⁷ 針對日本在 911 事件後的反應行為，中共認為日本藉反恐怖主義名義接連提出違反日本

⁷⁵ 有關《中日聯合聲明》及《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全文，可參閱“中日聯合聲明”，*新華網*，2002 年 3 月 26 日；“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新華網*，2002 年 3 月 26 日。

⁷⁶ “關於建立致力於和平與發展的友好合作關係”，*新華網*，2002 年 3 月 26 日。

⁷⁷ 這三項法案提供自衛隊得於戰時派兵赴海外行動的法源依據，法案明定派遣行動必須有國會的追認。所謂派兵任務，包含戰爭物資的補給、運輸、搜救、偵查、人道救援等，屬於非前線的單純戰地任務，但不包括武器彈藥的提供。不過，當自衛隊受到攻擊時，則可基於自衛而加以還擊。此一特別措施法為日本在戰時首次得以派遣自衛隊到海外，是戰後日本安保政策一大轉捩點。有關這三項法案的內容，可參閱*朝日新聞*，2001 年 11 月 10 日，版 1。

憲法的法案，以及趁機派遣艦隊遠赴印度洋，其意圖在於走向軍事大國。然而為了保持中共周邊環境的和平與穩定，不影響中共追求經濟發展的目標，中共決定對日本自衛隊行為採取忍讓的態度，繼續與日本保持軍事交流關係。2003年10月中共、日本和南韓領導人舉行第五次會晤，發表《中日韓三方推進合作聯合宣言》，決定三國在東亞地區加強包括安全對話，促進國防或軍事人員之間廣泛交流，裁軍、防擴散和實現北韓半島無核化等領域的合作。2004年10月中共副總參謀長熊光楷與日本防衛廳事務次官守屋武昌在東京舉行第五次中日安全磋商，中日雙方均表示要在兩國關係的框架內，進一步推動兩軍往來和交流。

(二) 東南亞

1990年代以來，隨著全球冷戰的結束，東南亞地區的兩極對抗消失，中共改革開放政策持續發展，中共與東南亞各國的關係進入新階段。尤其是東南亞國家是中共的近鄰，發展與這些國家的「睦鄰友好」關係，更是中共外交政策的目標之一。

中共與東南亞之間，不論在外交、安全對話、多邊論壇的參與對話、經濟，乃至軍事合作層面，都有著密切的合作交流。在外交關係方面，中共於1990年8月與印尼復交；同年10月與新加坡建交；1991年9月與汶萊建交；同年11月與越南關係正常化。自此，中共與所有東協國家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在軍事合作方面，中共與東協國家軍事交流的主要方式包括高層互訪、軍售、軍援及聯合演習(相關軍事交流內容可參閱本章第二節)，而在中共與東協國家軍事交流中，以與泰國及緬甸之軍事合作關係最為密切。。

自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之後，中共為了消弭東南亞各國對「中國威脅論」的疑慮，積極努力修補與東協的關係，與區內國家進行軍事交流及安全對話。中共與東南亞之安全對話已由非官方層次邁入官方層次，1992年中共成為東協的部分對話夥伴，開始參加「東協外長擴大會議」；⁷⁸1994年中共參與東協區域論壇，參與區域安全對話機制；1995年中共與東協建立副外長級之高級官員磋商機制，就雙邊關係、地區形式與周邊安全進行討論；1996年3月中共正式提出成為東協的全面對話夥伴國之意願，同年7月東協將中共提升為全面對話夥伴，12月並與東協建立睦鄰互信夥伴關係；1997年首度參與首屆東協「10+1」非正

⁷⁸ 錢其琛應邀至馬尼拉參加東協外長會議，表達支持東協「和平、自由、中立區」及東南亞無核區的主張。對於會中通過之南海宣言，中共表示接受部份內容，並強調「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立場。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會議為中共和東協對於南海主權問題在官方場合的首次正面交鋒。黃奎博，「冷戰後中共與東南亞國協之政治合作」，《國際關係學報》，第15期(2000年12月)：頁206。

式高峰會；⁷⁹1999年並參加在菲律賓舉行的第三屆東協「10+3」非正式高峰會；⁸⁰2002年11月4日中共與東協各國外長及外長代表在金邊簽署《南海各方行？宣言》，⁸¹並在2003年10月成為第一個與東協國家簽署友好合作條約的國家；2004年11月中共參加第11屆東協區域論壇外長會議時，並提出「促進各國軍方交流與合作，發揮各國軍方在增進相互信任方面的重要作用」。⁸²

(三) 南亞

1. 印度

中共與印度自1960年代初，因麥克馬洪線(McMahon Line)國界糾紛引發邊界戰爭，加上中蘇關係惡化，印度聯蘇反中，中共支援巴基斯坦抗印，使得中印兩國關係長期陷入僵局。直至1988年中印成立次長層級聯合工作小組的會談機制，雙方關係才開始好轉。冷戰結束後，中印兩國領導人頻繁互訪，⁸³1993年中印兩國推動「信心建立措施(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簽署《關於在中印邊境實際控制線地區保持和平與安寧的協定》，決定邊界的駐軍將領將定期舉行會談；1996年江澤民訪問印度，同印度建立「面對未來的建設性合作夥伴關係」，並簽訂《關於在中印邊境實控線地區軍事領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協定》；1997年8月中印邊界問題聯合工作小組第十輪會談在新德里舉行，雙方就澄清邊境實控線、雙邊關係和共同關心的地區和國際問題交換意見，簽署《會談紀要》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和印度共和國外交部合作議定書》，還交換《關於在中印邊境實控線地區軍事領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協定》的批准書，並簽署互換批准書的證書；1999年印度外長訪問中共，中印雙方達成共識，彼此不視對方為威脅，雙方強調和平共處五原則是發展兩國關係之指導原則，發展安全對話，至此兩國關係有了新的進展。

2000年7月中共外長唐家璇訪問印度時提出，強化中共與印度雙邊關係的建議，範圍包含邊境、經濟合作、軍事關係與安全對話等問題；2000年8月中

⁷⁹ 東協「10+1」非正式高峰會討論的議題包含南海行為準則、東南亞非核區、東協與中共間之經濟合作、廿一世紀東協與中共關係之方向、科技暨農業合作及開發湄公河流域等問題。

⁸⁰ 「10+3」高峰會議中所指的三國是中共、日本與南韓。

⁸¹ 宣言強調通過友好協商和談判，以和平方式解決南海有關爭議。在爭議解決之前，各方承諾保持克制，不採取使爭議複雜化和擴大化的行動，並本著合作與諒解的精神，尋求建立相互信任的途徑，包括開展海洋環保、搜尋與求助、打擊跨國犯罪等合作。

⁸² 2004年中國的國防白皮書(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2004年)，頁64。

⁸³ 1988年、1992年、1993年、1994年印度總理甘地、總統文卡塔拉曼、總理拉奧、副總統納拉亞南先後訪問中共。1991年、1993年、1994年、1995年、1996年總理李鵬、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副總理兼外長錢其琛、委員長喬石、國家主席江澤民分別訪問印度。

共軍事代表團前往印度進行軍事交流，同年 9 月印度兩艘戰艦前往上海進行親善訪問；2001 年 1 月中共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李鵬及 2002 年 1 月中共總理朱鎔基訪問印度皆指出，中印之間共同點遠多於分歧和問題，雙方都有進一步改善和發展關係的願望。尤其在在在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兩大趨勢不斷發展的情況下，中印更應加強交流和合作，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發展中印睦鄰友好關係；⁸⁴2001 年 5 月印度空軍參謀長訪問中共，中共總參謀長傅全有在接見時指稱，中共與印度發展友好關係，不僅符合兩國的根本利益，而且有利於地區乃至世界的和平與穩定；⁸⁵2001 年 5 月底兩艘中共軍艦也駛抵印度孟買港口進行友好訪問，並參加軍事聯合演習。⁸⁶

2003 年以來，中印兩軍互信程度有了很大程度之提高。2003 年 11 月中印海軍在中共東部上海附近海域舉行聯合搜救演習，該次演習是中印兩國海軍首次進行非傳統安全領域的聯合演習。雙方參演兵力進行包括空中及海上立體搜尋遇險船隻、直升機引導軍艦抵達事發海域、消防滅火以及直升機迅速轉運傷員等海上聯合搜救演習科目；⁸⁷2004 年 8 月 28 日中共人民解放軍邊防部隊和印度軍隊邊防部隊在西藏自治區普蘭縣境內成功舉行聯合登山訓練活動，此為兩軍邊防部隊首次在邊境地區舉行聯合登山訓練；⁸⁸2005 年 11 月 28 日由深圳號導彈驅逐艦、微山湖號遠洋綜合補給艦組成的海軍艦艇編隊，出訪印度，並首次在印度洋與印度海軍舉行代號為「中印友誼-2005」以聯合搜救為主要內容的非傳統安全領域演習。⁸⁹綜整後冷戰時期中印軍事交流的情形，可以表 4-8 來表示。

⁸⁴ “中印關係回顧”，*新華網*，2005 年 1 月 25 日。

⁸⁵ “主動倡讓加強接觸 印度想和中國搞聯合軍演”，*中國網*，2003 年 10 月 17 日。

⁸⁶ “主動倡讓加強接觸 印度想和中國搞聯合軍演”，*中國網*。

⁸⁷ “中印軍事交流升級 海軍聯合演兵印度領海”，*人民網*，2005 年 11 月 30 日。

⁸⁸ “2004 年中國軍事外交回顧：更加活躍更趨務實”，*新華網*，2004 年 12 月 19 日。

⁸⁹ “中國印度舉行軍演提升兩大國安全互信”，*新浪網*，2005 年 12 月 2 日。

表 4-8 後冷戰時期中印軍事交流的情形

時間	合作交流事宜
1993	兩國推動「信心建立措施」，簽署《關於在中印邊境實際控制線地區保持和平與安寧的協定》。
1996	建立「面對未來的建設性合作夥伴關係」，簽訂《關於在中印邊境實控線地區軍事領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協定》
1997	簽署《會談紀要》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和印度共和國外交部合作議定書》
1999	雙方達成共識，彼此不視對方為威脅，雙方強調和平共處五原則是發展兩國關係的指導原則，發展安全對話。
2000	8 月中共軍事代表團前往印度進行軍事交流；同年 9 月印度兩艘戰艦前往上海進行親善訪問。
2001	1 月中共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李鵬訪問印度；五月印度空軍參謀長訪問中共；5 月底兩艘中共軍艦也駛抵印度孟買港口進行友好訪問，並參加軍事聯合演習。
2002	1 月中中共總理朱鎔基訪問印度五天，分別會見印度總統、副總統和總理等領導人，並簽署《外太空和平用途合作協定》。
2003	中印海軍於 11 月在中共東部上海附近海域舉行聯合搜救演習，演習取得了圓滿成功。這是中共海軍首次與印度海軍進行非傳統安全領域的聯合演習。
2004	中共人民解放軍邊防部隊和印度軍隊邊防部隊於 8 月在西藏自治區普蘭縣境內，成功舉行聯合登山訓練活動。
2005	11 月 28 日由深圳號導彈驅逐艦、微山湖號遠洋綜合補給艦組成的海軍艦艇編隊，出訪印度，展開為期三天的訪問。

資料來源：整理自“中印關係回顧”，*新華網*，2005 年 1 月 25 日；“中國印度舉行軍演提升兩大國安全互信”，*新浪網*，2005 年 12 月 2 日。

2. 巴基斯坦

1951 年 5 月 21 日中巴兩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自此中巴兩國領導人互訪頻繁，兩國友好合作關係相當鞏固。1996 年 12 月江澤民主席訪巴國同時，與巴國領導人確定建立面向 21 世紀的中巴全面合作夥伴關係，這為中巴在新世紀進行

軍事合作奠定基礎。自 1990 年代以來，中共在陸海空三個方面積極幫助巴基斯坦，兩國簽署中共向巴基斯坦出口最先進 FBC1 戰鬥轟炸機的框架協議。巴基斯坦陸軍已經裝備 200 輛先進的中共制 T85IIM 坦克，目前正在參加中共新一代 T90II 坦克的研製計劃，並向中共支付研製經費。⁹⁰

另一方面，中巴雙方軍事交流層面之高、程度之深也非他國能比擬。如同 2001 年 2 月中央軍委會委員、總參謀長傅全有在會見到訪的巴基斯坦空軍參謀長時所言：「中巴兩國是山水相連的友好鄰邦，兩國人民之間的友誼源遠流長。兩國建交 50 年以來，雙邊關係一直穩定發展，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領域裏都有著良好的交流與合作。中巴兩軍關係發展勢頭良好，高層互訪頻繁，兩國空軍交往卓有成效，在今後的歲月裏，兩國、兩軍關係將會得到進一步發展。」

91

中共和巴基斯坦兩國海軍並於 2003 年 10 月 21 日舉行聯合軍事演習，⁹²此次演習有助於雙方進一步加強保衛海上邊防線和確保海上利益的能力，同時也為雙方分享海上經驗及處理海事事宜，提供合作的良機。

(四) 中亞

中共自 1996 年開始展開與中亞各國的元首會晤，2001 年 6 月 15 日中共、俄羅斯、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與烏茲別克等國在上海舉行第六次高峰會議，六國元首在高峰會議上簽署《上海合作組織成立宣言》及《打擊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上海公報》。根據此項宣言，六國同意成立「上海合作組織」，協議共同打擊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及極端主義，以維護區域安全及經貿合作為其目標。⁹³

911 事件發生後，美國積極地與中亞國家接觸，並獲得中亞各國軍事合作的支援。烏茲別克與美國簽訂軍事合作協定，開放軍用機場供美軍使用，成為美國在中亞的主要軍事夥伴；塔吉克隨烏茲別克之後，也與美國簽訂提供軍事基地的協定；吉爾吉斯起先猶豫，但最後還是向美軍提供機場使用；此外，哈薩克也開放領空和陸地供美國運輸通過，⁹⁴這些情況顯示美國已經在中亞有了軍事涉入之歷史性突破。

對於中共而言，中亞地區具有天然資源及地緣戰略的重要性，中共不可能放

⁹⁰ “中巴兩國海軍在上海海域聯合軍演倍受各方矚目，” *青年參考*，2003 年 10 月 21 日。

⁹¹ “傅全有會見巴空軍參謀長，” *解放軍報*（北京），2001 年 2 月 18 日，版 1。

⁹² “中巴兩國海軍在上海海域聯合軍演倍受各方矚目，” *青年參考*。

⁹³ “六國簽署上海合作組織宣言，” *中國時報*，2001 年 6 月 16 日，版 10。

⁹⁴ 王良能，”美新中亞戰略與上海合作組織，” *中國時報*，2001 年 6 月 26 日。

任美國在其後花園耀武揚威。因此隨著反恐佈戰役的推進，中共更積極地與中亞各國進行交往與合作。2003年8月6日至12日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武裝力量舉行代號為「聯合-2003」的聯合反恐軍事演習，這是上海合作組織框架內首次舉行的多邊聯合反恐軍事演習。⁹⁵ 中共、哈薩克、吉爾吉斯、俄羅斯、塔吉克5國的武裝力量參加演習，這是中共軍隊首次參加如此大規模的多邊聯合反恐演習。由中共積極與中亞各國舉行演習來看，中共為避免美國的圍堵政策及中亞各國向美國傾斜，現正積極地拉攏中亞各國，並加緊進行軍事合作關係。

第四節 小結

在追求國內外政局穩定及軍隊現代化的情勢下，解放軍對於非國家安全議題的外交政策，一般皆抱持合作與配合的態度，積極拓展軍事外交工作。亦即軍事外交為解放軍配合及實踐外交政策的方式，軍事外交係服從和服務於國家總體外交，與其發展軌跡一致，隨著其綜合國力的不斷增強及國際地位的提高，中共的軍事交往開始向縱深方向發展，交往的領域更加寬廣，內容更加豐富；另一方面，軍事高層往來、外國軍事首長來訪及參加多邊軍事外交活動與日俱增。軍事與外交的互為運用，對中共而言，不但在於企圖降低世人對「中國威脅論」的疑慮，而且有助於其突破軍事科技發展上之瓶頸。觀察近年來，中共在國際軍事外交上一直扮演相當積極的角色，諸如與北方俄羅斯之軍事合作、與周邊國家進行的軍事演習，甚至與美國之間所達成的多項軍事交流計畫等等，都對於穩定與各國間之外交關係，有著相當大的實質助益。

⁹⁵ “加強聯合反恐五國演兵中亞，”新華網，2003年8月6日。

第五章 組織衝突及案例分析

冷戰結束後，中共對外職能必須通過國防與外交所構成的機制來實現，中共的國防是為了捍衛和促進國家利益，而進行的軍事與其有關多方面之建設，它實現著國家防禦的職能；而中共的外交則是為捍衛和促進國家利益而進行的各種交流合作與活動，它實現國家的對外交往職能。因此，中共的國防與外交都直接服務於國家的對外政策、國家利益，都是推行對外政策和維護國家利益的兩種手段，國防與外交不僅本身對國家利益的維護具有巨大的能動作用，且二者之間有著密不可分、相互促進的內在關係。¹

對於國家安全或領土主權的外交政策問題，解放軍不但一再表達其論點，且亦力圖擴大其影響力。尤其是在中共採取改革開放政策，加入國際體系後，防禦及國防安全的問題也愈形重要。中共的外交政策通常會與軍方的重大利益及其所關切的國家安全事項密切相關，包括中美關係、台灣問題、領土主權爭議（如南沙群島）及軍售政策等等。外交部的政策以軟性與和善為主，希望能與大部分亞洲國家以及世界列強維持友善或友好的關係，以期能保持一個有利於中共持續經濟成長與政治穩定的客觀環境；而對軍隊而言，雖然支援國家戰略的目標是軍隊應有的態度，但由於中共軍隊的主要職責乃在於保衛國家安全，防止敵人入侵，並防阻可能浮現的威脅行為，因此軍隊一般都堅持在外交政策層面應以強硬的態度為主。可見，軍隊和外交部的立場有時是會相互抵觸的。本章將以中美關係（軍機擦撞事件）與台灣問題（1995-1996 台海危機事件）作為分析的案例，藉此瞭解外交系統與解放軍在相關國家安全議題之外交政策上不同的立場與態度。

第一節 中美關係

1970 年代以來，因中共與美國的關係漸趨改善，美國對中共外交政策改以「交往」為主，此種外交政策之友善態度促使兩國間合作交流趨於頻繁，其間兩國的合作關係雖遭遇天安門事件之阻礙，但自 1993 年後，雙方的合作關係再度恢復。1997 年 2 月鄧小平去世後，江澤民完全主政，為了提升其個人國際形象並在國際舞台擔任重要角色，自此中共對外政策改採積極作為，提倡「新安全觀」、加強與大國的關係、實行「睦鄰友好」政策及參與國際組織。1997 年 10 月江澤民訪問美國，中美雙方決定共同致力於建立「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Construct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確

¹ 謝昌生，「江澤民時期中共軍事外交戰略之研析」，《共黨問題研究》，第 25 卷第 7 期（1999 年 7 月）：頁 25。

定中美關係未來發展的方向。雙方同意建立三條對話機制：1.兩國元首定期互訪；2.在北京與華府間建立元首間的熱線；3.進行閣員級與次長級官員定期互訪，就政治、軍事、安全和軍備管制問題進行磋商。²在此一聯合聲明的精神下，中共與美國國防部定期舉行防務磋商，就雙方共同關心的國際與地區安全及雙邊關係交換意見。

布希總統上任之後，在新保守主義思潮的主導下，不再視中共為「戰略夥伴」(Strategic Partnership)，而將其定位為「戰略競爭者」(Strategic Competitor)。2001年4月發生中美軍機擦撞事件，雙方關係陷入低潮，但因江澤民後期對美外交表現高度的審慎與克制，致使雙方衝突減至最低。2001年9月911事件的發生為中共與美國提供了反恐的合作機制，2002年5月中共國家副主席胡錦濤訪問華府，之後美國在台灣問題上有了較為平衡的處理方式，而同年10月江澤民到布希總統私人農莊作客，顯示布希政府對江澤民處理中美關係態度的滿意，布希更表達美國尋求與中共建立「坦誠、建設和合作的關係(Candid, Constructive, and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³中美雙方關係顯然比布希總統初上任時改善甚多。

胡錦濤上任之後的對美外交，基本上延續江澤民主政後期的動力，在不與美國爭霸的主軸下進行不對抗、求合作之政策。中共在北韓核武問題上積極促成六方會談，以多邊機制控制北韓的冒進行為，更使美國國務卿鮑爾形容雙方關係是近年來最好的時刻。⁴可見，中共為確保其經濟改革的持續，需要來自美國及西方國家的資金投資與技術轉移，並為避免美國對其軍事現代化產生壓力，降低美國對台軍售的動機等因素，短期間內，除非雙方有重大的衝突，否則中共還是會維持與美國合作、不對抗之關係。

一、外交系統與解放軍在中美關係上的衝突

基本上，後冷戰時期，中共為服務國家經濟發展之戰略目標，外交系統與解放軍積極地與美國進行交流與合作。然而由於外交系統與解放軍各有不同的組織任務與目標，因此在敏感的國家安全議題上，這二個組織也會有不同之立場，2001年軍機擦撞事件即為最明顯的案例。

(一)中共外交系統對中美關係之看法

² “中美聯合聲明(1997年10月)”，*新華網*，1997年10月29日。

³ “President Bush, Chinese President Jiang Zemin Discuss Iraq, N. Korea,” *whitehouse*, October 25, 2002.

⁴ 鮑爾於2003年7月22日接受《華盛頓時報(Washington Times)》的訪問內容請見網址：<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03/22687pf.htm>

自 1978 年實施改革開放政策後，中共國家戰略目標即以經濟發展為主，外交系統為了達成國家經濟發展的目標，認為在外交政策上必須採取務實主義，因此建議與美國建立良好之互動關係，其目的在於確保經改政策之持續與成功，避免因持續軍事現代化導致鄰國不安、防堵日本崛起、降低美國對台灣之軍事協助及解決共同關切的重要問題。⁵

1. 確保經改政策之持續與成功

自十五大江澤民鞏固政權及中共完成香港、澳門回歸後，中共開始密集展開「夥伴外交」及「大國外交」的策略，其具體的外交戰略原則轉變為不斷發展經濟，強化自身的綜合實力；不斷發展以雙邊外交關係為主的夥伴關係，建立與重要國家和國家組織的夥伴關係，並參與多邊國際組織與對話機制。

1997 年中共召開十五大時，所列舉的外交工作優先順序是 1. 加強睦鄰友好關係；2. 加強同第三世界國家的團結與合作；3. 改善和發展同發達國家的關係；4. 同世界各國和地區廣泛發展貿易往來、經濟技術合作和科學文化交流；5. 積極參與多邊外交活動；6. 發展中國黨與各國政黨的黨際交流和合作關係。⁶ 2002 年十六大時，外交工作的優先順序更改為 1. 改善和發展同發達國家的關係；2. 加強同周邊國家的交流和合作；3. 增強同第三世界的團結與合作；4. 積極參與多邊外交活動；5. 同各國政黨與政治組織發展交流與合作；6. 廣泛開展民間外交，擴大對外文化交流。⁷ 外交順序之更動顯示中共已經調降對第三世界國家交流合作的重要性，將大國及西先進國家列為外交工作的首要任務。

由此可知，冷戰結束後，中共外交政策的考量主要是為配合國家整體戰略，外交政策的目標緊緊圍繞著中共國家建設發展和爭取、維護良好國際和平環境，因此外交焦點轉移到與各大國、周邊國家間的外交關係。如同中共外交部副部長周文重在 2004 年 2 月紀念中美建交 25 周年時指出，「中共的發展，需要一個和平的周邊國際環境。中共將在國際和地區事務中發揮建設性的作用，真誠希望與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各國和平相處，維持友好合作。中共將繼續推進睦鄰友好，與鄰善的政策方針，促進地區的和平、穩定與繁榮。」⁸

亦即中共工作的重點在於經濟發展，以增加綜合國力，對外安全與策略的設計和作為在於配合與保障經濟建設之成功。因此外交系統認為，對於正在尋求

⁵ Mickael D. Swaine, *The Role of the Chinese Military i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making* (Santa Monica, CA: RAND, 1996), 20.

⁶ “江澤民在中共十五大上的報告,” *新華網*, 1997 年 9 月 12 日。

⁷ “江澤民在中共十六大上的報告,” *新華網*, 2003 年 11 月 8 日。

⁸ 周文重, “努力推動中美建設性合作關係向前發展——紀念中美建交二十五周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網站*, 2004 年 2 月 7 日。

經濟成長的中共，急切需要一個和平與穩定之周邊環境。中共為確保其經濟改革的持續，需要來自美國及西方國家的資金投資與技術轉移，若與美國發生正面衝突，將使中共經濟發展進程受到阻礙，亦即外交系統主張與在全球處於領導地位的美國合作，透過友好的中美關係，持續維持國家的經濟成長。

2. 避免因持續軍事現代化導致鄰國不安

1997年7月東亞金融危機之後，南海周邊國家因受金融風暴的衝擊，經濟情況遭遇嚴重打擊，原訂的軍事採購案大都被迫取消或無限期延後。相對地，中共受金融風暴影響較少，不僅國防預算沒有減少，更嚴守人民幣不貶值，中共已儼然成為東亞金融的龍頭與區域霸權。中共在經濟及軍事上的持續擴張，終將成為區域中的主導力量。⁹學者瓦茲(Kenneth N. Waltz)在1993年即指出，「如果中共繼續保持高度經濟增長率和一個有效的政府，它的人民擁有經濟自由和創造力，10年之內它將跨入一流大國的行列。當中共使其三百萬人的軍備現代化，並且購買或製造先進的飛機和艦艇之後，它將迅速獲得遠距離投放部隊的能力。美國由於種種內外等因素的制約，將不能指望去制約一個擁有十二億人口、日益增長經濟和軍事實力的國家。」¹⁰美國在1997年開始將中共視為潛在的對手，當時五角大廈公佈的《四年防務審查報告(Th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明確指出，2015年後，可能出現與美國勢均力敵的全球對手，中共和俄羅斯具有這種潛力。¹¹在某些美方戰略規劃者的眼中，中共對美國在亞洲利益的挑戰日增。¹²亦即對美國而言，現今最大的威脅者即是中共。

現階段中共之國家發展以經濟為主，軍事只是經濟發展之輔助，在當前多極化之國際格局，產生軍事對抗對中共發展經濟所需之和平周邊環境並無益處，即使中共欲藉軍事力量的提昇來增加在亞太乃至於國際間之影響力，也不希望成為各國圍堵的對象，「中國威脅論」的散播引起周邊國家的恐慌，加深了對中共的戒心，並不符合中共目前「睦鄰外交」政策的執行。為了避免不必要的外在壓力施加於中共軍事現代化之上，與美國保持友好關係，將可適度轉移美國及中共周邊國家對解放軍軍事現代化的注意力。

⁹ Robert G. Kaiser, "2025 Vision: A China Bent On Asian Dominance," *Washington Post*, March 17, 2000.

¹⁰ Kenneth N. Waltz, "The Emerging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8, No.2(Fall 1993):66-69.

¹¹ Department of Defense of the United States, *Report of th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Washington: Department of Defense, 1997).

¹² "U.S. Seeks to Lift Sanctions on India," *Washington Post*, August 12, 2001, A01.

3.防堵日本崛起

在亞太地區，美國的聯盟體系不像歐洲那樣以區域化聯盟為主要形式，而是以雙邊合作為基礎而形成的地區聯盟體系，這些體系包含美日聯盟、美韓聯盟、美澳聯盟及美菲聯盟等多個雙邊安全合作體制。最近幾年，美日同盟的地位已經超過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其他同盟關係，成為美國干預亞太事務的最重要工具。日本之所以能夠成為美國在亞洲及太平洋地區的核心同盟國，其主要原因有二：1. 日本的經濟實力雄厚，在亞太地區有著巨大的影響力；2.日本處於亞太地區潛在熱點地區的「前沿」，它可以在未來美國干預亞太地區事務上發揮更加突出的作用。¹³為了加強美日戰略合作，日本積極參與飛彈防禦系統，日本於2005年與美國彈道飛彈防禦計劃相關的研發經費即達10億美元，未來10年更將投入達100億美元的經費。¹⁴

2001年7月6日日本內閣會議通過「21世紀擁有一支精銳強大之自衛隊」的《2001年防衛白皮書》，白皮書指出日本防禦重點由「北」改「西」，提出多邊保障理論，確立攻勢防衛的軍事戰略，並將防衛體系由內向型轉變為外向型。¹⁵據此，日本先後成立緊急動態部、對付重要事態會議、最初行動指揮小組、陸上自衛隊研究本部等重要防衛機構；2003年6月更通過包括《武力攻擊事態處理法》、《安全保障會議處理法》及修正《自衛隊法》之所謂「有事三法」。此外，日本不斷修改《美日防衛合作指針》，擴大軍事干預「周邊有事地區(Situations in Areas Surrounding Japan)」¹⁶的行徑，並不斷擴充軍力，研製新型裝備，如艦載直升機、空中加油技術、海上補充平台等等。日本這些舉動對一個急需要和平周邊環境的中共而言，是一大隱憂。因此中共外交系統認為，為了防堵日本軍國主義再度崛起，維持與美國的友好互動關係，使美國不視中共為一個威脅國家，並削弱美日防衛合作之合法化理由，對中共的國家發展較有利。

4.降低美國對台灣之軍事協助

中美兩國關係中，最為核心及敏感之問題就是台灣問題。外交系統認

¹³ 魏靜，「從軍事合作看美日安保體制的重大變化」，《國際在線》，2004年9月27日。

¹⁴ James Kitfield, "Dragon, Eagle, and Rising Sun," *Air Force Magazine*(June 2005): 65.

¹⁵ 日本防衛廳，2001年防衛白皮書(東京：財務省，2001年)。

¹⁶ 「周邊事態」是指六種類型：在日本周邊地區發生武力爭端；在日本周邊地區即將爆發武力爭端；因某個國家政治體制的混亂而出現大量難民，難民湧入日本的可能性很大；某個國家的行為被聯合國安理會裁定是對和平的威脅或侵略行為，這個國家因此成為經濟制裁對象，並將對日本的和平與安全產生重要影響；某個國家發生內亂或內戰，情況已擴大到國際範圍而不再是單純的國內問題；發生在日本周邊的武力爭端業已停止，但秩序尚未穩定和恢復。

為，美國提升與台灣的軍事交往，並繼續對台出售大批先進武器裝備，嚴重危害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¹⁷美國於 1991 年出售台灣 110 輛 M60A3 戰車；1992 年同意售台 150 架 F-16 戰機、租台 3 艘諾克斯級巡防艦、207 標準飛彈；1993 年售台 200 枚愛國者飛彈及相關裝備等。這些武器在當時雖然不是最先進的裝備，都構成現今台灣防衛安全的主力，更重要的是，美國軍售台灣重要軍事裝備，其所帶來的政治意義格外深遠。

1995-1996 年解放軍對台演習後，美國意識到台灣安全及區域防線的重要性，對台軍售進入「強化階段」，除了軍事硬體上的持續提供外，開始對於台灣軍隊指管通情系統和人員等軍事軟體上的強化進行評估和研究，並進一步提升雙方人員接觸和開拓聯繫管道，達到 1979 年兩國斷交以來未有的程度。此期間美國對台軍售項目包括 AGM-84A 魚叉式空對艦飛彈、21 架 AH-1W 超級眼鏡蛇直升機、13 架 OH-58D 戰蒐直升機、4 架 S-70C 反潛直升機、刺針防空飛彈、MK46 魚雷、長程雷達預警系統、地獄火 II 型空對地反裝甲飛彈、2 架 E-2T 2000E 鷹眼預警機、AIM-120 中程空對空飛彈等，以及各式提升台灣軍隊電子戰力的軟硬體，這些武器都已接近美軍現役多數裝備戰力。¹⁸小布希政府更突破過去軍售框架，具體協助台灣建立較具嚇阻程度的武力，2001 年 4 月 28 日同意向台灣出售價值 40 多億美元的武器，其中包括 4 艘基德級驅逐艦、8 艘柴油動力潛艇、12 架 P-3C 獵戶座反潛偵察機及海龍掃雷直升機等武器。此項軍售案使得美台軍事合作關係進入斷交後的最高峰。

為了阻止美國繼續出售武器給台灣，外交系統頻頻釋出善意，積極推動中美間領導人互訪及軍事交流合作，希望藉由與美國保持友好關係以防止美國與台灣軍售關係的繼續。

5. 解決共同關切之重要問題

中共承認美中國力差距之現實，默許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之重要角色，避免訴諸權力對抗，強調共同利益，並亟思強化自身之區域角色。中共與美國在諸如防範核子武器擴散、恐怖主義與能源安全等跨國議題上，享有許多重要的共同利益。

¹⁷ 2001 年 4 月 24 日中共外交部發言人章? 月就美國即將出售台灣武器問題時指出，「中國政府一貫反對美國向台灣出售武器，堅決反對美國向台灣出售『基德』級驅逐艦、常規動力潛艇、P-3C 反潛巡邏機等先進武器裝備。中方已就此多次向美方提出嚴正交涉。美國政府如不顧中方反對，執意向台灣出售上述武器裝備，將嚴重違反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特別是『八一七』公報的規定，嚴重侵犯中國的主權，粗暴干涉中國內政，加劇台海地區緊張局勢，並危害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外交部發言人要求美方在售台武器問題上慎重行事，*新華網*，2001 年 4 月 24 日。

¹⁸ 吳明杰，「美強化對台軍售 中國干預力漸弱」，*中國時報*，2002 年 2 月 19 日，版 13。

近年來，中共擴大宣傳與美國在國際安全與全球經濟發展上的共同利益。在安全議題上，中共致力就美國關切之反恐、打擊販毒走私犯罪等議題上加強合作，對外強調可扮演區域穩定者之角色；經濟上，中共強調將持續擴大雙方經貿交流，強調雙方互賴關係，以營造有利於中共經濟快速發展的環境。以北韓核武事件為例，為了穩定周邊安全環境及排除美國在東北亞的主控權，中共積極的介入北韓核武危機，促成三方會談與六方會談。¹⁹由三方會談及六方會談的過程中可以發現，中共在北韓議題上的積極角色，反映出外交政策的變化，中共已開始進一步融入世界秩序，中共除了安撫不安的鄰國外，同時也抓住北韓核武危機的機會，讓自己成為國際社會中具有影響力和負責任的一員。

(二) 解放軍系統對中美關係之看法

解放軍對於外交系統處理對美關係之方式相當不滿，其認為美國在亞太的軍事部署與交流行為主要是為了圍堵中共與鼓勵台獨。近年來，美國與亞太國家進行交往關係勢必會擠壓中共在此地區的戰略空間，美國如此的舉動將對中共睦鄰外交政策的推動產生負面之影響。此外，美國持續對台出售武器，也使得解放軍對美國的行徑感到不悅。

1. 圍堵中共

美國國防部完成《亞洲 2025 年》的研究報告指出，美國的基本戰略在於確保美國享有全球的唯一超強地位。²⁰美國國家戰略的首要目標在於防止競爭強權的崛起。在此目標的指導下，以美國總統布希的特別助理、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高級主任哈利紮德(Zalmay Khalilzad)為首的一個專家小組發表一份有關美國亞洲新戰略的研究報告-《美國和亞洲：走向新的美國戰略和軍事部署(The United States and Asia: Towards a New U.S. Strategy and Force Posture)》。報告中論及，在過去二十多年裏，亞洲戰略環境發生顯著的變化。從東北亞、東南亞到南亞地區，仍然存在著對和平與繁榮的潛在威脅。為了應付亞洲地區的新挑戰，美國必須開始建構一個相互協調的綜合性亞洲新戰略，實行亞洲新戰略的必要前提是繼續保

¹⁹ 2003年4月23至25日在北京召開的三方會談是北韓核武危機後的首次會談。在此次會談中，美國、北韓與中國三方各自表述立場，會談並未獲致重大突破，惟三方均期盼和平解決該項危機，並同意透過外交管道繼續保持聯繫；六方會談(南北韓、中國、美國、日本及俄羅斯)已舉行過四輪，分別於2003年8月25日、2004年2月28日、2004年6月23日及2005年9月13日舉行，在這四次的六方會談中，雖然美國與北韓仍然存在分歧的意見，北韓的立場是，只要美國放棄敵視政策，願意放棄核計劃；美國在會談中闡釋對北韓無敵意、無意入侵北韓、無意改變北韓政體的立場。美國方面同時也希望棄核必須不可逆轉，接受查核。雖然兩國沒有達成任何共識，但是會中各國仍重申和平解決朝鮮半島問題的立場。

²⁰ Robert G. Kaiser, "2025 Vision: A China Bent On Asian Dominance," *Washington Post*, March 17, 2000.

持美國在全球事務中之主導權，戰略目標是在亞洲地區阻止一切可能導致戰爭的對抗性競爭、相互猜疑和不安全因素之增長。²¹由此份報告的內容得知，布希上任後，美國的亞洲戰略並沒有作太大的改變，美國亞洲戰略的主要內容仍是以防止區域霸權的產生及促進亞洲的和平穩定為主。因此，美國亞太戰略目標是追求一個安定、繁榮及和平之亞太地區，防止中共在此區域形成區域霸權，並希望在此區域扮演一個積極的參與者兼受惠者。

解放軍認為美國擁有日本、澳洲、南韓、泰國和菲律賓等盟友，此外美國也透過東南亞、中亞及高加索地區的前蘇聯衛星國持續牽制中共。為強化對中共的圍堵，美國加強與東亞各國間的軍事合作，美國與菲律賓、泰國維持雙邊軍事同盟關係，1992年美菲達成非正式協議，菲國允許美國機艦進行加油、維修與補給，美國軍艦不僅可以在蘇比克灣(Subic Bay)海軍基地停靠，亦可在菲國其他港口停靠。²²另外，1992年1月美國復與新加坡達成協議，美國第七艦隊後勤分隊二百人將遷至新加坡，同年7月美國「西太平洋後勤組指揮部」正式在新加坡運作；1992年1月底汶萊同意與美國舉行聯合軍事演習；同年2月美國與馬來西亞達成使用軍事設施協議，美國太平洋艦隊從該年4月起在馬來半島西岸的紅土坎(Lumut)海軍基地進行維修；4月底印尼同意美軍使用泗水港(Surabaya)船塢進行維修。²³

另外，美國與東南亞國家已達成一系列協議，獲得這些國家基地、機場、港口、維修補給和後勤保障設施的使用權。2000年5月菲律賓國會批准《美菲部隊訪問協議(Visiting Forces Agreement)》，²⁴菲律賓蘇比克和馬尼拉港(Manila)開始對美艦開放，美國可派軍艦訪問菲國及舉行聯合軍事演習。2000年11月美國與新加坡達成一項軍事準入協議。根據該協議，美軍艦(包括航母)從2000年起可使用新加坡樟宜海軍基地，樟宜海軍基地工程的首期已於2001年1月完成，全部工程2003年6月完成。建成後的基地可容納包括航空母艦、巡洋艦等在內的大型艦艇編隊進泊。911事件後，菲律賓同意美軍飛機飛越菲律賓，並允許美軍使用克拉克(Clark)空軍基地和蘇比克海軍基地。美軍特種部隊目前已在菲律賓的安德魯(Edwin Andrews)空軍基地修建直升機起落場和軍營；泰國也向美軍

²¹ Zalmay Khalilzad, *The United States and Asia: Towards a New U.S. Strategy and Force Posture*(California: RAND Corporation, 2001).

²² 陳鴻瑜，「美國自菲律賓撤軍及其與東南亞之安全關係」，*美國月刊*，第8卷第3期(1993年3月)：頁38。

²³ 參閱自*聯合早報*(新加坡)，1990年11月14日，版1；*聯合早報*(新加坡)，1992年4月11日，版8；陳鴻瑜，「美國自菲律賓撤軍及其與東南亞之安全關係」，頁38-39。

²⁴ 在此協議中，菲國對雙方爭執已久的觸犯菲國法律之美國士兵初步審判權做出重大讓步，允許美國有審判權。

提供軍事設施，並允許美國軍機飛越領空。²⁵

911 事件發生後，美國積極地與中亞國家接觸，並獲得中亞各國軍事合作的支援。在美國勢力進入阿富汗後，美國已與哈薩克、烏茲別克、塔吉克和吉爾吉斯等國建立軍事合作關係，這些舉動引進美國勢力至中亞地區，進而導致中共周邊安全戰略受到波及，使中共飽受美國來自四方的包圍，形成孤立的狀態。現今中共學者普遍相信，中共已取代前蘇聯成為美國的主要假想敵，並認為美國正開始對中共進行戰略包圍。²⁶美國國防部在《2004 年中共軍力報告書》中指出，「中國的領導者已獲致結論，即美國所領導對恐怖主義的全球戰爭之淨效應，應是對中國進一步的包圍，而美國駐軍中亞，加強與巴基斯坦、印度、日本的防衛關係，以及軍事上重返東南亞均為其具體行動」。²⁷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圍堵行為使解放軍感到憂慮及反感，因此近年來，除了大幅提升國防預算外，並自俄羅斯大量進口先進及攻擊性的武器，企圖對美國進行反制。

2. 鼓勵台獨

中美軍事交流乃至中美兩國關係，其中最敏感的問題就是台灣問題。解放軍認為台灣問題純屬中國的內政，不容任何外來勢力干涉。2002 年 12 月 11 日中共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梁光烈於北京會晤美國副國務卿阿米塔吉時表示：「兩國的軍事關係是雙邊關係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共樂意在互信互惠與增進瞭解的基礎上促進兩國軍事關係。」同時也說：「台灣議題向來是中美關係裡頭最為重要與敏感的議題，希望美國信守對中共政府的承諾並妥適處理對台軍售問題。」²⁸解放軍認為美國即使是向台灣出售一發子彈，也是在實質上支援台灣與祖國的分裂活動，干涉中國的內政。因此在 2001 年 4 月美國售予台灣武器後，解放軍報即刊登一份題為「美國背信棄義禍莫大焉，評美國對台軍售」的報導，文中提及「美國的武器？『台獨』分子壯了膽、打了氣。美國賣給台灣的武器越多越先進，『台獨』分子就越猖狂。美國賣給台 F16 戰鬥機，李登輝就搞出一個『赴美訪問』，導致中美關係受到傷害。美國向台出售預警飛機和愛國者導彈，李登輝『兩國論』隨後=出籠。美國售台先進武器，增加了台灣當局拒絕與祖國大陸和談統一的一點底氣，也使島內『台獨』勢力？生台灣已有實力與大陸抗衡的錯覺。這無疑將

²⁵ 有關 2000 年後，美國與東南亞國家的軍事協議內容，可參閱陳喬之，「美國重返東南亞及其對中國的影響」，*視野周刊*網站。

²⁶ “北京加緊建構國際抗美統一戰線”，*中國時報*，2001 年 5 月 15 日，版 13。

²⁷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Annual Report on The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Report to Congress Pursuant for the FY2000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2004.

²⁸ “PLA chief meets with U.S. deputy secretary of state,” *embass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 11, 2002.

增加台灣海峽局勢走向不確定性和危險性，可謂禍莫大焉。²⁹

解放軍系統對於美國持續在亞太駐軍，並且對台灣進行軍售，尤其是在 1992 年批准對台軍售 150 架 F16 戰機及在 1996 年台海危機時派航空母艦巡航台海附近之行為，視為美國在軍事上對中共的挑釁。此外，美國近年來計劃在亞太地區設置「戰區飛彈防禦系統 (Theater Missile Defense)」，有意將台灣納入其中，更使中共憂心忡忡，頻頻試射中長程彈道飛彈，³⁰對美國顯示捍衛領土主權完整的決心，並且積極推行軍事現代化。

國防大學和軍事科學院在 1994 年 5 月共同召開會議，主題是「中國的外交及對台灣的政策」，會議中強烈批判外交系統對美政策的錯誤，包含容忍美國干涉中國內政、沒有批評美國對台軍售、沒有強烈抗議美國及英國反對中國舉辦 2000 年奧運。解放軍系統認為外交系統為了獲得中美間正常貿易的關係，而對美國妥協，並容忍美國干涉中國內政。³¹解放軍主張在國家安全或領土主權的外交議題上，中共應採取強硬態度，以遏止美國的圍堵及干涉內政行為。

第二節 軍機擦撞事件

2001 年 4 月 1 日駐紮琉球的一架美國海軍 EP3 偵察機在臨近海南島的南海上空執行偵察任務時，遭遇兩架中共殲 8 乙型戰機攔截，其中一架與美機擦撞，美機受損迫降海南島陵水軍用機場，中共戰機墜入海中，飛行員生死不明，另一架則返航。整個軍機擦撞事件的經過如表 5-1 所示。

²⁹ 王衛星，「美國背信棄義禍莫大焉，評美國對台軍售，」*解放軍報*(北京)，2001 年 4 月 27 日。

³⁰ 近年來，中共試射的中長程飛彈包括東風 31 型長程飛彈、東風 21 型中程飛彈，以及巨浪 2 型飛彈，巨浪 2 型是東風 31 型的潛艦發射版。

³¹ Xiaoming Huang, "Managing Fluctuations in U.S-China Relations: World Politics, National Priorities, and Policy Leadership," *Asian Survey*, Vol. XL, No. 2, March/April 2000, pp.272-279.

表 5-1 軍機擦撞事件經過大事紀

日期	中共	美國
4月1日	美國偵察機及機上 24 名機組人員被扣留在海南島。中共外交部發布聲明，將此事件歸罪於美軍機。	太平洋總司令布萊爾(Dennis Blair)表示此一事件的起因，實與中共戰機挑釁並過於迫近美機有關。
4月2日	外交部重申 1 日之聲明。中央軍委副主席張萬年指出，中共按照外交慣例，容許美國偵察機人員立刻會見美國領事館人員，而且這件事也將通過外交途徑解決。	美駐北京大使館武官會同駐廣州總領事館人員前往海南島計劃與 24 名機組人員會面，並要求中共依國際慣例將原機及機上人員遣返，同時美方令三艘美驅逐艦在海南島附近公海停留待命。在白宮，布希總統召集國家安全幕僚研商，會後公開要求中共當局儘速允許美使領人員與機組人員會面。
4月3日	中共表明不需要外力協尋落海之飛行員，請美艦駛離南海。同日，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要求美方負起責任。	美國大使館領事人員終於獲准與 24 名機組人員會面。
4月4日	江澤民赴拉丁美洲訪問前夕，在北京二度就此事件表態，要求美國應向中共人民道歉。中共外長唐家璇隨後召見美國大使，要求美方認識此一問題之嚴重性。	布希總統對軍機擦撞事件態度轉趨強硬，在白宮發表談話，要求中共歸還美偵察機及機組人員，以免損害雙邊關係。國務卿鮑爾則對中共折損一名飛行員表示「遺憾(Regret)」。
4月5日	外交部重申美國必須負起完全責任並道歉，且採合作態度，中共始考慮再次安排美使領人員會見機組人員。	美國與中共官員展開密切接觸謀求解決。布希總統首度對軍機擦撞事件表示「遺憾(Regret)」，並表示該事件不應導致雙邊關係不穩定，惟中共必須儘速交還偵察機及機組人員。
4月6日		美國大使館領事人員再度探視 24 名機組人員，同時美國建議兩國共同調查軍機擦撞事件，查明責任歸屬。

4月7日		布希總統證實雙方談判「已有進展」。
4月8日	解放軍報宣稱北京有權「徹底調查」這些美軍和偵察機，並要求美方停止在中國沿海附近執行偵察任務。外交部發言人則對於美方說出 Sorry, 表示是朝解決問題的正確方向邁進一步。	鮑爾國務卿對於中共折損一名飛行員表示「抱歉(Sorry)」，但警告該事件僵持不下，正使兩國關係逐漸受到傷害。
4月9日		布希總統警告稱：「每過一天，吾人與中共關係受損的可能性不斷增加，希望此事儘速解決」；鮑爾國務卿則表示，此一事件可能影響美國國會對台灣軍購需求的態度。
4月10日		撞機事件陷入僵局，美國國務院勸告美國會議員取消赴中共訪問計劃。
4月11日	外交部長唐家璇接受美方致歉函時表示，鑒於美國政府已向中共人民致歉，基於人道考量，中共政府決定允許 24 位機組人員在履行必要手續後離境。美政府旋即包租一架民航機接運其人員至關島。	美國駐北京大使正式向中共外交部長唐家璇遞交致歉函。
4月18日	中美談判代表團在中共外交部大樓正式開始談判，雙方同意保持接觸，並通過外交途徑確定下一次會談的具體事宜。	
5月27日	同意讓滯留在海南島陵水機場的美國偵察機拆開後，再用一架商用運輸機運回美國。	

資料來源：整理自陳錫蕃，「南海軍機擦撞事件」，《國家政策論壇》，第 1 卷第 4 卷(2001 年 6 月)：頁 53-56。

美國偵察飛機與中共戰鬥機相撞後，中共政治局常委立即在中南海召開緊急會議，軍方高級將領和國家安全部官員也列席會議。江澤民以外事領導小組組長和中央軍委主席的身份主持會議，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則以外事領導小組副組長的身份，做了長篇發言。會議開始，江澤民很快列出三項原則：第一、中共領導人不能在「鷹派布希政府」面前表現軟弱，以免受到國內民眾的批評。同時，也不能再次出現類似 1999 年北約轟炸中共駐南斯拉夫大使館的示威抗議活動；第二、北京必須在美國新政府剛上台的時候「教訓布希」，主要是布希在台灣和部署反導彈系統的言論惹怒北京，因此必須稍稍羞辱一下新總統；第三，關於間諜飛機和機組人員的談判，不要超過兩個星期。江澤民言及，必須維持與超級大國的長期關係，為了這個目的，北京應當採取靈活策略，讓雙方都保有面子。³²

實際上，在中美撞機事件中，江澤民一方面要照顧民意及中共中央軍委的期望，必須堅持美國道歉；另一方面，為了長遠的中美關係，江澤民也不希望因為撞機事件而導致中美關係受到阻礙。如同中共問題分析家林和立(Willy Lam)所分析，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在中美撞機事件整個過程中，掌控全局，他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能在與美國維持長期關係的前提下，「教訓一下布希(Teach Bush a Lesson)」，因此江澤民主張，北京應在表面強硬的同時，採取靈活的策略。³³

在整個撞機事件中，外交系統的態度希望繼續維持與美國友好關係，而解放軍系統的態度是希望美國必須道歉，立即停止對中國沿海的軍事偵察活動和作出賠償。在這兩股勢力的拉扯中，江澤民確立靈活策略，在會議結束前，政治局常委會要求主要媒體發表評論，抨擊美國「新霸權主義」，吹捧解放軍的愛國主義，同時命令所有大學制止學生上街示威，隨後，江澤民和錢其琛及其助手敲定所謂的「道歉外交」。³⁴有關撞機事件中，外交系統與解放軍系統的立場，分述如下：

一、外交系統

中共對美國的重大外交決策由中共中央外事領導小組和外交部作出並負責執行，即使雙方軍事上有問題，在中共一方也是由外交系統出面。³⁵4月1日外交部發言人朱邦造就美國軍用偵察機在南海空中撞毀中共軍用飛機事件發表談話。他指出，「中共軍用飛機在中國沿海對美國軍用偵察機實施跟蹤監視，屬於正當的飛行活動，符合國際慣例。中方飛機墜毀的直接原因，是美機違反飛行規則突然向中方飛機轉向、接近造成的。發生這一事件的責任完全在美方。中方已

³² Willy Lam, "Diplomatic Pain, Political Gain for Jiang," *CNN*, April 11, 2001.

³³ Willy Lam, "Diplomatic Pain, Political Gain for Jiang".

³⁴ Willy Lam, "Diplomatic Pain, Political Gain for Jiang".

³⁵ 古呂，「軍事熱線不熱北京避免受控」，《太陽報(香港)》，2005年10月24日。

就此向美方提出嚴正交涉和抗議，對美方給中方造成損失問題，中方保留進一步交涉的權利。」³⁶

4月2日中共外交部向美方進一步提出嚴正交涉。朱邦造再次強烈敦促美方認真對待中方嚴正交涉和正當要求，認真配合中方的調查，盡快就美方飛機撞毀中方飛機並侵犯中國主權和領空的行徑向中國政府和人民作出解釋，向中方道歉，並承擔全部責任。³⁷朱邦造並於4月3日向媒體介紹美國軍用偵察機日前撞毀中共軍用飛機事件和侵犯中國主權及領空的真相，並闡明中方有關立場。對美方飛機撞毀中方飛機並侵犯中國主權和領空的行徑，中共外交部向美國政府提出嚴正交涉和抗議，指出美方對此事件負有全部責任，強烈要求美國政府就美方飛機撞毀中方飛機並侵犯中國主權和領空的行徑向中國政府和人民作出解釋，並採取切實有效措施防止類似事件再次發生。³⁸

對於中共外交部的發言，美國的第一個回應是由國務卿鮑爾在4月4日對中共折損一名飛行員表示「遺憾(Regret)」。³⁹之後，中共外交部發言人孫玉璽立即於4月5日說是「朝著正確的方向邁進一步」，但仍強調要有正式的道歉。⁴⁰鮑爾在4月8日又突破性、意味深長的使用「Sorry」一語，但是令美國談判者和國際媒體吃驚的是，北京官員和媒體對於美國的善意幾乎保持沈默，相反地，之後中共官方媒體充滿國防部長遲浩田的鷹派聲音。

鑒於1999年北約轟炸中共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事件所煽動起來的民族主義情緒險些失控，因此此次北京對於軍機擦撞事件就非常謹慎對待。首先是只能由外交部出面說話，其次是只能由新華社統一發佈消息。如此作為的最主要目的是防止軍方出來煽動對中共決策層施壓，並且造成局面失控。⁴¹對於外交系統而言，美國的「道歉」是外交系統可接受的結局，因此在美國駐中共大使普魯赫(Joseph W. Prueher)於4月11日下午，正式向中共外交部部長唐家璇遞交致歉信，⁴²正式對飛行員王偉的失蹤、飛機的墜毀及飛機未經口頭許可而進入中共領空降落深表歉意(Very Sorry)後，唐家璇隨即表示，鑒於美國政府已向中國人民致歉，基於人道考慮，中國政府決定允許24位機組人員在履行「必要手續」後離境。⁴³

³⁶ “就美國偵察機撞毀中國軍用飛機事件外交部發言人發表談話，” 人民網，2001年4月1日。

³⁷ “外交部發言人朱邦造談美國軍用偵察機撞毀中國軍用飛機事件真相和中方有關立場，” 人民日報(北京)，2001年4月3日。

³⁸ “外交部發言人朱邦造談美國軍用偵察機撞毀中國軍用飛機事件真相和中方有關立場，” 人民日報。

³⁹ “Powell: 'We regret' Chinese pilot's loss,” CNN, April 4, 2001.

⁴⁰ “孫玉璽稱美國表示‘遺憾’是朝正確方向邁出一步，” 人民網，2001年4月5日。

⁴¹ 口峰，”從撞機事件看中美角逐，” 中國之春，2001年5月。

⁴² “The letter that led to release of U.S. crew,” CNN, April 11, 2001.

⁴³ “美國正式致歉 中國同意放人，” 大紀元，2001年4月11日。

二、解放軍

冷戰結束後，美國退出歐洲與蘇聯的冷戰戰場，將注意力轉向東方，逐漸擴大在東方的情報蒐集工作。⁴⁴在面對中共軍演的頻繁及軍事力量的提升，美國時常出動偵察機至中共沿海進行監視，並收集相關中共軍備的訊息，以瞭解中共國防能力。據中共軍方透露，自 2000 下半年，美軍明顯增加對中共的偵察飛行，一周往往進行四到五趟的任務，且通常只距大陸沿海 80 公里。⁴⁵美國之所以決定增加偵察飛行是為了發揮威懾作用，其認為若對中共軍方的運作瞭解愈多，則中共對台灣發動攻擊的可能性就愈小。

數十年來，一直只有看守本國領空的中共空軍，近年來開始飛向國際海域的高空，派機攔截美國偵察機的次數愈趨頻繁，且異於往常的愈飛愈近，根據美國海軍官員表示，大概每三次偵察任務會碰到中共派機緊急升空攔截。⁴⁶研析中共對美國偵察機態度改弦更張的理由有三點，第一、在空軍屈居第二流的劣勢多年後，中共終於取得精密戰機，可以在遠洋上空大顯身手；第二、中共的經濟大幅成長，中共許多大企業不再侷限在內陸，而遍佈海岸線一帶。中共的戰略家從此將注意力移轉到海路，以及遠離中共的各海島上；。第三、中共與台灣的關係日漸緊張，為了逼台灣就範，承認一個中國，中共在台灣海峽彼岸集結大批飛彈、海軍和空軍。1996 年中共甚至在台灣附近海域試射飛彈，以展現實力。⁴⁷

2001 年 4 月 1 日發生軍機擦撞事件後，解放軍首次對此事發表言論者為中共軍委副主席張萬年。他於 4 月 2 日會見澳洲外長、國防部長等官員時表示，中共方面已經同意美方使館人員會見 24 名機組人員，而這個事件也將透過外交途徑解決。⁴⁸4 月 4 日中共國防部發言人就美國偵察機撞毀中共軍用飛機事件發表談話，「多年來，美國軍用偵察機頻繁對我沿海實施抵近偵察，我機對其實施跟蹤監視，完全是正當的，符合國際法。此次撞機事件的直接原因，是美機違反飛行規則，突然大動作向我機轉向造成的。我們對美機這種行為表示憤慨和譴責，美方對此事件必須承擔全部責任。中方對美方造成中方的損失保留進一步交涉的

⁴⁴ “『中美撞機』情蒐行家 卯上強硬對手，”*世界日報網*，2001 年 4 月 5 日。

⁴⁵ “中美空中交鋒 年來日益頻繁，”*大紀元*，2001 年 4 月 7 日。

⁴⁶ 此次撞機事件的主角 EP3，其在海南附近偵察的主要目標即是中共兩種新型潛艇，一是仿製俄國 Kilo 級中共版的常規動力潛艇(九四型級核攻擊潛艇)，另一艘則是備受美軍注意的九三型核攻擊潛艇。這兩艘潛艇在這一帶海域不僅實施例行演訓，還試圖建立一套新的戰術準則而引起美軍關注，因為這兩型潛艇均對美國航艦編隊構成巨大壓力，故美國相當重視這兩型潛艇的活動與部署。有關美國 EP3 的偵察目的及中美空中交鋒情形可參閱元樂義，「殲八阻攔 EP3 所為何來？」，*中國時報*，1991 年 4 月 5 日；“中美空中交鋒 年來日益頻繁，”*大紀元*。

⁴⁷ “『中美撞機』情蒐行家 卯上強硬對手，”*世界日報網*。

⁴⁸ “張萬年：撞機事件將循外交途徑解決”，*聯合早報*(新加坡)，2001 年 4 月 4 日。

權利。我們對我失蹤飛行員的下落表示關注，並將繼續採取措施全力進行搜救。」

49

中美撞機事件發生以來，中共軍方對美方不道歉又要求中共立即交還人機的態度，一直十分不滿。繼中共軍委副主席、國防部長遲浩田藉由探望失蹤飛行王偉之妻阮國琴時，公開表達軍方強硬立場外，⁵⁰解放軍報 8 日也發表「霸權主義，法理不容」的署名文章，指出解放軍有權力全面調查事件各個方面--包括機組人員和飛機，這種提出的要求和作法比中共領導人和外交部的口徑還嚴峻。⁵¹

事實上，直到 3 日的中共外交部記者會，中共外交部還只表示美方使館人員「近期」將可以會見機組人員，但當天晚上，美方使館人員即首度與機組人員會面，顯然張萬年在 4 月 2 日透露的訊息更早且更準確於中共外交部；另外，張萬年明確指出這個事件將透過外交途徑解決，也有別於中共外交部一再對國際法及中共國內法問題的強調。這兩個問題的交集，事實上證明張萬年雖然出訪在外，但中共軍方已經深度參與撞機事件的處理過程，而不善於外交辭令的張萬年，在接受澳洲外長詢問時，就很自然地透露訊息。⁵²張萬年在澳洲透露的口風，證明在撞機事件初期，中共軍方，或者說張萬年的人馬參與內部決策過程。

在撞機事件發生後的前幾天，中共外交官員雖然希望能儘速解決危機，但解放軍堅持不讓外交人員探視機員，由軍方管制的陵水機場更是拒絕任何與外界的接觸管道。⁵³由此可知，在此次撞機事件中，江澤民受到強硬派的巨大壓力，尤其是人民解放軍。軍方對於外交部門與文人領導的危機處理有較強硬的要求，解放軍希望美方必須道歉、立即停止對中國沿海的軍事偵察活動和作出賠償。觀察遲浩田強硬的語氣，西方分析家普遍感受到軍方對於外交部門的處理方式並不滿意，若再拖下去，對立的氣氛可能越顯濃厚，中共十六大的接班問題可能因此提前引爆，這對許多中央領導幹部來說，是一想到就會頭皮發麻的事。⁵⁴可見，在撞機事件中，解放軍的態度比中共中央還強硬。

據日本媒體報導，中共國安小組在軍機擦撞事件中，首次發揮危機處理功能。組長是江澤民，成員包括胡錦濤（國家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錢其琛

⁴⁹ “國防部：對美造成我損失保留進一步交涉權利，”*人民日報*（北京），2001 年 4 月 4 日，版 1。

⁵⁰ 遲浩田在探望中共墜海飛行員王偉的妻子阮國琴時居然對美國提出警告說，如果美國還想推卸責任，「人民解放軍不答應」，其後，遲浩田又在會見外賓時，再次要求美國必須道歉。

⁵¹ “撞機事件 解放軍態度比中央還強硬，”*聯合報*，2001 年 4 月 8 日。

⁵² 朱建陵，”處理撞機事件 中共軍方角色耐尋味，”*中國時報*，2001 年 4 月 9 日，版 13。

⁵³ “解放軍一度主導撞機事件決策權，”*大紀元*，2001 年 4 月 16 日。

⁵⁴ 整個撞機事件中，解放軍一度主導決策權，如同季辛吉(Henry Kissinger)所認為，由於 2002 年中共「十六大」及 2003 年的換屆會議，軍方在領導層交接之際，無疑將扮演重要角色。有關解放軍在領導交接時之角色扮演分析，可參閱“解放軍一度主導撞機事件決策權，”*大紀元*，2001 年 4 月 16 日；吳釗燮，”美中危機軟著陸 台灣如何解讀因應，”*中國時報*，2001 年 4 月 12 日。

(副總理), 軍方成員有張萬年(中央軍委副主席) 熊光楷(副總參謀長)等。據軍方消息表示, 在這次軍機擦撞事件中, 國防部長遲浩田及總參謀長傅全有等軍委成員都加入危機處理小組。⁵⁵ 解放軍對江澤民提出質疑、反對和四個「不理解」: (一) 不理解為什麼有關國家主權、民族尊嚴的大事, 不經過集體討論, 就做出新的決定; (二) 不理解為什麼在美國對撞毀我機、進入我領空未作正式道歉前, 就改變原先立場, 使軍方難以接受; (三) 不理解今後如何處理美國軍機、軍艦在沿海的偵察、騷擾活動; (四) 不理解黨委如何對其下部隊、單位的黨委及官兵作解釋, 此勢將影響軍隊的士氣。⁵⁶ 面對軍方的不配合, 江澤民親自和遲浩田、傅全有、於永波、張萬年等軍隊領導者通電話, 強調要從全局和中、長期戰略角度來看待此事件, 並承諾「由於霸權主義對中國及世界戰略不會改變, 所以中國必須發展及擁有高科技震懾的武器, 這是既定的方針」這種對解放軍有利的條件,⁵⁷ 才使得軍方作出讓步, 並接受「道歉外交」政策。亦即美中撞機事件使得中共國內的民族主義和軍事現代化結合在一起, 解放軍加大國防軍備投資提供了更有利的理由。

中共文職領導人一般較為審慎, 他們必須考慮解放軍的軍事實力、經濟後果、國際反應, 及其它許多不成熟攤牌政策的可能後果, 因此江澤民在外交政策始終堅持「不對抗」政策。⁵⁸ 在中美軍機擦撞事件中, 中共即展現相當的克制與理性。儘管外界擔心解放軍在外交決策過程中, 影響力會不會凌駕外交系統之上; 也有人擔心, 毛鄧等威權型政治領袖不在, 江澤民到底能不能掌控全局, 能不能拍板決定放人, 中共仍以實際行動證明, 江澤民能夠掌控一切, 而整個北京的決策過程仍相當理性。當中共發現, 撞機危機若再持續下去, 可能會影響中美關係的時候, 中共就當機立斷, 將「Very Sorry」解釋為它所想要的深表歉意, 然後決定放人。這段處理危機的過程也已經證明, 中共非常重視與美國的關係,⁵⁹ 亦即為了國家經濟發展, 軍隊屈服於外交系統的意見, 在對美外交決策中, 支持以「友好」關係作為最大原則。

第三節 台灣問題

1971年前, 中共在毛澤東主政下, 中共對台政策的主軸是以武力來解放台

⁵⁵ “江逞英雄朱背黑鍋,” 大紀元, 2001年4月12日。

⁵⁶ 羅冰, “對撞機事件處理有歧見, 軍方拒表態支持江澤民,” 爭鳴月刊(2001年5月): 頁8-9。

⁵⁷ 中共軍隊預算在2001年增加了16.3%; 2002年增加了15.6%。羅冰, “對撞機事件處理有歧見, 軍方拒表態支持江澤民,” 爭鳴月刊(2001年5月): 頁10。

⁵⁸ 由冀, “中共對台政策與解放軍角色轉變,” 中國時報, 2002年12月18日。

⁵⁹ “美軍機組人員回家了,” 中央日報, 2001年4月13日。

灣，和談只是一種宣傳或是統戰之策略運用。1979年1月1日美國與中共建立正式外交關係之同一日，中共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宣布停止對金馬外島的砲擊，表示在解決台灣問題時，會尊重台灣現狀和各界人士意見，採取合理措施，不使台灣人民蒙受損失，並呼籲台海兩岸進行「三通四流」。⁶⁰1983年6月26日鄧小平在接見美國紐澤西州西東大學楊力宇教授時，提出「一國兩制、和平統一」的概念。1993年9月中共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和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聯合發表《台灣問題與中國的統一》白皮書，首次以政府文告形式，系統闡述台灣問題的由來和中國政府解決台灣問題的基本方針。⁶¹自此，中共對台政策即以「一國兩制、和平統一」為基本論調。

一、外交系統與解放軍對台政策

台灣問題的處理牽動著共產黨及其領導人之領導地位的穩固，共產黨領導統治中國合法性的根源、追求綜合國力的提升及強化國際影響力的關鍵，⁶²因此中共領導者對於台灣問題的處理抱持相當謹慎之態度。中共對台決策核心是以外交部為主，以拓展對美工作，削弱美國對台灣的影响，而且更進一步強化軍事角色，將軍委會與副參謀總長納入中共對台工作小組。⁶³基本上，外交系統與解放軍在

⁶⁰ 三通為通商、通航、通郵；四流是旅遊、學術、文化及體育的交流。

⁶¹ 按照白皮書的闡述，「一國兩制，和平統一」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政府一項長期不變的基本國策。它主要包括如下要點：

- (一) 一個中國：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央政府在北京。堅決反對任何旨在分裂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言行，反對「兩個中國」、「一中一台」或「一國兩府」，反對一切可能導致「台灣獨立」的企圖和行徑。
- (二) 兩制並存：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大陸的社會主義制度和台灣的資本主義制度，實行長期共存，共同發展，誰也不吃掉誰。兩岸實現統一後，台灣的現行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同外國的經濟文化關係不變。
- (三) 高度自治：統一後，台灣將成為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它擁有在台灣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黨、政、軍、經、財等事宜都自行管理；可以同外國簽訂商務、文化等協定，享有一定的外事權；有自己的軍隊，大陸不派軍隊也不派行政人員駐台。特別行政區政府和台灣各界的代表人士還可以出任國家政權機構的領導職務，參與全國事務的管理。
- (四) 和平談判：為結束敵對狀態，實現和平統一，兩岸應儘早接觸談判。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什麼問題都可以談，包括談判的方式，參加的黨派、團體和各界代表人士，以及台灣方面關心的其他一切問題。在統一之前，雙方按照相互尊重、互補互利的原則，積極推動兩岸經濟合作和各項交往，進行直接通郵、通商、通航和雙向交流，為國家和平統一創造條件。

⁶² 孫德平，「戰爭的政治目的與軍事工具的關係」，政治大學戰略與國際事務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03年，頁66。

⁶³ 以胡錦濤時期為例，中央對台工作小組組長為黨總書記兼國家主席胡錦濤，副組長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其他成員包括中央軍委副主席郭伯雄、分管情報的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熊光楷、國務委員唐家璇、中央統戰部部長劉延東、國家安全部部長許永躍和國台辦主任陳雲林。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大約每月開會一次，其所作出的決定分別交由文職和軍職部門執行，諸如國台辦、外交部、統戰部、外經貿部以及總參謀部等解放軍各單位。」胡錦濤掌對台決策陣容翻新，」《中央日報》，2003年6月23日。

對台政策上有共同的意識，即以「一國兩制、和平統一」為政策原則，但在策略的運用上，外交系統是以「和戰」並重，解放軍則以「軍事威脅」為主。

(一)外交系統對台政策

在鄧小平時期，為求經濟發展，鄧小平主張台灣問題應以和平的手段來處理，因為台灣問題若以武力方式來強制解決，將可能衝擊到國家的發展目標。鄧小平曾說「關起門來搞建設是不行的，發展不起來」，要求要「對內把經濟搞活，對外實行開放政策」，⁶⁴在港、澳、台實行一國兩制不僅適應國際潮流，並和國際接軌，更可塑造國家的正面形象；另一方面符合「摸著石頭過河」的經濟政策，以便隨時調整，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

江澤民於 1995 年 1 月 30 日提出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的八項主張(江八點)，⁶⁵2000 年在北戴河會議上也做出暫時避免持續對台灣武嚇的決定。可見，中共高層為了全力發展經濟建設，正準備減少對台灣的軍事壓力，並決定採取更為彈性的政策。整體而言，外交系統對台政策是以「和戰策略」為主，強調強化兩岸經貿關係、封殺台灣國際生存空間及避免無謂的軍事恫嚇。

1.強化兩岸經貿關係

中共在推動兩岸經貿互動上，基於「以經促政」的邏輯思維，對於兩岸經貿的促進是抱著積極與快速擴大之心態。1979 年起，中共在鄧小平領導下，開始推動改革開放，在兩岸經濟關係上，也釋出化解兩岸經濟互動僵局的訊息。1979 年元旦，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呼籲結束軍事對立、兩岸恢復往來，宣告對台政策進入「和平統一」時期。

中共為吸納台灣商人至中共投資，乃於 1988 年由國務院制定《關於鼓勵台灣同胞投資的規定》，台商可享受外商優惠政策，並於 1994 年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同胞投資保護法》，1999 年發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同胞投資保護法實施細則》。這些法律的通過意味著中共對兩岸經貿往來的重視及強調。

⁶⁴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 3 卷，頁 64-5。

⁶⁵ 江八點內容為：1. 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是實現和平統一的基礎與前提。中國的主權和領土決不容許分割。2. 對於台灣同外國發展民間性經濟文化關係，不持異議。3. 進行海峽兩岸和平統一談判，是中共一貫主張。4. 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絕不是針對台灣同胞，而是針對外國勢力干涉中國統一和搞「台灣獨立」的圖謀。5. 大力發展兩岸經濟文化經濟交流與合作，主張不以政治分歧去影響、干擾兩岸經濟合作。6. 兩岸同胞要共同繼承和發揚中華文化的優秀傳統。7. 充分尊重台灣同胞的生活方式和當家做主的願望，保護台灣同胞一切正當權益。8. 歡迎台灣當局的領導人以適當身分前往訪問；我們也願意接受台灣方面的邀請，前往台灣。

隨著大陸改革開放的推進，加上中共單邊的對台開放，導致私下前往中共的民眾逐漸增加，台灣內部的壓力開始升高。因此 1987 年台灣政府態度出現轉變，首先宣布開放民眾赴中國大陸探親，緊接著以積極的態度，面對兩岸的往來，於 1988 年成立行政院大陸工作會報，負責兩岸事宜相關工作。1990 年兩岸雙方簽訂金門協議，開啟政治互動，而經濟的互動也開始活絡。

在兩岸經濟互動進入雙邊往來後，兩岸的貿易額度快速上升，台灣產業外移到中共的速度也越來越快。從表 5-2 中可以看出，兩岸經貿的總額從 1984 年的 5 億 5330 萬美元，到 2005 年提高到 763 億 696 萬美元。

表 5-2 兩岸貿易金額之估算

單位(Unit)：百萬美元

期間	台灣對大陸出口 A	台灣對香港出口 F.O.B. B1	香港自台灣進口 C.I.F. B2	台港統計差異 B1-B2	台灣經香港轉口輸往大陸 C	台灣對大陸出口估計*	台灣自大陸進口**	台海兩岸貿易總額估計
1984	-	2,087.1	2,217.5	-130.4	425.5	425.5	127.8	553.3
1985	-	2,539.7	2,682.4	-142.7	986.8	986.8	115.9	1,102.7
1986	-	2,921.3	3,072.8	-151.5	811.3	811.3	144.2	955.5
1987	-	4,123.3	4,275.1	-151.8	1,226.5	1,226.5	288.9	1,515.4
1988	-	5,587.1	5,682.4	-95.3	2,242.2	2,242.2	478.7	2,720.9
1989	-	7,042.3	6,606.9	435.4	2,896.5	3,331.9	586.9	3,918.8
1990	-	8,556.2	7,439.9	1,116.3	3,278.3	4,394.6	765.4	5,160.0
1991	0.1	12,430.5	9,605.0	2,825.5	4,667.2	7,493.5	1,125.9	8,619.4
1992	1.1	15,415.0	11,156.3	4,258.7	6,287.9	10,547.6	1,119.0	11,666.6
1993	16.2	18,452.6	12,047.2	6,405.4	7,585.4	13,993.1	1,103.6	15,096.7
1994	131.6	21,262.3	13,757.7	7,504.6	8,517.2	16,022.5	1,858.7	17,881.2
1995	376.6	26,105.9	16,572.6	9,533.3	9,882.8	19,433.8	3,091.4	22,525.2
1996	623.4	26,787.6	15,795.1	10,992.5	9,717.6	20,727.3	3,059.8	23,787.1
1997	626.5	28,688.1	15,967.6	12,720.5	9,715.1	22,455.2	3,915.4	26,370.6
1998	834.7	24,619.7	13,342.9	11,276.8	8,364.1	19,840.9	4,110.5	23,951.4
1999	2,536.9	26,012.1	12,875.2	13,136.9	8,174.9	21,312.5	4,522.2	25,834.7
2000	4,217.5	31,336.3	15,919.5	15,416.8	9,593.1	25,009.9	6,223.3	31,233.1
2001	4,745.4	26,961.4	13,837.0	13,124.4	8,811.5	21,945.7	5,902.2	27,847.9
2002	9,951.8	30,858.5	14,920.3	15,938.2	10,322.6	29,465.0	7,947.7	37,412.5
2003	21,417.3	28,353.6	16,051.7	12,301.9	11,789.4	35,357.7	10,962.0	46,319.7
2004	34,046.7	29,875.1	19,719.5	10,155.6	14,761.9	44,960.4	16,678.7	61,639.1
2005	43,650.1	34,035.6	21,567.5	12,468.1	17,055.9	56,275.9	20,093.7	76,369.6

資料來源：行政院陸委會，「兩岸貿易金額之估算」，「兩岸經濟統計月報」，第158期(2006年2月)。

隨著中共市場規模的擴大，台商赴大陸投資絡繹不絕。根據統計，截至 2004 年 12 月為止，台商赴大陸投資合法登記的金額大約為 412.49 億美元，⁶⁶但若再加上其他由第三地流向大陸的資金，保守估計應已超過 700 億美元，甚至可能高達 1,000 億美元，佔台灣對外投資的絕對多數，其中多數是電子資訊產業。

隨著兩岸經濟互動的推進，兩岸經貿依存度也不斷提升，而台灣由於經濟規模小，依存度明顯比中共大。表 5-3 資料顯示，依據陸委會的估算，台灣對大陸貿易占台灣的出口比重從 1984 年的 1.4%，快速上升到 2005 年的 28.36%，亦即台灣的對外出口有超過 1/4 是前往中共，顯然台灣對中共的依賴度相當高。

⁶⁶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台商對大陸投資金額統計」，兩岸經貿統計月報，147 期(2005 年 1 月)。

表 5-3 台灣對大陸貿易占我外貿之比重

(Unit) : %

期 間	香港轉口貿易統計			陸委會估算		
	出口比重 1	進口比 重 ¹	進出口比 重 ¹	出口比重 1	進口比 重 ¹	進出口比 重 ¹
1984	1.40	0.58	1.06	1.40	0.58	1.06
1985	3.21	0.58	2.17	3.21	0.58	2.17
1986	2.04	0.60	1.49	2.04	0.60	1.49
1987	2.28	0.83	1.71	2.28	0.83	1.71
1988	3.70	0.96	2.47	3.70	0.96	2.47
1989	4.38	1.12	2.94	5.03	1.12	3.31
1990	4.88	1.40	3.32	6.54	1.40	4.23
1991	6.10	1.79	4.16	9.84	1.79	6.20
1992	7.72	1.55	4.83	12.95	1.55	7.60
1993	8.93	1.43	5.36	16.47	1.43	9.32
1994	9.15	1.51	5.50	17.22	2.18	10.02
1995	8.85	1.52	5.32	17.40	2.98	10.46
1996	8.38	1.56	5.20	17.87	3.02	10.95
1997	7.96	1.52	4.85	18.39	3.42	11.15
1998	7.56	1.58	4.65	17.94	3.93	11.13
1999	6.72	1.47	4.22	17.52	4.09	11.12
2000	6.47	1.41	4.01	16.87	4.44	10.84
2001	7.17	1.58	4.56	17.86	5.50	12.10
2002	7.90	1.52	4.94	22.56	7.06	15.39
2003	8.18	1.70	5.14	24.52	8.61	17.07
2004	8.48	1.48	5.04	25.83	9.93	18.03
2005	8.60	1.45	5.17	28.36	11.00	20.04

資料來源：行政院陸委會，「台灣對大陸貿易占我外貿之比重」，兩岸經濟統計月報，第149期(2006年2月)

2.封殺台灣國際生存空間

在政治層面，外交系統對台政策主要是以國際打壓台灣空間，並在區域整合上孤立台灣為主。中共在國際間否定台灣主權地位、破壞台灣對外關係、封鎖台灣政府高層首長出訪及阻止台灣參與國際組織的打壓行為，幾十年來從未改變。中共對台灣打壓的力度與廣度更有增無減，阻擾的手段有三種：⁶⁷

第一，以外交手段干擾國內政治：2002年7月中共不惜以1億3700萬美元援貸，並刻意選在陳水扁總統接任執政黨主席的同一天，以不符外交慣例的作法，引誘南太平洋的邦交國諾魯與其建交。另外，2005年10月中共也以2億美元的援助，促使塞內加爾與我國斷交。中共極力挖走台灣邦交國的作法，不僅是為了在外交上挫折台灣的士氣，並意圖影響台灣國內的政治情勢。

第二，阻撓參加政府間國際組織活動：中共透過各種正式與非正式、公開與非公開方式，強力動員外交系統，阻止台灣參與聯合國及其他國際組織的正式活動。2002年8月中共駐聯合國常任代表王英凡便致函聯合國秘書處，指台灣「作為中國的一部分，根本沒有資格以任何名義和藉口參與聯合國系統及其專門機構的工作與活動。」又以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為例，台灣於2002年1月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成為世貿第144個會員國，台灣申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便受到中共的多方阻撓，中共透過政經資源施壓，迫使台灣加入WTO的時間必須晚於中共，同時，台灣只能以「台澎金馬關稅領域」名稱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早在台灣未加入WTO前，中共便針對台灣代表團名稱，向WTO秘書長提出異議，兩岸加入WTO後，中共仍對台灣代表團名稱及文件出現正式國名一事，向WTO秘書處提出異議，要求比照港澳代表團模式辦理，並對台灣進行議事杯葛。

第三，加壓封鎖台灣高層首長出訪：中共對台灣高層首長的出訪，在媒體事前報導的階段就要求當事國澄清以事先阻止，若其與第三國交涉不成，台灣高層首長出訪成為事實，則強迫各國以不邀請接待、不派官員迎送、不安排政治活動、不做新聞報導等方式進行補救。近年來，中共加壓封鎖台灣高層首長出訪的次數不僅大幅增加，出面施壓的官員也超越外交部門的層級，而阻撓的對象則更加廣泛。以2005年11月在南韓舉行的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為例，台灣原本欲派立法院院長王金平為APEC代表團領

⁶⁷ 阻擾的手段及過程可參閱“外交施政概況”，*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外交年鑑*台北：外交部，1993年；“我與塞內加爾斷交 邦交國數降為25國”，*聯合報*，2005年10月27日；趙建民、許志嘉，“民進黨執政後中共對台外交孤立策略及其效果”，*和平論壇*，2005年10月26日；中共打壓林信義取代王金平出席APEC，*大紀元*，2005年11月9日。

袖，但受到中共的反對，因此改派總統府經濟顧問小組召集人林信義為代表者；此外為了打壓台灣的代表，APEC 宣傳看板卻獨漏林信義的照片，以及下榻飯店也不受到重視。種種跡象顯示出，中共打壓台灣高層首長外訪是不疑餘力的。

3. 避免無謂的軍事恫嚇

1996 年 3 月為了抗議 1995 年李登輝總統訪美，解放軍在福建部署 15 萬的部隊，並在台海附近進行連續 7 次的軍事演習，其中包含在基隆和高雄外海進行飛彈試射演習、在福建境內進行實彈軍事演習和大規模的登陸演習。⁶⁸然而，中共盲動躁進的發動軍事演習卻造成以下三個結果：一是台灣島內民心歸一，由統獨紛歧走向團結，使李登輝總統高票當選；二是美日擴大安全保衛合作的擬議得以堂而皇之的付諸行動；三是使東協國家加速擴大團結的共識，越南等中南半島國家加入東協組織。美日擴大安保的範圍至菲律賓以北的 1000 海浬運輸線，加上兩國在第一島鏈的日本、琉球，和第二島鏈的關島加強軍備和情報蒐集能力，使菲律賓以北包括台灣在內形成一個新的防衛圈。而東南亞國協加入軍力最強的越南，由海而陸也形成一個新的安全體系，對於南中國海未來的主權爭議對中共形成更大的壓力。⁶⁹

由於軍事恫嚇的結果並沒有達成威脅台灣的目標，加上為提供經濟持續發展的國內外和平穩定環境，因此外交系統傾向主張「以經促統」的對台戰略方法。1995 年李登輝訪美後，在北戴河舉行擴大會議中，外交系統即主張以「溫和、適度」的反應來看待李登輝訪美行為，⁷⁰強烈反對以軍事手段來處理台灣問題。

(二) 解放軍系統對台政策

中共在《憲法》序言中明白揭櫫：「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神聖領土的一部分。完成統一祖國的大業是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神聖職責。」而「早日解決台灣問題，實現國家的完全統一」更被中共列為新世紀的三大任務之一。⁷¹此外，在《2004 年中國的國防》白皮書中，第一次針對台獨問題作了明確的表示，強調「當前台灣海峽兩岸關係情勢嚴峻，如果台灣當局製造重大『台獨』

⁶⁸ Chen Qimao, "The Taiwan Strait Crisis: Its Crux and Solutions," *Asian Survey*, Vol. XXXVI, No. 11, (November 1996): 1055-1058.

⁶⁹ 廖文中，「中共軍力現代化對亞太地區之影響」，*和平論壇*，2004 年 6 月 25。

⁷⁰ Ken E. Gause, "China's Policy Towards Taiwan," *Jane's Intelligence Review*, Vol. 7, No. 12, (December 1995): 565.

⁷¹ 中共新世紀的三大任務為「繼續推進現代化建設，完成祖國統一大業，維護世界和平與促進共同發展。」

事變，中國武裝力量將不惜一切代價，堅決徹底地粉碎台獨分裂圖謀。」⁷²因此在職責任務及「民族主義」的驅使下，任何企圖製造中國分裂或「外國勢力」干預中國的行徑皆是解放軍所不容許。

解放軍對於主權與領土完整的議題相當重視，其中又以台灣問題最為明顯。中共視台灣為「首要目標」，其軍事規劃大多以此目標為中心。⁷³近年來，為了阻止台灣獨立及反制美國對其亞太地位的威脅，中共從俄羅斯購得相當的武器，例如：126 架蘇愷 27 戰鬥機、80 架蘇愷 30 戰鬥機、4 艘基洛級潛艦和 2 艘現代級驅逐艦。另外，中共也積極加強在東南沿岸的軍備部署，例如：部署一個團編制的 M9 短程彈道導彈分隊；⁷⁴並在福建仙遊建造第二個 M11 短程飛彈基地。⁷⁵中共把對台作戰的導彈編制調高為七個旅(分別為江西樂平、江西贛州、福建永安、廣東梅州、浙江金華、雲南建水以及遼寧的金州)，⁷⁶而根據 2005 年美國國防部所公佈的資料顯示，中共在台灣對岸部署 650 到 730 枚機動式 M9 和 M11 短程彈道飛彈，並以每年 100 枚的幅度增加。⁷⁷在戰機方面，中共將殲 7 部署在福建福州基地；殲 8 部署在福建龍溪基地；蘇愷 27 部署於廣東遂溪；蘇愷 30 部署於江西蕪湖基地。此外，解放軍積極設立快速反應部隊，例如：成立空降 16 軍，此空降軍將部署在浙江一帶，番號為空降 16 軍，由空軍總部直接指揮。其作戰任務已從最初的敵後破壞、捕俘、刺殺等非正規游擊戰發展到增援、突破、摧毀、佔領協同大部隊作戰。⁷⁸

2004 年 7 月解放軍在東山島進行演習，與以往演習不同的是，此次演習強調兩棲、三棲登陸作戰演習的科目不同，以奪取台海制空權為主題，除了延續傳統意義上的近距離格鬥和中距離對抗的空戰形式來奪取制空權外，更重要的是以混合編隊的方式向台灣重心進行超視距突擊，中共運用之武器為射程 150 公哩之俄製 Kh-59M 空對地導彈，此意謂中共戰機試圖在台灣海峽中線之外，且不需要

⁷² 《2004 年中國的國防》，新華網。

⁷³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The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Jul. 19, 2005.

⁷⁴ M9 是一種公路機動的固體燃料導彈，北約代號為 CSS-6，最大射程 600 公里，命中精度 100 公尺；M11 也是機動的固體燃料導彈，北約代號 CSS-7，射程約為 300 公里，命中精度 100 公尺。有關 M9 與 M11 的相關資料，可參閱“中共 M 族飛彈小檔案”，《中國時報》，1999 年 11 月 25 日，版 3。

⁷⁵ “中共建第二座對台飛彈基地”，《中國時報》，1999 年 12 月 9 日，版 2。

⁷⁶ “專家：中共對台飛彈 遠超過 496 枚”，《聯合報》，2004 年 3 月 29 日，版 13。

⁷⁷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The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Jul. 19, 2005..

⁷⁸ 新成立的空降 16 軍，將從駐徐州第 12 集團軍、駐萊陽第 26 集團軍、南京軍區配屬的空軍部隊中精選組成，並進行裝備和訓練，成為空軍的一部分，將配屬專用軍機和導彈部隊，成為對台作戰的「專業部隊」。有關空降 16 軍相關報導可參閱“中國加速組建空降 16 軍阻遏台獨”，《多維社》，2003 年 8 月 25 日。

臨空，就可以對台進行對地攻擊，盡量避免可能造成大量傷亡，然也突顯出其人民解放軍作戰觀念的調整，希望能夠「速戰速決」來解決台海戰事，避免外力的介入問題。⁷⁹事實上，自 1996 年後，每年召開的東山島軍演主要目的有三項，首先是提高部隊在現代條件下聯合作戰的能力，並檢證人民解放軍之訓練成果；其次，中共要向「台獨」宣示，如果「台獨份子」執迷不悟，人民解放軍有能力、有信心來解決台灣問題；最後，是向世界宣告，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政問題，嚇阻他國不得干涉。⁸⁰

由以上各種對台武器、部隊的部署及軍事演習來看，中共人民解放軍現正積極、徹底地從事軍事改革和現代化的工作，藉由軍事力量的提升，以威嚇台獨勢力，並因應未來台海衝突中美國的介入問題。

第四節 1995-1996 年台海危機事件

自從 1988 年 1 月李登輝接任總統以來，開始大力推動「務實外交」，⁸¹其中最令中共不滿的是，李登輝以總統身份出國訪問，且都能成功完成任務。其中包括 1989 年 3 月 6-9 日的「度假外交」(新加坡)、1994 年 2 月 9-16 日的「破冰之旅」(菲律賓、印尼、泰國)、1994 年 5 月 4-16 日的「跨洲之旅」(尼加拉瓜、哥斯達黎加、南非、史瓦濟蘭)。期間李登輝總統也藉參加哥國及南非總統就職典禮之便，會晤宏都拉斯、薩爾瓦多、瓜地馬拉等國的元首。此外，1995 年 4 月訪問沙烏地阿拉伯與約旦等國。李總統帶頭在外交上「走出去」，已成為當時台北「務實外交」政策重要的一環。⁸²

中共對李總統推動參與聯合國、增加邦交國，以及元首外交的努力深感憂慮，認為台灣在推動「一中一台」或「兩個中國」的分離運動。中共除全面打壓台灣外交努力，挖台灣牆角外，也開始運用和戰兩手策略，一方面提出和平建議，希望與台灣進行官方談判；另一方面則在沿海進行大規模的軍事演習。⁸³

⁷⁹ 翁明賢，「確保兩岸和平與我國國防安全之原則與方法」，兩岸和平與我國國防安全研討會，台北，2004 年 10 月 15 日。

⁸⁰ 翁明賢，「確保兩岸和平與我國國防安全之原則與方法」，兩岸和平與我國國防安全研討會。

⁸¹ 1988 年李登輝總統就職後，為突破外交上的孤立，確保台灣的國際人格，改採「務實外交」的策略，其中在爭取正式外交關係方面，正式放棄「漢賊不兩立」的思考，而改採類似「國統綱領」的國家定位方式，來尋求較佳的國際地位。有關「務實外交」的意涵可參閱李登科，「務實外交走出中美斷交陰影」，《中央日報》，1998 年 12 月 28 日，版 3。

⁸² 裘兆琳，「一九九五年 一九九六年台海危機：華府、北京與台北之決策失誤檢討」，林正義主編，《中美關係專題研究：1995-1996》(台北：中央研究院歐研所，1996 年)，頁 101-102。

⁸³ 陳紫財，「美國海外出兵準則檢驗之研究-以 1995_1996 台海危機為例」，《戰略與國際研究》，第 4 卷第 2 期(2002 年 4 月)：頁 108。

1995年5月22日柯林頓總統親自找中共駐美國大使李道豫到白宮談話，請他通知中共政府，由於美國國會以壓倒性票數否決國務院的決定，總統只能同意國會的決定，批准康乃爾大學對李登輝的邀請訪美。之後，李道豫立即電告北京，其時江澤民正在上海視察，聞報立即於23日返回北京，24日舉行政治局「碰頭會」。會上兩派意見：一派主張強烈抗議美國違反「一個中國」政策，從支持「兩個中國」，又進一步支持並製造「台灣獨立」。要求美國改變決定，否則中國撤回大使，並將要求美國駐華大使回國，以此嚴厲打壓台灣當局，封殺李登輝美國之行；另一派則主張暫時只限於對美抗議，對台批評揭發，但不採取任何外交行動和對台懲誡措施，且看一看李登輝到了美國之後，美國政府官員如何接待，雙方進行一些什麼「兩個中國」和「台灣獨立」的活動，再走下一步。⁸⁴

當時外交系統力主溫和、適度反應，認為不值得為李登輝訪美一事大動干戈，然而由國防部長遲浩田所代表的軍方，則力主應採取強硬態度。⁸⁵亦即之，在此事件中，解放軍明確表態應採取強硬態度；而外交系統則認為先觀察再採取行動較適當。最後，會議決定以「不變應萬變」來看待李登輝訪美，但後來的勢態發生變化，使得解放軍主張的強硬態勢占了上風。

1995年6月9-10日李登輝總統以私人身份訪問母校康乃爾大學，並以「民之所欲，長在我心」發表演講。在演講中，不時以「中華民國在台灣」(Republic of China on Taiwan)，來挑戰北京當局所採取「一個中國」的論述。⁸⁶李登輝總統的演講促使中共決定放棄溫和政策，改以強硬態度來對待台灣問題，以表達中共強烈的抗議。

在李登輝總統結束美國訪問後，中共於1995年6月中旬召開高層緊急會議，當時台灣事務領導小組組長江澤民、副組長錢其琛、海協會會長汪道涵、統戰部部長王兆國、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熊光楷、軍委會副主席劉華清及張震皆參與此次會議。軍隊代表熊光楷、劉華清及張震對於李登輝總統在美的言論相當不滿，主張應採取嚴厲(Harsh)手段，以防止台灣走向獨立。⁸⁷事實上，在李登輝總統赴美國訪問後，解放軍的高層將領認為江澤民應為其政治失敗導致李登輝訪美一事負責。因此在1995年7月的第二個星期，江澤民和當時的外交部長錢其琛被迫在中央軍委會的會議中，作出自我批評。錢其琛被認為應為此事負責，因為他曾向政

⁸⁴ “江錢恩怨秘聞，” *蘋果日報*，1998年4月22日。

⁸⁵ Ken E. Gause, “China’s Policy Towards Taiwan,” *Jane’s Intelligence Review*, Vol.7, No.12(December 1995):565.

⁸⁶ 李登輝總統在美國康乃爾大學專題演講全文可參閱李登輝，「民之所欲，長在我心—李總統在美國康乃爾大學專題演講全文，」*人事月刊*，第120期(1995年8月)：頁1-7。

⁸⁷ Andrew Scobell, “Show of Force: The PLA and the 1995-1996 Taiwan Strait Crisi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15, No. 2(Summer 2000), 236.

治局常務委員會保證，無論如何李登輝都不可能獲得赴美訪問的簽證。其後，在中央軍委會的會議中，江澤民顯然默認解放軍對台灣採行軍事選擇方案的要求。在江澤民作出自我批評後，解放軍立即宣佈將於台灣北部沿岸外海實施兩回合彈道飛彈的試射。⁸⁸

1995年7月18日中共新華社宣布，中共訂於7月21-28日舉行二砲部隊的飛彈試射演習，這是中共第一次史無前例的以飛彈來恫嚇台灣，且距離台灣彭佳嶼北邊僅60哩。對於此一軍事演習的行動目的，誠如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所說：「此一軍事演習的目的，是要美國認知到中美關係導向正途的重要性」。此外，也是要警告李登輝及其支持台灣獨立的人士，不要走向台獨之路，否則難免一戰。⁸⁹對於李登輝訪美之行，中共參與決策的人都認為此訪問代表對中共「國家安全利益核心之一項嚴峻挑戰」。⁹⁰

不久之後，中共新華社又在1995年8月10日宣布，中共將從1995年8月15-25日在東海進行一系列新的飛彈試射，距離北台灣90哩，中共並再次警告外國船隻與飛機避免進入演習區域。7月16日中共已將殲7或殲8戰機部署於距離台灣250哩的機場，此一舉動明顯地具有高度不尋常與挑釁的味道。

中共軍方最初的部署是實彈射擊、越過海峽中線、動用潛艦、攻佔外島。整個演習的預算，解放軍編列40億人民幣以上，規模驚人。⁹¹1996年2月下旬，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杜奇(John Deutch)重提擔心中共軍事演習會導致「錯誤的估算或非蓄意的意外事件」。柯林頓政府向中共傳達「非常明確且毫不含糊」的意見，稱導彈演習是草率魯莽的決定，並警告中共說「如果演習出現問題，會造成不可預計的後果」。⁹²同時，美方派出「獨立號(USS Independence)」和「尼米茲號(USS Nimitz)」兩個航空母艦戰鬥群，在台海附近遊弋。⁹³江澤民瞭解軍方強硬派絕不會甘心放棄演習計劃，但是江澤民卻又不敢真的與美國正面對抗，

⁸⁸ 有關江澤民自我批評的言論是源自沈大偉(David Shambaugh)對中國人士所作的訪談得知。沈大偉(David Shambaugh)著，高一中譯，*現代化中共軍力：進展、問題與前景(Modernizing China's military progress, problems, and prospects)*(台北：史政編譯室，2004年)，頁48-49。

⁸⁹ 陳紫財，「美國海外出兵準則檢驗之研究-以1995-1996台海危機為例」，頁210。

⁹⁰ 「專家指中共外交及安全政策制訂模式趨多元化」，*中央社*，2001年3月14日。

⁹¹ 李大衛，「台海危機十週年 江澤民其人揭內幕」，*大紀元*，2006年3月9日。

⁹² 大紀元編輯部，*江澤民其人*(紐約：博大出版社，2005年)，頁125。

⁹³ 1995年12月19日為因應台海可能產生的危機，美國派遣核子動力航空母艦「尼米茲號」，從東太平洋駛往阿拉伯海域巡弋，而路過台灣海峽水域附近，這是自1979年以來，美國第一次將航空母艦駛往台灣海峽附近，進行巡邏偵查的任務。另外，在1996年3月5日中共解放軍發布在台灣海峽試射飛彈的消息後，美國即強烈譴責中共的行為，參議院更通過決議案，要求柯林頓總統基於台灣關係法採取適當措施。美國亦於該日出動停泊在馬尼拉灣的航空母艦「獨立號」前往台灣；3月10日美國再從波斯灣調派航空母艦「尼米茲號」前往台灣，並在3月21日抵高雄外海。John Garver, *Face Off: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s Democratization* (Seattle, W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7), 96-102.

江澤民擔憂中美衝突一發生，軍方會乘機坐大，本身軍委主席的地位會一落千丈。於是江澤民重提鄧小平「韜光養晦」的教導，提出三點主張：導彈不飛越台灣本島、戰機和軍艦不過海峽中線、不占外島。⁹⁴

1996年3月5日新華社宣布中共將於3月8-15日實施導彈試射演習。演習範圍距離基隆港與高雄港25-35哩。3月8日中共進行第三次的飛彈試射演習，飛彈試射的命中範圍涵蓋半個台灣，且與重要的飛機與商船之航線十分接近。當日凌晨中共發射3枚M9飛彈，兩枚命中高雄港外海附近，距離台灣南部海域僅35哩。第三次飛彈命中基隆港附近，距離台灣北邊海岸僅23哩，而距離台北市僅30哩。13日又發射一枚於高雄外海。⁹⁵

總計1995年至1996年台海危機時期，解放軍針對台灣共舉行七波演習(如表5-4所示)，而在1995年7月21-28日和1996年3月8-15日的兩次演習中，中共試射可攜帶核子彈頭的彈道飛彈威嚇台灣，中共此一舉動是自1954-1955年與1958年台海危機以來最嚴重的一次台海危機。這兩次飛彈試射清楚顯示出，當國家安全環境受到威脅或出現緊張，而採用溫和的政策作為未見具體成效時，文人借重軍隊作為危機處理的一項工具，以威脅使用武力或準備使用武力的軍事行動，強烈表達國家意志，達到緩解危機和左右局勢的目的乃勢所必然。⁹⁶另外，由此次台海危機事件也可明瞭，在外交系統與解放軍的對台政策拉扯中，如果涉及台灣獨立的問題，解放軍的強硬態度較易受到採用。

⁹⁴ 大紀元編輯部，*江澤民其人*，頁125-126。

⁹⁵ 陳紫財，「美國海外出兵準則檢驗之研究-以1995-1996台海危機為例」，頁111。

⁹⁶ 王官德，「析論共軍在對台政策上的角色、立場與變數」，*國防雜誌*，第20卷第11期(2005年11月)：頁38。

表 5-4 台海危機共軍七波演習

	時間	主要內容	針對事件
第一波	1995 年 7 月 21-28 日	自江西鉛山發射 M9 導彈 6 枚	6 月李登輝總統訪美
第二波	1995 年 8 月 15-25 日	大批機艦的海上攻防火力展示	7 月副總統連戰訪歐
第三波	1995 年 9 月 15-10 月 20 日	長時間機艦操演	持續武力展示
第四波	1995 年 10 月 31-11 月 23 日	兩棲三軍聯合作戰	12 月立委及縣市長選舉
第五波	1996 年 3 月 8-15 日	自南平、永安發射 M9 導彈 4 枚	總統大選
第六波	1996 年 3 月 12-20 日	大批機艦海空聯合火力展示	總統大選
第七波	1996 年 3 月 18-25 日	聯合三棲登陸、空降、山區、城鎮戰	總統大選

註：中共計劃以第八波為實際軍事行動，可能襲攻國軍據守的外離小島，升高緊張局勢；但因美國派遣兩個航艦戰鬥支隊到台海，解放軍後續動武企圖作罷。

資料來源：”國防部：中共對台導彈 784 枚，”聯合報，2006 年 3 月 8 日。

第五節 小結

由軍機擦撞事件和台海危機事件的分析可以得知，在涉及國家安全或領土主權的外交政策議題上，外交系統主張以溫和手段為主；解放軍則力主強硬態度。外交系統與解放軍在軍機擦撞事件和台海危機事件的立場如表 5-5 所示。

表 5-5 外交系統與解放軍在軍機擦撞事件和台海危機事件的立場

	軍機擦撞事件	台海危機事件
外交系統	要求美方向中方道歉，並承擔全部責任。	認為不值得為李登輝訪美一事大動干戈，主張先觀察再行動。
解放軍	要求美方必須道歉、立即停止對中共沿海的軍事偵察活動和作出賠償。	主張以實彈射擊、越過海峽中線、動用潛艦、攻佔外島等方式對付台灣。

資料來源：作者綜整繪製

由於軍隊負責國家安全的維護，如果對外政策涉及國家安全及國家主權的問題，尤其是台灣問題、中美問題、領土紛爭等議題，解放軍皆透過正式或非正式的方法，影響對外政策之制訂，以符合軍隊的職責與利益。在所有國家安全議題中，解放軍對於台灣問題堅持以最強硬態度及軍事手段為主，因此解放軍在台海危機事件中，主張以實彈射擊、越過海峽中線、動用潛艦、攻佔外島等方式對付台灣。最後雖然在江澤民顧及美國、國際的反應，採取「導彈不飛越台灣本島、戰機和軍艦不過海峽中線、不占外島」政策，但不可諱言地，解放軍確實在 1995-1996 年台海危機事件中展現出其強大的政治影響力。

在外交系統與解放軍的兩股勢力拉扯中，最後的贏家不見得是解放軍，但是解放軍也總是能在外交決策過程中得到相當的利益。軍隊的政治行為與其他大型組織相類似，植基於個人和組織的自利因素，在達成首要目標的考量之外，須持續爭取更多的資源分配。⁹⁷因此，在軍機擦撞事件中，雖然最終是以外交系統的意見為主，但江澤民允諾提高解放軍的國防預算，如此之結果，也使得解放軍在政策制定過程中，獲得相當的利益。

⁹⁷ 簡諾維茲(Morris Janowitz)著，洪陸訓等譯，專業軍人 - 社會與政治的描述(*The professional soldier: a social and political portrait*) (台北：黎明文化公司，1988年12月)，頁287-289。

第六章 結論

前述章節已就解放軍政治影響力轉變之因素、解放軍參與外交決策制定、解放軍對外軍事交往及解放軍的強硬態度等進行分析與說明，透過解放軍參與外交決策制定的過程、解放軍對外軍事交往的情況及解放軍在台海危機、軍機擦撞事件的強硬態度之探討，瞭解解放軍參與外交決策的情形，進而釐清解放軍的政治影響力。本章將對假設及案例作一總結及檢討，首先將對假設內容進行檢驗，並對解放軍政治影響力強弱作一分析；其次，探討胡錦濤時期之決策模式、黨軍關係、政局穩定及國家安全議題等面向，並進一步推論胡錦濤時期解放軍之政治影響力可能發展。

第一節 研究發現

解放軍的決策影響力主要是受到領導人的決策模式、黨軍關係、政局穩定及國家安全議題等因素之影響。解放軍與外交系統的配合與合作展現在軍事外交層面上；解放軍與外交系統的衝突則呈現在國家安全或領土主權議題上，例如台海危機事件或中美軍機擦撞事件。透過以上章節的探討，吾人可將假設驗證的分析分述如下：

假設一 不同的領導者決策模式造成解放軍的政策影響力相異。

在毛澤東時期，軍隊的政治角色是一種工具性角色，軍隊聽命於毛澤東的指揮行動。亦即在毛澤東時期，毛澤東始終握有外交政策的最後決定權，軍人在外交政策中的影響力相當小。一直至 1987 年十三大之後，中共黨章規定，中央書記處成為辦理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的事務性工作之辦事機構，外交政策的決策權落到政治局與其常委會的身上。這樣的規定使得鄧小平時期之決策模式呈現「集體領導」，外交決策改以由鄧小平、陳雲及元老作為決策者。

在鄧小平過世之後，由於新領導人江澤民在軍隊中無強人的軍事背景，為了拉攏軍隊的支持，江澤民只好靠著黨領導人的資源分配與人事權來掌握與控制軍隊。此外，由於十三大之後，外交決策的權力落在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手中，使得政治局及其常委的角色顯得重要。從決策系統來看，不論中央書記處或是政治局掌握決策權，其成員均有軍隊的代表，軍隊的意見可透過軍方代表充分反應。中央軍委若不是正式參與政治局常委會議和政治局會議，就以非正式方式參與政

政治局重要會議，或與政治局常委舉行不定期的接觸和溝通，表達解放軍對一些重要決策議題的觀點。

在江澤民時期，政治局常委、外事領導小組及中央軍委成為國家決策的最高權力機構，這些組織常常就外交事務進行研議。尤其解放軍視自己為中國領土主權及國家尊嚴的捍衛者，因此與軍事領域或國家安全議題有關之外交決策，解放軍都會表達其意見，並試圖影響國家政策的走向。文人政府一旦期望透過軍隊達成政策目標時，軍隊即必須深入政策制定的全程，尤其是涉及武力的專業配置時，軍方的發言權和政策執行自主空間理所當然都會上升。¹從1995年台海危機事件與中美軍機擦撞事件即可以瞭解，在江澤民時期的「官僚政治模式」決策體系下，解放軍更能發揮決策影響力，且其重要性也日益突顯。

由以上分析得知，在毛澤東時期「領袖主導模式」下，解放軍的影響力最小；在鄧小平時期「集體領導模式」下，解放軍有較大的影響力；在江澤民時期「官僚政治模式」下，解放軍的影響力最大。

假設二 軍隊現代化造成解放軍在政治上的影響力逐漸降低。

1990年代末，中共的黨軍關係發展出新的互動模式，雖然軍隊仍堅守「黨指揮槍」的原則，然而基於軍隊現代化和專業化的需要，軍隊逐漸將重心置於建軍本身。隨著解放軍的現代化及專業化的進程，解放軍成為一個專業分工與更加注重其專業使命之組織，其結果是軍隊與黨之間，在利益、功能與外觀上的差異越來越大，這也使得中共軍隊在政治上的影響力逐漸降低。亦即中共解放軍現為「高度專業色彩的政黨軍隊」，在「黨指揮槍」的原則下，解放軍仍舊是一支「黨軍」，而非一支國家化的軍隊，加上軍隊將重心置於建軍本務上，因此除非面臨國家安全議題或領土主權的議題，否則解放軍的政治角色只能是政權的捍衛者，而非挑戰者，解放軍在政治上的影響力逐漸下降。

假設三 國內政局不安或權力繼承未穩固促使解放軍的政治影響力愈形強大。

在文化大革命及天安門事件發生時，解放軍勢力膨脹，政治角色地位重要。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澤東為了穩定惡化的政治局勢，要求軍隊實施全面性的軍

¹ 王官德，「中共黨軍關係與對台政策取向探析」，《共黨問題研究》，第26卷第7期（1990年7月）：頁66-67。

管，在「三支兩軍」的基礎下，軍隊勢力滲透軍事部門，軍隊勢力急速膨脹，政治地位提升至最高的狀態；而六四天安門事件迫使軍隊介入政治，共軍又再度扮演捍衛共黨政權的工具性角色。為了酬庸軍隊在六四天安門事件的功勞，1992年十四大時，增加了12位解放軍的中央委員。

另外，在權力繼承時，中共軍隊也扮演關鍵之角色，尤其是由文人擔任軍隊領導人江澤民在權力繼承的過程中，極需要軍隊的全力支持，所以掌權之後加重軍隊的決策權與發言權，增加國防預算，並提高部隊待遇。江澤民這些措施在無形中促使軍隊的政治角色愈形重要，其政治影響力大幅提升。

可見，在國內政局不安或權力繼承未穩固時，軍隊的支持成為獲得政權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在文化大革命、天安門事件及江澤民政權尚未穩固時，解放軍的政治影響力變得較強。

假設四 當外交事務涉及國家安全或領土主權相關的議題時，解放軍將竭盡所能的發揮政治影響力。

解放軍對於本身職責及任務有與生俱來的使命感，因此與國家安全或領土主權相關之議題，解放軍將積極地發揮決策影響力，以符合本身的利益。在制止「藏獨」、「疆獨」及「台獨」上，多數將領主張採取強硬手段，如前文第五章的內容所述，在李登輝總統訪問美國康乃爾大學之後，解放軍所作的反應極為激烈。在解放軍的主導下，迫使中共黨與國務院不得不採取「準軍事」的手段作出反應。由此可見，在外交事務上，只要是關於主權與領土完整之議題，解放軍將積極介入，並強力干預決策的走向。

假設五 當外交事務與國家安全或領土主權糾紛無關時，解放軍的立場以服從及服務國家外交戰略為主。

在重視政局穩定及軍事現代化的前提下，解放軍對於與國家安全議題無關的外交政策，抱持著支持與服從外交系統的態度，軍事外交即為解放軍服從和配合於國家總體外交戰略的方法。中共對外的軍事交流已成為其全面性外交政策的重要一環，解放軍對外展開軍事交往，係配合其整體國家安全戰略，具有高度政治、外交的意涵。觀察近年來，中共在國際軍事外交上扮演相當積極之角色，諸如與俄羅斯的軍事合作、與周邊國家進行的軍事演習，以及與美國之間達成的多項軍事交流計畫等等，這些軍事外交的措施對於穩定中共與各國間的外交關係、促進

國家的經濟發展、加速軍隊現代化、消弭「中國威脅論」的疑慮及孤立台灣國際生存空間，有著相當大的實質助益。

假設六 若外交事務涉及國家安全或領土主權相關的議題時，外交部的政策以軟性與和善為主，而解放軍一般都堅持在外交政策層面應以強硬的態度為主。

由本論文第五章內容可得知，中共的外交政策通常會與軍方的重大利益及其所關切的特定事項密切相關，包括中美關係、台灣問題、領土主權爭議（如南沙群島）等等。由於軍隊負責國家安全的維護，如果對外政策涉及國家安全或領土主權的問題，解放軍會透過直接或間接的方式，影響對外政策的制訂，以符合軍隊的職責與利益。由軍機擦撞事件與台海危機事件可以得知，在對外政策層面，外交系統主張以溫和手段為主，希望能與周邊國家及世界列強維持友善或友好的關係，以期能保持一個有利於中共持續經濟成長與政治穩定的客觀環境；解放軍則力主強硬態度，希望保衛國家安全，防止敵人入侵，並防阻可能浮現的威脅行為，因此軍方一般都堅持在外交政策層面應以強硬的作為為主。可見，外交部門與解放軍系統在國家安全或領土主權相關的議題上有著衝突的立場與態度。

綜合本論文的探討與案例的分析，解放軍政治影響力的情形如表 6-1 所示。

表 6-1 解放軍之政治影響力

	領袖主導模式 (毛澤東時期)	集體領導模式 (鄧小平時期)	官僚政治模式 (江澤民時期)	
軍隊現代化				
政局穩定				
國家安全議題				
外交決策制定者 或組織	毛澤東	鄧小平、陳雲、 元老	政治局常委、外 事領導小組、軍 委會	政治局常委、外 事領導小組、軍 委會
解放軍參與的方 式	非正式方式	角色重疊、非正 式方式	角色重疊、外事 領導小組、其他 非正式方式	角色重疊、外事 領導小組、其他 非正式方式
相關案例	文化大革命	天安門事件	1995-1996 年台 海危機事件	中美軍機擦撞事 件
解放軍的政治影 響力				

註： 表示解放軍政治影響力的增強； 表示解放軍政治影響力的降低

資料來源：作者綜整繪製

(一) 領導者決策模式對解放軍政治影響力有著極大的影響

由表 6-1 可看出，在政局不穩定與涉及國家安全議題的情況下，解放軍的政治影響力在不同的領導者決策模式中，有著不同的狀況。在毛澤東「領袖主導」時期，毛澤東握有外交決策的最後決定權，解放軍只能透過非正式的方式影響決策的制定，造成解放軍的政治影響力較弱，得到 3 個 ；在鄧小平「集體領導」時期，外交決策權掌握在鄧小平、陳雲及元老手中，解放軍可透過角色重疊及非正式的方式影響外交決策，解放軍參與外交決策的機會增多。然而，另一方面，因鄧小平強調軍隊現代及專業化，軍隊成為政治工具，造成解放軍的政治影響力只得到 3 個 ；而在江澤民「官僚政治」時期，外交決策權掌握在政治局常委、外事領導小組及軍委會，解放軍可以表達意見的途徑更多，可以透過角色重疊、外事領導小組及其他非正式方式影響外交決策的制定，使得解放軍的政治影響力較大，解放軍的政治影響力可得到 4 個 。

(二)解放軍在領土主權議題的政治影響力大於國內危機事件

由文化大革命、天安門事件、1995 年台海危機事件及中美軍機擦撞事件等案例的分析可以得知，解放軍的政治影響力一方面受到領導者的決策模式影響，另一方面也受到領土主權議題的影響。解放軍視保衛國家的主權、統一及領土完整為最重要之使命與職責所在，舉凡台灣問題、主權糾紛等問題，解放軍的態度會傾向採取強硬及軍事手段，亦即在領土主權議題上，解放軍扮演政策影響者的角色，而非政策擁護者的角色。

由本論文第五章分析得知，在所有國家安全議題中，解放軍對於台灣問題力主以最強硬態度及軍事手段為主，因此解放軍的政治影響力得到 4 個 ；相同地，在中美軍機擦撞事件中，雖然江澤民為了維持與美國的友好關係，最終採取外交系統的意見，以「不對抗」方式處理軍機擦撞事件，然而解放軍卻在此事件中得到國防資源的增加，可見解放軍的政治影響力仍相當強，可得到 4 個 。另外，在國內危機問題上，解放軍主要是扮演保護國家安全的角色，其角色只是捍衛者，而非影響者，因此在文化大革命及天安門事件中，解放軍的政治影響力只得到 3 個 。

(三)政局不穩定提高解放軍的政治影響力

由本論文第四章及第五章的分析得知，在政局穩定的情況下，解放軍的角色主要是以配合國家外交戰略為主，在「新安全觀」的思維下，各國應透過軍事對話及合作的方式，增進與各國之間的相互瞭解，並以和平方式尋求解決國家間之紛爭與歧見。因此近年來，解放軍積極開展對外軍事交流與合作，形成全方位、寬領域、多層次的軍事外交局面。在軍事外交的層面，解放軍的政治角色成為國家外交戰略的實踐者，而非影響者。然而，在政局不穩定的情形下，解放軍為了維護國家安全的基本目標和任務，制止分裂、促進統一、防備和抵抗侵略，以及捍衛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海洋權益，解放軍會強力影響外交決策的制定，試圖提高本身的政治影響力，使其組織目的及利益能夠達成，中美軍機擦撞事件及 1995-1996 年台海危機事件即為最明顯的案例。

(四)軍隊現代化降低解放軍的政治影響力

藉由思想與組織二方面之控制，中共鞏固黨軍「一體化」關係。自中共建政以來，「黨指揮槍」的原則成為黨軍關係維繫的基本方法，加上鄧小平主張軍隊現代化，江澤民更落實軍隊現代化和專業化，使得軍隊在「黨指揮槍」的指導下，

軍隊堅守對黨的領導，解放軍只能成為「高度專業色彩的政黨軍隊」，軍隊無形中成為領導者的政治工具，其角色為捍衛政權者，而非政策影響力者，亦即「黨指揮槍」原則與軍隊現代化促使解放軍的政治影響力逐漸下降。

第二章 未來解放軍之政治角色及影響力

如同前文所分析，解放軍之政治角色及影響力受到決策模式、黨軍關係、政局穩定與國家安全議題等四項因素的影響。因此，如要推論解放軍未來之政治角色及影響力，就須由此四項因素來探討。

一、決策模式

江澤民於2004年9月15日十六屆四中全會上，宣佈辭去中央軍委會主席的位子，胡錦濤擔任軍隊的領導人，至此第四代領導人胡錦濤完成接班，成為中共最高領導人。從胡錦濤執政後來看，胡錦濤的施政作為有延續江澤民之處，也有展現獨特風格的地方。在決策風格方面，新一代領導人更強調「信息公開」、「科學決策」、「集體領導」。首先，自胡錦濤上台以後，中共媒體即時報導政治局會議的(部分)內容，與江澤民的做法不同；其次，新領導人延續第三代領導人「集體領導」之風格，強調科學決策，更依賴智庫專家學者提供政策意見；²第三，重視科學決策，使得中共決策模式朝向更理性、更需要集體議決。由於科學發展觀著重長期規劃與協調發展，因此中共未來將會更依賴學者智庫與專業人士。同時，由於強調協調發展，相關分管業務的幹部或領導人間必須進一步加強合作協調，有利於集體議事程序的鞏固。³

以胡錦濤時期的對台決策為例。胡錦濤對台決策幕僚班底從建制內觀察，可歸為黨政軍三部分。⁴在黨的部分，以中共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成員為主。胡錦濤在自己擔任小組長後，非常重視政協統戰部門，所以副組長政協主席賈慶林，以及現任統戰部長劉延東兩人，都是涉台要角。另一個值得注意的要角是現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王剛，王剛另一個身分是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在胡錦濤重視黨內正常程序的作業標準下，涉台文書作業需經由書記處呈上轉下，王剛的重要性可見一斑。

在對台領導小組中，代表安全部門的是國家安全部部长許永躍、代表軍方的是副參謀總長熊光楷、代表外交部門的是國務委員唐家璇。值得一提的是近來中

² 寇建文，「胡溫科學發展觀」，*兩岸大未來*(台北：政大國關中心，2004年5月22日)。

³ 杜筱越，「胡錦濤的對台決策幕僚大曝光」，*新新聞*，第919期(2004年10月18日)。

⁴ 杜筱越，「胡錦濤的對台決策幕僚大曝光」。

共中央軍委會改組，讓主管總政治部的徐才厚擔任軍委會副主席，另增加濟南軍區的陳炳德、空軍的喬清晨、海軍的張定發、二砲的靖志遠等人進入軍委會內。⁵顯示中共軍方讓有關涉台的政戰、空軍、海軍、飛彈等決策要角進入軍事決策圈內，這種布局主要是為了讓軍委會為未來的戰鬥衝突提前做好準備。

胡錦濤對於建制外的學者建言也極為重視。這些要角包括中國社科院美國所的所長王緝思、外交學院副院長秦亞卿、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所長王逸舟、北京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賈慶國、中國人民大學美國研究中心主任時殷弘、清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閻學通等人。⁶由以上對台決策的建制內外幕僚成員得知，新一代領導人的決策風格較傾向「官僚政治」模式，決策方式將朝向更須協調及集體議決。

二、黨軍關係

與江澤民相同，胡錦濤也是毫無軍事背景而出任軍委主席(胡錦濤主要黨政軍經歷如表 6-2)。雖然胡錦濤並非軍人出身，但曾兼任過軍隊的職務，例如在 1985 年期間，他曾任貴州省委書記，並兼任貴州省軍區第一政委；在 1988 年擔任西藏黨委書記期間，也曾擔任過西藏軍區黨委第一政委，並負責弭平 1988 年西藏暴動。如此的兼職工作雖然是中共地方領導的慣例，但是自省軍區並未掌握常備或快速反應部隊，只有一些預備役的部隊，未實際掌有兵權。⁷

⁵ 杜筱越，「胡錦濤的對台決策幕僚大曝光」。

⁶ 杜筱越，「胡錦濤的對台決策幕僚大曝光」。

⁷ 沈明室，「中共十六大權力繼承與軍隊角色」，《展望與探索》，第 1 卷第 2 期(2003 年 2 月)：頁 23。

表 6-2 胡錦濤主要黨政軍經歷

1942	12 月出生，安徽績溪人
1964	加入中國共產黨，
1965	畢業於清華大學水利工程系
1968	任水電部劉家峽工程局房建勞動隊
1974	任甘肅省建委秘書
1980	甘肅省建委副主任
1982	共青團中央書記處書記，全國青聯主
1984	共青團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
1985	貴州省委書記
1987	中共 12 屆中央委員
1988	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
1992	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
1993	中央黨校校長
1998	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
1999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委會副主席
2002	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2003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2004	中央軍委主席

資料來源：參考自汪莉娟，2004 年 9 月 20 日，“胡錦濤主要簡歷”，《聯合報》，版 3；陳小平，“江澤民憑什麼扶胡錦濤上馬？”，《多維周刊》，第 113 期(2005 年 6 月)。

胡錦濤缺乏毛鄧在軍隊和政治上的淵源及絕對權威，為了拉攏軍隊的支持與效忠，鞏固國家領導者在軍隊的角色，胡錦濤上任後立即宣佈從 2005 年 1 月 1 日起，中共解放軍陸海空三軍軍官工資將有較大幅度調整。以陸軍為例，少尉排長月薪約 3000 元人民幣，較現時不到 2000 元增加幅度近 50%；校官每月約 5000 元至 6000 元人民幣；海、空軍、二炮部隊軍官收入高於陸軍一倍左右；士兵津貼則增到 300 元人民幣；士官工資一律在原基礎增加 50%。⁸

⁸ “中共解放軍 明年加薪 50%”，《中國時報》，2004 年 12 月 29 日。

另一方面，胡錦濤對於黨軍關係的維繫與江澤民時期相同，主張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在 2004 年 9 月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中，胡錦濤指出「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我軍建設和發展的首要問題。我們對這個問題要始終關注、抓住不放，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能有絲毫含糊和動搖。要抓住軍隊黨的建設這個關鍵環節，增強各級黨組織的創造力、凝聚力、戰鬥力，充分發揮黨委的核心領導作用、黨支部的戰鬥堡壘作用和黨員的先鋒模範作用。要堅持把思想政治建設擺在部隊各項建設的首位，加強思想政治工作，嚴格政治紀律和組織紀律，確保政令軍令暢通，確保全軍官兵堅決聽從黨中央和中央軍委指揮，堅決同黨中央和中央軍委保持一致。」⁹可見，胡錦濤時期的黨軍關係仍為「一體化」，軍隊以服從黨的指導為原則。

此外，從十六屆的軍委成員中(如表 6-3)可以看出，解放軍對於「科技強軍」的堅持。十五屆軍委成員中(如表 6-4)就有 3 位是總政治部系統人馬，于永波、王瑞林、徐才厚是總政治部副主任，只有曹剛川執掌總裝備部。而在十六屆中央軍委領導中，總裝備部系統異軍突起，總裝備部部長曹剛川升任軍委副主席，總裝備部政委李繼耐成為軍委委員。由總裝備部系統領導人被委以重任可以得知，中共對科技強軍的理念和決心甚為堅持。另外，因應軍事現代化的需要，胡錦濤於 2005 年 3 月 14 日十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將原先 4 人的軍事委員擴增為 7 人，納入陳納德上將(濟南軍區)、喬清晨上將(空軍)、陳定發上將(海軍)及靖志遠上將(二炮部隊)。現今中共中央軍委會已經逐漸走向一個軍事事務之決策機構，海軍、空軍及二炮司令員才得以「專家」的角色進入中央軍委。¹⁰

⁹ “江澤民胡錦濤出席軍委擴大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人民網，2004 年 9 月 20 日。

¹⁰ 朱建陵，”共軍建置 聚焦台海 稱霸亞洲，”中國時報，2004 年 5 月 1 日。

表 6-3 十六屆軍委會成員

職稱	基本資料
軍委主席：江澤民	籍貫：江蘇省揚州縣 年齡：七十六歲 學歷：上海交通大學 經歷：上海市長、市委書記、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家主席、總書記
副主席：胡錦濤	籍貫：安徽省績溪縣 年齡：六十歲 學歷：清華大學 經歷：中央書記處書記、黨校校長、政治局常委
副主席：郭伯雄(上將)	籍貫：陝西省禮泉縣 年齡：六十歲 學歷：國防大學 經歷：四十七集團軍軍長、北京軍區副司令、蘭州軍區司令、常務副總參謀長
副主席：曹剛川(上將)	籍貫：河陽省舞陽縣 年齡：六十七歲 學歷：國防大學 經歷：副總參謀長、國防科學技術工業委員會主任、黨委、總裝備部長
委員：徐才厚(上將)	籍貫：遼寧省房店市 年齡：五十九歲 學歷：政治學院 經歷：總政治部主任助理、解放軍報社長、濟南軍區政委、總政治部常務副主任
委員：梁光烈(上將)	籍貫：四川省三台縣 年齡：六十二歲 學歷：國防大學 經歷：北京軍區參謀長、副司令、瀋陽軍區司令員、南京軍區司令員
委員：廖錫龍(上將)	籍貫：貴州省思南縣 年齡：六十歲

	學歷：國防大學 經歷：第 11 集團軍軍長、成都軍區副司令員、成都軍區司令員、總後勤部長
委員：李繼耐(上將)	籍貫：山東省滕州市 年齡：六十歲 學歷：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 經歷：總政治部副主任、國防科工委政委、總裝備部政委

資料來源：整理自“中國大陸新屆軍委會 將著重科技建軍，”中央社，2003 年 3 月 16 日。

表 6-4 十五屆軍委會成員

職稱	基本資料
軍委主席：江澤民	籍貫：江蘇省揚州縣 年齡：七十五歲 學歷：上海交通大學 經歷：上海市長、市委書記、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家主席、總書記
副主席：胡錦濤	籍貫：安徽省績溪縣 年齡：五十九歲 學歷：清華大學 經歷：中央書記處書記、黨校校長、政治局常委
副主席：張萬年(上將)	籍貫：山東省龍口市 年齡：七十三歲 學歷：軍事學院 經歷：廣州、濟南軍區司令員、總參謀長
副主席：遲浩田(上將)	籍貫：山東省招遠縣 年齡：七十二歲 學歷：軍事學院 經歷：濟南軍區政委、總參謀長、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
委員：傅全有(上將)	籍貫：山西省醇縣 年齡：七十一歲 學歷：軍事學院

	本經歷：成都、蘭州軍區司令員、總後勤部部長
委員：于永波(上將)	籍貫：遼寧省復縣 年齡：七十歲 學歷：政治學院 經歷：南京軍區政治部主任、總政常務副主任、主任
委員：王克(上將)	籍貫：安徽省蕭縣 年齡：七十歲 學歷：軍事學院 經歷：蘭州軍區副司令員、新疆及瀋陽軍區司令員、總後勤部部長
委員：王瑞林(上將)	籍貫：山東省招遠縣 年齡：七十二歲 學歷：(高中) 經歷：軍委主席辦公室主任、軍委紀律委員會書記、總政治部副主任、中央辦公廳副主任
委員：曹剛川(上將)	籍貫：河陽省舞陽縣 年齡：六十六歲 學歷：國防大學 經歷：副總參謀長、國防科學技術工業委員會主任、黨委、總裝備部長
委員：郭伯雄(上將)	籍貫：陝西省 年齡：五十九歲 學歷：國防大學 經歷：四十七集團軍軍長、北京軍區副司令、蘭州軍區司令、常務副總參謀長
委員：徐才厚(上將)	籍貫：遼寧省房店市 年齡：五十八歲 學歷：政治學院 經歷：總政治部主任助理、解放軍報社長、濟南軍區政委、總政治部常務副主任

資料來源：“中共新組合顯示經改反腐決定，”文? 報(香港)，1997年9月21日。

雖然胡錦濤剛剛完成接班，政權並非相當穩固，但是由軍委成員的任命可以瞭解，中共當局希望未來解放軍將重心置於建軍本務方面，落實「科技強軍」之理念，減少軍隊對政治的干預，亦即在中共現代化建軍的環境中，解放軍的政治工作從過去的「掛帥」地位，下降到一個「保證」地位。在中共建軍以現代化為核心的大環境下，解放軍的政治工作將以服務、保證國家經濟發展為主要目標。

三、政局穩定

2005年10月11日中國共產黨舉行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提出「堅持發展是硬道理，堅持抓好發展這個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用發展和改革的辦法解決前進中的問題。要堅定不移地以科學發展觀統領經濟社會發展全局，堅持以人為本，轉變發展觀念、創新發展模式、提高發展品質，把經濟社會發展切實轉入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軌道。」而「推動經濟發展、改善人民生活始終是中國的中心任務，我們堅定不移地走和平發展道路，就是要通過爭取和平的國際環境來發展自己，又要通過自身的發展來促進世界和平。中國的發展主要靠自己的力量，同時也堅持實行對外開放，願意同世界各國開展互利合作，共同致力於建設一個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¹¹

經濟發展為胡錦濤時期最重要的國家目標，為了達成此目的，維護國內外和平穩定環境成為當務之急，可見胡錦濤時期外交政策方針仍延續鄧小平及江澤民時期的外交原則，外交以服務國家戰略為主。胡錦濤於2004年2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體學習上，特別強調「堅持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同各國友好相處，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積極開展同各國的交流和合作，人類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作出貢獻。當今世界是開放的世界，中共的發展離不開世界。我們要樹立寬廣的世界眼光，全面觀察世界經濟、政治、文化、科技、軍事等發展的大勢，始終堅持對外開放，積極借鑒各國人民在實現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中創造的有益成果和經驗，絕不能閉關自守、夜郎自大。」¹²

胡錦濤為了國家持續發展的目標，外交政策堅持在和平共處五原則的基礎上，與各國友好相處。因此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紀念「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五十週年」活動上發表講話特別指出，中共在新的歷史環境下，外交政策應該有五個方

¹¹ “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屆五中全會舉行(會議公報全文)”，《中國網》，2005年10月11日。

¹² “胡錦濤參加政治局第十次集體學習”，《新華網》，2004年2月25日。

向：¹³

1. 將堅定維護國家主權平等。雖然隨著經濟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的發展，國家間的相互聯繫和相互依存愈益加深，但這並不意味可以忽視和削弱國家主權的地位與作用。中共認為，必須實行國際關係民主化，任何國家都無權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推行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
2. 中共主張尊重和維護世界文明多樣性，不應人為歧視或貶低他國文明，不應相互隔絕和相互排斥，也不應強求一律、強加於人。
3. 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促進各國經濟共同發展。要尊重各國經濟自主權，平等參與，公平競爭，互利共贏。已開發國家應該在開放市場、擴大貿易、增加援助、減免債務等方面採取切實措施，並且在國際經濟規則的制定和修改方面，尊重發展中共家的權益，避免單方面的制裁和報復。
4. 經由對話與協作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樹立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為核心的新安全觀。同時，要防範和打擊一切形式的恐怖主義，並在國際法的基礎上，有效因應武器擴散、毒品泛濫和跨國犯罪等非傳統安全威脅。
5. 發揮聯合國及其他多邊機制的重要作用，重視世貿組織、世界銀行等多邊機構以及地區性合作機制。

胡錦濤上任後，外交風格仍以鄧小平時期之「務實主義」為主，亦即過去深受意識形態主導的外交模式，幾乎已不復見。過去為中共所抵制的國家(如美國、印度)，因為國家利益，中共不計前嫌，主動釋放友好訊息。¹⁴另外，在伊拉克與北韓核武問題上，胡錦濤上台後態度改變，極力表現中共在北韓問題上的影響力，試圖改變美國原先對中共的敵視。¹⁵中共希望塑造和平的形象，消除「中國威脅論」的負面影響，使世界各國瞭解到，中共的崛起有益於其他國家的經驗與發展，而且意味著中共作亞洲一員，將會對亞洲其他國家尤其是周邊國家的發

¹³ 溫家寶，「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五十週年」，*解放軍報*(北京)，2004年6月29日，版4。

¹⁴ 胡錦濤在2006年1月1日致電印度總統的賀詞中論及，中印兩國是山水相連的友好鄰邦，兩國人民的友誼源遠流長。建交以來，在雙方的共同推動下，兩國關係不斷邁上新的台階。2005年雙方宣佈建立面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合作夥伴關係，標誌著兩國關係進入新的發展階段。雙方還將2006年確定為「中印友好年」，體現了兩國政府和人民加強睦鄰友好、擴大互利合作和促進共同發展的一致願望。胡錦濤並表示，在新的一年裏，中方願同印方一道，以「中印友好年」為契機，進一步弘揚兩國傳統友誼，加強雙方各領域、各層次的對話、交流與合作，不斷深化雙邊關係的內涵，推動中印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全面深入向前發展。」胡錦濤和卡拉姆互致賀電 祝賀中印友好年開始，*中國網*，2006年1月1日。

¹⁵ 胡錦濤改變江澤民在北韓問題上不主動協助美國解決問題的姿態，專門派遣外交部副部長戴秉國前往平壤，戴秉國拋棄名存實亡的所謂「友誼第一，重話輕說」的北京外交，直達核心，表達了反對朝鮮發展核武的立場及其理由。陳奎德，「從北韓核危機看北京外交方向」，*大紀元*，2003年8月1日。

展、繁榮和穩定，發揮積極有益的作用。

由此可見，現今胡錦濤已具備黨政軍的身份，其最高領導者的地位已鞏固，加上維護國內外和平安全成為國家主要政策，因此在胡錦濤主政時期，勢必將維持政局穩定，以利國家經濟的發展。

四、國家安全議題

中共一再重申不對抗、不當頭，強調創造雙贏，以中共潛在的經濟實力作為拉攏各國的籌碼，在國際舞台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但亦講求分享利益，對東協各國提出「睦鄰、安鄰、富鄰」，用意即在化解各國對中共威脅的可能疑慮。而在睦鄰友好政策的外交原則下，當面臨國家安全或領土主權議題時，中共的外交作為將採取和善友好態度，而非強硬軍事手段。

然而，由本論文第五章解放軍的強硬態度分析得知，在所有國家安全或領土主權的議題中，解放軍對於「台海議題」堅持最強硬的態度。在 2006 年 3 月政協第十屆全國委員會第四次會議中指出，「今年以來，台灣當局領導人加快『台獨』分裂活動的步伐，圖謀通過所謂『憲政改造』實現『台灣法理獨立』的目標。特別是近期不顧島內外的強烈反對，一意孤行，強行決定終止『國統會』和『國統綱領』，在全面推翻『四不一沒有』承諾上邁出了危險一步。我們對此表示強烈憤慨和嚴重關注。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是國家的核心利益，是民族的根基所在。我們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堅強意志和堅定決心，是『台獨』分裂勢力無法撼動的。」¹⁶

另外，由十六大軍委成員具有「涉台防務經驗」的背景可以瞭解，解放軍對於台灣問題是相當重視的。從十六大軍方高層的權力改組來看，顯然隱含強化對台軍事鬥爭準備的意義，¹⁷因為除了負責武器研發和科技強軍的總裝備部系統幹部受到重用之外，涉台軍事幹部也獲得青睞，南京軍區司令員梁光烈升任總參謀長，遺缺由該軍區參謀長朱文泉升任。梁光烈任職南京軍區三年，曾帶頭主編一本登島作戰專著，期間並曾積極演練對台作戰戰法；¹⁸新任南京軍區司令員朱文泉，據悉是擅長兩棲作戰專家。¹⁹梁、朱的受到重用，顯示中共當局對台灣問題的重視。2005 年 3 月 14 日十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在北京舉行，胡錦濤將原先

¹⁶ “中華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十屆全國委員會第四次會議政治決議，” *新華網*，2006 年 3 月 13 日。

¹⁷ 陳梓龍，”中共新軍事領導階層的特點與影響評析，” *展望與探索*，第 1 卷第 3 期(2003 年 3 月 1 日)：頁 17。

¹⁸ “連任中央軍委主席，江澤民選擇緩退，” *中國時報*，2002 年 11 月 15 日，版 11。

¹⁹ “擅長兩棲作戰的朱文泉出掌南京軍區，” *多維新聞網*，2002 年 11 月 22 日。

4 人的軍事委員增為擴增為 7 人，納入陳納德上將、喬清晨上將、陳定發上將及靖志遠上將，這些新增軍委大都出身與涉台事務有關的南京、濟南、廣州軍區，可見這些人事任命已在為未來台海戰爭預做準備。總體來看，十六大後，軍隊在台灣議題上將有更重要的角色扮演。

由決策模式、黨軍關係、政局穩定與國家安全議題等四項因素的分析可瞭解，在重視軍隊現代化及強調政局穩定的「官僚政治」決策模式下，胡錦濤時期解放軍之政治影響力主要是受到國家安全議題的影響。雖然在「官僚政治」決策模式下，解放軍的政治參與管道較多，表達意見的機會也多，但在強調政局穩定及重視軍隊現代化的前題下，解放軍在未來仍為「具有專業色彩的政黨軍隊」，解放軍將重心置於軍隊現代及專業化的本務上，解放軍的政治角色只是國家安全的保護者，而非挑戰者。因此解放軍將服務及服從於國家外交戰略，積極拓展與世界各國間的軍事交流及合作，其政治影響力將逐漸式微。然而，唯一的例外是，當與國家安全議題有關，尤其是面對台灣問題時，解放軍基於本身職責與任務所在，將會強力介入決策過程，干預國家政策的走向，積極扮演保衛國家安全與穩定之重要角色。

參考書目

一、中文參考資料

(一)書籍

丁樹範主編，*中國大趨勢*。台北：新新聞出版社，2004年。

丁樹範主編，*胡錦濤時代的挑戰*。台北：新新聞出版社，2002年2月。

大紀元編輯部，*江澤民其人*。紐約：博大出版社，2005年。

中央研究雜誌社，*1998 中共年報*。台北：中共研究雜誌社，1998年。

中央研究雜誌社，*1999 中共年報*。台北：中共研究雜誌社，1999年。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

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鄧小平文選（卷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

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鄧小平文選（卷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中央編委辦公室綜合司編，*中央政府組織機構*。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1995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年鑑 1997。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年鑑社，1997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年鑑 2000。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年鑑社，2000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1998 年中國國防白皮書*。北京：國務院新聞辦，1998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2000 年中國國防白皮書*。北京：國務院新聞辦，2000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2002 年中國國防白皮書*。北京：國務院新聞辦，2002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2004 年中國國防白皮書*。北京：國務院新聞辦，2004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辦公室綜合司編，*中央政府組織機構*。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1995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黨政軍組織架構。香港：文? 出版社，2003年。

中華民國國防部，*中華民國 93 年國防報告書*。台北：國防部，2004年。

中國軍事百科全書（軍事歷史）。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7年。

中國軍事百科全書（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與軍事後勤）。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7年。

中國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鑑：2003*。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3年。

王泰平主編，*鄧小平外交思想研究*。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6年。

王普豐，*信息戰爭與軍事革命*。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5年。

王逸舟，*全球政治和中國外交*。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

王維章主編，*鄧小平軍隊現代化建設思想研究*。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97年。

日本防衛廳，*2001 防衛白皮書*。東京：財務省，2001年。

毛澤東，*戰爭和戰略問題(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

平可夫，*外向型的中國軍隊 - 中共對外的諜報用具能力與軍事交流*。台北：時報出版，1998年。

外交部，*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外交年鑑*。台北：外交部，1993年。

朱光磊，*當代中國政府過程*。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

江澤民，*論「三個代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

列寧，*列寧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

佘可平編，*全球化的悖論*。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

余炳輝等編譯，*社會研究的方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

呂亞力，*政治學方法論*。台北：三民書局，1987年。

李先念，*李先念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

李英明，*中國大陸研究*。台北：五南書局，1995年。

李英明、張亞中，*中國：向後鄧時代轉折*。台北：生智出版社，1999年。

李節明、唐思合編，張同瑩、馬勵、張定綺合譯，*台灣有沒有明天？ - 台海危機美中關係揭祕*。台北：先覺出版社，1999年。

宗海仁，*第四代*。香港：明鏡出版社，2002年。

易君博，*政治理論與研究方法*。台北：三民書局，1984年。

林中斌，*核霸：透視跨世紀中共戰略武力*。台北：學生書局，1999年2月。

林正義主編，*中美關係專題研究：1995-1996*。台北：中央研究院歐研所，1996年。

林長盛編，*解放軍的現狀與未來*。台北：桂冠圖書公司，1993年。

席汝楫，*社會與行為科學研究法*。台北：五南圖書公司，1979年。

洪陸訓，*軍事政治學*。台北：五南圖書公司，2002年。

胡偉，*政府過程*。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

胡耀邦，*“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

政大國關中心，*兩岸大未來*。台北：政大國關中心，2004年5月22日。

姜殿銘主編，*台灣一九九六*。北京：九洲圖書出版社，1997年。

徐爭游等編，*中央政府的職能和組織結構(下冊)*。北京：華夏出版社，1994年。

郝雨凡、張燕冬主編，*限制性接觸：布希政府對華政策走向*。北京：新華出版社，2001年。

展望與探索雜誌社編，*中國大陸綜覽*。台北：展望與探索雜誌社，2003年。

浦興祖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制度*。香港：三聯出版社，1996年。

浦興祖主編，*當代中國政治制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高新等著，*江澤民面臨的挑戰*。香港：明鏡出版社，1996年。

許志嘉，*中共外交決策模式研究--鄧小平時期的檢證分析*。台北：水牛出版社 2000年。

許志嘉，*當代中共外交政策與中美關係*。台北：生智文化公司，2004年。

張五岳主編，*兩岸關係研究*。台北：新文京出版社，2003年。

張同瑩等合譯，李潔明，唐斯合編，*台灣有沒有明天 - 台海危機美中關係揭密*。台北：先覺出版社，1999年。

張亞中主編，*國際關係與現勢*。台北：晶典文化出版社，2004年。

張虎，*剖析中共對外戰爭*。台北：幼獅文化出版社，1996年。

張良編著，*中國六四真相*。香港：明鏡出版社，2001年。

張建邦，*2010 中共軍力評估*。台北：麥田出版公司，1998年。

張登及，*建構中國：不確世界中的大國定位與大國外交*。台北：揚智出版公司，2003年。

張萬年，*當代世界軍事與中國國防*。北京：軍事科學院，1999年。

郭立民編，*中共對台選輯 1949-1991*。台北：永業出版社，1992年。

郭瑞華，*中共對台工作組織體系概論*。台北：法務部調查局共黨問題研究中心，1996年。

景杉編，*中國共產黨大辭典*。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91年。

賀俊起主編，*國防的多維結構*。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90年。

楊日旭、楊念祖合編，*新世紀中共解放軍與台海安全*。台北：中華民國高等政策研究協會，2000年。

楊勝春著，*中國最高領導班子的左右手—中共中央直屬機構檔案(1949-1998)*。台北：永業出版社，2000年。

趙全勝，*解讀中國外交政策 - 微觀、宏觀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台北：月旦出版公司，1999年。

- 鄧小平文選，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
- 鄧小平文選，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
- 蔡瑋，*中共的涉台決策與兩岸關係發展*。台北：風雲論壇，2000 年。
- 劉烈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機構*。哈爾濱：哈爾濱出版社，1988 年。
- 鄭竹園，*大陸政經巨變與中國前途*。台北：五南圖書公司，1992 年。
- 錢其琛，*外交十記*。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 年。
-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下)*。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 年。
- 韓漳主編，*中南海外交珍聞錄*。太原：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1994 年。
- 蘇紹智，*中國大陸政治經濟的再認識*。台北：風雲論壇，1995 年。
- Jano-witz, Morris 著，洪陸訓等譯，*專業軍人 - 社會與政治的描述(The professional soldier: a social and political portrait)*。台北：黎明文化公司，1988 年。
- Lewis A. Coser 著，黃瑞祺、張維安譯，*古典社會學理論(Masters of Sociological Thought)*。台北：桂冠圖書公司，1986 年。
- Lilley, James R. and David Shambaugh 編，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共軍的未來(China's Military Faces the Future)*。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2000 年。
- Pfalezgraff, Robert L. and James E. Dougherty 著，胡祖慶譯，*國際關係理論導讀(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台北：五南圖書公司，1993 年。
- Puska, Susan M. 編，李憲榮、陳國雄譯，*未來的中國人民解放軍(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fter Next)*。台北：玉山社出版，2001 年。
- Shambaugh, David 著，高一中譯，*現代化中共軍力：進展 問題與前景(Modernizing China's military progress, problems, and prospects)*。台北：史政編譯室，2004 年。
- Stokes, Mark A. 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中共戰略現代化(China's Strategic Modernization Implications Unites States)*。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2000 年。
- Swaine, Michael D 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共軍如何影響中共國家安全決策(The Role of the Chinese Military i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making)*。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9 年。

(二)期刊論文

- 丁樹範，"1993 年的中共軍隊：軍事現代化與政治繼承，" *中國大陸研究*，第 37

- 卷第 2 期(1994 年 2 月)：頁 37-45。
- 丁樹範，”中共未來的軍備政策，”*遠景季刊*，第 2 卷第 2 期(2001 年 2 月)：頁 1-27。
- 丁樹範，”中共軍隊的生產工作：內容與影響，”*中國大陸研究*，第 36 卷第 8 期(1993 年 8 月)：頁 5-15。
- 丁樹範，”軍隊角色，『鄧後中國大陸何去何從』研討會，”*中國大陸研究*，第 38 卷第 3 期(1995 年 3 月)：頁 26-37。
- 丁樹範，”1990 年代以來的中國黨軍關係，”*中國大陸研究*，第 46 卷第 2 期(2003 年 3 月)：頁 57-78。
- 于有慧，”中共外交政策走向與選擇，”*問題與研究*，第 43 卷第 1 期(2004 年 1、2 月)：頁 105-124。
- 王官德，”中共黨軍關係與對台政策取向探析，”*共黨問題研究*，第 26 卷第 7 期(1990 年 7 月)：頁 62-71。
- 王官德，”析論共軍在對台政策上的角色、立場與變數，”*國防雜誌*，第 20 卷第 11 期(2005 年 11 月)：頁 31-40。
- 王官德，”從『裁軍 50 萬』看共軍體制改革及其影響，”*共黨問題研究*，第 25 卷第 1 期(1999 年 1 月)：頁 45-55。
- 王玲玲，”中共十四大人事之分析，”*中國大陸研究*，第 36 卷第 1 期(1993 年 1 月)：頁 14-26。
- 王緝思，”國際關係理論與中國外交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季刊*，第 1 期(1993 年 2 月)。
- 甘棠，”共軍體制改革精簡整編的研析，”*中國大陸研究*(1986 年 1 月)：頁 1-10。
- 田道遠，”江澤民提出對美三大策略，”*多維周刊*，第 49 期(2001 年 5 月)。
- 伍凡，”美國專家論中國的戰略發展趨勢--美國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的年度報告述評，”*中國之春*，第 181 期(1998 年 9 月)。
- 伊然，”江澤民的『新安全觀』透視，”*鏡報月刊*(1999 年 5 月)：頁 24-25。
- 行政院陸委會，”台灣對大陸貿易占我外貿之比重，”*兩岸經濟統計月報*，第 149 期(2005 年 3 月)。
- 行政院陸委會，”兩岸貿易金額之估算，”*兩岸經濟統計月報*，第 149 期(2005 年 3 月)。
- 杜筱越，”胡錦濤的對台決策幕僚大曝光，”*新新聞*，第 919 期(2004 年 10 月 18 日)：頁 48-50。
- 吳安家，”中共『十四大』前的政治情勢，”*中國大陸研究*，第 35 卷第 10 期(1992 年 10 月)：頁 5-15。

- 吳明杰，"1989年後中共人民解放軍對外交流情況研析，"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年。
- 吳建德，"後冷戰時期中共對外軍事交流對東亞安全之影響，"新世紀中共解放軍與台海安全學術研討會，2000年1月，頁：83-132。
- 阮銘，"新政府的兩岸政策-觀察與展望，"遠景季刊，第1卷第3期(2000年7月)：頁179-200。
- 李芙桃，"共軍人事調整的意義與影響，"中國大陸研究，第41卷第6期(1998年6月)：頁67-79。
- 李登輝，"民之所欲，長在我心—李總統在美國康乃爾大學專題演講全文，"人事月刊，第120期(1995年8月)：頁1-7。
- 李華球，"中共十六大後---『黨、槍』的權力互動及其未來建軍走向，"投資中國雜誌，第105期(2002年11月20日)。
- 沈有忠，"中共解放軍戰略與軍事裝備的現代化，"展望與探索，第2卷第8期(2004年8月)：頁32-50。
- 沈明室，"中共十六大權力繼承與軍隊角色，"展望與探索，第1卷第2期(2003年2月)：頁31-51。
- 沈明室，"中共權力繼承與軍隊角色，"東亞季刊，第27卷第3期(1995年冬季號)：頁31-51。
- 沈明室，"共軍對三個代表思想的實踐與影響，"展望與探索，第1卷第8期(2003年8月)：頁43-57。
- 周繼祥，"軍辦企業下中共軍人的心態，"中國大陸研究，第34卷第4期(1991年4月)：頁51-61。
- 河成柱，"八〇年代以來中共決策過程與政治權力運作之研究，"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年。
- 林火順，"江澤民掌握軍權之研究，"政治作戰學校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年。
- 林文程，"中共與亞太多邊安全機制，"國家政策雙週刊，第171期(1997年8月19日)：頁6-8。
- 林文程，"後冷戰時期美國的國家安全策略，"美國月刊，第8卷第6期(1993年6月)：頁4-14。
- 林文程，"美國與中共軍事交流之研究，"行政院國科會專題研究，2001年，編號：NSC89-2414-H-001-004。
- 林正義，"一九五八年台海危機期間美國對華政策，"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碩士論

- 文，1982年。
- 林正義，”中共與東南亞國家的軍事交流：解放軍外交，”*國家政策雙週刊*，第155期(1997年1月7日)。
- 林正義，”布希政府台海兩岸政策初探，”*中國事務*，第7期(2002年1月)：頁67-81。
- 林正義，”美國的東亞安全政策與預防外交，”*戰略與國際研究*，第3卷第1期(2001年1月)：頁16-37。
- 林長盛，”論中共軍隊參與經濟活動的影響，”*中國大陸研究*，第36卷第3期(1993年3月)：頁59-72。
- 林長盛，”槍桿子到底支援誰？，”*北京之春*，第48期(1997年5月)：頁32。
- 林宗達，”中俄關係之改善對中共軍事現代化的助力分析，”*共黨問題研究*，第27卷第8期(2001年)：頁58-76。
- 林麗香，”中共與美國在東南亞的競逐，”*中共研究*，第36卷第2期(2002年2月)：頁82-101。
- 林麗香，”中共黨軍關係，”*空軍學術月刊*，第586期(2005年9月)：頁18-33。
- 林麗香，”後冷戰時期中俄美軍事合作之探討，”*共黨問題研究*，第26卷第4卷(2000年4月)：頁73-84。
- 周全華，”論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動因，”*二十一世紀*，第48期(2006年3月)。
- 周煦，”冷戰後美國與中共的軍事關係，”*政大國際關係學報*，第13期(1998年12月)：頁1-13。
- 帥化民，”東山演習戰略意涵，”*國政評論*，第178期(2001年8月24日)。
- 俞雨霖，”中共軍人的政治角色—比較與歷史的觀點，”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論文，1987年。
- 奕父，”從『集體領導』論江核心的問題，”*中共研究*，第31卷第3期(1997年3月)：頁9-12。
- 孫德平，”戰爭的政治目的與軍事工具的關係，”政治大學戰略與國際事務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03年。
- 翁明賢，”確保兩岸和平與我國國防安全之原則與方法，”兩岸和平與我國國防安全研討會，台北，2004年10月15日。
- 寇健文，「政權轉移 VS 解放軍地位」座談會，台北，2002年3月20日。
- 許志嘉，”中共外交決策模式研究：鄧小平時期的檢證分析，”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論文，1998年。
- 許志嘉，”鄧小平主政下參與中共外交決策的黨政組織探討，”*中國大陸研究*，第41卷第5期(1998年5月)：頁21-48。

- 許志嘉，”鄧小平時期中共的外交決策模式，”*問題與研究*，第 37 卷第 8 期(1998 年 8 月)：頁 49-72。
- 陸民聲，”中共擴軍--僱傭前蘇聯國防專家，”*中國大陸研究*，第 26 卷第 6 期(1993 年 6 月)：頁 55-57。
- 寇健文，”中共『幹部年輕化』與政治繼承，”*中國大陸研究*，第 44 卷第 5 期(2001 年 5 月)：頁 1-16。
- 曾建元，”動員戡亂時期台灣憲法變遷的歷史回顧，”*淡江人文社會學刊*，第 10 期(2002 年 3 月)：頁 113-146。
- 陳小平，”江澤民憑什麼扶胡錦濤上馬？，”*多維周刊*，第 113 期(2005 年 6 月)。
- 陳志洪，”江澤民時期中共黨軍關係之研究，”*中山大學大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年。
- 陳梓龍，”中共新軍事領導階層的特點與影響評析，”*展望與探索*，第 1 卷第 3 期(2003 年 3 月)：頁 8-22。
- 陳梓龍，”現階段中共裁軍與體制改革之研析，”*戰略與國際研究*，第 1 卷第 2 期(1999 年 4 月)：頁 32-50。
- 陳紫財，”美國海外出兵準則檢驗之研究-以 1995-1996 台海危機為例，”*戰略與國際研究*，第 4 卷第 2 期(2002 年 4 月)：頁 97-121。
- 陳錫蕃，”南海軍機擦撞事件，”*國家政策論壇*，第 1 卷第 4 卷(2001 年 6 月)：頁 53-56。
- 陳鴻瑜，”美國自菲律賓撤軍及其與東南亞之安全關係，”*美國月刊*，第 8 卷第 3 期(1993 年 3 月)：頁 37-43。
- 陳鴻瑜，”後冷戰時期東南亞之區域安全，”*戰略與國際研究*，第 1 卷第 1 期(1999 年 1 月)：頁 16-58。
- 陳聯邦，”中共對台政策演變之研究 - 兼論一九九五年及九六年的軍事演習，”*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 年。
- 彭光謙，”中美關係的晴雨錶：彭光謙評述中美軍事關係，”*世界知識*，第 3 期(2004 年)。
- 鄒旺，”高新科技武器服役 國防整體實力增強，”*鏡報*(1999 年 9 月)。
- 郭華倫，”中共當權派之權力與路線鬥爭現勢，”*匪情月報*，第 21 卷第 11 期(1979 年 5 月)。
- 黃奎博，”冷戰後中共與東南亞國協之政治合作，”*國際關係學報*，第 15 期(2000 年 12 月)：頁 173-214。
- 董立文，”中共十六大人事的初步分析—令人困惑的後江時代與第四代，”*展望*

- 2003 年兩岸政經發展研討會，高雄，2002 年 12 月 1 日。
- 傅耀祖，”論鄧小平外交思想，”外交學院學報(1997 年 2 月)：頁 25-29。
- 程瑞聲，”論中國對亞太安全的新方針，”國際問題研究，第 3 期(1999 年)：頁 1-8。
- 楊志恆，”中共外交的策略與原則，”中國大陸研究，第 42 卷第 10 期(1999 年 10 月)：頁 29-43。
- 楊志恆，”中共近年對外軍事交流及其對我國國防安全之影響，”國家安全學術研討會，台北，1996 年 7 月，頁 1-14。
- 楊志恆，”中共軍事擴張戰略之探討，”國策期刊，1997 年 1 月 7 日。
- 楊志恆，”中共對外軍事交流對台海安全的影響，”新世紀中共解放軍與台海安全學術研討會，2000 年 1 月 14 日~15 日。
- 楊念祖，”軍隊角色，『鄧後中國大陸何去何從』研討會，”中國大陸研究，第 38 卷第 3 期(1995 年 3 月)：頁 21-25。
- 楊開煌，”中共『對台政策』解釋與評估—決策人物取向之研究，”東吳政治學報，第 7 期(1997 年 3 月)。
- 鄭大誠，”論中共新購之蘇愷 30 型戰機，”空軍學術月刊，第 533 期(2001 年 4 月)。
- 劉正慶，”中共大國外交政策形成與實踐之研究，”文化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2000 年。
- 劉振安，”小布希時期美中軍事交流之研究，”展望與探索，第 2 卷第 5 期(2004 年 5 月)：頁 23-43。
- 劉清波，”論中共『八二憲法』的『中央軍事委員會』，”共黨問題研究，第 26 卷第 1 期(2000 年 1 月)：頁 4-16。
- 謝昌生，”江澤民時期中共軍事外交戰略之研析，”共黨問題研究，第 25 卷第 7 期(1999 年 7 月)：頁 14-27。
- 歐錫富，”中(共)俄軍工改革與軍事合作，”跨世紀兩岸軍力發展與區域安全學術研討會，高雄，1999 年 4 月。
- 譚傳毅，”高技術條件下解放軍之作戰指導，”跨世紀兩岸軍力發展與區域安全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高雄，1999 年，頁 1-9。
- 韓璐，”美國處理中共飛彈演習之研究，”淡江大學美國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年。
- 羅冰，”對撞機事件處理有歧見，軍方拒表態支持江澤民，”爭鳴月刊，第 283 期(2001 年 5 月)：頁 8-10。

(三)報紙

”2003 中國軍事外交：聯合軍演受注目 參與維和加力，”*解放軍報*，2003 年 12 月 29 日。

”2004 年中國軍事外交更加活躍務實，”*解放軍報*，2004 年 12 月 20 日。

”2005 年中國軍事外交新思維，”*青年參考報*，2005 年 5 月 25 日。

元樂義，”殲八阻攔 EP-3 所為何來？”，*中國時報*，1991 年 4 月 5 日。

“廿年來軍隊建設的歷史經驗，”*文匯報*(香港)，1999 年 7 月 8 日，版 4。

”中共 M 族飛彈小檔案，”*中國時報*，1999 年 11 月 25 日，版 3。

“中共加緊和戰兩手策略逼我接受『一中』，”*中央日報*，2000 年 8 月 22 日。

“中共自信 50 年內成為『中型』強權，”*聯合報*，2000 年 7 月 4 日，版 5。

“中共計畫更動戰區戰略部署強化戰力，”*中央社*，2000 年 4 月 4 日。

“中共建第二座對台飛彈基地，”*中國時報*，1999 年 12 月 9 日，版 2。

”中共新組合顯示經改反腐決定，”*文? 報*(香港)，1997 年 9 月 21 日。

“中共解放軍 明年加薪 50%，”*中國時報*，2004 年 12 月 29 日。

“中法軍售充漢變數，”*中國時報*，1997 年 1 月 6 日，版 4。

“中美決增強軍事交流，”*文匯報*(香港)，1998 年 9 月 17 日，版 1。

”中俄北京宣言，”*人民日報*(北京)，2000 年 7 月 19 日，版 1。

“中俄在科索沃找到交集，”*中國時報*，1999 年 7 月 19 日，版 14。

”中俄實兵軍演精銳出五國觀觀摩”，*中央日報*，2005 年 8 月 22 日。

”中國大陸新屆軍委會 將著重科技建軍，”*中央社*，2003 年 3 月 16 日。

“中國共產黨章程，”*人民日報*(北京)，2002 年 9 月 19 日，版 1。

”中國向東盟論壇提交新安全觀立場文件，”*人民日報*(北京)，2002 年 8 月 2 日，版 3。

”中國青壯派解放軍不主張 4 年內和台灣決裂，”*中國時報*，2000 年 5 月 16 日，版 14。

”中國軍事外交步入新階段，”*解放軍報*(北京)，2002 年 9 月 23 日。

“日修事態法欲遏中國，”*解放軍報*(北京)，2006 年 1 月 16 日。

”六家中國公司涉嫌出售飛彈材料遭美國制裁，”*中央社*，2005 年 12 月 28 日。

“六國簽署上海合作組織宣言，”*中國時報*，2001 年 6 月 16 日，版 10。

王良能，”美新中亞戰略與上海合作組織，”*中國時報*，2001 年 6 月 26 日。

王衛星，”美國背信棄義禍莫大焉，評美國對台軍售，”*解放軍報*(北京)，2001 年 4 月 27 日。

“巴國發展核武 中共是藏鏡人，”*中國時報*，1998 年 5 月 30 日，版 7。

”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源，”*人民日報*(北京)，2000 年 5 月 23 日，版 2。

“正視中俄軍演的意涵與影響，”*中華日報*，2005年8月22日。

由冀，”中共對台政策與解放軍角色轉變，”*中國時報*，2002年12月18日。

古呂，”軍事熱線不熱北京避免受控，”*太陽報*(香港)，2005年10月24日。

“北京加緊建構國際抗美統一戰線，”*中國時報*，2001年5月15日，版13。

江澤民，”在慶祝建黨八十週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北京)，2001年7月2日，版1。

“江錢恩怨秘聞，”*蘋果日報*，1998年4月22日。

朱建陵，”共軍建置 聚焦台海 稱霸亞洲，”*中國時報*，2004年5月1日。

朱建陵，”處理撞機事件 中共軍方角色耐尋味，”*中國時報*，2001年4月9日，版13。

汪莉娟，2004年9月20日，”胡錦濤主要簡歷，”*聯合報*，版3。

沈佛光，”再論信息戰，”*中國國防報*，1998年10月18日，版3。

”我與塞內加爾斷交 邦交國數降為25國，”*聯合報*，2005年10月27日。

李登科，”務實外交走出中美斷交陰影，”*中央日報*，1998年12月28日，版3。

李棠生，”中售伊朗飛彈技術美跳腳，”*蘋果日報*，2003年5月24日。

“美軍機組人員回家了，”*中央日報*，2001年4月13日。

林火順，”由中共歷屆全國黨代表大會，談解放軍在中國大陸的政治角色，”*台灣新聞報*，2002年12月24日。

林火順，”淺談共軍參與政治活動原因與途徑，”*臺灣新聞報*，2002年12月24日。

吳明杰，”軍艦外交 國力展示，”*中國時報*，2005年2月21日。

吳明杰，”美強化對台軍售 中國干預力漸弱，”*中國時報*，2002年2月19日，版13。

吳釗燮，”美中危機軟著陸 台灣如何解讀因應，”*中國時報*，2001年4月12日。

“阿米塔吉指美中軍事交流幾乎回到原本情況，”*中央社*，2004年1月31日。

”胡錦濤掌對台決策陣容翻新，”*中央日報*，2003年6月23日。

“美國小鷹號航母訪港 將停留四天，”*人民日報*(北京)，2002年11月28日，版1。

“淡出北京政爭共軍角色蛻變，”*中央日報*，1998年2月20日。

“國防部外事辦公室負責人談『中國軍事外交，中國軍事外交呈現三特點交流合作趨向更加務實』，”*解放軍報*，2003年8月11日。

“國防部：對美造成我損失保留進一步交涉權利，”*人民日報*(北京)，2001年4月4日，版1。

“張萬年：撞機事件將循外交途徑解決”，*聯合早報*(新加坡)，2001年4月4日。

“連任中央軍委主席，江澤民選擇緩退，”*中國時報*，2002年11月15日，版11。
“逢先知，李捷，”*毛澤東與抗美援朝*，”*解放軍報*(北京)，2000年10月25日。
“軍方提『炸、封、登』解決台灣”，*大公報*(香港)，2005年8月2日。
“軍事外交 營造和平發展安全環境，”*解放軍報*(北京)，2005年12月29日。
“專家：中共對台飛彈 遠超過496枚，”*聯合報*，2004年3月29日，版13。
“專家指中共外交及安全政策制訂模式趨多元化，”*中央社*，2001年3月14日。
“傅全有會見巴空軍參謀長，”*解放軍報*(北京)，2001年2月18日，版1。
“*解放軍報*坦承中共軍隊官兵科學文化素質偏低，”*中央社*，2003年4月15日。
“撞機事件 解放軍態度比中央還強硬，”*聯合報*，2001年4月8日。
“發展合作才能獲得和平與繁榮，”*文匯報*(香港)，1997年12月16日，版4。

(四)網路資料

“一個中國的原則與台灣問題，”*陸委會網站*，2000年2月。
“2002年美國國防部中華人民共和國軍力報告，”*奇摩網*，2002年12月3日。
“2004年中國的國防，”*新華網*，2004年12月27日。
“2004年中國軍事外交回顧：更加活躍更趨務實，”*新華網*，2004年12月19日。
“2005年中國軍事外交『高與深』初露端倪，”*國際在線*，2005年2月2日。
“2005年：中國睦鄰外交譜新篇，”*新華網*，2005年12月7日。
“十六大報告全文，”*新華網*，2002年11月17日。
“八一七公報，”*陸委會網站*。
“大陸近五年軍購約6600億台幣，”*中廣新聞網*，2004年6月3日。
“上海合作組織成立宣言，”*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網站*，2001年6月15日。
“口峰，”*從撞機事件看中美角逐*，”*中國之春*，2001年5月。
“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新華網*，2002年3月26日。
“中日聯合聲明，”*新華網*，2002年3月26日。
“中巴兩國海軍在上海海域聯合軍演倍受各方矚目，”*青年參考*，2003年10月21日。
“中印軍事交流升級 海軍聯合演兵印度領海，”*人民網*，2005年11月30日。
“中印關係回顧，”*新華網*，2005年1月25日。
“中共打壓林信義取代王金平出席APEC，”*大紀元*，2005年11月9日。
“中共近兩年來的重大軍事演習一覽，”*新華網*，2004年9月25日。
“中美空中交鋒 年來日益頻繁，”*大紀元*，2001年4月7日。
“中美軍事交流大事紀，”*新華網*，2003年10月29日。

“『中美撞機』情蒐行家 卯上強硬對手，”*世界日報網*，2001年4月5日。

“中美聯合聲明(1997年10月)，”*新華網*，1997年10月29日。

“中俄聯盟權益之計 夥伴關係難持久，”*大紀元*，2005年8月28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法，”*人民網*，1997年3月14日。

“中華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十屆全國委員會第四次會議政治決議，”*新華網*，2006年3月13日。

“主動倡議加強接觸 印度想和中國搞聯合軍演，”*中國網*，2003年10月17日。

“中國印度舉行軍演提升兩大國安全互信，”*新浪網*，2005年12月2日。

“中國共產黨十六屆四中全會，”*北方網*，2004年9月26日。

“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屆五中全會舉行(會議公報全文)，”*中國網*，2005年10月11日。

“中國共產黨章程，”*新華網*，2002年11月18日。

“中國加速組建空降 16 軍阻遏台獨，”*多維社*，2003年8月25日。

“中國成為烏克蘭軍火第二大買主，”*美國之音中文網*，2005年1月1日。

“中國軍隊近年來涉外演習盤點，”*新華網*，2005年9月27日。

“中國和希臘發表建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新華網*，2006年1月19日。

“中朝雙邊關係，”*人民網*，2004年9月9日。

“反分裂國家法，”*人民網*，2005年3月14日。

“外交部發言人朱邦造談美國軍用偵察機撞毀中國軍用飛機事件真相和中方有關立場，”*人民日報(北京)*，2001年4月3日。

“外交部發言人要求美方在售台武器問題上慎重行事，”*新華網*，2001年4月24日。

“加強聯合反恐五國演兵中亞，”*新華網*，2003年8月6日。

民進黨，”*中共軍力基本報告*，”*東森新聞網*，2003年12月19日。

江天，”*解放軍對政治的影響力更大了*，”*大紀元*，2001年8月1日。

“江逞英雄朱背黑鍋，”*大紀元*，2001年4月12日。

“江澤民在中共十六大上的報告，”*新華網*，2003年11月8日。

“江澤民在紀念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二十週年大會上的講話，”*新華網*，2000年12月18日。

“江澤民胡錦濤出席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北方網*，2004年9月21日。

“江澤民遙控作主 朱熔基插不上手，”*大紀元*，2001年4月12日。

沈明室，”*中國共產黨之轉型及共軍『軍隊國家化』之探討*，”*和平論壇*，2003

年 10 月 20 日。

“抗美援朝大事記—中共中央決策出兵，”*新華網*，2005 年 10 月 19 日。

李大衛，”台海危機十週年 江澤民其人揭內幕，”*大紀元*，2006 年 3 月 9 日。

“我國港口集裝箱吞吐量有望 穩居世界第一，”*新華網*，2005 年 12 月 6 日。

林長盛，”槍桿子到底支援誰？，”<http://bjzc.org/bjs/bc/48/32>

”美軍太平洋總部司令：美中兩軍增加了解非常重要，”*新華網*，2006 年 5 月 15 日。

“美國正式致歉 中國同意放人，”*大紀元*，2001 年 4 月 11 日。

“美國國防部台海安全情勢報告全文，”2003 年 11 月 13 日，
<http://www.chenghaicity.com/mey/jimz/usth1.htm>

周文重，”努力推動中美建設性合作關係向前發展——紀念中美建交二十五周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網站*，2004 年 2 月 7 日。

“政治局學習：堅持國防與經濟建設協調發展，”*新華網*，2004 年 7 月 26 日。

”胡錦濤和卡拉姆互致賀電 祝賀中印友好年開始，”*中國網*，2006 年 1 月 1 日。

”胡錦濤參加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體學習，”*新華網*，2004 年 2 月 25 日。

“南韓議題紛紛踏訪中國 為國家安全選擇尋找答案，”*瞭望東方周刊網*，2005 年 5 月 27 日)。

莫大華，”美國亞太軍力調整對兩岸之影響，”*和平論壇*，2004 年 6 月 25 日。

莫大華，「政權轉移 VS 解放軍地位」座談會，遠景基金會會議紀錄摘要，2002 年 3 月 20 日。

”唐家璇外長談 2000 年的中國外交，”*新華網*，2000 年 12 月 28 日。

“孫玉璽稱美國表示‘遺憾’是朝正確方向邁出一步，”*人民網*，2001 年 4 月 5 日。

陳東龍，”如何界定『軍區』與『戰區』，”*東森新聞報*，2001 年 5 月 1 日。

”售伊朗武器材料 美制裁中國等 9 家企業，”*大紀元*，2005 年 12 月 28 日。

陳奎德，”從北韓核危機看北京外交方向，”*大紀元*，2003 年 8 月 1 日。

陳喬之，”美國重返東南亞及其對中國的影響，”*視野周刊網站*。

陳漢華，”短期內中共科技在國防安全面向的趨勢評估，”*中華民國外交部網站*，2004 年 8 月 13 日。

“張萬年遲浩田代表表示全面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 加速推進軍隊建設和改革，”*人民網*，2002 年 11 月 9 日。

“曹剛川希望美勿軍售台灣先進武器 未獲美國回應，”*東森新聞報*，2003 年 10 月 30。

“商務部投資促進事務局副局長顧傑在第九屆中國國際投資貿易洽談會香港推介

會上的講話，”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經濟部貿易處網站，2005年6月29日。

葉斯偉、吳佳玲，”由空中巴士看歐洲整合，”*認識歐洲*，第5期(2000年8月)。

“就美國政府宣佈將向台出售大量先進武器裝備，我政府向美方提出強烈抗議，”*新華網*，1998年8月2日。

“就美國偵察機撞毀中國軍用飛機事件外交部發言人發表談話，”*人民網*，2001年4月1日。

董立文，”中共十六大人事的初步分析—令人困惑的後江時代與第四代，*中山大學網站*，2002年12月1日。

“解放軍一度主導撞機事件決策權，”*大紀元*，2001年4月16日。

溫家寶，”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五十週年，”*解放軍報*(北京)，2004年6月29日，版4。

“新陣容新面貌新階段，”*新華網*，2006年4月27日。

“愛國主義實施綱要，”*新華網*，1994年8月23日。

廖文中，”中共軍力現代化對亞太地區之影響，”*和平論壇*，2004年6月25。

鄧謹，”中國發展戰略正式轉型，”*南方周末*(2006年3月9日)。

趙建民、許志嘉，”民進黨執政後中共對台外交孤立策略及其效果，”*和平論壇*，2005年10月26日

“擅長兩棲作戰的朱文泉出掌南京軍區，”*多維新聞網*，2002年11月22日。

“樹大國形象 2004年中國軍事外交更趨務實，”*新華網*，2004年12月19日。

魏靜，”從軍事合作看美日安保體制的重大變化，”*國際在線*，2004年9月27日。

“關於三支兩軍若干問題的決定，”*人民網*，1972年8月21日。

“關於建立致力於和平與發展的友好合作關係，”*新華網*，2002年3月26日。

二、英文參考資料

(一)書籍

- Allen, Kenneth W. and Eric A. McVadon. *China's Foreign Military Relations*. Washington, D.C. : Henry L. Stimson Center, 1999.
- Allison, Graham and Philip Zelikow, *Essence of Decision: Ex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2. nd. ed. New York: Longman, 1999.
- Allison, Graham T.. *Essence of Decision: Ex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Boston: Little, Brown & Company, 1971.
- Allen, Kenneth W. and Eric A. McVadon. *China's Foreign Military Relations*.

- Washington D.C: The Herry L. Stimson Center, Oct. 1999.
- Bachman, David. *Bureaucracy, Economy, and Leadership in China: The Institutional Origins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 Barnett, Doak. *The Making of Foreign Policy in China: Structure and Process*.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85.
- Bullard, Monte R.. *China's Political-Military Evolution: The Party and Military in the PRC, 1960-1984* .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85.
- Campbell, Angus, Philip E. Converse, William E. Miller, and Daniel Stokes. *The American Vote*. New York: Wiley, 1960.
- Chang, Jaw-Lin. *A Retrospective Evaluation of Decision-Making Models in US Foreign Policy*. Ann Arbor, Michigan: 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 1985.
- Economy, Elizabeth and Michel Oksenberg eds.. *China Joins the World*.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1999.
- Eftimiades, Nicholas. *Chinese Intelligence Operation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4.
- Department of Defense of the United States, *Report of th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Washington: Department of Defense, 1997.
- Fairbank, John K. and Edwin O. Reishauer. *China: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 1989.
- Flanagan, Stephen J. and Michael E.Marti.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nd China in Transtion*.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Washington, D.C., 2003.
- John Garver, *Face Off: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s Democratization*. Seattle, W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7.
- Gittings, John. *The Role of Chinese Army* .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 Goodman, David S. G., and Gerald Segal (eds.), *China Rising: Nationalism and Interdependence*. London: Routledge, 1997.
- Gurtov, Melvin, and Byong-Moo Hwang. *China's Security: The New Roles of the Military*. Boulder, Colorad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8.
- Gurtov, Melvin and Byong-moo Hwang. *China under Threat*.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0.
- Harding, Harry. *China's Second Revolution: Reform After Mao*. Washington, D. C.:

- The Brooking Institution, 1987.
- Harding, Harry ed..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in the 1980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 Hamrin ,Carlo Lee and Sui Sheng Zhao. *Decision Making in Deng's China: Perspectives from Insiders*. N.Y.: M.E. Sharpe, Inc., 1995.
- Huntington, Samuel P.. *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 The Theory and Politics of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 Jencks, Harlan W.. *From Muskets to Missiles: Politics and Professionalism in the Chinese Army, 1945-1981* .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82.
- Joffe, Ellis. *Party and Army: Professionalism and Political Control in the Chinese Officer Corps, 1949-1964*.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1971.
- Joffe, Ellis. *The Chinese Army after Mao*.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 Khalilzad, Zalmay. *The United States and Asia: Towards a New U.S. Strategy and Force Posture*. California: RAND Corporation , 2001.
- Kissinger, Henry. *Diplomac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4.
- Lampton, David M.. *The Making of Chinese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in the Era of Reform*. Standford: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Lee, Ngok. *China's Defence Modernisation and Military Leadership*. Rushcutters Bay: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1989.
- Lampton, David M. ed., *The Making of Chinese and Security Policy in the Era of Reform*.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Lieberthal, Kenneth. *Governing China: From Revolution through Reform*. New York and London: WW Norton & Company, 1995.
- Liberthal, Kenneth and Michel Oksenberg. *Policy Making in China : leaders, structures, and process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 Lilley, James R. and David Shambaugh (eds). *China's Military Faces the Future*. Washington DC: AEI and M. E. Sharpe, 1999.
- Liu, Alan P.. *How china is Ruled*.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 1986,
- Ning, Lu. *The Dynamics of 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ing in China*. Boulder:

- Westview Press, 1997.
- Macridis, Roy C.. *Foreign Policy In World Politics*. N.J.: Prentice Hall, 1992.
- Melvin, Gurtov, and Hwang, Byong-moo. *China under Threat*.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0.
- Mulvenon, James C.. *Professionalization of the Senior Chinese Officer Corps: Trends and Implications*. Santa Monica: RAND, 1997.
- Mulvenon, James C. and Richard Yang eds., *Truth From Facts: A Retrospective on Chinese Military in the Post-Mao Era*. Santa Monica, CA: Rand, 2001.
- Mulvenon, J.C, and Richard. Yang. Yang.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in the Information Age*. Santa Monica, California: Rand Corporation, 1999.
- Nicolson, Harold. *Diplomacy*, 3rd.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 Ning, Lu. *The Dynamics of 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ing in China*.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7.
- Perlmutter, Amos. *The Military and Politics in Modern Tim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7.
- Pflezgraff, Robert L. and James E. Dougherty. *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J.B. Lippincott Company, 1971.
- Plischke, Elmer. *Modern Diplomacy: The Art and the Artisans*. Washington, D.C.: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1979.
- Roberts, Jonathan M.. *Decision-Making during International Crisi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8.
- Robinson, Thomas W. and David Shambaugh. *Chinese Foreig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7.
- Shambaugh, David. *Modernizing China's Military: Progress, Problems and Prospects*. California: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 Shambaugh, David ed.. *The American of Study of Contemporary China*. Armonk, N. Y.: M. E. Sharpe, 1993.
- Simon, Herbert A.. *Administrative Behavior-Astudy of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in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1976.
- Snyder, Glenn. H. and Paul Diesing, *Conflict Among Nations : Bargaining, Decision Making and System Structure in International Cris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 Suettinger, Robert L. *Beyond Tiananmen: The Politics of U.S.-China Relations*,

- 1989-2000.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2003.
- Swaine, Michael D. and Ashley J. Tellis. *Interpreting China's Grand Strateg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Rand, 2000.
- Swaine, Michael D.. *China: Domestic Chang and Foreign Policy*. Santa Monica, California: Rand Corporation, 1995.
- Swaine, Michael D. *The Military and Political Succession in China: Leadership, Institutions, Beliefs*. Santa Monica: Rand, 1992.
- Swaine, Mickael D.. *The Role of the Chinese Military i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making*. Santa Monica, California: Rand Corporation , 1996.
- The Military & Political Succession in China-Leadership Institutions Beliefs*. Santa Monica, California: Rand Corporation, 1992.
- Waltz, Kenneth N.. *Man, the State, and W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 Waltz, Kenneth 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assachusetts: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 Wasserman, Paul and Fred S. Silander. *Decision-Making: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 NY: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Cornell University, 1958.
- Wortzel, Larry M. ed.. *The Chinese Armed Forces in the 21st Century*. arlisle, PA: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U.S. Army War College, 2000.

(二)期刊論文

- Ashton, William. "Burma's armed forces: preparing for the 21st century," *James Intelligence Review*, Vo.110 No.11(November 1998):28-31.
- Bachman, David. "The Limits on Leadership in China," *Asian Survey*, Vol. XXXII, No. 11(November 1992): 1046-1062.
- Baum, Richard. "China after Deng: Ten Scenarios in Search of Reality,"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45(March 1996): 153-175.
- Bickford, Thomas A.. "Regularization and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n Assessment of Change," *Asian Survey*, Vol. XL, No. 3(May/June 2000): 456-474.
- Brecher, Michael et al.. "A Framework For Research on Foreign Policy Behavior,"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utlion*, Vol.13, No.1 (March 1969):75-101.

- Bullard, Monte R., and Edward C. O' Dowd. "Defining the Role of the PLA in the Post-Mao Era," *Asian Survey*, Vol. XXVI, No. 6(June 1986): 706-720.
- Cheng, Li, and Lynn White. "The Army in the Succession to Deng Xiaoping: Familiar Fealties and Technocratic Trends," *Asian Survey*, Vol. XXXIII, No. 8(August 1993): 757-786.
- Cheng, Li. "Jiang Zemin's Successors: The Rise of the Fourth Generation of Leaders in the PRC,"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61(March 2000): 1-40.
- "Demobilization: The Dialects of PLA Troop Reduc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46(June1996): 336-359.
- Ding, Arthur. "The PLA and New Generation of Chinese Leadership," *CAPS-RA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PLA Affairs*, U.S.A., August 15-16, 2003.
- Dreyer, June Teufel.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omparative Strategy*, Vol. 5, No. 1(1985): 27-50.
- Gause, Ken E.. "China's Policy Towards Taiwan," *Jane's Intelligence Review*, Vol.7, No.12, (December 1995):561-566.
- Godwin, Paul H. B.. "From Continent to Periphery: PLA Doctrine, Strategy and Capabilities Towards 2000,"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46(June 1996): 464-487.
- Foley, Corazon S.. "Contending Perspectives: Southeast Asia and American Views on a Rising China," *US Army War College*, August 2005, 1-5.
- Godwin, Paul H. B.. "Preserving the PLA's Soul: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and the New Generation of Chinese Leadership," *CAPS-RA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PLA Affairs*, U.S.A., August 15-16, 2003.
- Halperin, Morton H., and John Wilson Lewis. "New Tensions in Army-Party Relations in China, 1965-66," *The China Quarterly*, No. 26(April-June 1966): 58-67.
- Holsti, Ole R.. "Model of International and Foreign Policy," *Diplomatic History*, Vol.13, No.1(Winter 1989): 15-43.
- Huang, Xiaoming. "Managing Fluctuations in U.S.-China Relations: World Politics, National Priorities, and Policy Leadership," *Asian Survey*, Vol. XL, No. 2(March/April 2000): 269-295.
- Ji, You. "Jiang Zemin's Command of the Military," *The China Journal*, Issue 45(January 2001): 131-138.

- Joffe, Ellis and Gerald Segal. "The Chinese Army and Professionalism," *Problems of Communism*, Vol. XXVII(Nov-Dec 1978): 1-19.
- Joffe, Ellis. "The Chinese Army after the Culture Revolution: The Effects of Interven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No.55(July/September 1973):450-477.
- Joffe, Ellis. "Party and Military in China: Professionalism in Command?," *Problems of Communism*, Vol. XXXII(September-October 1983): 48-63.
- Joffe, Ellis. "Party-Army Relations in China: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46(June 1996): 299-314.
- Kim, Samuel S.. "The Maoist Image of World Order," *World Order Studies Program Paper*, Princeton University(1977).
- Kitfield, James. "Dragon, Eagle, and Rising Sun," *Air Force Magazine*(June 2005): 62-66.
- Lewis, John W., Hua Di and Xue Litai. "Beijing's Defense Establishment: Solving the Arms-Export Enigm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5, No.4(Spring 1991):87-109.
- Li, Nan. "Organizational Changes in the PLA, 1985-1997,"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58(June 1999): 314-349.
- Li, Nan. "From Revolutionary Internationalism to Conservative Nationalism: The Chinese Military's Discourse on National Security and Identity in the Post-Mao Era,"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May 2001).
- McClaran, John P.. "U.S. Arms Sales to Taiwan: Implications for the Future of the Sino-U.S. Relationship," *Asian Survey*, Vol. XL, No. 4(July/August 2000): 622-640.
- Munro, Ross H.. "Awakening Dragon: The Real Danger in Asia is From China," *Policy Review*, No.62(Fall 1992):10-16.
- Nethercut, Richard D.. "Deng and the Gun: Party-Military Relation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ian Survey*, Vol. XXII, No. 8(August 1982): 691-704.
- Nelsen, Harvey W.. "Military Bureaucracy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sian Survey*, Vol. XIV, No.4(April 1974): 372-395.
- Qimao, Chen.. "The Taiwan Strait Crisis: Its Crux and Solutions," *Asian Survey*, Vol.XXXVI, No. 11, (November 1996): 1055-1058.
- Overbolt, William H.. "China After Deng," *Foreign Affairs*, Vol. 75, No. 3(May/June 1996): 63-78.

- Pultz, Christopher B.. "The PLA and China's Changing Security Environment," *Strategic Insights*, Volume II, Issue 1 (January 2003).
- Pye, Lucian W.. "Jiang Zemin's Style of Rule: Go For Stability, Monopolize Power and Settle for Limited Effectiveness," *The China Journal*, Issue 45(January 2001): 45-52.
- Pye, Lucian W. "Mao's Tse-tung's Leadership Style,"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91, No.2(Summer 1976), 219-235.
- Scobell, Andrew. "Show of Force: The PLA and the 1995-1996 Taiwan Strait Crisi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15, No. 2(Summer 2000), 227-246.
- Shambaugh, David.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Research Bureaucracy,"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10(June 1987): 276-304.
- Shambaugh, David. "China's Military in Transition: Politics, Professionalism, Procurement and Power Projec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46(June 1996): 265-298.
- Shichor, Yitzhak. "China and the Gulf Crisis," *Problems of Communism*, Vol. XL(November-December 1991): 80-90.
- Shirk, Susan L.. "Will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Party Leadership Survive the 2002-03 Succession?," *The China Journal*, Issue 45(January 2001): 139-142.
- Swaine, Michael D.. "The PLA and Chinese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Leadership, Structures, Processes,"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46(June 1996): 315-335.
- "The Fifteenth National Party Congress: Jiang Takes Command?,"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53(March 1998): 141-156.
- "The New Officer Crops: Implications for the Future,"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46(June 1996): 315-335.
- "The Party, the Government and the Gun," *Asian Survey*, Vol. X, No. 7(June 1970): 441-471.
-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at 50: Reform at Last,"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59(September 1999): 660-672.
- "The PLA and the Power Struggle of 1989," *Problems of Communism*, Vol. XXXVIII(September-October 1989): 41-48.
- "The PLA's Evolving Warfighting Doctrine, Strategy and Tactics, 1985-95: A Chinese Perspective,"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46(June 1996): 443-465.
- "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in the Formation of Revolutionary Committees 1967-68,"

- The China Quarterly*, No. 44(October-December 1970): 112-145.
- “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 in China: The Political Work System in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27(September 1991): 527-568.
- Waltz, Kenneth N.. "The Emerging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8, No.2(Fall 1993):66-69.
- Whiting, Allen S..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Foreign Policy after Deng,”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42(June 1995): 295-316.
- Yuan, Jing-dong. “Sino-US Military Relations Since Tiananmen: Restoration, Progress, and Pitfalls, Parameters,” *US Army War College Quarterly*, Vol. XXXIII, No. 1 (Spring 2003): 51-67
- Zhe, Sun. “China’s Foreign Policy: System Transformation, Policy Formulation Proces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Decision-making,” *CSIS*, Volume 1(January 30, 2004).

(三)報紙

- Cliff, Rogger. “Beware Beijing's Military Ambitions,” *Los Angeles Times*, August 7, 2005.
- Hwang, Balbina Y.. “Resolving the North Korean Nuclear Issue,” *Heritage Foundation*, May 8, 2003.
- Isenberg, David. “How Russia keeps China armed?,” *Asia Time*, Nov 19, 2004.
- "U.S. Seeks to Lift Sanctions on India," *Washington Post*, August 12, 2001, A01.
- Lam, Willy. “Diplomatic Pain, Political Gain for Jiang,” *CNN*, April 11, 2001.
- “Powell: 'We regret' Chinese pilot's loss,” *CNN*, April 4, 2001.
- “The letter that led to release of U.S. crew,” *CNN*, April 11, 2001.

(四)網路資料

- Byman, Daniel L. and Roger Cliff. “China's Arms Sales: Motivations and Implications,” 1999, <http://www.rand.org/publications/MR/MR1119/index.html>
- Flanagan, Stephen J, and Michael E. Marti(eds.).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nd China in TransitionI*, 2003,
http://www.ndu.edu/inss/books/Books_2003/China/PLA_and_China_Transition.pdf
- Kaiser, Robert G.. "2025 Vision: A China Bent On Asian Dominance," *Washington*

- Post*, March 17, 2000.
- Mulvenon, James C. and Andrew N. D. Yang (eds.).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A Retrospective on Chinese Military Studies in the Post-Mao Era,"
<http://www.rand.org/publications/CF/CF160/>.
- "PLA chief meets with U.S. deputy secretary of state," *embass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 Dec 11, 2002.
- "President Bush, Chinese President Jiang Zemin Discuss Iraq, N. Korea ," *whitehouse*,
 October 25, 2002.
- Scobell, Andrew. "Chinese Army Building in the Era of Jiang Zemin,"
<http://carlisle-www.army.mil/usassi/ssipubs/pubs2000/chinarmy/chinarmy.pdf>.
- Swaine, Michael D.. *The Role of the Chinese Military i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making*, 1998, <http://www.rand.org/publications>.
-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Annual Report on The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Report to Congress Pursuant for the FY2000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2005,
<http://www.defenselink.mil/pubs/d20050719PRC.pdf>
-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Annual Report on The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Report to Congress Pursuant for the FY2000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2004,
<http://www.defenselink.mil/pubs/d20040528PRC.pdf>
-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Annual Report on The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Report to Congress Pursuant for the FY2000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2003,
<http://www.defenselink.mil/pubs/20030730chinaex.pdf>
- Wortzel, Larry M., ed.. *The Chinese Armed Forces in the 21st Century*, 2000,
<http://carlisle-www.army.mil/usassi/ssipubs/pubs99/chinese/chinese.pdf>